延安訪問記

陳學昭著

延安訪問記

陳學昭著

·IANAN FANGWENGI

延安訪問記

著者　陳學昭

印行者　北極書店

實價：國幣二元

（內地酌加郵運費及匯水　成）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極0120

目錄

一 成渝路中與成都的兩週生活

統一戰線剛成的時候，延安曾到過國內外新聞記者的訪問——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先生——美記者史諾先生——各種性質不同的團體的參觀，也有一個二個人單獨地來探奇的，大約稍稍關心國事的人，對於彼時延安的介紹，總已有了一點影子。此後，蘆溝橋事起，我國為抵制強敵不斷的侵略，發動了神聖的全面抗戰，以前的紅軍，即改編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也就是第十八集團軍的一部分），出赴山西一帶作戰，當第一次，去年九月二十五日平型關一役，博得全國的讚揚；可是在另一方面，抗戰已經一年多了，在一般人的腦子中，延安依然是很神祕的，好比一幅圖畫，只見到一角，不見整個。延安是不是這樣的神祕古怪？統一戰線後的延安，可有什麼改變？及抗戰中的延安，是怎樣的動態？特別是，那裏的人是怎樣生活着的？這些都是我想知道而不得的。結果，我決定跑到延安去作一個短時間的逗留，我想我的疑問或者會得到一個清楚的回答。

人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可是我個人的經驗，入蜀並不是頂困難的，雖然我沒有坐着船的幸運，不過如果能想法買到船票，坐着外輪，那麼由漢口動身，九天工夫就可到重慶了（我說的是去年十二月裏的情形）。上重慶碼頭的石級，怕是那次入川的人感到最難受的一件事情；此外那皮包骨頭的轎夫會使你起異樣的感覺。

在重慶，我留了一共近兩個月，其間我曾在涪陵的鄉下居住了四個多月，我很高興我在四川的鄉間生活，可以說我自有生以來，從沒有接近過那樣的農村：四周只有稀稀的草屋，沒有一家店舖，家駐於狹隘的山路上的，就是那些赤脚的下田的男女同胞，他們是那樣的質樸，天真，辛勤，他

們又那樣的貪苦，絕對不能以江浙的農人來比的。眞的，不到四川，不知四川農村的苦。江浙的農人，有時會得穿起綢衣，皮掛，下雨的時候，穿上了一雙套鞋；可是四川的農人的生活，決不是江浙農人所能想像的，吃的是雜糧，蠶豆，山芋；吃玉蜀黍已算是好的，穿的是補成千塊的破衣。離涪陵三百里的重慶，那一切完全就不同了。逃難的人源源的來，旅館裏塞滿了人，街路上，店鋪裏，飯店裏……沒有一個地方不塞滿了人。一間沒有上海的亭子間那樣大却十分暗黑的房間，要十五元一月的房租，而且要先付的。許多穿着華美衣服的男女老幼，在街頭，在戲院門口，一羣羣的走着，立着，總要以爲有盛大的什麼會似的。飯館門口停着許多輛掛着「防空」的汽車，在青年會旁邊的京菜館燕市酒家，星期六的晚上，除非在五點鐘之前去，否則，找不到一個座位。大家用暢了錢，大家賺够了錢。但是你假定有感情，你一定會起一種異樣的感覺，感覺重慶的生活是寒熱的生活，而不是健康正則的生活，一切都在發着寒熱。眞實的說，我不愛重慶這樣的生活，我覺得不是戰時所該有的，尤其是在爲了抵抗外來侵略的一個自衛戰爭的時候，這個現象將是很羞恥的。我急於想離開重慶，但在另一方面，我是依戀着重慶的，那些朋友，他們對我太好了，爲了來接我，渡船觸礁，幾乎淹死的濟安先生與趙學廣先生，同他的夫人，使我感愧，不安到極點！別離了十多年的鴻明姊，居然在重慶會面，她的眞摯，她的友情，一如往昔，那一天的晚宴，更使我感動的，是桌子上有杭州蒓菜湯與昆明的火腿（她說以代替金華火腿的）。我們談了些巴黎的前後舊友，有的已死了，談着當年在北平時的一切，那時我們的遊蹤，北海，三貝子花園，陶然亭……我眞的感激她那樣熱情熱意留我住在重慶，可是我還是走了，鴻明姊，我想你一定會原恕我的罷。

從重慶到成都去的公路，汽車每天頂多只開三輛，旅客已登記到八月初。雖然一切都還是人情問題，但我不耐煩等待下去，也不想去走脚路弄票子（因爲脚路之上還有脚路，除非是頂大的脚路）

靠了一位識事務的朋友的幫助，想出了一個妙計：由重慶坐船到嘉定，由嘉定再坐公共汽車到成都，這是繞了圈子。照我們以理推想，繞圈子的人一定不會多的。六月三十日的下午五時我上了××公司的××輪，出於我的意料之外，統艙裏早已擠滿了人，沒有一個空隙，人家還是午後一時就來占住鋪位的，沒奈何，只好在烟筒旁邊，鋪下了我的睡位，糊亂的睡一夜。次日早上五時，船開了，馬達的聲音同烟筒所發出的熱氣把我驚醒過來，雖然有風，可是那熱氣簡直把我烘得頭暈。最令我失望的是旅客大都份都是走長路的，並且竟有好幾個南渝中學的學生是要由嘉定再轉成都的。

在這隻船上，有好幾個自江浙流亡出來的家庭，有一個無錫人，夫婦倆帶了三個孩子，大的只有五歲。無錫我曾住過一年半，對這個城市留得極好的印象，工商業發達，知識開通，文化水準相當的高。我同他們就談起無錫來了。

「現在無錫出來的人回去的很多，聽說公花園一帶被日本人燒掉的房子現在又建造起來了，又好做生意了。」他說。

我同他談到無錫的偽維持會：他說着他同族的一個工業家：「怎麼他會做這個事？愛錢，他不好早點把他的工廠搬到後方麼？他不是還可以賺錢，而且更加賺得多呢！現在的布比從前貴了幾倍。他那些工廠呢？」

「工廠都給日本人收去了。無錫沒有失掉以前，維持會的人早已安排定當。他做會長總比江北人來做好些，現在各處失地都有維持會，恐怕辦得要算無錫的最好了。」他說。

我聽了他的話不知該笑還該哭，這位先生自然不能代表所有的無錫人，不過可以代表一小部份人的看法，代表一小部份人只知道賺錢，做買賣，沒有絲毫國家民族觀念，把做漢奸也當是一件生意經的！

一號的晚上，到了瀘縣，這是我一個朋友的故鄉，因此這地方對於我更有興趣。上岸在公園裏走了一個圈子，就去吃晚飯。瀘縣的馬路很寬闊，市面熱鬧，人也極擠，都是我所意想不到的。我愛到一地去問一地的物價，就走進一家雜貨舖裏，那些重慶很貴的香肥皂，在瀘縣還沒有漲價，特別是熱水壺，價値比漢口也還便宜。這些當然都是陳貨，但是爲什麽還沒有漲價？也許是銷路不暢，也許是他們不識市面。結果我買了幾塊香皂，就回到船上。那晚船停歇在瀘縣。瀘縣雖是山城，但沒有石級要爬，所以給了我極好的印象。

所乘的輪船掛牌直放嘉定，問了公司也得到同樣的回答。可是船到敍府，船上的人把旅客全部趕下船來，托言水小，船不能行，當夜叫旅客換票，又說嘉定已有小火輪下來，上水的旅客都可接着發輪。原輪呢，明天一早開回重慶去。

旅客們大家下了船，把行李搬到囘船上，等待小火輪到來。過了一夜，次日早上，小火輪總是不來，大家開始懊悔，而忿慨起來，可是原輪早已溜掉，去同那一個算賬呢？囘船上的人是不能負責的。

那天夜裏，大家七顚八倒的躺在囘船的地板上，臭虫從地板上，壁板縫裏，四面八方的聚攏來，一捉就是十幾個，那數量實在驚人。那夜我就沒有閤上一眼，不停地捉臭虫，別的人也不能安睡，大家嘆氣，抓癢，咒咀那船上的辦事人。

天下起雨來了，沉沉不斷的四川的雨，對於這一羣旅客，更加上了一層失意的打擊，一個華西大學的學生同兩個南渝中學的學生提議說：

「輪船把我們抛在這裏，今天我們化錢吃飯，這都是我們預算了的？實在我們可以要求囘船上給我們開飯」。

他們的提議立刻得到了全體旅客的回答：「要得！要得！」馬上推了八個代表去見國船主任，國船主任回答說他不能作主。大家商議了一下後，決定去輪船公司，好得公司就在碼頭上。

「經理先生還沒有來。」公司裏一個出來回答。

「怎麼到現在還不來，辦公時間早上八時起，現在已九點多了。」「在什麼地方？」「差人去叫他來。」代表們說。

公司裏面走出了一個高個子穿短衣褲的人來：「什麼？有話對我說，我去轉達經理。」

「你說經理不在呀，倒底在不在？你不要敷衍我們！」

這個穿短衣的人沒有法子了，只好聽代表們夾忿急慨的敍述。

穿短衣的人回進去了一歇走出來說：「公司裏不能給你們開飯，貼發你們飯錢，好不好？」

「也好，」大家馬上說。但是貼發多少呢？經過一陣商量之後，以果合算，統艙每天每人伙食五角，要求貼還五角是很合理的。公司終也同意了。可是坐房艙的人也只發五角，照船上的規矩，坐統艙吃房艙飯的，每天加四角，那麼坐房艙的人不是該有九角伙食發還麼？結果因爲房艙客少，要求與爭論終歸徒然。

午飯時，大家上菜館去吃飯，雖然給臭虫擾了一夜，這一頓午飯，却使我對敍府的印象變好了許多，化了三角錢吃了一大飽：一角六分一隻炒腰花，一角錢一隻肚湯，四分錢飯。腰花一大盤，肚湯一大碗，至少可吃四個人。四川內地的生活與江浙一帶的生活程度比較，眞是相差了好幾倍。

小火輪到了晚上七時才到，這就是我們該換的上水輪船。那是一隻很小很小的輪船，沒有房艙，大家像鯗魚一樣的疊在狹小的統艙裏。剛剛搬上行李，舖舖位，喘息未定的時候，船上的茶房來查票，同我們轉船的旅客，吵起來了。原來我們轉船過來的有卅多人，敍府民生公司方面會聲明我

們卅多人有占艙位的優先權，要等我們舖好艙位之後，見有空的才得售票。可是公司方面對於這話食言了。他們盡量售票，而這批新客人待小火輪一到，就爭先上去，使我們轉船的人還是擠得毫無辦法，連脚都伸不直。但是我們只不過感慨一下，而沒有正式提出抗議。那曉得公司方面，大約不甘心五角錢伙食的發回，叫茶房出來與我們尋事，我們中的一個旅客（從前是某大學教授），他捷足先登，占了一個好位置，所謂好位置，就在統艙地上的一條長而高的櫃上，正在滿意的舖被頭，茶房來查票，查到他，叫他搬下來，聲言這是船上職員睡的地方，這一下，爭執可起來了，我們轉船過來的全體旅客，都幫助這個大學教授。本來，由敘府上來有兩個老太婆，他們帶着裝滿了香的大網籃，上峨嵋山去燒香，她們把她們的網籃以及小包大包，在她們的四周像佈起了鐵絲網，而在她們的裏面有坐有躺的。兩個人，占住了至少有五個人的地位，大家心裏雖然有些不樂意，可是爲了她們的年齡而寬恕她們，一個學生請她們把網籃移緊一點，她們大聲的吼駡起來，反把網籃往學生這邊推，這個學生也只好笑笑不出聲了。這一對老太婆使我忽然回憶到十幾年前我在京寧車上遇到的老太婆，爲了請她讓一點位置，她索性把身體倒在我身上睡覺。我們對茶房說請他轉達我們的要求爲了優待這兩位年老的燒香太太，請把她們安置到經理室去，我們並不一定要占住這個櫃子，只要地下有空，大學教授馬上會下來。

「我們沒有辦法！」茶房說。

「我問你，你們要錢就有辦法！」一個旅客說。

一陣鬨笑，茶房只好走了。

一歇後，兩個航警，他們背起手鎗，向大學教授說：「這是我們的舖位，下來，下來！」

「你們是不是船上的？」

「不管，我叫你下來！」

他們聲勢洶洶，而且還帶點流氓氣。

大學教授一個人應付不過，他們竟想把他硬拖下來了，我們羣起對付，畢竟多數人的力量是不可侮的，這兩個流氓也只好悻悻然走了。

我們還等待着有第三次麻煩來，倒沒有。

以前我是很愛好旅行的，但是年齡的增長，或者是固定的生活會使你減少這種旅行的愛好，而眷戀着安定生活，但我終究確信，你讀過對這個地方的十部書，終不及你自己到這個地方去旅行一下。

船上的事，大家除吃了睡，睡了吃外，餘下的是同這些差不多的頂物質的事情。有的人找些書同雜誌看看——船上有一個圖書庫——，有的人呆看着山水，有的人簡直儘睡覺。在我旁邊一家鎭江人，老夫婦帶着二子一姪，稍微遇到一點刺激，就嘆息起他們的流亡生活來，他們是從敵機的機關鎗掃射下逃出來的，在南京開的店舖給敵人占去了，兩個老人，好幾次爲了沒有把賬簿帶走，相互埋怨，而爭執起了。

「好了，你們逃出了命也很運氣了！」旁邊的人勸說。

最使我發生興趣的，是那兩個去燒香的老太婆，每當開飯以前，小桌子剛剛擺起，她們倆就沒命的，往網籃底下找些醬燒雞，罐頭牛肉。她們的香底下，裝滿了這些美味。吃飯時，她們儘量咀嚼着吃，張着兩隻瞇迷的眼睛，眞的，那神氣，進入了無憂世界，極樂天國去了。

半路上來了一羣到嘉定去會考的初中女生，由幾個教員帶領着，船上是那麼的擠，她們只好往一點點的空隙中去擠，有三個就擠在老太婆的香網籃旁邊，船顚簸得很利害，一下子站不穩，她們

三個人坐到在網籃上來了，她們伸伸舌頭，趕快站起來，這一下，可把所有的旅客都引得大笑了，兩個老太婆嘴裏嘰嘰咕咕不知在說些什麼。

由敍府上嘉定，岷江的水流越來越急劇，一個一個的大旋渦，使你望見了要頭昏，有的人竟會因顛動而難過起來，更可怕的，船的行駛，像一個醉鬼的東傾西斜，好幾次船尾差一點要碰到邊岸的石塊了，岸上的樹枝從我們臉上擦過去，旅客大家透了一口氣。雖然你淸楚的望得見淸秀筆立的四川特有的山，山坡上的玉蜀黍，蘆蔗，麥子同高粱，但是那死的恐怖時時刻刻會逼上你的心頭，像在大風浪的印度洋裏一樣。

沿江的山上，有時坐着一個農人，他悠閑的神情，令人想到王維詩中所描寫的。其實呢，與其說這個農人悠閑神情，還不如說是我的悠閑的心情。這一帶江上，有木船行駛，他們很多人，兩人一排的搖着，爲了水急，上水是很困難的，他們拚命的搖，口裏齊聲喊着，有的人一絲不掛。我在法國時，曾見到電影中，外人攝去演映的：「揚子江上的船夫」，而比擬從前的「伏爾加船夫」。當我們小輪過去時，木船就顛動得很利害，快要翻了那樣，聽說有時候，的確也有翻了的。

終於在七月七的午後五時左右，到了嘉定，一尊極大的佛像，高高的刻在山上，隔着江遙對嘉定城，這是嘉定的標記。船停在江心，旅客由小船過渡靠岸。在船上望嘉定，是一個可愛的小小山城。我說是小小，在四川，這却是內地的一個大山城了。經過了一翻紛擾，我也帶了行李過渡，上了岸。上岸後，經過了一翻嚴密的盤問與檢查，爲了防止漢奸活動，這也是該當的。但不知爲什麼對於一些非四川口音的旅客，盤問特嚴，他們盤問着，好似還不知道我國的抗戰，也不知道這次因了反抗侵略戰爭，同胞們有極大的移動。盤查完畢，才把行李裝上黃包車往旅館去。

我住在一個新開的名叫東頭賓館裏，裏面有一個園子，滿栽花木、茶閣臨着嘉陵江，風景是够

美麗的。但是房間卻一間也沒有了。靠了那兩個年青的朋友（南渝中學學生），他們用本地話去同老板交涉，結果，老板答應讓一間很小很小的房間給我，沒有牀鋪，給我放一隻帆布牀，那兩個學生呢，只好睡在茶閣空樓的地板上。

在旅館的花園裏吃晚飯，吃到比重慶便宜的魚。晚飯後，馬上出去探聽上成都的公共汽車。嘉定有一條水門打馬路，兩旁的店舖都還整齊。公共汽車站在城外，到那裏問訊了一下以後把我上成都的整個希望拋到了深沉的海底。他們的回答是這樣：「車子也不一定有的，頂多是開三輛，或者兩輛，或者一輛。我們不用登記手續，登記手續以前用過的，但是結果是，登記的人不來買票，不登記的人來搶票，所以不登記了，登記也是無用的」。

「那麼怎樣辦呢？」

「現在就是發牌子，早上五點發牌子，六點賣票。可是人家在半夜十一點，十二點，就來我們售票的門口等待了，有的搬了木板索性睡在售票門外，有的唱歌，有的說笑，你看怎麼辦？弄得我們睡也不能睡！」站上的職員一邊笑，一邊說，一邊做着鬼臉，「你知道，現在嘉定旅館裏還留有三百多人，在等待坐上成都去的汽車」。接着，他說：「看你們的幸運罷，早點來搶牌子就是了」。

回到旅館裏，商量辦法，看來明天是走不成的分兒多。我們商量，決定我的年青旅伴，兩個學生早點起來去搶牌子，我留旅館中照顧行李。如果搶到一張，給我先走，因我錢帶得很少，如果留待車子，必得拍電報到成都寄錢了。如果兩張，他們中間留下一個，如果三張，那當然頂好；如果一張也搶不到，就只好坐黃包車到成都。旅館老板極力勸我們坐黃包車到成都，說近來坐不到汽車的人這樣走的很多，不過這條路上從前有土匪出沒，搶刼的事近來少些，但終究有一些麻煩，不過我覺得這也是幸運的，坐汽車還是可以遭受搶刼，只要攔住了汽車，車裏的人一樣是手無寸鐵的

旅客，所以我也主張搶不到牌子，就坐黃包車（四川人叫做「包」車）。

早上二時，我起來了，其實我根本沒有睡上一眼，我不歡喜那帆布牀，牠像一隻袋，你裝在裏面翻不得身，跳蚤與臭虫成羣結隊的來襲擊。十二點鐘，旅館中人聲喧嘩，早已有人出去搶牌子了，那兩個青年同伴，他們就急急去汽車站。我在園裏蹓了一會，到茶閣上，坐着，望着，岷江的水流，發出絲絲的光，曉風，殘月，疎星，一如柳永所寫的。一瞬間，我起了無限的思緒，我想起錢塘江，漢江，以至遼遠的萊茵河，一歇把我的心引起了一種思鄉愁情，一歇又把我引到了歌德與屠洛涅夫的自然的懷感裏。我安慰着自己：「我終究在自己的國土上，我踏着自己的泥土，是的，我們自己的泥土！」我的眼睛潤濕了，流下了感激的眼淚！我只要踏着自己的泥土。

到五點多，天已大亮了，旅館裏的第一個搶牌的人回來了，「人擠得很，你們的兩個人還算站在前面，或者有希望。」又說，「看來今天不發牌了，我不願再等……」。

六時左右，兩個青年同伴回來了，他們跑得氣喘喘，滿頭是汗，把制服的鈕扣也解開了。「牌子搶到麽？」我闢頭問。

「那來的牌子？車子給伍處長包去了！」他們忿怒的說，「可是售票處的門窗也給打掉了。今天如果發牌子，我們倒一定搶得到的。前面的人並不多。可惡那車子給人包去了，許多人一下子發怒起來，把售票處的門窗都打了，我們也參加了一下。有許多人上了那輛車子占住在那裏，也有人立在站上等待發牌子，我們看看沒有希望，還是回來，坐包車走罷」。

我們決定坐包車走，正在商量叫車的時候，又有三個旅客，搶不到牌子而回來了，他們就加入我們談起來：「今天車子並不是伍處長自己包的，是岷江旅館的一羣旅客，等了好幾天搶不到牌子，其中有認識伍處長的，去走脚路，由伍處長出面來包一個車子。」

「公共汽車可以包用，何必辦公路，設公路局呢？」

他們三人也主張坐包車走，與其坐等在旅館裏，而且明天有沒有車子是不一定的，搶得到牌子與否又是不一定的，什麼都是不一定的。結果，我同兩個學生決定與那三個旅客一同走。

我們叫了六輛黃包車，計劃是先到眉山，在眉山再換黃包車到成都。到眉山的車價是四元（公共汽車由嘉定到成都是七元六角）路程共約四百里，到眉山恰合一半路程。

動身的時候已快八點鐘了，車夫說如果趕一下，今天可以到得眉山。

我們的車子經過公共汽車站，站門前擠滿了許多人，一輛汽車停着，坐的，立的，只見滿車是人頭。車站前的空場上，堆放了好些舖蓋同箱子，同輪的大學教授，他百無聊賴的神氣坐在那裏。見我的車子拉過，他大聲的喊我，向我招手：「陳先生！陳先生！你到成都嗎？」

「是的，我不願呆等了，你不想坐黃包車麼？」

「我等一下再看。」

大約不到十分鐘，他的「包」車來了，而且拉得很快，趕上了我們的車子，當他從我們面前過去時，他微笑着對我輕輕搖手。

我們在夾江縣午飯。夾江是一個縣城，但小得及不到江浙的一個村鎮，冷落得像一個死城。找不到一個起碼飯店，我們在一家擺着一隻方桌的飯店內坐下來，兩個青年學生對我好似抱歉的說：「四川內地就是這樣貧苦的，但也有比夾江好得多的縣份。」為了填塞肚子，也沒有別的辦法。我的脾氣一向是很壞的，在家裏，沒有我愛好的菜，我寧可少吃一點飯，但是在這個時候，雖然飯帶着酸味（天太熱了，一定是上一天賣剩的飯），我也只好用開水泡了一下，把牠吃下去。我第一次懂得，在飢餓之前，什麼都管不到的。

現在回想起走過的地方，要算夾江這個縣城給我的印象頂壞了，街道那麼的靜，街市是那麼樣的冷落，沒有看見一個活潑潑的小孩，沒有一條肥胖的狗，沒有一張抗戰的標語，個個人帶着一種病色，沒精打彩的，好似生活得厭倦極了，恨不得倒下來似的。談到抗戰，他們一點也不知道。「那一邊同那一邊打？你們是那一邊的？」他們這樣問。

離開夾江時，一輛公共汽車從我們後面趕了上來，車裏有好幾隻我們熟識的面孔，原來他們占住了車輛不下來的，終究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我們很悔却沒有照他們那樣做，但又想他們都是沒有行李的，或者極少。

我們三輛車，有一輛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拉的，常常掉在後面。為要三人在一起，前面的只好慢慢拉，等待他，因之，還有那同行的三個同伴，他們早走在前面去了，剩下了我們同我們的車夫六個人。車走在山中，四圍都是高山，松林與柏林，沒有一個人影，靜寂得連鳥聲也沒有，只有車夫的脚步聲與他們的喘息聲，及橡皮輪在路上的轉動聲，經過了這樣一節彎曲狹隘，深奧的山路，我們不由自主的噓了一口氣。

「好了！這個地方沒有什麼！以前是常常在這裏出事的。」兩個中學生說。車夫們說近來這一路還平靜，坐包車的人很多。在經過這些山奧時，我們大家不期而同的靜默了，連咳嗽聲也忍住了，好似等待着一粒子彈突然飛來，而預備跳下車的。可是，一點事情也沒有，我們已經過了彭祖的故鄉，彭山縣。

成渝公路的橋樑實在太壞了，常常只用幾條木頭隨便擱着，下面用竹簍子裝了些石子做橋基，差不多在每一個橋前都豎了這樣一塊牌子：「危險……」底下是叫坐公共汽車的乘客下車來走過橋去。我覺得四川境內固然因山多，造路不易，但有一個很好的條件，就是隨處都有小石子，只要

把路身打平，舖上石子，公路就成了，可是四川公路是這樣的壞。昨夜爲早起搶牌子，沒有睡好，今天七高八低的路把我們顚顚倒倒搖得腰酸，頭昏，太陽又那麼燙熱的照着我們，呆板而單調的姿勢，前面與後面都放了行李，好像把你夾在兩塊板裏，你只想睡覺，可是剛有些朦朧，不是頭因後倒碰痛了，就是前倒碰痛了，在下午三時光景，天下起陣雨來，我們只好停下，在一個小極小極的村上，一家茶館而兼旅館的——沐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門前躲雨，茶館主人非常可愛的替我們泡了茶，又問我們要不要上樓看房間，我們爲了這個村莊太小，而旅館的神氣又太壞，決定不留下，還有最大的原因，是我們今天要愈多走一點路愈好。據車夫說今天是無論如何到不了眉山的。我們希望雨早早停止，可是旅館中的人看見雨越下越大，竟拍手哈哈大笑，對我們留宿：「今天一定走不成了！」看了他們這樣誠意的做生意，由不得令我好笑，真的，我們同他們的利益是不相同的，他們怎能理解我們呢？雨小起來了，車夫們也急於要走，趕到前面較大的村莊去停宿。

終究，我們沒有趕得上停眉山，雨是止了，又失望，又快慰的，在晚霞遮貼晴穹的涼快的黃昏，約七時半，停落在離眉山約卅里的一個村莊上。下車時，我的腰背都痛得有點伸戳不得了，坐車的人已經這樣，拉車的人的疲倦更可設想了，特別是那個小孩，幾乎喘得氣都透不過來。

我們先去找那未晚先投宿的地方，進一家，掛着好似泰什麼棧的，賬房裏居然有個青年——一面孔的鴉片烟——在那裏踏風琴，我們一進去，他就停住了，原來他就是老板，他領我們去看房間；那些房間都沒有窗子，黑暗得像地下室，必得用一盞小小油燈照一照，才能看得出一點東西的影子，那些房間裏放着一隻桌子，三四隻禿頭舖——沒有帳子的——，就是幾塊板，板上舖一條席子。

每一隻禿頭舖是一角錢，我的兩個旅伴，他們就找了一間住下。剩下的房間都是舖位太多，我

就往隔壁一家去看，恰恰有一間小小的房間，那隻舖還有帳子，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個旅館比那一個好——後來知道這兩旅館是一對親兄弟開的，——決定住下來。放下行李 我們就趕忙去吃飯 這種小村子，太晚就找不到吃的地方了。那晚我吃到了四川有名的豆漿粥。吃罷回到旅館，先付住費，就倒頭睡覺，我的直覺一點也沒有錯誤，被頭是乾淨的，臭虫與跳蚤一個也沒有，拍死了三隻蚊子，就淨清無事，所以我竟像死了一樣的沉沉睡去了，直到早上午時那兩個同伴來喊時我才醒來，並且知道他們一夜捉了幾十個臭虫，沒有睡上一小時。

天沒有亮足，我們就動身了，車夫們爲了看不清道路，慢慢的走着，太陽漸漸升起，高照，也漸漸熱起來，一下子又呈現了炎夏的景象。九時半，到達眉山。

在一家茶館裏，我們停下歇息，並接洽去成都的車子，原來的三個車夫，只有一個願意往成都。

眉山有條水門汀馬路非常清潔，市容也很好，店舖與住家的門口都乾乾淨淨的，有的還起的人家正在自己家門口打掃；看去大約是各個人家須掃乾淨自己的門口。城門上極大的標語：「驅逐日寇，抗戰到底」，街頭，店舖門口都有抗戰的標語，防空，防毒的通告。我仔細觀察了一下眉山，此起別的我已經過的縣份來，牠的面目是相當的新鮮與活躍。眉山是蘇東坡先生的故鄉，我自然的想起他的詞：「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有些感想使我心內有些慚愧，一路自重慶過來，看看那些縣城同市街，人羣，我還要想：「這樣偏僻的地方，住於四山之中，也有這許多人生活着，而且與別人一樣的生活着！」

我們在茶館裏停了一小時多，每次把黃包車叫成功了，講定了價錢後，給一個流氓似的鴉片煙鬼搗亂，一扇又不肯了。這一帶地力、哥老會有極大的勢力，哥老會始創時，原是一個極革命的民

眾結社，是以復漢為職志內。但是在這一次的抗戰中，我們各個民族實現了大團結，上與下，黨與派，統統都在為抗戰建國的唯一目標努力，可惜哥老會還沒有把他們那麼大的力量動員起來幫助政府抗戰，直接參加抗戰。在重慶時，曾經見報載四川的哥老會員準備出川殺敵了，我希望能够這樣。

我們看着車子叫不成功，預備等待公共汽車，及至他們看我們無意坐黃包車，却又肯了，可是一定要四塊錢的車錢。

由眉山而上，公路兩旁有不斷的大平原，稻長得肥肥的青青的，已結了穗子，重重的垂下。四川今年雨水調順，可望豐收，眞可說是天助我們抗戰。稻田旁邊間或有稀密不等的桑林，四川也是出產絲的。這一幅江南農景，怎能不令我想起家鄉呢？

下午五時左右，我們渡那個「走遍天下路，難過新津渡」的新津渡。水流湍急，江面廣闊，足足渡了一小時多。天晚下來了，大家爭着渡，我記起大約是孟郊的詩罷，「渡頭爭渡喧」，眞對。不過現代與從前不同，當然有錢的人總比較神通廣大一點：「你給我渡不渡？你……」這樣一來，就給他先渡了。我們無聊的坐在一個竹蓬下的長凳上，等待着，我同一個看去約十五六歲的男孩搭着話：「……你恨不恨日本鬼」？「不」！他回答。「你不恨」？我出驚了：「他來了，把我們房子都燒了，把我們大大小小都殺了，你還不恨？」他低下頭去，輕聲的，像自對自，又像譏誚又像惋惜的說：「日本鬼子不來，我們的日子也難過呀！」

我們等得急了，然而那一個人來注意我們，兩個中學生與一個女子？渡船拚命的載竹頭：——我們也只好聽他——，兩人一車要一塊錢，後來總算讓到八角。

新換的車夫，比上一天的差得多　他們不但時時要休息，而且有時，無緣無故的在半山荒地裏停下來，使我們不得不起戒心，每次我們都是很客氣的，幾乎是懇求他們，早早達到目的地，但他

們不是特然的使一下性子，放下車來不肯走了，就是嘰哩咕咕的罵，每次都要說上許多好話。有一次，大一點的那個中學生，他恨得伸起手來要打了。這一天的旅程，眞使我感到疲乏，特別是心境上的懊喪，——雖然昨夜是好好的睡了一覺——一天到晚和車夫們費口舌，弄得喉嚨都啞了。他們說我們捨不得錢，不肯給他們「飛票」——上坡下坡的時候，叫一個人來幫助拉，叫做飛票，大約每次飛一個票，頂多是一角錢，車夫們頂歡喜旅客能慷慨的給飛票錢。這種來飛票的人，沿途時多時少，大都是十幾歲的小孩子——，却不知道我們身邊所有的錢，大家都是很扣的。我耐不住，對他們老實說了出來，他們對我們的呪咀是停住了，却變成一種不快意的卑視。

這天晚上，我們停在離成都五十里的一個鎭上，很奇怪，白天我們懇求車夫們趕路，他們不情願的拉着，到了天快暗下來，他們反不肯停了，甚至我們要停下來，吃晚飯，住宿，他們都不同意：「你們要早點到，那我們就拉夜路」。月亮固然很清明，但我們何必一定要半夜趕到成都呢？況且城門口一定有檢査，不會半夜三更放我們進去的。「我們不願走夜路，倘半中出了事情，大家不快活」。因了我們的堅持，停下來了。

那晚我們在一家小館子中糊亂的吃了一點東西 又貴又不好。找着一個唯一無二的旅館 只有一間房間，裏面冲出一陣說不出是什麽的怪臭味，跳蚤非常多，我們沒有立上三分鐘，手臂上，脚上已給牠咬了好幾口，癢得難受。我們不願住這間房間，而且也住不下，就同老板商量，在堂中放長櫈，擱起門來睡覺，願出房間一樣代價。那兩個學生弄到了一塊門板，擱起來睡覺了。旅館裏唯一的茶房同了一個小孩子睡在堂中地上。我呢，找不到門板，把一隻五寸闊的長櫈當做了床，只能筆直的躺着，兩隻手拱放在胸口，或索性掛下，如果要側身睡，必得起來，重新換姿勢。大而黑的蚊子，一欵也不肯放鬆我們，牠們不待你有點朦朧，就東一口西一口盡量來咬，我們的週邊，身旁，

，脚跟都點了蚊香——蚊香倒還便宜，一個大銅子買三根——滿屋子都是烟，那兩個青年學生與那兩個旅店夥伴都呼呼入睡了，可是我，從來不歡喜點蚊香，眼睛受不住那麼利害的砒霜氣味，眼淚竟大大的掉下來，弄得比蚊子咬更難過。在這條長櫈上，本來我就不預備睡覺了，這樣，把我身旁的蚊香息了，開了店門，在門口不時的透一下空氣。月亮清清的照着那條唯一的大路——公共汽車路——，靜寂極。村外時時傳來一些秋虫的聲音，叫哥哥的聲音，陡然，溫柔而殘酷的打擊着我的心，這些聲音對我太熟悉又太生疏，就是這樣使我難堪。四川的季候，什麼都提早了，在江南還是盛夏，而這裏已遍地秋聲。

「拍」一下的聲音，使我想回進屋子去看看，我想他們兩人之中大約有一個醒了，在拍蚊子，回進去，使我忍不住的笑了出來——這是很本能的——那個年紀小的學生，掉在地下，他茫然的神氣，眼睛半開，正在爬起來，把他的同伴也吵醒了。我們笑了。

看看錶，已三時半，三個人就談起天來，他們談成都的生活，青城的風景，奇，我不在峨嵋停留。四川的山，的確是秀麗的，我覺得只有沿浙江徽河的山，嚴子陵起直到黃山始可比擬，但現在我沒有遊山的福氣，也沒有這樣的閒情，到四時半，我們去喊醒車夫們，他們睡在猪欄旁，一間蓋屋的地上，簡直那樣的酣眠，用手去拉才拉醒過來。這是習慣，還是勞動的代價？

我們向成都行。成都，這個滿着史蹟的古城，在今天，變成了我們抵抗日寇侵略，復興民族的根據地，四川的一個重要城市。四川不但物產豐富，應有盡有，而且在地勢上，能攻能守。諸葛武侯費盡了心血，把這個扶不起的阿斗放在這樣一個好地方——四川——，然而這個不爭氣的皇帝，不知道好好自爲，結果仍把牠送在別人手裏。在清晨的美麗的陽光下，一片新鮮的大平原展在我的眼前，田上，草上，樹葉上，晨露如珠，一滴一滴的落下，辛勤的蜘蛛，爲了只過了一夜，牠也在

車上結了網，一點也不隨便，一絲一絲的結得很美好，講究。我的腦子裏充滿了一部三國志，一些對成都的想象。

離成都只五，六里了，公路上的人愈來愈多，農人們肩着菜担，各式的小販，有賣麥菜扇的——那些扇子編得非常美麗，都是農家的手工副業——有賣零星食物的，大都是向着成都行。到成都了，經過一座大院字，門口掛着西北聯合臨大，他們，兩個青年同伴指給我說：「這就是武侯祠」，但我沒有仔細注意，我正在深深的想。許多小河道灣灣曲曲的流着，我問有什麼名字不，他們說沒有名字的。那些小橋很精緻的架在小河上。玉蜀黍已熟了，農家架了一個高高的棚，在看守着。四川同胞對於建築有特殊的本領，這種看守農作物的棚，他們只用四根木頭高高豎起，再用幾塊板，一個竹蓬，幾根繩子，幾根短木頭做一個梯就成功了，婦女們在棚裏面坐着做針黹，小孩子爬上爬下，看去那樣堅固，沒有一點危險。

終於，我們到成渝路的成都汽車站了 長途貨包車是不能進城的 在一家汽車站的茶館裏，我們停下來，把行李擱下，付了車錢，好似很偶然的結束了這個旅行。休息了一歇後，我就同那兩個學生告別，雇車進城去找朋友。那是七月九日的上午十時左右，由渝至蓉總共在路上走了九天半。

進成都城，經過一座大而古舊的石橋，下面江水渾濁而湍急的流着。進城時，城門口的衞兵把我的行李慶齊的檢査了一下後，才得放行。我找到祠堂街的一個朋友那裏，第一就問嘉甚來了沒有，朋友回答我說沒有人來找過我。接着，放下了行李，就去尋旅館。成都的旅館，沒有重慶的髒，價目也沒有重慶的貴，但是我一個一個的看了好幾個，都沒有中意的，看見被頭褥單上，牆壁上，都是臭虫的血迹，就只好退出去；幾個價錢公道而比較清潔一點的旅館，却住滿了人。最後看中了凌雲旅館，這是一位朋友在重慶就給我介紹了的。價是三塊錢一天，可是因有一個熟人的朋友介紹是

這個旅館的老主顧，經這個間接朋友一說，就打了個四折。

一進旅館的房間，我簡直就想倒下來，但是有許多事情必得就做，最重大的：第一件，就是填塞肚子。在旅館裏隨便的叫了一點東西，喫了就睡。我全身，因了兩天半的黃包車顛動，痛得睡都睡不下，在路上，還能支持，此刻却感到身心都被疲倦克服了。待做的事情又像亂麻似的，做完一件又來一件。身體需要安睡，腦子可一歇也不肯休息：「惠姊究竟來了沒有？她會不會在什麼地方裏等我？我們竟會在成都相見——！於是在朦朧中忽然異想起來，一下子遇見了惠姊……

離開重慶的幾小時前，在大樑子街上，遇到了崢嶸先生，知道老伯父母都住在成都，他們要我住到他們的寓居去，他們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是我為了要重新整理行裝，把路上已用髒了的衣，整理出來交人洗過，……等等的事情，不願再吵擾他們。其次便是有許多朋友待見面，以及去探聽川陝公路的車子，在凌雲旅館，進出方便一點。但無論如何，我知道崢嶸夫人——永業姊，一定在那裏等我了。

午後：祠堂街的朋友把惠姊的信轉來了，她還沒有來成都，在崇甯生病剛痊，她說這幾天天氣太熱，待秋涼一點來看我。這個信一下子又使我失望，又使我焦急！我想我跑到她那裏去，但事實上又不可能，車輛呢，那裏是有一條公路的，但不直接通，須去找商人的貨車來搭，可是我人地生疏，那裏去找這樣的巧機會呢？如果再坐黃包車，來回一百八十里路，我確實有點怕，而且一來一往總得三，四天，我呢，只想愈早好搭川陝公路的車子。結果，寫了一封信給她，請她可能時在十五號之前趕到成都相見頂好。同時發了一信給廣漢書台姊，告她如果她還沒有回重慶，過成都時，希望她來看我。

雖然，我還算睡了一些時候，雖然幾次為了收信，寫信而打斷。我把被頭都疊在床上當褥子，

[illegible]着也還算[illegible]和。起來後，就出去打聽車子，一問再問，才問到了川陝公路的汽車站。辦公的時間已經過了，在院子裏看見幾個職員，正閒散地踱着步，我走向其中一個問：「明天有車子麼？」他不則聲，只是有意沒意的望了我一下。「對不起，請問，明天可有車子？」我再問，「不知道」，他掉頭對我說。我往裏走，遇到一個職員樣子的人，我想我應當變換問語，指着停在院子裏的五，六輛公共汽車問：「先生，對不起，這些車子明天開麼？」他對我投了一個冷眼，慢吞吞的說；「不一定，開就開，不開就不開」。我覺得再找人問也不會有結果的，帶着忿惱，走出了汽車站。

我茫然的走着，腦子裏盡量工作，但總是想不出什麼辦法。「在這個時候，一個普通人要行路是這樣的困難，不要說沒有錢的，出錢也不讓你走，最要的是勢力！」我恨恨的想。忽然，在一條街的中心，一輛包車疾馳而來，車上一個人對我招手，一面車子停下來：我一些也沒有預備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遇見熟人，所以我只是呆着，直到這個人走近我來，一看，是崢嶸先生，眞太巧了！約好我回旅館去，他同永棨姊來看我。

回到旅館裏不久，他們倆來了，永棨姊手裏抱了一個小孩子，快半歲了，他又胖又白，完全像他的母親。我們彼此驚奇的喊：「無錫一別，再也想不到會在成都晤面！」談起無錫，我們有無限的惆悵！崢嶸先生勸我們別去提了，預備喫晚飯去。

他們非常客氣，邀我到沙利文去晚餐。這是一個新開的館子，開了將近半年，主人與廚師都是從上海一帶流亡出來的。菜價還算公道，喫客都是帶些蘇滬口音的。天下起微雨來，馬上涼快了，這就是成都的天氣，一下雨馬上就涼。他們怕小孩子冷，急急的要歸去，在沙利文餐館前我們分別了，我約明天去訪伯父母。車子問題，完全託了崢嶸先生，本來，服務公司專修理公路上的車輛，當然，有車沒車，消息是最靈通的，但最近爲了人事上的某些關係，服務公司已奉令結束，現正辦

辦理結束手續。他說他盡力去替我探聽一個究竟，並幫助我去弄票子；一方面呢，我自己也去想法進行，大家分頭努力，免得落空。

那晚我並沒有好睡，臭虫不多，但被蚊子咬得不能沉睡，我是太被這個旅館的外表所欺了。次日早上，一起來我就決定搬旅館，可是跑出去看了一回還來，還是不搬。「成都是沒有好旅館的，大概都是這樣！除非你願意化上八塊十塊錢一天，像沙利文那樣，可是你一定又覺得太不合算了！還是湊湊好！」的確，還是湊湊好，我安心住下罷。但這間房間是西晒的，我又想換房間，茶房以滑稽的口吻對我說：「我勸你不要換了，這間寬敞，蚊子罷，那邊也一樣有的，夜裏只有點蚊香」。固然，我就依照了他的話，馬馬虎虎的敷衍過去。

早上八時半，我又打電話問汽車站有沒有車子開，這回總算回答我說：「十五大約有車子開，五點半領牌子，六時買票，七時開車。」可是我有點不大相信。

到退漁別墅，四妹正在門口，要出外去，她領我進裏面，老伯父剛吃過早點，就在他的房間裏坐下，接着，永繁姊，三妹都來了，還有未見過面的三弟的新婚夫人，大家都爭着談別後一年半來的一切，可是又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說起，大家東一句西一句的。他們以爲我從嘉定坐公共汽車來，三弟天天去汽車站接我，一連等了三天，又以爲我在成都大約是長住的，在他們寓居的旁邊爲我看好了一座小小的西式房子。「就是這一座，」走到園裏，老伯父指給我看，「我們可以做隣居，只有一牆之隔」。他們領我看他們的寓居，這是一個大的花園，在園裏有好幾處三間一起，四間一起的平屋，都是西式的。園裏滿種着花草樹木，又有小池小橋，地點很好，在城外，沒有市聲的煩擾。他們佈置得很簡單，這是旅居生活，明白的說，這是流亡生活，在沒有見過他們的太湖別墅與姚寶巷住宅的人，是不知道作一個比較的。

我們在園子裏坐下，老伯母也出來了，自從離開無錫，到了成都，一路上飽受驚嚇，更加上旅行的疲倦，本來體弱多病的老人，衆之氣候的不慣，差不多十有六天是臥病在床的；當然，還有是懷念故鄉，愁緒不寧。她是一位熱血的女詩人，滿腹牢騷，苦恨年老，無力報國；她又是一個賢母，教養出了她的愛子，王崐崙先生，爲國辛勞，最近在徐州爲搶救難童，突圍而出。那次他同他的夫人孟君女士，曾受到敵機轟炸下的極大危險，一個炸彈正落在他們住處的旁邊，房子倒下來，幾乎壓死。幸而一個僕人把他們救出來的。老伯母很興奮的對我談到她的愁國思子的情緒。我一邊聽，一邊欣賞着園裏的花木佳草，想起她在病床上寫給二妹的詩：「滿園花似錦，不如故家山」，不禁感到凄愴。老伯父叫人拿了一竹籃的李子蘋果出來要我吃，我們一邊吃，一邊讚美成都人的編竹藝，各種竹具的精工，以及成都出產的大量的水果，特別是李子，味美得很。吃着水果，使我更想起無錫來了，前年這個時候，我不是天天吃着他們山上的水蜜桃麼？有些日子，我甚至早粥也不吃，只是吃桃子。

他們留吃午飯，並且另外已做了幾樣菜。午飯時崢嶸先生回來了，也說探聽的結果，是十五號才有車子。

那天午後，天微雨剛晴——成都是差不多天天這樣下一陣雨的——我獨個人雇車到武侯祠去。武侯祠的門口掛着西北聯合臨大的牌子，其實臨大早已不在這裏了。走進門，一個大院子，滿院是高大的柏樹，樹葉發出清爽的香味，在樹蔭下走，使我真的感到前不見古人的悵恨。「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至今還是實事。左廂現在不開放，停着四川故主席劉湘將軍的靈柩。頭殿龕中是昭烈帝——劉備——，兩邊是他的子孫，兩廂左邊是漢壽亭侯關，右邊是桓侯張。兩廊上供的，自趙雲馬超，直到費禕，姜維，一部三國志裏的蜀漢功臣，統統在內。泥像有人體樣的

夫，顏色都還鮮潔，大約是新修過的。每個像前有一塊小石牌，上面刻着他的身世，籍貫，他的事蹟。關張的像是獨立的，像前有門，門閉着。無論誰讀完了三國志，總要感嘆「關張無命」。正殿上供的武侯，香火似乎特盛，有好幾個老百姓正在點香燭，是來求籤的。我對着他的像心頭不禁深深地致敬，童年時我愛讀他的前後出師表，不愛別的，愛牠的理直氣壯。現在，我更愛這些文字了，因爲這些文字不是簡單的文字，牠不止表現了武侯的一生，一個時代，直到現在，將來，都有不滅的價值，因爲牠能够影響一個實際生活。

我國歷史上多多少少偉人，但可說只有武侯是最爲大衆所熟知的，「諸葛亮」，無論婦孺都知道的。但是很可惜，人們只把他神化，把他的鵝毛扇，寫的那麼巧妙，而不把他的眞實才能加以宣揚。武侯不但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而更可崇敬的，同時他又是一個治國的能才。三國志裏寫他開到成都，與法正的談話，是値得三思的。能够攻城略地，克制強敵，並不就够足了，更要在乎同時能够治理。就說俄國女皇加德林，她在朝的時代，固然經過了些勝利的戰爭，但最要緊的還是在戰爭後，她能够知道，而給人民以安居樂業的幸福。我們現在爲了抵抗一個外來的殘暴的侵略，而有了一個超乎歷史的大團結，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但這個偉大的時代，將產生偉大的人物，使牠成爲更偉大的時代。這是必然的。每個熱血的黃帝子孫，努力操住大時代，別要給牠淹沒了！

永樂姊陪我玩了一整天，我們先去望江樓，薛濤的門第，就在那條小巷中。「薛濤井」看去很通俗，與我國平常老式的井一點也沒有分別。薛濤的遺迹一絲也不存留了，只有一間小屋，裏面有人出賣薛濤的像，就是在這間屋子裏的一塊石牌上托下來的。

臨着江的樓上，有許多人在那裏喝茶，咬瓜子，也有人在此叫麵，吃飯的。在我國，每一個風景地方，也就是吃喝的地方，所以無論怎樣美麗的山水與建築，結果總是弄得杯盤狼藉，果殼遍地

，若說遊風景是找尋詩意，那我覺得這句話不頂適合於我國人的心理。成都畢竟離前線太遠了，沒有一點戰時現象，雖然從逃難來的人身上帶來了一點戰爭的氣息，但這些人慢慢安居下來，那氣息也就淡下去了。人們喝茶，閒談，快樂而輕鬆，有的，在園裏緩緩的踱着步，有的，手裏提了鳥籠，來這裏比鳥。在童年時，我就見不得提鳥籠，他們都是些閒蕩的高等流氓，這個時候我見着了這些東西，心裏更有說不出的憎惡的感情。真的，我覺得成都需要幾個敵人的炸彈。

在望江樓，來回都經過四川大學農學院場，有幾個農人（不是農院學生），正在收玉蜀黍。在農場的那一邊，五層的水泥大廈正在建築。川大農院的院長秋季要更換了，聽說將是本來江西省農學院院長董時進先生担任。住南昌時，在友人家的茶舞會上，在歐美同學會的聚餐席上，遇到董先生，有一次，偶而同董先生同桌，承他邀我到蓮塘去玩，他對我說農院裏的池塘，樹林的美妙風景：「夕陽西下時，在那裏划船是很有趣味的」。可惜我始終沒有去過蓮塘。此刻想着，我很悔在江西時什麼地方也沒有去，的確是辜負了許多勝境。董先生大約是去年十二月裏返川的，重慶的報上曾刊着他的「返川雜感」（大約是這樣，我已忘了題），也有一篇關於改良四川農產物的文字，當時即有一位一向留川的從事農業的先生回答了一篇討論，那位先生在開頭說：「董先生這次由江西坐飛機返川，可算是衣錦榮歸，若不是戰事，那會有這樣的農學家想回到四川這種苦地方呢……？」實在，這到也有幾分實意的。我國近年來已有了些農業工程師，但他們大半不是住在洋樓上，就是坐在那些省政府的技正室裏一天辦幾小時公！以前在國聞周報上，我讀到董先生的文字，很敬仰他是一位有見地的農學者，像他那樣的人應當主持一個廣大農場，做農業行政人員未免太可惜了。

那天永榮姊同我在一家廣東館子午飯，這家館子名叫「小巧」，確是名附其實。當爐的是老板娘自己，紅燒牛肉每天只燒一鍋，賣完了就沒有了。我歡喜的不單是價廉物美，特別是清潔，還有

，菜的味道不帶「館字味」，使你只覺得是在家裏吃家常便飯。

十三號的早上十時左右，我正在寫信，迅快的脚步聲走向我的房門，「幸好，她還沒有走！」於是，急促的敲門聲。惠姊，她來了！同着靜沉。我已經不等待她了！

我們分別了十二，三年，她依舊是那樣的瘦弱，舉動是那樣的急促，似乎她的一伸手都要使你覺得是特然而來的。

說話的聲音還是那樣的尖銳。在期待了多少年的會面，以前我們曾爲此流了多少想念的眼淚，多少的信，多少的詩，多少的詞，訴說這個期望，如今見面了，却又無話可說，而那樣的平淡。

晚間，他們倆夫婦領我到「不醉無歸老酒家」去晚飯，這家館子是幾個文化人開的，在成都，有許多文化人做這個生意，祠堂街有一家小館子叫「小園地」的也是幾個文化人開的。這個「不醉……」館子，在成都是很有名的，有幾隻特別的菜，可是價錢太貴了。

那晚惠夫婦也在凌雲閣房間住下，靜沉爲了事務的關係，次日大早就回崇甯去了。惠的家本在成都，可是沒有什麼人了，有的是一些親戚同朋友。靜沉走後，她出去訪朋友：並把老同學張載飛姊也拉了來。載飛，她眞的變了，竟變得那樣不同。以前在愛國裏，她是極好動而極愛打扮的。有一年冬天，她因燙頭髮把髮燒了起來。現在，她的服裝是如此隨便，性格竟變得如此的恬靜，她已有了四個女孩子，個個都是她自己哺乳的。「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是我的實感。她的外形，固然是一個平常的良母賢妻，但同她深談起來，感覺到她對於國家有多少的關懷，而自己的心中又壓着多少的牢騷！是的，中國的年青的母親，她們與別的青年男女不是十分相同的，她們有雙層的苦痛，雙層的煩悶，可是她們，却頂被人們遺忘，而往往遭受卑視的。人們籠統的叫她們做「家庭婦女」，這個名目一被蓋上，就表示她們已沒有了社會地位了。實際上，她們有她們的利益，她

們的利益，決不是她們的丈夫能夠代表的。我看到許多像戴飛一樣的婦女，她們各有特長，在未婚之前，她們是有職業的，結婚以後，有的爲了子女的牽累，有的或因丈夫的地位較高，要謀經濟獨立時，受到人家這樣的回答：「你何必做事呢？留給了別人罷！」因爲在中國，女子總被看爲男子的附屬品。年青的母親，他們或者及不上少女具有的革命的熱情，可是她們富於實際生活的經驗，往往不單是爲了她們自已、特別是爲了他們的子女，她們是更會堅決地站到抗戰上去的。一個母親，不像是一個少女，她們的眼淚，人道的多於戀情的。惟有她們，更能鼓勵多少男子上戰線去！在抗戰期中，後方的工作，積極方面，生產，消極方面，節省，其他如保育，如慰勞等等，如果不發動家庭婦女來參加，無疑的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與損失。我們在這次民族解放戰爭裏，不幸有了許多給我們丟臉的漢奸，但另一方面却到處可以聽着男女志士的報國無門的熱情的感歎，這是我們的光榮，却何嘗不是我們的羞恥。特別是外人，一定覺得十分奇怪的。

近晚，與惠，戴飛在少城公園散步，回國以後，我已失掉了「遊花園」的習慣。少城公園多樹木，少亭榭，這是異於中國一般公園的地方，在那高大成行的樹下，使我悵然的想起里昂公園來。一下子，使我記起了已經忘記的新近的印象；那天船向嘉定行的大早，在睡夢中被旅客們驚嘆的聲音吵醒了，我也起來看那些從來沒有見過的鹽井，高高的棚座頂，遠遠望去好像希臘的教堂；有幾個頂上架着幾條木頭，又像法國南部的磨坊。

出少城公園時，在門口的小橋上，遇見了十多年前教我書的馮克書先生夫婦，重見到童年時代所崇拜的人，這位很早翻譯了盧騷「愛彌兒」的教育者，我的心境上起了不少的波動。馮先生蒼老多了，額角有了縐紋，找不到當年南通女師時的中年人氣概了，他的太太倒還依然胖胖的沒有見老。他們顯然不會認識我了，但也對我凝視了一下，我想前去招呼他們，可是終又把脚步移轉了方向，

「何必呢？彼此訴說一下我們老家陷落的慘痛，我們對敵人的忿恨？都是廢話，我們都知道的」。這樣，大家過去了。

十四日的夜裏下了大雨，括了大風，黃昏時，我已經把行李檢好了，準備十五日動身。一夜風雨，眞令我焦心極，早上四時起來，坐待天明，天依然下着沈沈的雨，茶房勸我不必上汽車站去，惠也這樣說。川陝公路只要一朝雨就不能開車，這個我也知道的，我就像熱石頭上螞蟻樣，在房間裏打旋。到八時去電話問汽車站，回答是這樣：「今天不開車，明天不定」。接着，崢嶸先生打電話來：「今天沒有車，多半是因下雨路壞了，只好再等罷」。

糟了，什麼時候才能走呢。眞的使我坐又不安，立又不是，幸而後來的幾天，永繁姊，惠姊，同載飛姊，她們三人每天好似輪流着的陪我玩，吃飯，消遣那等待中的時日。吃飯，是的，特別是吃飯，簡直每天重要的事，就是到各個館子去吃飯，她們見我一時不能走成，反而很高興，留我吃，玩。

十六日早上，各個報紙登載着大風雨後的各地損失，川陝公路的川段橋樑，許多均被折斷了，這樣，等上十天，八天，半個月都是可能的。旅館我已住厭了（而且那樣的費錢），整夜吵鬧不停的聲音，脚步聲，話聲，使你的心一刻也不能安定。在這個時候，我又悔住旅館了，根本早就該接受友人們的好意，住到朋友家裏去。我決定搬到祠堂街附近的友人家去住，在那裏，進出也還是方便的。早點後，我就出去通知友人，然後回旅館來搬行李。

在友人那裏，談了些話，告別出來，又去吃飯，回旅館時，已下午三時了，賬房裏交了我一張名片，我驚奇地接過，一看，是書台的。書台已經到了成都，暫在四川旅行社她的夫弟那裏，還沒有找定房間，望我在該處留言。我問了一下，剛剛有一間空房間，馬上就跑到四川旅行社關照她。

在四川，爲了語言的不通，或者也因爲他們性格上與江浙人的不同，問路是到處要碰壁的。不單是問路，無論是買東西，上館子吃飯，時時都有可以吵架的機會。在南昌時，一位差不多走遍了全國的朋友曾講到各地的風俗人情，他說在重慶進一家舖子買物，店舖對你表示十分討厭，理也不理的。在昆明，商店對於主顧像是仇敵：「沒有！」他們總是這樣一句回答。根本就不肯去找尋你所要買的東西。他的話實在對極了。在四川旅行社的門口，我幾乎要同那裏的茶房吵起架來。「沒有！」他一來就這樣回答我。當我問房間號頭時，「不知道」，他又那樣回答。賬房也找不到，結果我也不管什麼了，自己去找名牌，找着了名牌，再去尋房間。裏面的房子非常曲折，在院子裏，我還是只好見人就問。

「學昭！」書台在樓梯頭喊我了，她居然還能認出我的聲音。見着舊友，使我想起往事。她那大的男孩已入初中，小的已小學二年級，「讀第五冊」，她高興的對我說，一直帶在自己身邊。川陝路的橋樑確實被風雨冲壞了，汽車不能通，她是由廣漢坐了黃包車來的。我說我也預備坐黃包車走川陝路，一節一節的坐過去。「這怎麼成？煩麻哪」！她說，「橋樑都壞了，水淺的地方只好擱了木板，人下車來步行，把車子槓了過橋。短路還可以這樣，你走長路怎麼成呢？」

爲了書台，我又在淩雲多留了一夜。那夜在她的房間裏，我們談了些時，環境的變遷，心境的不同，使我們本來可以更爲接近的會面，卻增加了不少惆悵，當然我們彼此都已找不到當年「倦旅」降阜時十八，九歲的熱情與天真了。

「你別去，那邊比這裏更苦，你去走一圈又有什麼意思呢？我看你入川以來，心境就不安定，你這樣跑來跑去，太疲勞了。就是廣漢小一點，並且也不安全，否則我留你在廣漢居住。」

許多好意我都接受了，「這樣罷，我回川時，總希望能與你住得近些。」我說。

她微笑起來。

次日，她請吃午飯，是一桌豐满的酒席，又爲我介紹了幾個朋友：可是我心裏很難受，對着佳餚，雖然本能地吃下去，可是不能不想起戰爭，以及其他。如果在國家自由，獨立，快樂的時候，看見許多舊友，境遇也都很好，我心裏一定愉快得不可名狀的。

午飯後，我搬到祠堂街友人家，近晚，她來看我，留字說明天早上動身回重慶，我正出去了，回來已夜裏十一時過，來不及去看她了。於是，我們這樣輕易的見面，又這樣輕易的分別了！

成都差不多每天午後與夜裏總要下一陣雨，正午又很悶熱，使人頭昏昏然，好像沒有睡足的樣子。天氣簡直有像西貢那樣的潮溼與難過。有人說住家的舒適，北平以外，要算成都，北平，我同意的，若說成都，我可絕對不同意 我不慣於悶熱同潮溼的氣候，就是家鄉的氣候，我也不歡喜，我覺得住家最好是哈爾濱，其次才是北平。哈爾濱氣候乾燥，有水，有雪，有炎夏，只是冬天吃的菜貴一點。那天午後——這一天倒例外的沒有下雨——獨個人雇車到華西協合大學去，這是成都人叫做「租界」的。那學校的建築與北平燕京，南京金陵的校舍差不多，都是宮殿式的，不過年代較久，牆瓦都已變成深灰色了。只有美國人有這許多錢來造華麗壯大的校舍，學生寄宿舍。美國人常常笑舊大陸上的國家，那些有名的大學，不過是幾間課堂，圖書館與實驗室……但是舊大陸的國家有時也笑答新大陸：「雖然這樣，我們還是有我們的學者，往往是成爲世界的學者，我們依然可以做研究工作，我們新的人才依然源源不斷的從各種大學，專門學校裏培養出來……」的確，這倒是一個事實，在我，覺得一個國家，富錢太多的時候，那也不妨造些美麗的大學校舍，至於像我們，這樣的校舍似乎是無需要的。實際上，抗戰一年多來，早已證明不但這些校舍是不需要，而恰恰給敵人作爲轟炸的目的物。我不能不深嘆我們一向的教育只是形式教育，商品教育，更可痛心的

是那些各地的大漢奸，也有的學生，大學生去充任，不能不說是一向教育的破產，也不能不叫人反省深思該不該再繼續這樣的教育！

南京中央大學的牙科班在併在華西大學的牙科裏，南京金陵大學的一部份，文法科學生也在華西寄讀。這時是暑假期中，沒有一個學生影子，遊人很多。有一家男女老小，坐在草地上嗑瓜子，吃糖果，悠然自得，談笑欣欣，使我想起巴黎波洛業森林裏的情景來了；有些小姐與少婦，她們的「馬桶式」的捲髮，在風裏飄動，耀眼的各種花色的綢衫；高跟皮鞋，可憐地發出不自然的不均勻的托托聲，向着我迎面而來。她們快樂地談話，多半是操着江浙口音。竟有的爲得要省卻極微小的力氣，索性坐在黃包車上，向天望望，向地望望的那樣欣賞着美景。宿雨積在球場上，還像池沼一樣，我想要等待牠乾燥是不很容易的罷。樹葉的顏色青得發亮，草也一樣的蒼翠，漫郁，…沉沉的鋪在地上。樹木，花草，這樣的發育，無怪使人感覺到有些難受，這是一個最好的適合於植物的氣候，而不是最適合於動物，特別是人類的氣候。水蒸氣與霧氣好像從天上壓下來，使你鼻孔都感到閉塞了。是的，儘管有人說住家成都最好，但我還是不愛她。我要重複說的，成都畢竟太遠離前方了，看到那些悠閑的遊人，他們與她們，嘴裏只是瑣瑣碎碎談他們的私人間的情感，我心裏深深地咬着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裏的話，大意是：「前方激烈地進行着戰爭，後方則一切依舊照日常一樣的在那裏繼續，憎，愛與別的：：」你覺得不可思議，但事實是這樣。

二十日午前得到的消息，明天有車子，一切都託了蜉蝣先生。午後，去向王老伯父母辭別，他們知道我要吃甜食，拿出了蜜餞等等的東西來，永榮姊又燒了糖芋，吃着這個應時東西，使我想念家鄉。伯母一定要送我一個紅豆戒，我恐沒有戴的機會而謝卻了她，結果，她送了我六粒紅豆。紅豆，就是王維詩中的「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的這種紅豆。很奇怪

的，如果把牠放在身邊，牠會愈久愈紅，愈鮮艷。牠的形狀圓圓的，像毛豆一樣的大，可是圓在衣上很像一粒寶石。成都有一家專鑲銀器的店舖，永然姊曾領我去看過，這家店舖鑲工的精緻連在滬杭一帶也難找到的，聞婷先生也說可以比得上巴黎的有名手飾店的鑲工，的確，我在法國溫泉療養地如維希（Vichy）等地見的手飾店鑲工也不過如此。這家店舖現在很有名，可是我恰恰忘記了他的店名。只認得是在離凌雲旅館不遠的一條路上，居留在成都或來成都遊玩的外人，常對專在這家店裏定打些銀叉，銀杯，銀匙，及各種好玩的小東西。那天我看到一個鑲飾，上面刻着一個老農肩了一付担子，那老農的背微微有點彎，表情十分生動，很使我愛好。

回來的時候，惠姊已在友人家院裏等我了，上樓去，我急急的理行李，她靜默的坐在凳上，顯然心情是被惜別的惆悵激動着，她立起來，她踱着步，哭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得再見面」！

「只要不死，總還易見面的！」我笑了說，我並不是那樣殘酷，也並不是不知道珍惜友情，特別是不能遺忘的童年的友情，但是旅行的興趣已超過了這個別離情緒！

二一日大早五時，就起來雇車，太早了，雇不到車子，只雇到兩輛一老一小拉的黃包車，為了不願吵醒事情極忙的友人，就把行李搬到車上，這樣上了車，不別而行了。

昨夜又下過雨，今早已停止了，但地上還是很泥濘，街上十分寥落。車夫老者拉我的行李，小的拉我這個人，一樣的蹣跚的脚步，從祠堂街到汽車站，他們竟拉我近一小時工夫，我心裏異常着急，可是那老的車夫，他還不認識路的，時常往錯的方向拉，小孩子在後面喊住他，指示他，一隻箱子太大，擱不穩，時時因震動而地下來，這樣担担擱擱，可是他卻說：「早得很呢，車子要八點鐘才開」。這樣欺騙我，小孩子呢，倒老在後面催促着快拉：「時間不早了，恐怕趕不上了」！小孩子對於責任心總比成人強。

到汽車站時，峰嶸先生家的男僕已在那裏等我，說牌子已領到了，他幫忙照顧我的行李，不一歇峰嶸先生來了，為了打長途電話介紹綿陽廣元汽車站上的熟人。惠姊趕來，在候車室裏談了幾句話，我就上車了。上車時，才知道這輛車是直開梓潼的，但當我買票時却只許買到綿陽，開車時，站上的人說可以在車上補票的。

車開了，窗外還望得見友人們揮着手，漸漸的他們的影兒也看不見了，車出了成都城，開在田野中。

成都，這個被多少詩人們歌誦過的蓉城（成都又名蓉城，春來滿城都是芙蓉，故名）我就這樣匆促的同她分別了！

二　由成都至寶鷄，寶鷄至西安

成都到廣漢，廣漢到綿陽的途中，兩旁都是大平原，碧綠的稻田，舖展在眼前，可是鄉人同川東的一樣，衣衫襤褸，面色枯憔。

下午三時左右，我們到了綿陽。這時候，三輛車，因渡河的關係，前後相距得很遠了。我們的車停下好久還不見第二輛來。我們這輛車，在成都開出時，原說是直開梓橦的，可是剛剛車一停，司機還沒有跳下，站上的一個職員對司機喊：「車子壞了麼？」果然這輛車子，一直很好的開到綿陽，又很好的停下來，忽然壞了！「車子壞了！不能再開了！今天在綿陽過夜」！司機喊。車中有幾個旅客，連那位別動隊隊長太太在內，不肯下車，要他們繼續開梓橦。照衞兵說——他已走過一次——此去到梓橦只須渡一條河，倒要化個把鐘頭，眞眞的路程只有一點多鐘，算起來，六點鐘一定可到的。我可以找到崢嶸先生所介紹的人——站上的職員——我也不等待他幫我什麼特別的忙，只盼他能幫助我辦補票的手續。可是他說今天車子一定不開了，勸我早點去找旅館，等一下也許給人家住滿了；並介紹了我一個城裏的旅館——這個旅館，起孟先生在重慶就爲我介紹了的，說是比較算清潔一點的旅館——我感謝了他。正在同黎君一起叫黃包車進城去，停在車上不肯下車的旅客，在車窗裏對我呼喊招手，我走近車去，隔着玻璃窗，他們對我說：「你不要走，時間還早得很，我們可以要求成功，直開梓橦。」我覺得話非常有理，但是不知爲什麼，我的心總被那個職員的這幾句話「今天車子一定不開了……，等一下也許給人住滿了……」深深的刺激着。在車旁徘徊了一歇，站上的人見我們聚攏來商議，就大聲的叫：「車子今天一定不開了，大家走罷，車子要開進車房去了」！……可是沒有一個旅客理他，於是接着吱吱喳喳的：「今天就是爲了不能渡河，不相信

，可以問別人，昨天我們的人被新綏公司打傷了，還照了相，要呈報上去打官司的……」那個衛兵跑回來對我們大家說：「司機不肯開，因爲昨天，公路局的車子，在渡河時，新綏公司的車輛爭先渡河，把公路局的車上司機與乘客都打傷了，他們怕今天又起衝突，當然要打起來，我們是打不過他們的」。另一個旅客加上補白：「昨天是這樣子的：有兩輛新綏公司的車停在前面，公路的一輛車開在他們後面，可是在這一輛公路車的後面又來了幾輛新綏的車，渡河時間很久，只有一隻渡船，只好一輛一輛的渡。當輪到公路客車渡時，後面的新綏車上來不許他渡，這樣就爭鬧起至於打架……」聽他們說得娓娓生動，但我倒反有點不相信起來，打架這件事該是眞的，決不是不肯直開梓橦的理由，何以現在不再說是車子壞了不能開？總之，這裏面有欺騙。可是在這個時候，那位大隊長太太也已經走下車來了，「如果出了事，那不上算」，他們都在這樣說，準備在綿陽過夜了。還機，還是決定再叫黃包車進城罷。我託那個職員明天幫忙我辦理買票的手續，又問他要否今天先行登記，俾明天就可領牌。他回答說：「不用，不用，明天你只要近開車的時候來好了，我替你留出坐位」。我問他這輛車會不會等一下開梓橦呢？他說如果開，會打電話給我。

進綿陽城，沿城牆下走，奇怪這些倒頹下來的城牆，非常像海寧小東門一帶的城牆，黃包車沿着石板路顚顚倒倒的走，頃刻使我覺得「快到家了……」可是，這是綿陽！

幸好，在那個旅館——大約叫嘉利賓館罷——裏找到了兩間房間，我的一間靠院子，安靜的一間近廚房，在一條小街後面。放下行李，去找飯店，吃過飯，就去逛街。這差不多是我在旅行中所一直愛做的。綿陽也有一條直貫城中的水門汀馬路，可是很短，街市也不及廣漢的熱鬧，在民衆教育館前我看了一下壁報，又在一家店鋪裏買了一份當天的成都報紙。綿陽人的說話口音與成都不很同，就是面貌與舉動與川東人比較起來，也顯得質樸，笨遲，總之，慢慢的有起了川西北的風味。

玉蜀黍與麥粉混合起來做的餅子堆滿街都是，但是吃慣南方糯米食品的我，總引不起愛吃的胃口。

回進旅館，在院子裏的一隻茶桌旁坐下，泡了壺茶，一邊讀報紙。太陽已經快要下去了，可是地下的水蒸氣依然熱烘烘的從脚底下升上來，滿院綠苔，厚如絨毯，使我煩膩得好似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擱脚。牆角的天竹，翠綠的葉，鮮紅的果，在潮濕的天氣裏，顯得分外的鮮艷。洗了面，把身上的灰塵出淸了些後，再往街上去蹓步，月亮已出來，深淡的照着馬路，天忽然悶熱了，人們都從屋子裏出來，在街上閒散，小小的豆油燈在門排板裏抖動着，一閃一閃的。

剛剛倒頭睡覺，忽然括起大風來，一下子雷電交加，大雨傾瀉着。

次日大早起來，就雇車子動身。

街道旁倒着一棵一棵的大樹，有的連根折斷，有的吹斷了椏枝，也有一處街角，屋子吹倒了。太陽已新鮮的透出了熱光，今天依然是炎熱天。到汽車站，已有幾個昨天同車的旅客在那裏等待了，車站上的職員還沒有起身，我們大家無聊地坐在站旁一帶的小茶館裏，有的喝茶，有的吃酒釀蛋。茶館旁邊有好些小擔子，賣甜酒釀蛋，在什麼東西也買不到的淸晨，他們的小生意倒還可觀。等着，等着，這個跑進去問，那個跑進去探，太陽熱烈的正逼照着我們。一羣整齊的軍隊從我們面前過去，該是出操，他們的年齡約在二十四、五，他們的胸膛個個挺起。「爲什麼他們留在這個地方，不出去打鬼子？」我苦悶地想，他們唱起歌曲來了：「太陽淸早……依呀海……」不知道爲什麼我不喜歡這個歌曲，或者是我聽久了一個我所討厭的人的歌唱。他們爲什麼不唱義勇軍進行曲，我會愛好他們唱這個曲子。

七點鐘了，應當是開車的時刻，然而車子還沒有離開車房。聽說可以領牌子，買票了，許多人都擁到售票的小門口，我倒有些茫然了。一到車站，我原就找那個許留車位的職員——不過我根本

就不信任他——他還沒有起來，及至等得他起來，他說已爲我留得一個位子，我就耐心的等待上車。可是人家已經買好了票，坐上車子，我呢，還在等待着，當追問時，他人也不見了，我就自己去買票，他們說：「買票要登記，今天登記，明天買票，今天沒有位子了……」怎麼？今天沒有位子了！我鬧了，那個職員出來：「替你留好了位子」。我問他許我的位子在那裏呢？他說：「等大家坐齊了替你找」。「那不成，我要知道我確實坐那一輛車走」。車站前這時候停了三輛車，我逐一問過去，這輛也不是，那輛也不是，而且都沒有空位了，那麼我該坐的一輛車呢？他被我逼得不能再敷衍了，却說了出來：「今天客人實在擁擠，我只替你在一輛行李車裏弄到了一個位子」。這輛行李車還沒有到綿陽，十點鐘可到。奇怪，今天客人實在擁擠，那昨天爲什麼不讓我登記？我也不是一定要靠他才買得到票子的。這一切都是爲什麼呢？我再問時，他說那輛行李車坐四個旅客，我同黎君及另外兩個旅客，——看去也好似同我一樣因有人介紹而反上當的——我同黎君經過了一番商議之後——我心裏早已猜着這個職員不是爲要揩我車票油，就是與旅館商人有關係，多留客人住幾天旅館，他有派頭錢的——我說：「那不成，爲什麼我要坐行李車呢？我決不坐」。就同他講理，責問他昨天欺騙我的話，黎君也幫了我說。「什麼？你在這裏無理吵鬧！」站長走出來打官話，想把我嚇住。這一下子，更使我忿怒了：「你說官話沒有用的……。」忽然，哄哄然的，第一輛車上的旅客在那裏吵鬧了，許多人的話聲打成一片，分不清楚是那一個說的。「那不行，公家的車輛你要放私人行李，反而把我們的行李連一個很小很小的包裹也要磅過……」那些旅客都紛紛下車。一問，原來那個站長把行李都裝在旅客車裏：旅客的面前，背後，都放了行李，擠壓得連腰連脚都伸不直。許多的質問，許多的威嚇，許多的解釋，終究，才弄清楚了：行李是旅客們結過票的行李，並不是站上任何私人的行李，那是因爲要替公家省一點汽油，把一輛行李車省下不開了，所以把行

李裝在客車裏。既然這樣，旅客也願意擠一點，在抗戰時期，一切都該節省，特別是汽油，那是對的，於是旅客們在車旁等他們把行李先好好的重新裝過，然後人一個一個爬進去、因爲落脚的空隙也都給行李塞住了。忽然，我的位子也有了，第一輛車裏竟餘了六個位子，而且都在前面。我同那個大隊長太太仍舊坐在第一排。一場吵鬧總算結束了，可是開車，已近十時了。

其實只開了半小時光景就到河邊了。河邊已有許多輛漆着「新綏公司」的汽車停在那裏。在成都，我爲了坐公路車麻煩，要等待，及開車時刻不定等等原因，曾想坐新綏公司的車子，去探問時，他們回答只運貨物，不載旅客，可是這個時候，却看見有穿着旗袍的女子，有小孩，還有好些年輕的男子，從車上下來，在河邊散步，這些人，未見得都是新綏公司的職員罷。我想既不公開售票，那些人總有別的方法才坐上的；他們都是高大而強壯的，說話帶着東北口音。我們等着，等着，徘徊在河邊，直等待八、九輛新綏汽車都過完了，才輪到我們。渡船只有一隻，渡夫只有一班，這些渡夫，他們十幾個人，看去個個都抽鴉片的，面黃肌瘦，眼睛半閉，他們黃黑的皮膚底下該有的脂肪都給鴉片烟毒吸乾了。他們像夢中一樣的摸摸索索拉着那個繩子，好容易把汽車渡過去，又把空船渡回來。

水流很急，上水費力，下水倒極容易的，用不到撑篙，渡船來回像箭流似的斜行着。這條河邊，據說張飛同黃忠曾隔河對打過，我可記不得三國志裏是不是這樣寫的。在河邊走，那個衛兵對我偶然發牢騷：「眞討厭，一個不够，還要兩個」，他伸出兩個指頭「已經接去了一個，放在寶雞，現在這個去住南鄭」。那麽他走這條路不是第二次，現在應該是第四次了。

渡河這樣的麻煩，在我過去旅行中從來沒有遇到過，一渡渡了近三小時。

綿陽以上，漸入山地，只開了近四十分鐘，就到梓橦了。「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童年

時，讀着王維這兩句詩，已死的長兄兼長師隨便怎樣同我講，我總不懂，「梓橦」，原來有這樣奇怪的地名。

車到梓橦，停在站前的大街上，司機一下車，天無影迹，又不預備開了，時間只一時過，昨天同今天綿陽站上的事，已够教訓了我們，這短短的路程中足够給我們充分理解與團結的時間，我們就堅持統一戰線。對車站上的人我們的言語與態度是十分強硬的，對司機，我們輭硬兼用。我們無論如何不下車，只推兩個男客下去往館子中吃東西，其餘的人均在車上，由這兩個男客向館子中叫了麵，送上車來吃，因為站上的人騙我們下車，如一下車，就要把我們的行李搬下，這輛車子開回成都。他們見我們不下車，起初是騙，後來用威嚇，最後站長出來了，他命令儘管把行李搬下來，他們來搬，我們把行李奪住，他們冷笑，可是也無可奈何。「司機病了，等他休息一下看能不能再開，如果司機患病開車，途中出了事，我們不負責」站上的人說。我們大家哈哈笑了：「當然我們的命難道你們能够替我們負責麼？」「車兒壞了，那是真的，今天決對不能開了」。他們說，最後，他們又說油沒有了，騙來騙去總騙不了我們。我恨極了這批車站上的技術公務人員，他們不是技術人員，可是他們却借了他們的所擔任的公務人員名義，賣弄外行的技術技倆，說種種騙人的話，擺出臭架子。快三點鐘了，太陽熱烈的逼照着我們的車子，我們熱得透不過氣來，又加上煩燥，但決定不下車。一歇，他們來說：「司機睡了起來，好些了，或許可以開車」。一個職員無頼地量量油，玩那些下台的把戲給我們看。後來，司機出現了，他恨恨的投了我們一眼，恨恨的開動了車子，畢竟我們的統一戰線勝利了！

梓橦的街上擁擠着驢子及牛，汽車好不容易的從牠們中間開過。出街時，經過一條可怕的橋，這個橋上兩旁有屋宇，還有許多小食擔同菜擔，車開過時，一塊一塊的橋板都跳動起來。

汽車儘是上山下山的爬，下午四時半左右我們到劍閣，汽車站是在一個公園裏，背靠着山，圍牆外，就是河流。這邊有一個小亭子，那邊有幾隻小圓茶桌，幾隻竹椅，有的人在那裏喝茶，有的在玩脚踏車，這山景與人物都使我想起遊過的法國中央高原的一個小鄉鎮，珊雅(Ceyrat)，靠山的那個露天跳舞園的小咖啡館，遊人們吃着新炸的馬鈴薯片。

到劍閣，司機又不肯走了，我們依然採取我們統一戰線陣勢，大家不下車，推兩個代表去見站長，說明我們不能停留在這個地方，我們的車票是直買廣元的。那個站長倒很好，他不像綿陽站長及職員都一任司機的排佈，要開車必得好言好聲懇求司機老爺。在我們聲說之下，劍閣站長對司機說話，叫他快開，司機又說生病了，我們問他生什麼病，他說眼睛痛：但是那一個相信他，就使是眞的。本來，開長途汽車是一件苦事情，但這是他的職業，並不是旅客逼迫他去做的，他不做則已，做了必得好好地做，一切工作上的條件他該向公路局去要求，可是他沒有權利來爲難我們旅客，不惜不顧的找旅客來出氣。我們恨極了，在車中你一句我一句的指摘他。他在車站裏面轉了一下，回到車上，不聲不響的開動了車子。我們知道他是恨透了我們，但不管他，我們要走路。

過劍閣，車繼續往上爬，不久我們就到劍門關，山口異常狹小，曲折，險峻，在轉彎的口子，好似沒有路了，但轉過口子，大山又出現在面前了。李白「蜀道難」中的：「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就是這個地方。車過去了，回頭看時，只望見一條山縫。在有一個時候，我們的車儘是沿高山走，一旁是臨着急流的河道，隔河，又是起伏不斷的高山。我們經過一條險路，那是在一個突出的好像懸掛着的山下開過，如果那石頭掉下來，我們連人帶車當然都沒有希望了；那山石看去那樣伶仃，可是並不掉下來。

車在高山上顚動得非常利害，還不知是路不好，那衛兵輕聲說，他怕司機恨我們而故意出事，

弄到翻車等等，我覺得那是不會的，如果翻車，司機不能包他自己不受傷，雖然開車的人在最前面，比較穩一點。

離劍門關，六時多了，這時太陽已下山，靠着一點晚霞的淡光，迅速的開着，經過幾個小村，都沒有停留。七時了，我們想停在一個小村裏，司機倒不願；「沒有我們車站，連睡的地方也沒有」，而必須趕路，天昏黑了，只靠着一點星光，車子一會兒開過小河，一會兒又下坡，開得極慢，像一個盲子摸索着走。八時左右，才到昭化，那裏有公路車站，就停下來。昭化，這是離廣元約百里的一個較大的市鎮。下車時，我們只把必需的小東西帶了走，其餘行李均留在車上，站上的人說他們會當心的。這樣，我們第一就去找旅館，找到了「只此一家」的旅館，幸好有兩間房間，我同某大隊長太太各占一間，黎，韓（同行一個不相識的旅客）與衛兵只好睡在堂中的桌子上。

我們在街上來回的走，整個昭化，不過幾十步的市面。昭化，這個古怪的地名，好似含有梵意的，但是並沒有什麼大的佛寺，也沒有特別的佛蹟，什麼也沒有，只是古舊，衰敗，貧苦，這樣的一個市鎮。

到早上五時，我們都已理好行李。那位大隊長太太也一夜未睡，尤其是她的小孩子一歇不停的哭鬧着。我們在七時就到了車站，司機還沒有起身，今天我們只好稍微忍耐一點，如果鬧得不好，把我們拋在昭化，那可糟了。八時半，司機老爺起來了，洗面，漱口，吃早點，歇息，喝茶……十時四十五分了，（我們幾乎是一分一分的數着），才慢慢的步上車來，轉動那把手，在我們說不出的焦急情緒下，總算開出了昭化。又是險峻的山路，又是耐人的渡河，每次渡河都得等待新綏的先渡，他們的車都是新的，開足了馬力，往往從我們後面疾馳過去，我們的車只好可憐地讓過一邊，從對面來的，也是這樣。下午一時過，我們到了廣元。

檢查的工作完結了，車站上只剩下了我們幾個走長路的人。我們向站長要求給我們馬上直放寧羌，他們回答說：「沒有車子，車子壞了，油沒有了……」爭論一場，毫無結果。四時過了，我們才進一家旅館，離車站只十幾步路，店堂裏是茶館，裏面一共有五間小屋，兩間已給人住去了，我們占下三間，黎韓二人一間，我與隊長太太各一間，衛兵只好睡在堂中了。

我們曾到汽車站去看過幾次，其實立在我們旅館的茶店門口，就望得見一切，的確沒有上寧羌的車，只到了幾輛裝汽油的車，「明天你們一定走得成的，汽油到了，」站長對我們說。

那晚我睡得倘好，居然買到一枝艾繩，點了後，蚊子少一點，可是天熱極了，到半夜，下了陣雨，雷呀，雷呀，大約一小時光景，雨停了，不敢重新再睡，怕睡誤了時刻，就休息着等待天明。起來後，院子裏的石板上已露出乾燥了的花白形跡，太陽也已照在嶺上，昨晚洗的衣服也都乾了，一切都好，我快樂極了。

六時，我們已把隨身的行李安放在汽車站上，大家呆等在那裏，有一輛載重車停在站前，八時半，我們已登上第一輛載重車，車中堆滿了行李，汽油，我們旅客就坐在舖蓋上，一共十五、六個人，大家擠做一團，連放脚的地方也沒有，各人的脚像排齊了似的放着，一點都不能移動。坐這樣的車子，我是第一次，也曾聽坐過這類車子的朋友說不好，但是車子開出了幾小時後，我却覺得這種載重車是很好的，無論是牠的橡皮輪及馬達都比那些客車來得吃重，只有這樣的車始能在山地上行，如果是不能吃重的車，那是危險的，容易顚覆。

從廣元以上，山更高了，路也更險峻了，我們已經沿着棧道行，古時的棧道還留在那裏，有幾處，公路就傍着牠建造的。棧道非常狹小，只能行一人一騎，或許以前比現在闊些，現在路旁蔓草叢生，把路遮得只剩尺把闊，不時有挑重擔的人及柴夫走在這條路上，足見牠還在給人利用的。兩

旁的樹木，有橡樹，有榆樹，樹身都有幾抱以上，是有年代了。我想像玄宗當年行在這條路上，天下着雨，聽着風聲，馬鈴聲而作詞曲的情景。這個英明的皇帝，不能英明到底，不過爲了個無聊的女子。

我們的車在下午三時過就到了寧羌。今天除了一路受檢査的麻煩外，那司機是非常好的，他開車的技術也很高明，而且不願多耽擱，如旅客一樣，只望早早到寧羌，有幾次，我們因爲受不住車的顚簸，要停車走下來，他倒不肯同意。也有幾次路上受攔阻時，是他不理會他們，儘把車子開過去：「査什麽？早査過了！」

次日早上在寧羌汽車站又會見了上天同走路的人。這個地方苦極了，連甜酒釀蛋也沒有，在一家小館子前，我看見有幾個穿翻牛皮掛的人在那裏吃稀飯，我也就買了一碗——恰恰這是最後一碗——把肚子塡滿。

今天我們坐的還是無篷車，已經是陝西的車輛，是美國與蘇俄貨。陝段公路比川段好得多，橋樑都很結實；司機也能盡他的職務，一點也不用費口舌，我覺得痛快極了。只是天氣太熱，昨天的太陽已把我手臂晒得痛了。在寧羌買不到草帽，今天還是只好兩手交替着拿扇子遮住頭，到後來，看見別人用衣服來包頭，我也用一塊手巾裹着，渡河時，把手巾在水裏絞一下，包在頭上，很風涼，但是不到一、二小時就晒乾了。自寧羌以上，已覺氣候乾燥，汽車過去，灰塵飛揚，眞是喝飽了黃沙。一重山，二重山，爬了無數重的山，只有在午飯的時候因吃麵點而停留了一歇。午後五時光景，我們到了漢中。

那晚在旅館裏，——已經沒有那隊長太太同衛兵了，他們與我們在汽車站分別了的——等待着受檢査，等到十一時多，才來了兩個武裝軍人，把我的一隻皮箱，翻了個身，一聲不響的出去了。

那晚居然買到蚊虫香，點多了，我出眼淚，點少了，又不靈，臭虫也很多，擾得一夜未睡。天未亮，我就起來，立在窗口，由院子望到街上，不知什麼，那情景很像十三、四年前的南京，由台城遠望所見的。

五時，我們動身到車站去，已經有三個穿青布工作衣的女學生同一、二個男子在那裏，在站上盤旋着，時間還早，大家往汽車站對面的小擔子上吃甜酒釀蛋。自從離成都，這個東西，幾乎成爲每個早上必吃的食料了，以前我這般愛吃牠，——回想到去年十一月底同沈練江夫人在九江終夜候輪，吃甜酒釀蛋以消磨時刻，那時吃着何等有味——可是這一天吃進口裏，差一點想嘔了。有一個哲學家，是笛卡兒特（Descartes）還不知是那一個，會諷嘲女子的胃一如女子的感情，這個時候想着這句話，使我好笑。

「什麼時候到秦嶺？」車中大多數人這樣發問，我更是問了好幾遍。我們還要爬過一個大山，那就是秦嶺，過了秦嶺，就到寶鷄了。秦嶺這個山名，我在八、九歲時就聽到了，小時候，母親講那些神怪的故事，會講到八仙裏的韓湘子，「韓愈貶到藍州，過秦嶺，夢見他的姪湘子，……贈他八句詩：『雲橫秦嶺家何處說開關馬不……』」就是這個秦嶺。

我們的車，爬上一層又一層，原來已經爬在秦嶺上了，如果只看對面的山峯，那你還不覺得爬的怎樣高，如果你往下看，往後望，那你的心虛脫得就要像坐升降機下來時的情形了。秦嶺裏只見樹木，荒草，沒有人煙，間或有一堆工人在修路；有時，一羣全武裝的軍人從山凹裏出來，全車的人不由的都怔了一怔，車子繼續再爬，每轉一個灣，大家都攀住車，好似準備車子翻身，其實如果車子翻身，任你如何用力攀住車也是沒用的，或者，忽然擱住了，如果在這個地方擱住了，那眞是糟得不堪設想，幸而車子沒有出毛病，爬、爬、終究爬過了秦嶺。到寶鷄，下午四時過了。

次日大早，我們上火車站去，火車早已停在那裏，「滬杭」「京滬」「北寧」……一節一節都是這樣接攏來的這些字，殘酷地刺動我的心腦。這個車站的月台因爲沒有欄柵，使我覺得浩浩蕩蕩。車站的牆上，貼着好些紙頭或用粉筆寫的字：「××，我在××」……這類通訊的東西。我們買好票，結好行李，就上車了。說是六時到七時方開。不久，天下起微雨來，但一會兒就停止了，在火車裏望兩旁田畝，泥土不再是黑色，而是黃色，乾燥，結實。玉蜀黍還沒有收，白菜，南瓜很多。這一帶的屋宇還美觀，有的是一座一座四方形的黃色泥屋。過馬嵬，楊貴妃葬身的地方，當時「六軍不發」，玄宗無可奈何，「賜」她自縊，後來入蜀之後，玄宗深深追念。「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這是長恨歌裏的名句。接着過咸陽，這是一個大站，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大市「咸陽市五牛分屍」，充滿了多少悲慘與快樂的事故，阿房宮也該是達到咸陽，現在却是這樣的冷落，破敗，從站上望去，簡直沒有一座像樣的屋子。

在車中，又遇到那三個女大學生，她們今天都施上了脂粉，「爲什麼呢？」我不禁傻想。坐在我後面一排椅子上是一個武裝軍人同一個「大阿福」臉的婦人，那個婦人有一頭吧兒狗，在人們的脚邊攢來攢去，這個軍人用着一口純粹的紹興話問她關於狗的起居一切：「牠愛吃什麼？」「牠吃牛肉，不愛吃羊肉……」我聽得厭極了，然而不能不聽，因爲他們的話聲是這麼尖銳。這個小畜生在這個時光居然還能吸引人的注意，我眞不解。「克明！」「克明！」狗走往車廂那頭，婦人一邊追一邊呼，我的汗毛都浮了起來，我承認我討厭這個女人。

太陽火熱的照着黃沙大地，不安，好奇，期待的種種複雜情緒裏，我們到了西安——七月二十七日的下午二時光景——這個古代的首都。

三　西安待車與西延途中

下車後，旅客擁擠在西安車站上，等待檢查行李。檢查處像一個櫃台，旅客把箱子放在上面，人人都想早點受檢查，所以，擁擠，混亂，但是同時，那些站上的檢查員却不停的在喊：「這是那個的？快拿上來檢查！……」這情景使我想起杭州的城站。

受過檢查的人，都往站旁邊一角去，好像又有什麼必需手續要辦的，我帶着行李走近去，才看見是幾個男女護士，在一隻桌子旁替旅客打針：西安這時候正流行着霍亂。旅客是那麼的多，只見男女護士把針東一針，西一針在人們的手臂上打進去，我覺得太不乾淨了，而且我又在旅程疲倦之後，我對他們說我進西安就去找醫生打，他們好似求之不得的回答：「好！好！」

這樣，我就帶着行李，走出車站，站門外的牆上貼着許多關於防止霍亂的宣傳彩色畫，可怕的虎列拉正襲擊着西安市。

在站上，我們被大事，黃包車所包圍了，到馬坊門街，索價一元，或八角，我有點稀奇，起孟先生明明對我說過至多是三角半錢。太陽如火一樣照在我的頭上，黃沙撲面，西安對於我，顯得是這樣的陌生，總之，我是被我的浙江官話累了。秦韓兩位先後坐黃包車走了，我也終究化了五角錢的代價雇到兩輛黃包車進城去。

西安，我們古代的首都，八一三後，牠很早就受到了敵機的空襲，而且有一個時光，潼關是很緊張的，可是市面還繁盛，雖然空氣是緊張的。鐘樓上有「聲聞於天」的金漆字，城牆也還完好。同南鄭一樣，街上有許多不同符號的軍人走着，車拉過一條街，我仔細觀看，看有沒有八路軍人，很幸氣，給我發現了一個臂掛八路的軍人，他背着一隻信包，像別的人一樣，在熱陽下，喘着氣走

路。當火車到咸陽車站時，我會見一個八路軍人，是一個很年輕的男孩，看去不過十四、五歲，不待我注意，他已經下車去了。

一個朋友住在馬坊門街附近，爲了便於招呼我，就陪我在馬坊門街上找了一家旅館，叫西北大旅館罷，我只記得這家旅館的隔壁是一家館子，叫浙江大飯店，可是店堂門口有洋廣南貨出售的。

我的房間在二層樓上（一共也只有二層樓），西向，太陽正遍照着一半房間，地板是廣漆的，灰塵積得烏黑黑，除此以外，椅桌等等好似還覺得清潔。一進旅館，我就想睡覺，朋友走了，說等一下來同我去晚餐。一睡到牀上，我發現這間房間並不如我想像的好，沿牀的白牆上有一條一條的血迹，枕頭底下還有乾枯了的臭虫屍體。

我沒有睡着，實在太熱了，因爲天氣又是乾燥的，簡直熱得全身像火燒一樣，嘴唇都破裂了。我沒有料到西安的夏天也是這樣熱的，從前，聽到好些住過西安的熟人對我說西安是如何風涼，可見一個人如果不親身到這個地方，總不能知道這個地方的確實情形，連氣候都這樣。五點半，朋友來，一同出去，他領我去青年食堂，這是一個西餐店，我們上樓去，那裏擠滿了一些南方口音的吃客，電風扇正在迅速的轉動着。餐價每客好像有一元二，一元五，一元七三種，還不是那些牛排豬排。內地的西餐都是這樣的，不但味道是單調的，菜目也單調，所以吃一次覺得還好，吃第二次可以，吃第三，第四次就乏味了。但是，我確實感謝友人的盛意，爲的在那個時候我正想吃一次西餐。

西安的街道非常闊，而且有旁路，旁路上還有些樹木，行人在樹木下安閑地走着。我問朋友這些路基是不是新加闊的，還是原先如此，他說一向這麼闊，那麼還是很古舊的路基了。小時候，我常常夢想長安的街道，「春風得意馬蹄輕，一日走遍長安城，」我想那個時候從外省進京城的人走

在這樣的街道上，當然會有特別興感。在馬坊門街附近的一條短街上，還看到舊時的明角燈，那樣小的燈，不知道怎麼能「金吾不夜」的?!

同友人分別後，就回進旅館歇息，太陽一西沉，天氣馬上風凉起來，這是與南邊不同的地方，夜裏我還蓋了棉被。

早上八時光景，我還沒起來，被韓君來吵醒，他找到我友人那裏，然後再跑向旅館來，他同着一個朋友，有一點張惶失措：「我們有兩個友人失踪了……」他輕聲的說。坐了一下就走了。

十時左右，我雇車往七賢莊一號八路軍辦事處去，接洽去延安參觀的手續，辦事處伍處長出來接見，一間小方形的會客室，靠門口擺着四隻沙發，黃布套。他客氣的請我上坐，沒有什麼客套話，開始問：「呵，可是坐飛機來的?」

「不，坐公共汽車來的。」我心裏想怎麼差一點給他猜到呢，原來我曾想坐飛機的。

「延安很苦呵！不像西安一樣的，遠遠不像西安。」他說。

我忍不住笑了。

後來說到車子，他關照我同門口的王先生接洽，要我把寓居地址留下，一有車，王先生就會打電話來通知我。問了王先生，說三十號大約有車，明天下午會通知我。

走出辦事處的院子，我心裏想，今天我的服裝，一定給了他們一個特別的印象，——至少是不大好的，但是有什麼法子呢?我沒有一件旗袍，爲的我受不住那枷索一樣的領口，當然更不用說軍裝了，我已經穿慣了西裝，在我，這是習慣的問題，而不是講究與漂亮問題。

同進旅館，我覺得很快樂，好似把一個數學難題解答了。沒有事了，只須在旅館等待電話。

下午四時，韓君來看我，他很高興，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他明天就要出發，進陝公分校。呀！

青年！熱烈的青年！

近晚去訪二妹，——明霄女士——把王老伯母託帶的東西交給她，她是南京失陷後調到西安來的。我同她在無錫一別又快兩年了，她結婚了，而且快做母親了，她的周先生是一個可愛的東北青年，他們眞是一對簡單，誠摯的夫婦。二妹來西安後，曾回過成都省親，談到川陝公路上的一切，她說：「在綿陽，他們硬要留我住旅館待車……」原來她也上那個人的當。「他們就是這樣的，越有人介紹，他們越要敲你，或同你滑稽。」這也是中國人的特別脾氣，外國人常常罵中國人，愛利用信用而做壞事，這話使我深思。

二十九號那天，爲了等電話，就沒有敢出去。二妹夫婦接連打電話來邀去吃午飯，終於到正午，他們兩人來了，拖到一家江蘇館子去。西安的菜也是這麼貴，同南鄉差不多，菜也沒有標明價錢，而至少都在五角，六角。

那天下午二時光景，有警報，可是旅館只把大門關了，旅客們依舊說笑談天，因之我想聽一聽敵機的聲音也不可能。警報我也沒有聽到，只看見有些路人衝進旅館來，茶房們說：「有警報！有警報！」人們把警報看得那麼平淡，似乎同南昌的空氣是不同的，大約因爲南昌很早（第一次轟炸在去年八月十五號上午）就遭受到敵機殘酷的轟炸。我本來睡在牀上，起來到走廊上望了一下，天太熱，又同進房間睡覺。在南昌，一個朋友曾說他每次聽到警報就爬到牀上，如若在夜裏，根本就不起來，那樣，如果一個炸彈下來，死得可以舒服些，何必勞勞碌碌起身來呢。引得我發笑。那天我確實照着他那樣做了，實在，天熱得我一點氣力也沒有了，眞的，炸彈下來，我也不願躲避了，我只是昏昏然的睡在牀上，不時的喝冷開水。警報解除了，敵機已回去了，沒有投彈，只來了一隻偵察機。

直到近晚，電話不來，我決定出去洗澡，友人會介紹一家「明星」。費比上海這些地方貴一點，但是很乾淨，設備周全，可以比得上巴黎的浴室。洗了澡出來，回進旅館，叫了一碗麵來，吃過，出去逛公園。走過幾條小街，那些舊式的房子，式樣很特別，門檻是那麼的高。公園門前停着汽車，黃包車，擁擠着進進出出的遊人，燙髮，高跟鞋，各式的絲旗袍……一如成都少城公園所見的。園裏有花木亭榭，還有一隻大的池子，楊柳垂岸，穿過晚光下的樹影子，傳來划船的男女們的笑語聲……誰相信西安是已經逼近了前線呢！

三十號的早上，我又跑到辦事處去問王先生，他說他沒有忘記我，今天仍舊沒有車子，一有，就馬上有，並且通知我。結果，决定明天如果仍舊沒有車，我就搬進招待所去，招待所就在六號（還不知是七號）。回到旅館裏，把行李理好，只剩隨時要用的東西放在外面。三十號又過去了，還是沒有車子消息。三十一號早五時就起來了，因為王先生說好也許有車，臨時來通知我，叫我預備好。十時我又跑辦事處去，終於回旅館來搬行李。

辦事處的門口，老是擠滿了各種口音的男女青年，那位王先生，一個長個子的東北口音的青年，總是被一羣學生圍住着。「我們怎麼能走呢？那麼多的路！」我順耳聽去，還是從長沙來的一批學生，他們要求車輛給他們載到延安，我覺得他們眞有些不大明事，世界上沒有一個學校這樣不要學生出一個錢，而學生還要求給車子坐的，實在太不體諒辦事處了。雖然目前中國情形不同，因為有許多許多學生是流亡的。那位王先生，我覺得很能幹，辦事乾脆，有條理，我聽他對人們的應答，有這種感觸。

七賢莊並不是一個村莊，如我所想像的，只是像一個里，一個街，那裏一排房子差不多是一樣的，大門進去，兩邊各有兩間房，同一個小天井，二門進去，是一個院子，有幾株樹，兩邊又是房

間……招待所好似沒有辦事處深進。大門右邊的一間門口，貼着抗大招生委員會的條紙，裏面同時住人的，有幾隻禿頭舖；左翼的一間擠着許多男子，年齡不等，一例是軍服，有的有「八路」的臂章，有的沒有，這一間裏只有一、二隻舖，大部分的人都睡在地上。「婦女同志」（他們這樣稱呼一個女子）住的就在院子裏面左邊一間大的房間（接連有一間小的，兩個女管理員，還不知是該叫事務員，我忘了，住在裏面，我只記得其中一個姓楊，大家叫她楊同志），只有一扇窗，因爲蒼蠅很多，用紗蒙着，裏面一排用長櫈擱起的木板，舖着被褥，這是大家的牀舖。對面的一間是診療室，有人負責在替患病的人換藥。他們男同志住的兩間是二院子裏朝外的，一間大，一間小，小的靠近救亡室。院子裏的牆上，貼着許多標語：「擁護蔣委員長」「擴大鞏固統一戰線」……簡直記也記不清楚了，只是在那個時候，看到這些標語，——字很草，而且寫的也不美觀——把我的心感動得顫抖了，甚至於熱淚盈眶，牠們是這樣的誠摯，簡單，句句都是湧在每個人喉間所要喊出來的。救亡室差不多是一間圖書館，牆壁上掛着孫中山先生，蔣委員長，毛澤東先生，朱總司令……許多像，還有標語，壁報，很有次序的貼着，有一個白木櫃子裏放着些書。兩隻白木的舊方桌上堆着報紙。借書，看報，隨時都可以的。

「同志，」「同志，」他們間很親密的喊着，可是我總覺得不好意思把這兩個字喊出口來。我的服裝，本來已是引人注意了，而對於一個新來住的人，大家不免都要看他一下或招呼他一下。「同志，你過去做什麼工作呀……？」我窘極了，不知如何回答，所以爲了這些，我就儘躲在她們婦女同志的宿舍裏，躺着或坐在木板上看些書。大批的青年往延安去都是進抗大或陝公學習的，像我這樣只是單純地去訪問延安，一定很少，對於我的好奇是這樣產生的。但是在我搬進招待所的二小時後，我遇到了一個同伴，她姓李，片子上刊着全國女青年會農村什麼部的幹事，她說她去參觀延安

，準備停留兩星期。婦女療養所裏擠着十幾個人，有長沙來的，有四川來的，從四川來的，跑路來的居多，有洛陽來的，也有從延安來西安醫病，或者往前方去工作的，流動得非常利害，只見到許多陌生的面孔，進進出出，那晚坐火車往漢口的有一個魯迅藝術學院的女生，瀋陽人，進來的是一個姓朱的女醫師，還有兩個川籍女同志。

那天的晚飯，我在招待所吃的，一大盆青豆同一碗淡湯，雜有幾根葱，一點蛋。八、九個人立着，圍了一隻破舊的方桌吃，是純粹的素菜，大概是用麻油燒的。

「這裏吃得比延安好，」一位同桌的臂有「八路」符號的男同志說，「怎麼呢」？有人問。「那，僞的延安一切都貴，菜裏沒有這麼多油，不大有大米飯，僅吃小米飯。」

「哦！」我一邊應允，一邊心裏慚愧的沉思着，今天的菜在我吃着，已覺很苦了，就是在法國念書的時候，身邊乾枯，正期待錢到，也沒有吃得這麼苦，我驚奇他們怎麼能長期吃這樣苦呢，一號裏的林伯渠老先生今天也同樣吃這個菜。

聽說起來，延安是這麼苦，但是他們談着延安，人人帶了眷戀的口吻：「延安什麼……」「我回延安……」延安這個，延安那個……幾個伙夫同志，當我去拿洗臉水的時候，聽他們一邊洗碗，一邊談：「延安的洋芋比西安大……」「延安的豆子比西安好……」「你沒去過延安麼？」「沒去過」，我說。「延安好啊！」他們說。

晚間，姓朱的女醫師，睡在我旁邊，她能說順利的上海話，我就同她長長的談起天來了，她是上海私立東南醫學院畢業出來的，在南京中央醫院做實習生，去年八月，她回家鄉湖南。「在家裏我也沒有什麼事情，我同姊姊姊夫寫信說我願到延安去，他們回信說那邊很歡迎的，不過苦一點，我就去了……」她簡單地對我說，她的姊夫是八路軍留守處主任，（後來我到了延安，才知道就是

蕭勁光將軍）。她在延安邊區醫院做醫生，這次來西安割扁桃腺。她是一個志願醫生。

「延安的生活究竟怎樣苦？」我好奇地問。

「呵！是很苦！」她似乎沒有頭緒，不知從何說起似的，「你是一定吃不住的！」她又補上一句。

「爲什麼我一定吃不住呢？既然你都吃得住，你也是久住過上海的。」

她想了一想：「那你同我不同呀！我們湖南人……你們江浙人也是一向地域的關係，地方富庶，生活優越。」

我聽到她的話不禁想起有些女友曾說江浙婦女不會革命，但同時也同意她的話。

於是，接着，她同我談到病人，「藥品同紗布都非常缺乏。」

「爲什麼他們不向外界募捐呢？我相信一定有人關心抗戰時期內的救護事情。」

「他們不會這一套，他們已經天真，直率慣了……捐是也有人捐一點，但是怎麼够呢？」

那夜，因了蚊子的緣故，我一夜沒有合眼，翻來翻去，沒有睡着，却很疲倦；可是在我旁邊的朱醫生，她用一條毛巾毯把頭同脚都裹起，在毛巾毯裏面發出大大的酣聲。近天明，她翻了個身，對我咕嚕着：「你還沒有睡着？眞討厭，蚊子多極了！我也總睡不好！」「你還說你睡不好！你打着大大的酣聲呢！」她吃的笑了，可是一下子，酣聲又作了。

我心裏想，到延安去，可以測量一下我能够吃怎樣程度的苦。

一號的早上，我仍舊五時起來，爲等待車子。把行李結好，等着。那位李女士聽說她同我一車走。她穿着一條藍布工褲，上面是白色麻紗襯衫，像男子的西裝襯衣一樣，她說：「這樣才可以到延安」。旁邊的那位由魯迅藝術學院出來上漢口的女同志說：「對了！」「你怎麼知道呢？」我問

。「我早知道的，」她說。

我奇怪怎麼我不知道呢？我只知道，模糊地知道那邊婦女也穿軍裝的。

「你這樣子去恐怕是不大行的，並不是不許穿，是因爲大家都穿軍服，你一個人穿得不同，不好意思走出去，」魯藝的女同志說。

怎麼辦呢？做軍裝是來不及的，於是我決定今天如走不成，一定去買工褲。

李女士會說話，善交際，也很活潑，我想她一定很快就會被延安認識的，在中國，也在全世界，這樣性格的人是容易被人認識的。

到八時左右，聽說有車子了，管理科長還不知是事務科長來叫李女士動身，對我說：「今天坐不下了，明天還有車，明天准可走。」我旁邊的兩個長沙來的女同志，將同我一起走，她們也已等待好幾天了，大家很和氣的說：「希望能够早點給我們走！」

實際上，大家已經在西安停留了好幾天，盼望走的心是很急的，可是到了這樣一個環境裏，最煩燥而最易發脾氣的人，也用了極大的忍耐把這個焦急克服了。

「開一輛車由西安到延安，要化費到二百八十元至三百元的油費，實在貴呵……」楊同志對我們說這裏面的苦衷，那是一定的，不說，我們也都能想像，而他們只收車費十三、四元，拏來貼補貼補，並且有時候，有些工作人員是不收費的。實在，比起一般公路車來，這點車費是便宜的。

午前友人來看我，在救亡室裏談了一歇天。

這天是八月一日，是世界什麼節（我最不會記這些節日與紀念日），昨天午後，楊同志已經來動員幾個婦女同志的宿舍寫文章：「同志，請寫一篇東西，好不好？」「寫不來，」「不要緊，隨便寫你所想的……，」一張紙頭送到一位從洛陽來的女同志手裏：「我不會寫」，「不要客氣！」

「我不是客氣！」「過去你是做什麼工作的？」楊同志笑眯眯的問，「別客氣了！」「不是，的確不是客氣！我是一個女工，我不會寫。」但是她自己承認她的歌唱得很好，她唱了一隻「……不讓敵人渡黃河」給我們聽。

我深深的爲這個女工同志的直率與不可動搖的自信力所打動，她們這種優美的性格，在我，出生在一個極封建的家庭裏的，恐怕永遠學不會的。

早間，編排得很美麗的新鮮的壁報（還有插圖，有一位畫了一張「延安的俘虜」）掛在救亡室裏與室外的牆上了，楊同志徵求讀者的意見：「這個是不是呆板一點？」「這個顏色好似……」有的人一邊搭着話，一邊看。

因爲是紀念日，有會餐，會餐就是有肉吃，那天吃到青豆裏雜一些肉片。

午飯後，二妹夫婦來看我，拿了菓子露同餅乾來，說是延安沒有這些東西，知我今天不能走，約我去觀碑陵，我問他們遊華清池怎樣去法，說是坐火車在臨潼下車，再進去……一天是來不及回來的，只好作罷了。我們正要出門，警報來了，在門外附近的一棵樹下，坐着，彼此談所見到的敵機的轟炸，無錫，南京，南昌……敵機來了，是一隻偵察機，打從我們頭上過去，飛得很高 在陽光遍照的天空，只看見白色一點。

警報解除後，我們就一邊走，一邊雇車，那一角地方很荒涼，遇到一、二輛黃包車，索價六毛，七毛。西安的黃包車是這樣的高貴，"車子的式樣就像京滬一帶的包車。實在西安的黃包車夫怕要算是有產階級了，因爲這樣的車買起來至少也要一百多塊錢呢，除非他們是租來的。我們慢慢走，太陽很大，風過去，吹掉一點炎熱，帶來一些乾燥。我們談着西安的古蹟。「曲江現在什麼也沒有了，連雁塔都比不上，一滴水也沒有了，只有乾乾的一條潰的痕迹！」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這樣被詩人們歌誦着，帶着許多艷情逸事的這一條水流，變成瀆穢了。「春日同遊曲江頭……」我憶想起陸游失意的情愛與他的詞：「……悔，悔，悔……」

碑陵的房子是新造的，入門購票，實在是一個博物館，不知爲什麼稱爲「陵」，總使人直覺地以爲是一個墳墓。裏面有許許多多石碑，各種刻字，像與花草。有一塊石刻「達摩西來」，非常細膩生動，使我歡喜。景教流行碑，我在巴黎東方博物館看見過的。

從碑陵出來，就雇車分道，二妹問我招待所住得慣不，邀我去她那裏住，我想也好，別的沒有什麼不慣，可是我太怕蚊子，如果再不能睡覺，我會生病的，但我必得回去說明一聲，否則也許他們要以爲我迷失在什麼地方了。我回招待所說了後，吃過晚飯，就去二妹那邊。在她對門的一條街上的鋪子裏買了一條工褲，只有男式，沒有女式的，也不管牠了。又買了兩件毛襯衣。

二妹已在工作——播音——，她把他們的小書房出空了給我睡，安放了一隻小鋼牀，又放着椅子桌子，……簡直像預備我長住似的，還叫人把洗浴的水都預備好了，蚊香也點起了，……好罷！再來過一夜太太與小姐生活！這間房間門與窗兩面都臨園子，夜裏，對頭風很大，太涼了，必得起來蓋棉被。

二號的早上，我還是五時起來，去招待所候車，二妹已關照傭人燒好糖雞蛋給我吃了走，她想得實在太周到了。

招待所裏的女同志，大家在待車，聽說今天可以走成了，坐紅十字會的車，把行李搬在門口，等到八時左右，我同長沙來的幾個女同志仍舊走不成功，只有幾個男同志，有一個是廣東來的，他帶着一個十歲的女孩，他們走成了。

無聊極，回進宿舍來談天，大家談談各人的家鄉情形及別的，……那三個長沙來的女同志，一個姓許，一個姓鄒，一個姓葉，姓葉的年紀還只十六歲，是一個生得很秀麗的女孩子，據說她的父親是犧牲了的，她要往雲陽去進青訓班。

這一天沒有出去，把三天來所見的面孔更混熟了些，有一位姓張的男同志，談起，他是浙江上虞人，他老同着一個長個子的同伴，是一個華僑，姓黎，他們來西安有事，辦完事，仍要返延安。我很驚奇延安竟有這樣從紐西蘭跑來的青年，固然我也早從一些書報雜誌上看到延安是擠滿了祖國的有出息的青年，但是我不能想像他們是從那一角去的！現在我才知道，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這樣的青年，不遠萬里，千里而去的。

他們倆都愛好航空事業，張君曾學過航空機械，在日本住過兩年，現在八路軍裏做俘虜方面的工作。黎君有點小孩子氣，長得雖已像一個大人，因為生長在外國，英語說得很流利。

招待所裏吃過午飯，大家午睡，這是最衛生的辦法，恰巧也正是我的習慣，午飯後全座屋子鴉雀無聲，午睡起來，一切都照原舊，有的人看報，有的人在大門裏的小天井中打乒乓……。那天午後，幾個人立在門前，看見四號裏的一個男同志把行李提出露車走了，一定是因為招待所裏的生活，已使他受不住而一下子取消了去延安的決意。對於我，實在說來，招待所裏的生活，當然是覺得有點不慣，可也不是不能忍受。像學校寄宿舍的集團生活，我已經十三、四年沒有過着了，又是從小到大本來孤僻的脾氣，總愛一個人至少占一間屋子看書做事；但也不能夠就說我不愛人多的團體或公衆場所……總之，對於工作，我是歡喜靜靜地獨個人做的，不歡喜有人來吵擾我；娛樂，我却是極歡喜社會性的，大衆性的。

招待所裏只有兩件事情使我很不慣，就是蚊子與厠所，但這也只能怪我的特殊脾氣，因為別的

人都很好的過去了，要蚊子一隻也沒有才能睡覺，把厠所的門鎖起，還要把厠所四周的人趕掉，就是在那些貴族式的學校裏也是不可能的。招待所裏的厠所比西北大旅館的好得多，有門，打得還算深，雖是不够，男女又是共同的，人又多，剛剛進去，就有人來推門。西北大旅館的厠所同昭化差不多，總算沒有豬欄，根本不是厠所，只是在一塊平地上，東一堆，西一堆的一直擺到「厠所」門口。連可踏脚的地方也沒有，所以每次我覺得需要了，走到那裏又嚇回來了。怒天二妹曾對我說越往西北走，厠所越糟糕。

偶然又談延安生活，一個睡在靠窗的女同志，滿臉有疿子，她也是來西安看病的，說延安患肺病的很多，因爲營養不足，患胃病也很多，因爲小米飯不消化，患神經衰弱的也很多，因爲工作過度，還有皮膚病，是那樣的普遍，在學校裏，有些人的境況是很苦的，買不起毛巾，大家就隨便亂借，又不好不借，就是這樣傳染開來的。還有花柳病，那眞是無從說起，陝北的老百姓，差不多十之八、九患花柳病的……他們髒極了，從來不洗澡的，他們以前洗臉也不洗的，他們一生只洗三次臉，生出來，結婚，死。還是在八路軍到後，他們開始洗起臉來……「總之，延安別的都好，就是生不得病，一生病，就糟糕了，又沒有醫生，又沒有藥品……」她這樣下結論。延安有這許多病，我在重慶，成都就已聽到過。小米飯據說不易消化，須看如何燒法，如果燒得爛一點，那還好吃。王老伯父曾叮囑我說：「吃小米飯要嚼爛，不要多吃，譬如你平常吃兩碗大米飯，那麼開始吃小米飯的時候，你只能吃一碗，」他又說，「小米飯能耐飢，從前年輕的時候，他在庫倫，騎馬的日子，必得吃小米飯才可持久。」

晚飯前，我們幾個人在招待所旁邊的革命公園裏散步，這個公園裏沒有什麼特別景緻，只有很多的樹木——一些未長足的樹，叫牠們做青年樹罷，但是有可散步的小路，兩旁天然地長着蔓草，

使人一下的忘記了身處城市的感覺。七賢莊旁邊恰恰是一個革命公園，偶然，還是不偶然？

那晚我仍去二妹那邊過夜。並且依照招待所中大家的辦法，買了一頂闊邊草帽，西安市上就有人戴了這種草帽出來的。戴着這樣草帽使我想起西班牙的水菓販，很相像。

三號早閒，我還是六時就回到招待所，說是今天可以走成了，我非常高興。本來一到西安，我就打聽去雲陽的路，想去看看分別了十三年的琴秋姊，可是辦事處說琴秋已回延安去了，這樣，我就連信也不會寫，反正到了延安總可見到。這天，恰恰那位洛陽的女工同志將與我一同坐車，在三原下車去雲陽，我就寫了一個條子，託她帶去，或者琴秋還沒有離開安吳。

在門口，我們眼巴巴的等車，車子到了，停在一號門口，一共三輛，都是載重車，上面堆着些麵粉，郵包……亂七八糟的。辦完上車的手續，大約已八時左右了，大家上車。車開了，我們立在車上，挾住行李，東西堆得太亂，沒有地方可坐，據說還須到堆棧上貨，這些東西需要重放的。我坐的車是第二輛，紅頭，每輛車子有一個押車，聽說叫副官，我們車上的副官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一口湖南音，眼睛有一點斜視。車上掛着第十八集團軍軍用車牌子。我們的車上，一共四個大人，一個小孩（三男二女）。到堆棧，大家下來，在看守棧屋的同志屋裏喝開水。那屋裏有三隻禿頭舖，兩三個老頭子在那裏。車子停留了好久，上好貨，重新分配人，他們要我們坐到第一輛車上去，說第二輛車上東西太多，換兩個男子一個女子上去坐，但却又儘量往第二輛車上堆東西。在西安上車的時候，聽得說那紅頭車比較結實，同時也聽到有人叫那個男同志把他的八歲的小孩放在司機旁邊，爲了小孩可以少顚一點，但那個男同志並沒有替他的小孩爭這個坐位，說是已有人坐了時，也就不出聲了，後來還是那副官坐着。這個時候，第二輛車上的司機與副官叫我們到第一輛車上去，可是我們的行李搬到第一輛上時，竟被第一輛車上拋下，而不要我們上這輛車。那叫我們怎麼辦

呢？

「同志，」我第一次這樣叫，「我想你態度可以好一點，這邊不要我們坐，那邊又不許我們坐，那應當怎樣呢？」我說。

「他不是我們請來的工人，」第三輛車上的一個有符號的男同志說，他把我們被拋在地下的箱子提起來：「你們到底叫他們怎樣呢？有話可以好好說。」

我們車上的那個男同志，他說：「給我們仍舊坐第二輛，這輛車上東西稍微平一點，給小孩子同女子坐着，少危險一點！」

「小孩子也是人，婦女也是人，他們要少危險，我們就不要管危險麼？」

聽着這個話，我就出來說：「好，我們不怕危險的，請你們去坐罷！」我問兩個同車女伴，她說好的，我們就坐第一輛車罷，可是因小孩子確實太小了，那個男同志堅持一定要把小孩放在紅頭車上，副官說他不聽從他的組織，便爭吵起來，末了，管堆棧的人出來說話，結果，我們四個大人一個小孩仍舊坐在第二輛車上。

小孩子也是人，婦女也是人，在理論上，這是通的，可是在實際上，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如果沒有大人照顧他，他會成功怎樣一個情形呢？在這種遍地烽火，艱苦抗戰的今日，我們期待男子、中國的男子，不但勇敢的赴戰場，為國家，民族與敵人肉搏，却還要希望他們能够放出一點見義勇為的行動來，特別是對於婦孺。可是我不能够說這句話，輪不到我說，因為，我回憶，做了一個女子，如果我說這樣的話，人們要以為是女子依賴性了。許多理論沒有講到這些枝節的小事情該如何做，沒有講出從理論到實踐的曲折，可是理論到實踐的確還要經過一些路。

堆棧裏放着好些東西，進門口，有兩大麻袋貼着萬國紅十字會封條，斯沫特萊捐來等字，我想

該是藥品，一個老頭子問我：「這幾個外國字是什麼？」我回答他：「怕是藥品，斯沬特萊女士捐來的，那個美國女同志！」

「唔！那可不得了，早就該把牠運延安的……快些！快些！喂！這兩包東西搬上車去！」

這兩件東西大約堆在那裏已好久了，我想他們為什麼不找一個年紀較輕比較更懂世情一點的人來負責管理這事呢?!因為很可能有些東西——如像藥品或醫療用品，不能受潮，不能碰動，同時却是很急用的東西，為了負責的人不知道其特殊性及價値而弄壞了，多麼可惜呢！

我們的車子開了，出城時受到一點檢查，副官給他看護照就放行了，三輛車前後隔着一點距離。車過時，黃沙在我們四周飛揚，太陽已開始熱烈的照在我們頭上了，幸而我們個個有草帽。

渡河的時候，我們三輛車上的人都下來，等待的時光，在河邊走着，一邊閑談，輪到我們渡河了，那個背匣子鎗的第三輛車上的武裝同志，同我們一起渡，我讚着陝西渡夫的敏捷，肯用出力氣來，……於是東一句，西一句，大家談到各地的渡夫，談到工人……。

「剛才這個抛箱子的工人，不是我們的，他們什麼也不懂，常常對外來的學生與婦女同志很不好的，我們曾經對他們說：『你們不要這個樣子，我們八路軍裏誰對誰都是客客氣氣的，你們這個樣子要把我們的名譽破壞了，』我們好幾次對他們說，他們才好一點，可是常常仍舊像今天這個樣子……」

他是川西人，姓陳名獨保，曾經過兩次草地……在每次停車，吃飯或歇息的時候，我們歡喜同他講話：「過草地的時候，這個東西可也結果了不少命呢！」他撫着他身上的匣子鎗，說。「那個時候我們不願再打了，我們不願再自己打自己，我們要打日本鬼子！」「過草地真苦，看去是一片綠色草地，但是下面牠多少年積着的爛草，變成像軟的毯子，你走下去，拔不出來，如果你越用力

想拔出脚來，你就越陷下去……」—「在我們八路軍裏，越是上面的人越苦，他的責任越大，事情也越多；我們下面的人反舒服。我們不罵人，也不行打人，有一個同志犯了錯誤，就勸告他，說服他，要他改過……」本來，他是個戰鬥員（他說我們不稱兵的），第二次過草地他受了重傷，受了兩次手術，第二次手術做得不好，他的右手現在舉不起步槍了，所以他沒有再上火線，現在衛生部做一個特務員，這次是同了衛生部長由前方轉來，再回延安去的。

我們越同他在一起走，我們越覺得他的可親，他對我們完全像一個兄弟姊妹。他是這樣的眞摯，簡單，平常，可是却又這樣的不平常。談起他的老家，他帶着些依戀：「不知他們怎樣了，已好幾年沒有信了！」

十一時左右，我們到了三原，洛陽女工同志下去了，同我們告別。我們的車停着，司機要休息，吃午飯。我與同車的溫女士，第三輛車上的鄒許兩女士，走進一個館子，就在那裏吃麵。這是一家比較算好的館子，或者是唯一可吃的館子，是副官與司機指示我們的。一下子，車上的人大家都來了，老板笑瞇瞇的招呼他們：「天熱啦！快喝一杯茶！」和氣的招呼這些手臂上有「八路」符號的男子，老板娘的小脚也一拐一拐地走過來招呼喝茶，她不但不怕他們，的確自然然而且親親熱熱的招呼，像招呼她一個從遠方回來的愛子或胞弟，我不能不感動。

吃過麵，司機他們休息去了，說是天太熱，要等太陽稍微過一點才開。三原的八路軍聯絡站，就在街上，只有一、兩間屋子，外面的一間，像一個書報推銷社，有些書籍出售，在那裏翻了幾本書。沒有坐的地方，就在聯絡站對面的一家老百姓家門口的石凳上坐下，那並且是陰涼的一角。太陽晒在黃沙地上，地面變成火紅，特別覺得熱。好像在紅海上望阿剌伯的沙漠，那樣乾燥而炎熱。三原沒有什麼市面，或者因是中午，行人稀少，更覺冷落。我們口渴，就在旁邊的一隻露天桌子上

等喝茶，等待小孩子把水煮沸，泡給我們。我實在想睡覺了，天太熱，又無聊，加上每天的睡癖發了，一個不相識的同志拿着幾本救亡小冊子在看，就向他借來翻了一遍，有一隻鳳陽調，譜進抗戰的辭句，我覺得很好。這些通俗的調子，最能流入民間。

到下午三時我們還坐在這隻茶桌旁，打過幾十個呵欠，喝過十幾杯茶：「同志，快開車了罷？」「快開了！」副官來了，司機跟在他後面。終於，司機懶洋洋的轉動了車輪，我們離開了三原。

黃沙是那麼的大，如果車子前後開得相距不遠，那麼前輛車開過後掀起的路上黃沙，像迷霧一樣的遮在後一輛的面前，我們只好摒住呼吸，把手巾掩住口鼻，雖然這樣，因爲喝飽黃沙，時時感到口渴。

六時左右，到了耀縣，今夜車停在這裏過夜。副官告訴我們一家旅館，說是比較乾淨一點。是一座黃泥平屋，走進門去，一個狹長的空天井，兩邊是屋子，屋子裏，一隻大坑之外，一個桌子，就完了。坑上舖着一條高梁桿子所織成的蓆，用手一抹，全是黃沙。隨便什麼地方我總要拿出我的臉盆來，用面布將蓆揩刷後，一盆洗臉水變成黃泥漿了。茶房不肯換第二盆洗臉水，說：「等泥沉下去，可以用的。」原來越往西北走，水是越來得寶貴了。其實這個地方並不缺乏水，是人們懶得去取水，或者是辦慣了。

把行李放下後，就去吃晚飯，大米飯已賣完了，只有饃。這種饃，是以麥粉做成的——蕎麥，玉蜀黍也都可以磨成粉做的——沒有餡子，實心，其實，在北平，就叫牠做饅頭。聽說明早五時就開車，那今晚必得飽食一頓。吃完飯，就上街走了一下，耀縣比三原大多了，一條不怎麼闊的街上，擠擁着驢子，馬匹，大車，與人們……在一個堆頭上——賣饃的堆頭是很多的，我買了一角錢饃，有十二個，帶回旅館，備明早吃。

回旅館，去看看三個女伴。與我同車的這女士，她同都許兩位同住一間，就在我隔壁。她們三個人把被褥舖起，蟠膝坐在坑上，預備睡覺了。「聽說明天早上五時就開車，來不及吃早飯的，今晚還是去飽吃一頓罷！」她們聽我一說，三個人就起來，跑出去吃東西。

我覺得很疲倦，向老板買到兩枝艾繩，點起，就睡覺了，其實這天我們的車並沒有走許多路，恐怕一共只開了五、六小時，如果像川陝公路陝段的那樣開法，一天開十二小時，不多停留，那麼一天工夫可以到洛川，或洛川以上些。

土坑比木板還硬些——或許是我的心理作用，蚊子倒不多，可是跳蚤却擾個不休。腦子裏縈迴着日間所經受到的新鮮的印象，實際上這種印象到明天更有其牠新的，以後就要變成舊了。最使我興奮的是對於陝北的想像。

四號早上四時左右，我已起身把行李結好，等待出發，到五時多一點，我們上車，就離開耀縣了。

我們的車上，經過我們幾次的整頓，靠了那個男同志的力量，把行李已經盡可能的壘得平了些，可是終究還是很高，每次經過城門，我們的頭就盡量低下，或者索性將身子躺倒，不然，恐怕很會把我們的頭削去的。從耀縣以上，儘是山路，非常不平，車子顛動得利害，那個男同志只好把小孩用一條很粗的繩子綁着，深怕小孩子睡着了，他一不留意，孩子會拋出車去。

昨天我還不深信長江先生的「陝北之行」中的話，今天却越走越相信，這條公路恐怕要算最難走的公路了。地方是愈來愈苦了，荒涼，冷落，多少里沒有人煙，雖然這樣，我還是愛牠，深深地愛牠，因爲這是我們的國土。我們的祖宗曾經在這一帶開闢民族大業，好不容易子子孫孫繁殖到沿海幾省，可是現在，我們的一大部分肥美平原有的被敵人占着，有的被敵人糜爛着，我們要靠着這

些痛苦的山地，作後方補充與建設的根據，把敵人打出去。

十一時左右，我們到皇帝陵——這地方怕叫「中部」罷——，就在那個小村上歇息，吃午飯。這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村莊，不過二十幾家人家，我們到的這家館子兼旅館，恐怕也是唯一的。今天第一輛車曾在路中擱淺，後來聽說是修好了的，可是這樣，我們的車就開在最前了，我們的車總算沒有出事，每次上山，汽車發出嗚嗚求援的聲音，坐在上面的旅客，也都個個肅靜正經，車上的一個隨車工人，每次車上山，他就跳下車來，拏着那個木楷，在後面擱住車，怕車開不上去倒退下來，車子上幾步又退幾步，終於爬過了一個山，又一個山。看慣了四川與江浙一帶的山，那麽陝北的山，實在太醜了，牠們沒有山峯，只是一堆一堆的極高的黃泥堆，好像是用人工削平了的，像男子的平頭，就是所謂「台狀形」，沒有一棵樹，只是長些亂草，太陽照着黃沙泥的山地，發出的反射，使人起異樣炎熱的感覺，完全像在紅海上所望見的熱帶地的禿山。因爲氣候乾燥，泥土都生了裂縫，可是，這個時候，還是雨季呢，尙且如此。這條公路大約是極難造的罷，當然我是外行，只好猜想，這一帶很少有石頭，沒有法子舖細石子，整個路基是泥身，天下過雨，行過車，就成一條溝，又有的一塊一塊毀下來，有的深深的洞，車子行在上面，就是那樣七跳八跳的亂跳，像法國奥凡業（Aurergue）人跳的本地舞。

我同溫女士在那家館子吃午飯，司機與副官也在這家館子吃飯，飯後，他們在大門裏的一隻坑上睡着休息。我們就在圓桌上談閑天，那位男同志戴了草帽去訪皇帝陵，託我們照料一下他的小孩。在這個時候，溫女士對我講起一點她來延安的經過。她的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揚州人，她曾兩次出走，都被父親追回，父親也不是一定反對她來延安，只是要她在高中畢業以後再來的，因爲她已高中二年級了，只差得一年，但她等不及。到後來，父親見她意志不可屈，就給了她一些錢，還

次她由重慶到成都，成都坐飛機到西安……。我偶然問她多少歲，她說只十三歲半足，她跑得很快，已高中二年級了，但我想或許她不止這個歲數，在歐洲，沒有一個女子的歲數是正確的，我可不知道中國時行的女子的習慣是怎樣的。她父親是××大學校董，兼現任教育主任，我問她××大學裏我的幾個朋友，她說都會見過，當她父親宴請同事的時候。我同她談天，覺得她很可愛，她有一些正確的判斷力，但是我又不禁替她擔心，她太聰明，太早熟，我只怕墮落的魔鬼隨時要窺伺她，有的人說聰明的人應當學政治，我却覺得聰明的人也應當學科學。

自西安出發，一路遇見三三兩兩的男女青年，行在公路上，往往數十數十的魚貫走着，他們背着一個包裹，那樣的走，像朝山進香似的——正如六月十四、五日由茅家埠到靈隱所見的——他們帶着一點微薄的衣服，爲着求得抵禦日寇的知識與技能，遠遠地到延安去。往延安的青年，幾乎每一個都有一點奮鬥與艱苦的經過，一個小小的動人的歷史。

直到我們談了好些閑天以後，第一第三兩輛車才到來，鄒許兩女士說她們的車上不來山，只好大家下來走，後來總算開上了，却又壞了，再修……。

那個男同志回來了，滿頭是汗，他說他找不到皇帝陵，只見着皇帝庵，「這就快到了」，副官同他說，可是他不願再去了。我同溫女士出去，照着他們所說的，一出城門，就往左邊的山路走。出城門時，我們問了守城門的衛兵，他向山上的柏林叢指了一下：「就在這上面」，問到一個老百姓，他說在那一邊，叫我們回頭走，他一定沒有聽懂我們的話。我們走到半山，路也沒有了，山上都是小的棗樹，攀住衣服，天熱得我們透不過氣來，一輛汽車到山脚下停住了，「志川醫學院」，是第二戰區的，車上下來好些青年，他們也上山來。「皇帝陵在那兒？」糟糕，我們還不是一樣的不知道。他們在半山裏盤旋了一下走了。我同溫也無意上山，就走下來了。在河邊，居然有幾株柳

樹，我們就在樹蔭下漫步，河水澄清，有三、四個男孩在河裏洗澡，他們快樂地彼此潑水，我們欣羨的望着他們，這個時候，我們很需要洗一個浴。

一時過，我們離開小村，過洛川，沒有停留，近晚六時，到了鄜縣。車子停在一家小旅館門前，車一停，旅館門口一個穿紅衣服綠褲子的女子，滿臉白粉，抹得又不高明，有幾處被汗流弄掉了，顯出一塊油光的粗糙的皮膚；來同副官搭話：「房間一間也沒得了，我讓給你，你來……」她拉住他的袖口，老是這麼說。副官手裏拏着那條卸下的皮帶與匣子鎗，這個女人就接了去，「等下要來呀！」副官下來，他往這個旅館裏去了一下，又回來。

「這家算最好的旅館，沒有房間了！」

「怎麼辦？」我同溫與鄒、許，大家沒有頭緒的呆在車上，他們叫我們到茶館裏去喝口茶，再替我們想法。我們走進一家茶館又回出來，家家座滿，到最後，我們走進一家，茶爐就在門口，煤氣息很重，也不去管牠了，就在這家占住了一隻方桌，洗了面，拍了拍灰塵，我們就在這裏老等。

這個小小的城鎮那樣地擠滿了人，街道上，來來往往，簡直沒有一個空隙。天已快暗下來，終於，陳獨保同志替我們找到了一個過夜的地方，他去向友軍（八路軍稱別的我國自己的隊伍爲友軍），第二戰區的一個後方醫院（軍政部第×後方醫院）接洽，請求他們讓出一間房間來，他們答允了，並告我們早點去吃夜飯，再夜一點，也許會吃不到東西了。我們邀他一同去吃飯，他無論如何不肯。走進一家館子，運氣眞好，我們先走一步，因爲裏面已經客滿，而且還在源源的進來，我們占到一隻圓桌，大家飽吃一頓。回到車旁，陳獨保獨自在那裏，他說他們今夜睡在車上了，正在把行李舖平一點，去同老百姓借幾塊木板，擱在車上。我們把要用的舖蓋拏下，他領我們到那個後方醫院去。這是一座舊式的有許多零零散散屋子的大院宇，穿過幾個小院子，到裏面，才是那間借給

我們的房間，泥的，一連好幾間，人聲，笑聲，胡琴聲，像走進一個市場。這間屋子裏有一隻舖，是用幾塊板擱在長櫈上而成的；還有一隻高的舖，是幾塊板，擱在兩隻圓櫈的脚上成功的，這都是陳獨保同志爲我們預備好的，眞難爲了他。那許住了板舖，男同志與他的小孩用了高舖，當他舖好了睡上去，或許是他的身體太重，圓櫈脚搖動得非常利害，那小孩子却哈哈地笑，一邊喊「阿唷」！我同溫，在牆脚邊看見有竪起的兩隻圓櫈面，各人拏了一隻，放平在地上，她睡在一隻的面上；但是我的一隻，醫院裏該是剛剛吃過酒席，上面留着豬油，韮菜，雞骨頭……用紙揩過後，還是一塌糊塗的油膩，沒法，我就把牠反過來睡。可是圓櫈的背面有四根木頭，因之我得小小心心的睡，而且脚也不好伸直，這樣彎曲着。那位男同志同我們開玩笑：「這隻圓櫈面比起阿麗思漫遊奇境記裏的圓櫈面怎麽樣？」我們說：「不去管牠，總之，牠們給了我們無比的用處。」第三輛車上一對夫婦，睡在院子裏的地上，其餘的人，也不知道他們住什麽地方去了。

我把被頭包住身體，轉屈着睡。跳蚤多極了，每個人隔衣抓癢的聲音，像刨生瓜。

天熱，沒有關門，爲了貪風，我的圓櫈面就放近門口，大約已是半夜了，本來睡不着，門外面的來回急促脚步聲，人聲……更煩吵得我不高興睡覺了。「送到一個俘虜！」「傷了頭的？」「房間早已預備好了！」「送東西給他吃過麽？」「早送過，藥也換過了。」「他不要吃，他要吃大米飯。」「他不要吃饃，那麽去買大米飯。」「去買過了，沒有。」「這裏那來大米飯。」「那麽去叫碗麵罷！」……這個一句，那個一句，許多不同的聲音在那裏說。「一個俘虜！」刺入我耳朵，一隻穿衣服的野獸！」一半爲睡不着，一半爲好奇，我就起來去看，這個俘虜就睡在我們的隔壁間，怪不得這些人的話句句都這樣清楚的送進我耳朵。這個黯色皮膚的日本兵躺在舖上，用灰色軍毯裏着身子，頭上札着繃布，他的面孔還是那麽的驕傲，在那裏半睬不睬的回答人們的問話。我在門口

望了一下，一個穿西裝的男子在用日語問他，又把他的回答翻成中國話給旁邊的人聽：「他說他不願吃饃，並不是不愛吃饃，剛才買來的饃，他看見沒有紙包起，給勤務的手拏過了，他嫌髒，不肯吃，他們日本人多文明，不像我們這樣的，他們多淸潔！多講究！」旁邊的人現出驚嘆賞讚的面色。這人大概是一個留日學生，他這樣義務的宣揚日本的文明！不知道他所見於日本的文明，是那一方面的？是因爲他們有飛機大礮得以在我國攻城略地，殘殺我們同胞，奸淫我們婦女，燒毀我們家舍田園？

他發了一些讚美日本的議論以後，回過頭來命令人家快快去買碗麵來給俘虜吃。我不願再看下去，也覺得那樣立在門外望是不大「紳士」態度的，在另一個場所，我絕對不會這樣的，可是這一次我爲了克制不住我的好奇，要看一看殺我們的人是怎樣的人而那樣不紳士的去望了一下，但是我眞煩惱，心裏深深兒詛這個奴性的同胞，這就是祖國化了許多錢送出去留學回來的!!同時對於他們這樣的優待俘虜，也使我感慨！爲什麼一定要替他們找大米飯，既然我們自己也沒有大米飯吃，買了饃來，他不要吃，那就算了。優待俘虜，不錯，對的，但他們是一個人，不是神，我們待他們如待自己一樣就是了，爲什麼要待他們勝過自己？怕他們？敬他們？因爲他們比我們文明？

早上，天還沒有亮，大約不過三時，我就起來了，接着溫、鄒、許也起來了，大家都沒有睡好。我們摸着暗路到厠所，眞糟，簡直無從說起。我已經把皮鞋拋在西安，只剩了脚上一雙鞋子，有什麼辦法呢？

天一亮，我們就離開那屋子，往車上去，司機與副官正剛剛起來，「昨夜我睡在車上，」副官說，他好似特地對我們幾個女同志聲明似的。「我們睡得很好，」他又說。「我們睡得一點也不好」，我們說。

七時左右，我們渡過一條小溪流，對面有一家茶舖，還有饌，熱騰騰的，我們停下來，大家喝一點開水。溫往溪邊洗脚，我把我的鞋子底往水裏洗了一下。溪水碧清的流着，可惜靠水的泥灘上都是驢子糞。我注意到驢子有個怪脾氣，每次渡過水的時候，牠們歡喜小便，牠們是特別歡喜便溺在清水裏的。

今天說是我們可以到達延安了，我的心爲要看到一個新地方，經受到一些新的事物而激跳着，喜悅着。十時左右，我們停落在一個小極小極的村莊上，一家小茶舖前有幾株大樹，我們就坐在大樹下，等待我們的車子，只有第三輛車老早開去了，第一第二輛車上不來山坡，在我們對面的坡下嗚嗚地叫。

在大樹蔭下，望着質樸的山景，好似十分熟悉。我想起在珊雅(Ceyrat)，法國中央高原的一個小村夏天，我好幾次同了朋友在一家大樹邊的咖啡店裏喝咖啡，遊人在那裏買油煎馬鈴薯片吃。茶舖臨着一塊乾淨的空地，後面有一座瓦屋，關閉着。

我們的車上來了，但是司機叫我們不要坐上去，還要爬過一個高山，這樣，我們就留下第一輛車上的同伴而走了。我們翻過山又下山，跑了近十里多路，就在路旁坐待車子。

據說昨天，我們早已進入邊區了(從前的蘇區，現在是中央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地方政府)，十二時左右，我們停在一個小村莊上，就在當路的一家小舖子前坐下，有兩個男子，和藹的來問：「同志，你們是到延安去的麼？」「是的。」「不知道你們的車上還能够坐一個人不……？」

我們請當爐的老板娘做了三碗麵，無論如何，同她講不明白，結果，她給我們燒好一鍋開水，還是我自己動手，我最歡喜吃爛麵，居然不知不覺的燒得那麼爛。老板娘看我放下醬油，打下雞蛋不時露出會心微笑，喊一聲「噢」！

我們上車走了，副官沒有允許小村上的男同志上來。現在我們的車孤獨地走着，前面第三輛車早走了，後面第一輛車還沒來。經過一個地方，兩邊是深山，路只恰恰可以開一輛汽車，如果開得斜出一點，那可完了。我們的司機的技術，似乎還好，但我總覺不及川陝公路上的，而且他工作不很努力，不把工作當工作做，有一點兒戲似的，我確實有點不放心。

剛剛開出小村，天下起雨來了，副官同司機說還是回小村，在小村過夜罷，看天色是要作陣了，問我們意思怎樣，說只要我們不怕雨，他們是沒有什麼的。我們希望早到，就說開罷。雨越下越大了，草帽已遮不住，我們就用一條絨毯將我們三個大人一個小孩都遮了起來，但終究不成，過一小村落，只好停下來，等雨小再開。村前有好幾株大樹，我們的車就停在一株大樹下，受不到雨點。

看見我們這輛車，小孩與婦人都出來了，女孩子拖着辮子，婦人都是三寸金蓮，他們男男女女個個人胸前掛着一個紅布或綠布肚兜，很精緻地用別的顏色布來鑲出花朵或嵌邊。她們圍住司機與副官問話，我們也沒有去聽，根本聽也聽不懂，接着她們燒出稀飯來了，我們已吃過麵，司機與副官從清早起還沒吃過東西。

我同溫與一個老婦人搭着話，旁邊有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這裏還裹脚？把她的脚放了罷！」但是她完全文不對題的：「苦呀！這地方苦呀！苦得吃稀飯都不成，只好喝水！」她說這個地方的土地太瘦，只出小米，就是小米，收成也不多。可是我不相信這句話，自從我進入陝北，我根本就不信這話，就在這小村的四周，我看見許多肥美的青豆，長得同江南一樣。只能說這個地方不適宜種稻、麥，但還可以多種別的東西，多吃些雜糧，也總比喝水好，實在，她們如果喝水過日，我想也不會那麼胖。她們給我一個不好的印象，她們有一點虛矯，也太懶惰，就如我們的車子停着

，她們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甚至有幾個本來在作農事的壯力也跑來了，有的坐在露天的磨子邊，有的立着，個個雙手拱起，呆看我們，直到我們的車子開走。

我們在這個小村停留了近兩小時，雨小了，就開車，開出不一歇，雨停了，天邊已沒有了烏雲，玫瑰色的晚霞，展在晴空，我們高興極了，但是，今晚到不了延安，我們必得停在甘泉過夜。

到甘泉，太陽快下山，車子停在一個小旅館前的空地上，副官同司機下去找旅館，他們問我們下去不，我們說今夜一定在車上過夜，他們笑了。我們就沒有下車，這輛車子已經變成了我們暫時的家，在車上不再覺得怎樣不舒服，反而有點眷戀的感情。隔街的一家館子，問我們要吃什麽東西，有麵，有餅……他再三問，並且跑近車來。「等我們下車來再講罷！」「你們不用下來，我送過來給你們吃。」一歇後，他竟送了三杯茶，一隻小方桌子面來，我們把這桌子面平放在行李上，靠着，喝起茶來，像歐洲Vogue裏的人。末了，他又送過三碗麵來。

我同溫下車去走走，甘泉是個很小的地方——這是在我看去，其實還是一個縣呢——四圍是荒着的山，聽說這個地方有個甜水井，才叫甘泉。陝北確實是地廣人稀，就是近人家的平地，也都荒着，不種什麽，不像四川，連一寸一角的山坡都種滿了東西，土地在陝北是那樣不值錢，不被重視。如果國家能够把戰區裏逃出來的難民移到這些地方來，給他們一點開墾的費用，一方面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問題，同時又使他們得以供獻他們的力量，增加抗戰期間的糧食生產，總比把他們放在難民收容所裏好些。

我們在一個小學校的操場上來回散步，回到車上，那個男同志已把車上的行李重新加過一番整理了，「就是這個郵包，沒有辦法安置牠，又硬！你們睡一下看，這是你們睡的地方！」我同溫睡下，覺得還好，於是舖起被頭，索性睡了。

那夜我睡得很好，從來沒有比這夜的睡眠更甜蜜了，沒有一個跳蚤，沒有一隻蚊子，只在半夜以後，露水很重，被面也濕了，覺得冷冷的。頭上冷，用草帽遮着，也就繼續睡去了。

天微明時，我們早已醒了，大家睡得很好，可惜早上太冷一點。我下車去，在小學操場的一角換上工褲與毛襯衫。大早，毛襯衫穿着還嫌不够，需要加上毛絨衣。

五時左右，我們車就開了，迎着朝霞，大家心裏爲快要達到目的地而快樂着。各人唱着自己愛唱的歌曲，好像凱旋歸來似的。

甘泉以上，每逢山口，有女自衛軍在山坡上放哨，她們都是小脚，挽起一個厚厚的髻。穿着青、白布短衣褲，兩三個在一起，坐着做針線，車子經過，她們立起來，帶着一點羞怯，檢查路條，一輛車子也不肯空空放過。

車子開出大約二十幾里路，一個背包的青年喊住我們的車，要求上車來，副官答應了他，他就上車來了。他是在雲陽青訓班工作的，這次同延安去。

太陽照着全身，毛絨衫已穿不住了，過崂山，副官與司機要我們下車來，因爲山坡太險。我們又走了十幾里路，在路上，我同雲陽來的青年，又談延安的生活。

「延安的城外山裏，狼很多，大早與黑夜，一羣一羣的出來，不過都是小狼，見了人多，牠們就跑了，如果一個人，那牠會來咬的。山裏的小豬小驢常給牠們咬死，拖去吃掉。」

「呵！」我應着，問到日常的生活程度，他說：

「羊肉一塊六、七斤」豬肉一塊錢四斤……」

這樣便宜，我覺得很奇怪，因爲在西安，聽人們說延安的生活程度是非常高的。我有點不相信，羊肉比豬肉會差得這麼遠，在別的地方，羊肉比豬肉還貴。他說：

「那是因爲這邊出產羊，一張羊皮可賣幾元呢！牠的肉又値什麼？」

他的話似乎有理，的確，在近延安的路上與山坡上，許多成羣的黑羊白羊，有人趕着或散放着吃草。

崂山的山路極險峻，車子常常在這裏倒翻，可以說是到延安的最後一個關，過崂山，山坡旁邊有一輛載重車倒在路旁，幸虧只落翻在路的斜坡上，還可以想法弄起來，車裏並沒有坐旅客，司機押車也都安然無恙，他們要我們的車寄信給延安派人去幫助他們取起車來。

延安已在望，延安的城牆蜿蜒的從山巔拖下來，臨着一條彎彎曲曲的延水。近城門了，城門外的兩邊牆上的字，清楚的映入眼底，生動而有力：「一切爲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高的在那裏。

進城門，只轉了個小彎，開進一個停車的所在，我們就到延安了。

我們的運氣太好了，路上沒有遇着下雨，有些人費了八天十天，甚至於二、三星期之久才達到延安的，我們只走了三天半的工夫，——那天是八月六日上午十時左右。

四　延安的最初一瞥，最初的幾天生活，最初的幾個訪問……

到延安了，朋友們的航空信，絡續從西安轉過來：「寫些延安一般的眞實情況，生活情況來告我們……」，但是，我能够寫些什麽呢？偉大的話，留給偉大的人去說罷，去寫罷，我，一個平庸的人，一個平庸的女子，只能說幾句，寫幾句與柴米油鹽差不多瑣碎而沒有價値的東西。

到達延安後，居處馬上就成了一個問題，離西安時，黎君曾說起可去住西北旅社，在延安的停車處探聽一下，說這旅社早已住滿了人，沒有空房間了。我身邊帶的幾封介紹訪問的信，那當然與解决居宿問題無關的。這樣，我有點窘了，因着一個朋友的關係，住到北門內的北什字巷一家老百姓人家，這裏面也有一個公家機關，擠得沒有一間房子是空的。我住的是一間很小的四方式房間，西向，很倭，窗子低於行人的街道，街上的行人毫不費力的可以瞭望房間中的一切。沒有門，僅有一個白布門帷，隔壁是那個機關的通信室，但門上沒有字條寫明，來找這個機關的人常常闖進我房間裏來。後來，這機關裏的人也同我熟了，半夜，當他們在院子裏談天談得口渴了的時候，知道我有熱水瓶，他們跑進來倒熱水，我醒了，翻了個身，又繼續睡覺。因爲日夜有人進來，我只好穿了同白天一樣的衣服睡覺。

我房間裏有一隻大坑，上面鋪一條高梁桿子織成的蓆，靠窗有一隻舊的白木桌子，一隻小方櫈。跳蚤非常多，還有一種白色的小蚊子，後來知道陝北人叫做「白蛉子」，在陽光裏一點也看不出牠的影迹，給牠咬了一口，很癢，皮膚上立刻起了一個泡，直到一、二個月後，還時常會發癢，一抓就起泡，出水。想不到這種小小的蟲，牠們的毒質是這般利害的。

這份老百姓人家，是沒有厠所的。他們的厠所，就是屋後面的空地。那個機關在屋後的空地上造有一個厠所，三面是圍牆，上面有屋頂，厠坑打得不很深，用幾條不很粗的木頭擱着做踏脚，可是脚立到木頭上，又怕滑下來，又怕木頭斷。大約人人都有這一種感覺，所以一堆一堆的東西並不在牠們應當所在的地方，却在這個坑洞的四周，人們走路的地方。厠所的地位在平地上，對面是一個山坡，有幾個衛兵站在那裏，正好居高臨下，對着這個厠所。那個機關裏沒有一個女同志，時刻有男同志進出，因之你要在這厠所裏停留二、三分鐘都是不可能的。

延安這時是在盛夏，可是早晚很涼，須穿毛絨衫，半夜，我冷得蓋厚棉被，只有中午極熱，不知道其間相差有多少度（爲了不顧太過文明人的生活，我已經把一隻愛好的常帶在身邊的小極的寒暑表送給了朋友）。

七號的早晨，——這是一個星期日——我去訪洛甫先生，向那個機關商借了一個通信員，請他領路，據說有十五里山路，可是我急於要知道琴秋姊回延沒有，也就不怕路遠了。那個機關裏的人對我說洛甫先生這幾天在生病，今天去，恐怕見不到，實在，這樣突然去訪問，也是很失禮的，並且張先生事情非常忙，多半不在寓所，更是可能的。但這個時候，我只想知道老友的行止，這些都不去想到了。山路不大好走，高高低低的，天氣也很熱，可是還算好，只走了一小時多就到了；原來不過六、七里路程，陝北的里數，像四川一樣都是說大的，特別是在這位通信員同志口中。

洛甫先生在寓所，近日正患感冒。夏天，住窰洞的人很容易患感冒的，窰洞裏與外邊熱陽下的熱度是差得很遠的。第一次走進一個窰洞，我覺得她比延安城內的瓦屋好得多。這是一個土窰，大約丈把深，七、八尺闊，有一對門，一點小小方格的木窗，糊上些白紙。裏面有一隻舖——幾塊木板擱在長櫈上成功的，——一隻舊得已拐脚的書棹，好像舊家庭的賬檯，還有一隻與這隻棹子成對

的椅子與茶几，一隻只有一個扶手的籐椅，一些書籍……就是洛甫先生的窰洞裏唯一的擺設了。這些破舊的東西好像是沒人訪求的古貨堆上弄得來的。這些東西雖然很破舊，但整理得很清潔，有次序。我開始讚美窰洞，他笑了：「你歡喜這樣的窰洞？」我說：「是的。」洛甫先生又微笑着說：「那還容易，在延安，找個窰洞住住，總還容易的。」問起琴秋，說就要回來了，從琴秋談到澤民，「澤民已經犧牲了……」面孔上的肌肉好像緊縮了一下，或者爲了不願給別人看到這個苦痛的表情，說過這話，他掉轉了頭。

回來，已是近午。在路上，天很熱，遇到一擔小瓜擔，買了兩隻小瓜，一邊吃，一邊走，想起澤民，心情哀傷。一到延安，就聽說琴秋已結婚了，很覺難過，當然，那並不是封建思想作怪，琴秋，她有權利得着一點安慰，不過在當年做了澤民與她兩人的朋友的我，對於澤民的死，不能不起哀感。眼前這付小瓜擔，使我憶想起西摩路街堂裏的餛飩擔；那年冬天，我在他倆寓中過新年……。澤民已經死了，他的快七十歲的老母，還是巴巴的望他寫信，駡他懶筆頭。

傍晚，我出去逛街，想出城門，守城門的站崗同志要問路條，我沒有，只好回進城。覺得無聊，不想回寓，就爬城頭。經過一個廣場，許多人坐在地上，大家都在出神聽，有的手裏拏了紙筆在記錄。主席台上一位頭髮花白的老先生在講話，太陽正逼照着西向的主席台，他不時揩着額角的汗珠，頭髮也似乎發出汗濕的光。這位老先生，我想大約就是林伯渠先生。順耳聽，是報告赴漢口開第一次參政會。在陝北，演講等等，都稱「報告」。

城頭上站立了一歇，我就走了，人們的眼光已開始在注視我；走在街上，有幾個青年對我吹口哨，想是表示不快，一定是爲了我的服裝。那天，實在太熱，穿不住毛襯衫，把一件有花的絲西裝塞在工褲裏面，就這樣走了出來。我深悔自己太不謹愼了。後來，我又覺事情並不如此嚴重。

那是大約在一個月後，我走在魯迅藝術學院的附近山地上，看見一位女同志，穿着一件綠色絲質西裝，式樣也還新，正從公路上走來，沒有人向她吹口哨，也沒有人注視她，我推究緣故，想該是她已經被人們看慣了，熟識了。看慣了的人，看慣了的服裝，以及看慣了的一切，方式……不覺得特別，也就不覺得不好。

延安的街上，沒有高跟皮鞋，沒有花花綠綠的綢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樣，穿藍布軍裝，有的還打起綁腿。穿軍裝的婦女，在別處是極難得見的，可是在這裏，還有穿着軍裝的懷孕女同志，她們有的是邊區的婦女工作人員，偶然也有抗大的女生，快要做母親了。老百姓的服裝也很樸素，顏色也不十分鮮明。服裝的顏色與奢華與否，我覺得與地勢同氣候都有關係。熱的地方的人，歡喜鮮明的顏色，冷地方的人喜穿深沉的顏色。至於質料的奢華問題，產絲的地方，像我的家鄉，最便宜的紡綢只要一角二分，三、四分一尺，有些人用做襯衫，還嫌不好，但是洋布與土布呢，也差不多至少要這個價錢一尺；這種便宜的紡綢，運到西安，起碼就變成，八、九角一尺了，那天我替二妹帶了一件絲綢旗袍到西安，她說西安買不到一元一尺以下的絲織衣料的。越往西北走，絲的東西越少，越貴，大家穿些土布，固然是風尚的樸實，却也是勢所必然，因為這邊是產棉的。

走在延安街上，自南至北，一條短短的大街，擠着無數的人，同了無數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口音。延安是這樣的擠滿了人，簡直是水洩不通。在星期日，每一個街角，每一間屋子裏，都擠滿了人——連在鄉下的人也進城來了。衝在這樣一個人潮裏，我有點着急，不會習慣，而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有點害怕被弛展了去。

十三日的午飯後，機關裏的人正在睡午覺，四周是靜寂的。院子裏忽然有人聲，說是來找我的，我眞快樂，眞感動，但也有些驚奇，在延安，我沒有很多朋友。在那個機關的會客室裏，大家喊

：「呀！你來了！」「你們來了！」「你怎麼來的？」「你們怎麼來的？」六號午後我託通信員送的信，陳昌浩先生——琴秋姊的丈夫，「丈夫」這個名稱在延安是不存在的，大約這兩個字太封建了，延安盛行的是「愛人」，代替丈夫，——到昨天——十二號——才收到，我寫的地址不清楚，他們竟找到二十里鋪去了。後來，吳亮平先生想，問馬海德先生也許會知道。——說起這位馬海德先生，延安大家叫他馬海德同志，是我到延安後最早見到的一位外國新聞記者，兼八路軍志願醫生……，還有傅連暲醫生，也是最早就見到的，那晚他們有事往那個機關，聽說有外客，就來看我。馬海德同志，說是美國人，能夠說法國話，他說最後的三年醫科是在瑞士讀完的。曾經到過法國我兩次度暑的高城（Hauterille），那條路上的山景，他是熟悉的。我驚奇他的法語發音，還很正確，過去我交際的會說法語的美國朋友，他們的法語發音常常是很可笑的；後來，人家對我說，馬海德同志原籍是敍利亞人，誰都知道的是一個現在正很受壓迫的弱小民族，我知道這個民族對於語言是有特長的，尤其是對於「說」。馬先生能夠說吾國的普通話，特別是開玩笑的話，他還能夠簽他的中文名字「馬海德」。馬先生在延安已久了。——陳、吳兩先生問到馬先生那邊，居然問着了。可是我，在這五、六天裏，正在奇怪沒有一個回信。見面之後，大家似乎有些要埋怨的意思，却說不出埋怨的話來，大家還是初次見面；可是我很高興，因爲在那間屋子裏，天天盼望有個人來領我認識延安，天天悶得百無聊賴。

　　這天午後三時，該去拜訪李富春先生，上一天由那個機關去信約好了的，聽說我要問的都可向李先生提出。約訪的時間已到，陳吳兩位就陪同我一起去。

　　在延安找人，是很不容易的，道路除了大街外，其餘都是一樣的彎彎曲曲，高高低低，全是黃泥沙；沒有街名，也少有門牌號數，如果是近郊的窰洞，那更難找了，除非你一個一個窰洞問過去

。問路也很困難，街上沒有警察，問或遇到一、二個站崗的衛兵同志，你問他時，他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你，他也不認得，只好用手隨便指一下，言語的不通，也有一些關係。如果背後跟着一個特務員，或者前面有一個通信員，那麼對於問路及問的一切，就方便得多。那天若不是陳、吳兩先生領路，我決不易找着李富春先生的寓所。

李先生住的是一個窰洞，大門外砌着瓦屋的式樣，裏面卻是窰洞，接連三個，是打通了的。由當中一個的大門進去，陳、吳兩位領我走進右邊的一個，李先生在那裏辦公。

四十左右，中等的身材，不胖，卻很結實，皮膚緊緊的裹着肌肉。面部與手的外表，似乎已把個性表示得十分顯明：堅決，乾脆，辦事十分能幹。我這個直覺並沒有錯誤，因爲，在後來，爲了接洽參觀，想聽報告，甚至於晚會的入場券，我都去信麻煩李先生，他總是有求必應，而且總由他親自給我一個迅速的回答。

「來延安幾時了？」李先生一邊立起來，一邊讓坐，一邊說。

他是一位留法老前輩，問起我幾時回國，我說：「一九三五年二月。」「我是一九二五年歸國的。」他說。

問到我的居處，我就說：「希望能介紹一個地方給我住，爲的現在所住的地方，廁所太不方便了……」

他笑了笑，又好似縐了縐眉頭，立刻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介紹信。

在這個短促的訪問與談話裏，已經有二、三次有人拿進信件公文來請李先生披閱，他的路易十六式的有插信櫃的破舊的寫字檯上堆滿了各種文件，我不願就誤他的重大的工作，把我寫了在紙上的幾個問題，交呈了李先生，他答允約定日子通知我去各方面談話，可以得到我所要知道的種種。

我就告辭了。出來，陳吳兩位有事，也就分別了。

這天晚間，那個機關送了我一張晚會入場券，券是油印的。那晚的節目是：一，忠烈圖（京戲），二，東塔鎮（快板），三，雙拾金（滑稽劇），四，烈婦殉國（秦腔）。西北戰地服務團公演的。七點鐘，我趕去赴晚會，在大禮堂進門的院子裏，又遇到了陳吳兩先生，於是便一同進去。「大禮堂」，只是一間較大的屋子，這是附屬於基督教堂的，大約從前是用以說道的罷。裏面沒有人們會想像到的各色電燈，電風扇，冷氣管與絨椅一類的東西……只是一塊一塊的白木板，一行一行的釘着，就是座位了，人是那麼的擠，連窗子邊上也坐滿了人。我的券號是左一百十四，可是陳吳兩位把我領到最前的一排板上，這是無號的，他們笑着對我說：「我們沒有券就坐在這裏罷！」

一隻小小的戲台，台前掛着一盞汽油燈，左邊擱起了一隻角，裏面是坐着打鑼鼓的。寫着西北戰地服務團的紅布幕半開着，不久，戲就開始了。

那晚的京戲與秦腔，都能感動人，看衆熱烈的拍着手，有時還聽到咒詛日本鬼子的罵聲：「媽的……」。戲的內容是抗戰的實事，而用的是舊形式。聽說丁玲女士正熱中於戲劇的舊瓶新酒問題。實在說，我不愛京戲，或者是因爲我不懂得牠。我不愛京戲，因爲牠表情太做作，京戲裏的音樂我又不懂。可是秦腔，我却很歡喜，在西安旅館中，我已聽到人唱秦腔。秦腔的聲調高亢，悽愴，這是我國的地方音樂，也可以代表這個地方人的性格。那晚在戲中間加進的二個小同志的「活報」——不知是不是叫活報——，也很可愛。

戲完了，幕已拉攏，一位胖胖的女同志站在台的左角，好似帶着一點惆悵與疲倦。「大約該是丁玲女士」，我想。今天那個機關曾給我介紹午後二時去訪她，她在介紹信的信封背後批了三個字：「明天來」。明天既然要去見她，今晚介紹一下也好，吳亮平先生爲我介紹了。在暗淡的汽油燈

光下，她似乎帶着驚奇的眼光凝視我。「很好，謝我的恭維！」我說。她笑了笑，沒說什麼話，還着我的手，送到門口，彼此又握了一下，分別了。在我與丁玲女士招呼的時候，陳吳二位因遇到了別的友人，走得不見了。

回來，踏着淡淡的月光，我還在想剛才戲中的情節，與丁女士的好似惆悵的影子……。

十四日的上午，我請那個機關的負責人介紹去參觀婦聯會，我的目的是想去看看那邊有沒有琴秋的女友。婦聯會的負責人是蔡暢女士，可是找到那裏，說蔡女士因生病，休養去了。一位女同志把我領到一個窰洞，有一位女同志在那裏看文件，——還不知是稿件——，胖胖的，面孔上有一點雀斑，說了些客氣話後，彼此都坐下來。

「琴秋同志來信問起你，我們也不知道你住在什麼地方，她不久就要回來了……」。

「是的，」我說，「我因爲不熟悉這邊的情形，來的時候我沒有往交際科或西北旅社去住。」

這位徐明清女士，她是浙江上虞人，來延安一年多了，現在的婦聯會，大約是她負責的。

在送我出窰洞時，徐女士說明天下午婦聯要開一個座談會，邀我去參加，如果我還不能記得這條路，當由一位女同志來通知我並領我去。我從沒有參加過什麼座談會，可是我想：「我不會說話，却可以聽聽她們的話，而且這邊的婦女工作情形，也是我所要知道的。」

「明天下午你有空罷！」徐女士問。

「有，我一定來。」

回到住處，正好吃午飯。那個機關裏的膳食時間與辦法是這樣的：早晨八時左右吃早飯，午前十一時左右吃午飯，午後三時吃夜飯，早晨是飯，午上是稀飯，晚間又是飯。三頓飯在六、七小時內吃完，只覺得一天工夫吃飯的時間占去大部分，因爲飯與飯間的距離太近，常常把工作打斷。三

頓飯都是小米，菜呢，都是南瓜。南瓜在這時是「時季菜」，聽說也比較便宜，但也要一角太洋一小個，那是不能同四川相比的。自從我到後，他們爲優待外來的參觀者，爲了外來的人一下子不能習慣於吃小米，素菜，每次都特地給我燒大米飯，另加一隻葱炒蛋。第一、二天我還沒有注意到這個事情，有一次，他們開飯時，我偶然立在門口，看見他們的飯桶——洋油箱——裏儘是小米飯。心裏很不安，但他們又不能如我所請，每頓還是另做大米飯與葱炒蛋。有時，我就吃一碗大飯米，半碗小米飯。小米飯其實並不如何難吃，只是糙一點，粒子太小，如果不細加咀嚼，恐怕是不易消化的。我所覺得不慣的，是早晨吃乾飯，中午吃稀飯，我想所以這樣一定也有理由，偶然問到關機裏的人，他們說：「戰鬥員都歡喜早上吃乾飯，才够飽！」我想了一想，從下午三時直到次晨八時，中間有十五、六小時沒有東西吃，當然會餓急了，如果晚飯在晚間六、七時吃，那情形或者會不同些。

吃過午粥，帶着李富春先生的介紹信，往文化界救亡協會去，他就在大禮堂的隔壁，原來是一座牧師的住宅，牧師及其家庭仍舊住在裏面，文協會只向他們租借了一部分。裏面住着文化人：詩人，小說家……糟糕，我呢，什麼也不是，倒並不是特地要在這裏聲明，眞的，我只不過是一個會賣文爲生活的女子，不是女作家，更不是別的。但是我也不管有資格沒資格住到這個會裏去，爲了那個機關裏的毛厠，我只想離開那個機關。

走進大門，穿過一個小院子，不見一個人，我就往第二個較大的院子裏走，遇見一個男同志，我問他，他把我的信接去看了後，指給我叫往斜對面的階上那邊的屋子裏去。一位長着半臉鬍子的老先生應着敲門聲，開出門來，把信接過。

「呵！呵！很好，很好。我——我們十分歡迎你來住！」他說，把信看過，放在桌上。

房間裏亂七八糟的堆着書，紙頭，文稿，……連地板上也是，只有一隻小方櫈，他一定要讓給我坐，可是我就在近門口的舖上坐下。

「我見過你的！」柯仲平先生又說。

「呀！」我驚異起來。

「我還聽見你同人談話，我對你的印象非常好。」

我愈加奇怪了，看見過我，還聽見我同別人談話？但是照柯先生說來，却是眞的。但我，不是他提起，已經忘了。

我說起要參觀魯迅藝術學院，柯先生就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周揚先生。

關於住進文協會的事，他說：「一定成功，至遲明天給你回音。」

送我到院子裏，柯先生伸起手來，似乎要拍一拍我的肩頭，但又並不，放了下去，說：「我對你的印象非常好。」他的年齡——其實，後來知道他並不是老頭子，還不過三十八、九歲，因了他的禿頂，看老了——同了他的鬍子，使我發生一種類似怕的感情，但他的隨便的姿態，自然的話句，把這個怕的感覺減掉了。他又仔細告訴我去周揚先生那邊的路：「出城門，一直沿靠右手的一條山路上去，儘上去……早上七時左右，大概他總在家。」

從文協會出來，往西北旅社訪丁玲女士。

「西北戰地服務團在第二個院子裏，」門口的人回答我。

往第二院走，我向左手第一間敲了一下門，走出一個男同志來：「丁玲主任麼？在那一間，我去……」他走了，丁女士也就從斜對面一間裏走了出來，邀我同進這邊的一間屋子裏去。

屋子裏十分簡單，一隻大土坑上，舖着一條軍用毯，一頭放着一條摺成四方的被頭；靠窗一隻

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付文具……二隻小方櫈，她邀我在對窗的小方櫈上坐，自己坐在橫頭。一個男同志進來倒了兩杯開水。

「請喝點水罷！」她拏一杯來放在我面前。

我想，要不要說一些敬佩，久仰的話？可是，從那裏說起呢？我又是這樣的拙於言令。並且，真慚愧，我從來沒有讀過她的作品，十年來，我絕少讀中國的作品。

彼此望着，好似等待誰先開口，「你辛苦了罷？」我終於開始說，但又覺得這句話太客套形式，恨不得把牠收同來。

「為什麼住在旅館裏？」

「沒有房子，延安是擠滿了人，」她說。

「對了，擠得連一個空隙也沒有了！」我笑着，聳了聳肩，她也笑了。

「這裏的廁所好不好？」

「不好，也說不出，人太多……西北的廁所都是一樣的，」知道我就要搬進文協會，她又說：「文協會的廁所比這裏的好。」

「這裏有一種白色小蚊子，這麼利害！」我說，她看見我手上許多粒子，捲起軍裝袖管的手臂舉了起來，「你看，都是那種小東西咬的！」她胖胖的手臂上儘是疤痕，「這些疤痕不會褪的。」聽說她曾在上海住過，但是沒有一點上海口語，她的整個湖南音，我要很留心聽，才能一個字一個字懂得她們的意義。

我凝視她的手臂及整個輪廓，覺得她真的稍胖了些，這樣坐着，她的兩手已不很容易平垂到膝頭，她是到了「發福」的年齡了，簡直怕連醫生也沒有法子阻止胖。

「你身體健康！」我不禁欣羨的說。

「是呀，還好，可是我飯吃得並不多呢。」

談到昨晚的戲，她說演戲不是他們主要的工作，在前方，他們所做的工作，是宣傳與動員方面，動員壯丁上前線，民衆幫助軍隊……問到他們的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工作，她說：「以後還是要上前方去，第一次在前方的工作，正在預備作一個結束報告，將來印了出來，送一份給你。」我謝謝她，就辭了出來。

走在延安街上，現在我的膽子大了，也不再感到不自然了，在汗氣蒸蒸的人羣裏，我也擠來擠去的擠往我所要去的地方。天氣非常熱，我的毛襯衫一天濕幾次，也只好隨牠去，那間房間裏是不能措身的，不過還好，晚上，天涼下來，我的毛襯衫也就自然而然的乾了。我開始張大眼睛，望着街上，貪心的看，好像要把一切吞下去。哦！眞快樂，延安的街，眞激動，延安的街！人們三三兩兩攙着手走，雖然有點妨礙交通，但延安是一個青年的城市，她微笑着，好似說：「一切請原諒罷！」人們的嘴吧幾乎隻隻都在動，不是吃，就是說，通常是兼吃兼說；花生堆，香烟堆，與小吃攤，小館子……接連不斷。紅頭大蒼蠅從這個堆頭飛到那個堆頭，像行人一樣，總是不斷不停。幾塊紅燒豬頭肉，發出誘人的香味。

「喂！你呆在這裏做什麼？又不買，你饞麼？」一個熟人走過，對我開玩笑。實在，豬頭肉對我是有歷史意義的，小時候，爲了暗地裏吃了一塊老男僕買來下酒的豬頭肉，我受到重重的責罰；可是這個東西對我總很有興趣似的，但我却沒習慣買牠，幾隻大蒼蠅又把我嚇住，只好無聊賴地走了。

蒼蠅從豬頭堆飛到滿街堆積的牛糞，馬糞，驢子糞上，有時候，停歇在行人的肩背，你只覺得

肩背上有什麼東西在動，發出什麼小聲音，但只要你頭一側，還沒伸起手來，牠們已經飛了，可是你頭不動而向前望時，牠們又來了。

延安的街，我實在歡喜牠：可是我又說不出什麼理由，牠是這樣的髒，這樣的擠，你沒有地方可以落脚的，不要說沒有柏油路，水門汀，就是石子也沒有，儘是黃泥沙——最近才舖起了大塊的石子，那是最近的事情——，可是我還是愛牠，我記得當我第一次到法國，——我的脚踏上馬賽的街，也曾經有過這樣一種歡喜的心情。我想我所歡喜於延安街上的，是民主與自由的空氣罷。在延安的街上，你儘講，儘笑，從國家大事，以及你私人的感情事情，你儘講，大聲的講，是可以的，沒有人在你旁邊，背後偷聽，沒有人釘你梢，你放心，不用怕，也不用東張張，西望望。延安的街上，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沒有一個乞丐。

十五日的早上，七時，我去訪周揚先生，依照柯先生所說的走去，居然給我問到。不過在走出城門時，站崗的衛兵問：「往那裏去？」我沒有路條，把介紹信給他看過，就放走了。眞不巧，找着教育廳祕書處的窰洞，一位老先生——旁邊有人正在喊他祕書長——回答我：「周廳長今早恰恰有事，已出去了，平常這個時候倒總在家的。」我把介紹信留下，走了，說：「明天早上我再來」。

午後二時，婦聯會的一位女同志來領我到她們那裏去。在小山坡下的一個半窰洞裏，放着一張長方桌子，好幾位女同志，要我到裏面去，我就在旁邊的一隻小方櫈上坐下，她們圍住我問外邊各地婦女在抗戰中的工作，我隨便說了些我所知道的與我所見到的——自己沒有工作經驗——說的既沒有頭緒，也沒有次序，爲的我沒有預備發議論，而且也只會這麼說。

長方桌上舖起了一塊白布，放着一盆餅乾，二盆花紅，好幾隻茶杯。一歇，茶上來了，請喝茶，請吃菓子，她們太客氣了。各人圍坐之後，就開會了。我不懂得這些開會的儀式：——實際上並

沒有什麼儀式，不過總有一點習慣。想起那天的座談會，我覺得有點難爲情，自回國以來，我關起大門，在家裏過着依然像在歐洲一樣的生活，中國時代婦女的習慣，她們的一切，我太少接觸了。

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女士，姓應，是從江西來的，她講了些江西婦女新生活改進社的工作情況，曾經被派在江西農村去，我是住過江西的，却在延安，聽到談着江西婦女生活改進社的工作，並大加讚揚。江西婦女新生活改進社的幹事熊芷女士，我曾見過幾次，這是一位和氣而善於交際的太太，在今日，她還留在江西做婦女工作，實在是很不容易的。

末了，一位婦聯會的女同志立起來講話，她能說話，講得也很詳細，大約有個把鐘。旁邊的人一邊吃着花紅，一邊聽。散會後，一位女同志名吳瑛女士問我在無錫留過多少時候，可認識王楓女士，她說她們現正籌備一個保育院，是應蔣夫人之電而發動的，將來成立時，邀我去參觀，只是一切都受了物質條件的限制，她們希望能與其他各地的保育院取得聯絡，並希望得着外界的援助與指教。我想三妹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並且她的嫂嫂曹孟君女士是熱心於戰時保育事業的，我把三妹的最近地址交了吳瑛女士，又允寫信去轉達這邊要成立保育院的情形。

陝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是由以前女工農婦代表會擴大而成的，所有全邊區的婦女，該組織的，都在裏面了。會員有十七萬三千八百餘人，像別的邊區的各種會一樣，婦聯也是民主制，由下而上，推選出執行委員二十一人，由這二十一人再組織成一個執行委員會。她們所着重的工作是：武裝組織（包括女自衛軍，女少先隊，女兒童團），戰時服務工作組織（看護隊，縫衣隊……）而特別使我個人發生興趣的是保育兒童工作與優待抗屬（抗敵軍人及工作人員家屬）及推動邊區落後的文化，教育工作，冬學，鄉村婦女識字小組等。

從婦聯辭別出來，她們一直送到門外。在院字裏，一位有了年紀的小脚女同志，攙住我的手，

說：「請多多來我們這裏玩，多多指敎我們。」眞使我又感動，又慚愧，我能回答些什麼話呢?!我非常敬佩她們爲自身，爲幫助國家抗戰所做的事情；我要用十分誠摯來說這一句延安流行着的話：「我還要跟你們學習。」

回到住處不久，柯仲平先生差人送了一封信來，說有一間小小房間，今天就可搬進去住，因爲天已近晚，我回了個信，說明早一定搬進去，並謝謝他。

太陽已下山，乘晚涼，我在房間裏寫信，門外有人聲，好似聽到說着我的名字，立起來，掀起門帷一望，一位先生在院子裏，望見了我，他對那機關的一個同志說：「那不是一個女同志麼？」一邊望着我走來，帶着一些猶疑：「可是陳學昭同志？」周揚先生實在太誠懇了，在忙碌了一天，該是休息的時候，跑得來，幸而我出來望了一望，否則他要被這個機關裏的人回出去了：「這裏沒有一個女同志」！我的房間小，也沒有椅子，我就移了臘燭，領周先生到那機關的會客室裏去，在一條長櫈上坐下。去年十一月C先生過南昌，曾對我談及周揚先生的大名。中等身材年紀大約三十外，湖南口音，可是沒有湖南的典型面孔。一邊談着話，一邊，周先生爲我寫參觀魯藝的介紹信。天快暗足了，周先生辭去，送到大門外，道再見，并深深的向他致謝。

十六日的早上八時許，我搬到文協會去，找不到一個人搬行李，在延安，勞力是這樣的神聖，寶貴，沒有一樣東西更能比得上勞力的神聖與寶貴的。老百姓，因爲生活優裕，他們寧願他們的驢子空着，何況他們自己。我想到汽車站去叫一個老百姓來幫忙搬行李，那機關裏的人對我說，汽車站上也沒有搬夫的，那天是我的運氣，偶然碰到一個。至於別的，因爲人人有工作，雖然多或少，重或輕是有分別的，但飯是吃得一樣的，何必多化費自已的氣力呢？我想也有人這樣想的。生活如果太有保障，人們是容易變成懶惰的。在延安，沒有力氣的人是比較要吃苦一點，共苦還勝於吃

小米飯，那些病人，也要自已背起行李，去進病院。沒法，我只好自己肩起包裹，搬到那邊去，路上歇息了好幾次，一隻較重的箱子，我想向文協會「拉夫」去取，後來一個朋友把牠送了來，眞該謝謝他，我還同他說笑：「在延安，男女是平等的，您居然還有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可是話得說正經一點，我眞的謝謝他，因爲這是一個友情，是沒有代價的。

我在那個機關住了九天，吃了二十七個葱炒蛋。搬進文協會去，那裏面住着四對夫婦。延安的慣例，是夫婦分居的，他們流行叫做「星期六制」，到星期六晚，丈夫接妻子，妻子接丈夫。所以這樣，聽說是爲了工作的方便，使工作不至因夫婦的情感而浪費時間，或妨礙工作，除非夫婦兩人的工作是同樣性質，而同在一個機關的，他們才得經常的過着夫婦生活。這是很好的，可是，後來照我的觀察，這個「星期六制」也並不是沒有弊的，法律是爲聰明人立的，正是這樣。有些結了婚的夫婦，爲了不願分離，而又不好說不願分離，大部是爲妻的，寧願犧牲了自己本來較爲特長，較能獨立的工作，而去做她丈夫的一個助手，這樣，「星期六制」本來希望可以增進工作的效能，而其結果，反是減少了。雖然「星期六制」是這樣普遍，但延安，一切都是非常寬容的，民主的，在不妨礙工作情形之下，夫婦經常住在一起的，也有這樣的例外，好比文協會，就有四對夫婦。其中有一對的男同志往前方去了，尙沒回來。他們中三對都擠住一隻洋鉛小盤燒東西吃，紅豆粥啦，白菜肉絲湯啦……我看着眞有點饞了。我是這樣一個「物質」的人，那些葱炒蛋正如漢中的酒釀蛋一樣，這個時候，我只想變換味兒，肉也好，菜也好，就是一個醬油湯也是好的，這是我的坦白的供辭，讓哲學家與醫生們去諷笑「女子的胃口」罷。

午飯時，柯仲平先生對我說：「這樣的菜同小米飯你吃不慣罷？」我笑着回答，「還好。」「我們決定給你另外去包一個飯，」他說。「爲什麼？」我驚異的問，又說：「我不願開例外。」他

說：「那麼你如吃不慣，可以想法燒一點菜，這一隻小爐火上是可以燒的，」他向院子那邊的小爐指了一指，又對着旁邊一位女同志說：「她一隻一隻雞買進來燒呢！」又接下：「一星期或者兩星期可以上館子去吃一頓……」

我笑了，可是我沒有對他說，我是一個怪物，不能上館子的，爲了腸病，我從不去吃館子，所有「廚子味」的菜，太油的菜，我都不吃的，一次宴席要二天肚瀉，除非免不了的應酬，必得去領情。延安的生活，確實要算很苦，因爲不是一天如此，而是天天，經常如此，胃腸是需要結實一點。有些人，不能自己另外作菜的，就一星期，兩星期上館子吃一頓，特別是一般學校裏的學生，他們不比工作人員，他們是絕對無法可以自己另燒菜的，他們平常吃油極少的素菜，小米飯，一下子到館子裏去吃那麼多的油，不鬧肚子，眞使我佩服。

文協會裏我的房間是在第二個院子的進口，房間極小，倒有一隻大坑。北方的平屋都是這樣的，篷子露在外面，總使你感覺到好像住在屋頂的最高層，其實你的脚却又分明踏着地上的泥土。往往要在篷子底下擱了幾根高粱桿子或別的，糊起紙，才成功一間像樣的房間。「這個地方要糊一點紙的」，文協會的總務科長對我說。因了我太急於搬進去，來不及糊上紙。

院子裏有一點花木，我們吃飯，就在院子裏，有的坐在地下，有的立在樹旁。「這是延安城裏最好的房子呢！」一位同志對我說，他見我望着院子出神。「你看，這樣大的花園，你愛游花園麼？」另一位開玩笑。是的，我正在想，這個院子還可以稱牠做「花園」，但是，小爐這麼多——有文協私人的，也有牧師家庭的——，倒也可叫牠做露天廚房。我房間對面，是一間很正式的房間，大大的，窗上糊着滿是灰沙的綠紗，裏面住着兩位先生，一位是久住蘇州不會說寧波家鄉話的留法同學，一位是徐雉先生。在十七·八歲的時候，小說月報上常常有他的「情詩」，那時新詩正在發芽

，我記得我曾經很歡喜他的詩。聽別人說，他早已不寫詩了，現在是延安世界語學會的負責人。徐先生戴着一副極近視的眼鏡，穿着一件深咖啡色的呢大衣，挺起方方的肩頭。手裏常常拿着一隻小煙斗裝煙，但又並不見他吸，年紀怕過了四十。不言不笑，好似他有說不出的疾痛，或者是太飽受了憂患。這是我年青時代所讀的詩中的英雄，不禁感到惆悵，好似看見了一個病得面孔變相的海涅（Henrich Heine）。實際，徐先生對於世界語工作是很努力的。

那天午後，我上街去找鮮肉堆買肉，就在文協會小街，一直向左走過去不遠的街上，找到鮮肉堆。豬肉五角一斤，豬油九角到八角一斤，山羊三角五分一斤，綿羊四角一斤，這是眞實的市價。我決定買一斤豬肉。可是我身邊，只有一張五元的鈔票，商人找不出，「同志，你拿去罷，明天走過這裏，你來給我好了，」他把肉同鈔票都交給我。

我呆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因爲我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商人。我說：「我把肉寄放在這裏，去把祟兌開後來拿。」

「不用了，不用了！」他執意把肉放到我手裏：「你們的時間寶貴，都是有工作的，下次你走過，你記起，來給我好了！我總在這裏的！」

我心在爲難了，他的好意可感，但我不願爲五角錢跑第二次來，又怕忘記了，失卻了信用，正在不知怎麼好，一個熟人L君走過，「勞您駕！」我說，把鈔票交他。L君替我到一家合作社去兌成零錢，結果，他收了五角錢，我取了豬肉，很快樂的分別了。他們是這樣的眞誠可愛，這是一個實事，可是朋友們恐怕要不相信。

實在，陝北的老百姓，生性是非常強悍的，又加上山地居民的特性：偏狹，固執；積年內戰，盜匪的侵擾，他們不能安居樂業，也就使他們更強悍更不信任的緣故。那是求生的經驗要他們這樣

的。自從經過八路軍的高度政治教育與動員抗戰的工作後，這些善良的老百姓，得以坦白地顯露他們善良的本性。他們是這樣可愛，竟使我爲了有這樣可愛的同胞而足以驕傲。但是照一般講，延安街上能像我所遇見的猪肉商人，終究很少。我猜想，延安在八路軍未到以前，一定沒有什麼市面的，也無所謂生意買賣，現在有百餘家店舖，這一定是八路軍到後興起來的。這些商人，他們是從農民轉變過來的居多——也有好些由山西逃難來的，做點小買賣，都發了小財——或者是些小工，聽說替邊區醫院挖窰洞的一個工頭，發了財，現在開設一家店舖，資本也有數千元，就此改工爲商，也不願再做挖窰洞這個生意了。在延安，老百姓要生活，是這樣的容易，一天趕趕驢子也可賺好幾毛錢，因之這些本來非用氣力，辛辛苦苦才得謀一飽的，現在他們發現了新的路，兩個錢買進，六個錢賣出，只要經過這一番手續，錢就很容易的進來了。越吃越要吃（L' appétit vieut en mau-geaut），這句法國成語是很對的，越賺越要賺，他們的索價不劃一的，往往聽你的話音，看你的服裝，而他們不知是從何處學得來的本領會分別這個買客的有錢沒錢——往往是有錯誤的——把價格抬到如何程度；這方面，大約他們是有了經驗的，價格無論如何高，東西總有人來買去，那是因爲延安擠滿了人，一切東西，吃的，用的，總是供不應求；但我推究爲什麼物價只見增高，就連本地出產的農產品也如此。人家對我說，在八路軍未到之前，猪肉比菜還不值錢，一元可以買到十二、三斤，而且陝北人的脾氣很特別，猪肚裏的東西是不吃的，猪肝呀，猪腸呀……都拋了的。但現在，猪肝賣五角一個。八路軍當時來的時候，我想，一下子，人太多，無論實用品與糧食都發生不夠的事實，同時，他們裏面，一定還有一部分人身邊有一點錢，於是大家爲爭得這些必需的東西，而願出最高的價格，據說當他們經過甘肅某地的時候，一塊錢才買到一個饃。他們，這些延安的商人，有農民性的固執，而沒有普通一般商人的圓滑，與應有的一些和氣，與客套。有一次，我去

過菜場，看見兩隻雞，我問價。「一元」，雞主人說。「九角兩隻賣不賣？」「不賣，差一錢也不賣！」我正在想「一元買了也好，」可是正沉思着還沒有決定的這頃刻，他說：「你不買，走開罷，立在這裏看什麼？」有一次，使我眞有點生氣，走過一個花紅堆，我問：「一角錢幾隻？」「八隻！」「十隻賣不賣？」「九隻賣！」等我同身來買，他說：「八隻也不賣！」也有些時候，使你覺得他們有點討厭，他們的嘴吧又那麼會說，你無論如何也說不過他們。有一次，大早——那已經是一個多月的後來，我已經住在窰洞裏了，——我爲不會買菜，去找文協會的汪侖同志，跟了他去買，這位出名的模範丈夫，是很會買東西的，文協會的每天伙食是由他陪同了管理員同志去買的。我們已買好蘿蔔，還要買一點葱。「這個太不好了，給我們那邊的幾把！」「不能，絕對不能！」「好了，老鄉，賣給我們罷！」汪同志說，一邊伸手去拿，旁邊的管理員開了一句玩笑：「你總不是想留給日本鬼子吃的罷！」好，這一下，老鄉的話就多了：「對了，日本鬼子來了，你們不開心，我們也不開心，大家不得活，你也不得來買東西……」確實，我只好對他笑了。汪同志轉過頭，對我伸了伸舌頭。終於，我們只好換了一個菜堆。汪同志會買菜，是爲了他使用極大的耐心，同時也兼用一點外交手腕，他總是先看好要買這件東西，面孔上又表示並不怎樣要買這件東西；雖然如此，對於剛才這個「絕對不能」的老鄉，他也還是沒有辦法。

爲什麼延安的商人，這麼殺價，H先生對我說，因爲邊區的各機關學校的事務科長，事務員，管理員，買東西都不回價的。「反直是公家的錢，省也省不到我自己。」這種意識或者也是有的。他說有一次，到軍人合作社去買紙，他自言自語的：「這幾張怕够了罷！」合作社的人問他：「公家的？你自己的？」「公家的，」H先生回答。「公家的，那你多買些罷，有什麼關係？」其實，在抗戰期間，每一個人應當把公家的看做是自己的，與同自己的東西一樣的愛護，事實上，公家，

正是人人自己的。王先生又對我說，他在西安街上，一天曾經看見一個八路軍人與幾個別的隊伍的軍人在一家店舖前，「這條絨毯幾元？」其中一個軍人問。「二元五角！」他們回價，「二元！」這位八路軍人摸出了二元五角把絨毯買去了，別的軍人有一點不快的表情，驚奇的表情。這種事情或者是容易引起齟齬的。這樣事情，並不足為八路軍病的，為什麼他們同民衆的關係弄得這麼好，在這類事情上也有關係的罷。

在文協會，我住了兩夜，十八號的午前，搬到城外的窰洞裏，這是一個小小的土窰洞，裏面用石灰粉了的，也還潔淨，面南。那些住慣了西式房子的人，他們一定不能想像住窰洞的樂趣。那天我住進窰洞，實在太快樂了，這近乎一間半大的西式房間的土窰，你也可以照你的意思，用了隨便什麼東西，破紙頭，舊釘子……你也可以把他飾置，安排得很好。午後，我正在佈置，一個熟人跑來，他看見我這般興奮，「你這麼愛窰洞，將來回南方老家怎麼樣？要去平地挖窰洞了罷？」窰洞，的確冬暖夏涼，至少夏涼已是我所嘗到了的，光線也還充足，在窗口，只覺得光線太強烈，有時我只好戴黑眼鏡，並不如我有一次在一個外國醫生所寫的一篇東西上讀到的：「光線不充足」。後來，在那荷蘭駐香港總領來延安參觀的時候，遇到他，我曾同他談到這個。「窰洞一點也不暗黑，像我住過這一類窰洞。當我們從熱陽下走進窰洞，眼睛前會感到一陣黑暗，因為外面的陽光太強了，當我們從熱陽裏走進屋子，也有這種感覺，」我說。「對了，那是一個錯覺。」可是我得承認，如那個外國醫生所說的，窰洞的空氣不够流通，在裏面往往有一種窒息的味兒。如果窰洞之間能够打通——打通的窰洞也有的——那麼就沒有這個缺陷了。陝北的窰洞，有好幾種，如果嚴格的分起來，可以分成四種：石窰，土窰，半窰，還有一種只有一個門，沒有窗的，這樣一種極簡單的窰洞。有些老百姓的石窰洞，打得非常巧妙，從整塊的山石裏開出一個洞來，不知道曾經化去多少的人工與時

日，老百姓所住的土窰，同石窰一樣，有的是幾百年下來的，這樣的結實，我想可以抵得住飛機的轟炸。陝北氣候乾燥，但是有些窰洞裏，非常潮濕，東西都霉了，老資格住窰洞的天天一起來就把被褥晒在外邊，說是必需的。自從我住在山上，我就老愛參觀窰洞，我覺得第一，方向是有關係的，第二，要小，不要太深，那也可以減少潮濕。搬進窰洞的第一晚，我沒有睡好，一方面是窰洞門外，人聲吵雜，住在裏面，好像住過街樓，每個窰洞門外，就是行人路，我的窰洞正好在一條山路的轉角，高坡的地方，恰恰是在路口，又貼近一個機關的收發，在起初的第一個月裏，我幾乎每天替那個機關做收發，上山來的人，因為順路，又因為我一天到晚總在家裏，人們就找到我窰洞裏來。人聲，驢、馬蹄聲：：時刻好似有人會來敲我的門；同時，窰洞畢竟對我太生疏了，我像一個剛剛要認人的小孩，端詳他的母親的面目樣，我的兩眼儘張大了望住這個洞內的一切，牠的圓形的頂：：

傍晚，當炎熱退去的時候，我歡喜上坡下坡，瞭望延安的城市，延水在山腳下濺濺地流着，延安的市容，比起南岸望重慶，美麗得多，牠沒有茅屋，也沒有假洋房，雖然很少樹木，枯燥醜陋一點。晚霞貼着遠山，幾匹棕色馬在晚霧與黃沙裏馳過，「四圍山色中，一鞭斜照裏」，正是這個情景。我不會騎馬，可是却很愛馬，傍晚，延水邊有許多的馬匹，在喝水，牠們的姿勢沒有一隻相同的。「飲馬傍交河：：：」這句詩引起我許多想像，也有許多回憶，小時候，家裏每值炎夏，必要把畫拿出來晒，我也曾見過幾幅畫得很好的飲馬。

天下過雨，延水一下子漲了，在寂靜的深夜，牠的聲音，像一隻大船拍浪，海波滔天，我同一個友人說：「你聽，這不像船行在平靜的印度洋上麼？」這句話受到了責罰，我夢了，夢中坐着海輪又往異國去，海濤的聲音，把我送去，遠離親愛的祖國！可是現實，却是烽火連天，國土正在受強鄰的侵略，我們正在受無比的磨難，為了要自由生活！

月白風清的黃昏，馬也好像爲一天工作的疲乏，與炎熱的消去而快樂的長嘶起來「風和閒馬嘶，」雖然這時不是春天。驢子叫的聲音實在太難聽了，牠好似轉不過氣來，而這樣急，叫的，好幾次，我聽錯了，以爲是警報。在窰洞前踱着步，我眞想彈一曲 Schumann 的「春天」！高粱長得比人高，風過去，搖曳着，葉子發出嗦嗦索索的聲音，好像有人在私語，偶然送來一聲，兩聲的笑聲，清脆得像豎琴弦的撥動，於是語聲，喊聲，步伐聲，號子聲……把四圍的山都震得撼動了！青年人，正爲着國家，民族，自身，儘量的叫，儘量的喊，儘量的流血……這是一曲「未完的交響曲」！聽着這樣的音樂，你不能不激動起你的熱血與熱情！

住在窰洞裏，每天大早起來，開出門，就見山。「開門見山」，家鄉的鄉下人過新年，歡喜請人把這幾個字寫在紅紙上，貼在大門的當中。山，在沒有山的地方變成一種祝福的東西，甚至於這個字，也變成了口采。現在，我却眞的「開門見山。」這些每天看見的山，却是每天不同的，水流的聲音因着水的漲落而時刻變化，同樣的山的容貌因着天空雲彩霞光的閃動而時刻奇異。我常常呆對着山，許久不厭，特別是在吃飯的時候，捧了一隻飯碗，站在窰洞門口，一邊吃，一邊呆望着山，有幾次，曾見熟人來，我連忙跑進窰洞。可是有一次，却給一個熟人看見了；「你這樣子吃飯？」旁邊一個朋友說：「我說過她幾次，她說這樣容易消化！」我笑着喊：「天知道！這些小事情！」雖然這樣，但我不去管他們的話，反正現在沒有一個人會因了這些小事情而責罰我，把我關在一間房間裏，脫掉鞋子，責罰我坐上半天。

住在山上，消息可不大靈通，特別延安，這個城市，牠是天天在變，天天在進步，天天在改良，幾天不進城，你就會起一種跟不上了或隔膜了的感覺，牠雖依然滿擠着行人，堆積着牛糞，馬糞…還有那些誘人的小食堆．可是牆頭有了新的壁報，前方傳來勝利的消息，俘獲多少……標語，街

賣詩，還有邊中附小的宣傳隊在唱歌，偶然有人聚在街頭，有的說：「這樣不好，那樣不好…」有人會回答你：「哦！一年前還糟，你沒有見過一年前的延安，現在好多了！」又有人會回答你：「三個月前的延安也不是這樣，現在比三個月前好多了！」總之，牠是天天在改進的，還有希望！」如果你要批評，旅客，參觀者，那麼請你留心一點，慢一點，請你別性急，慢慢的，你看，什麼地方是可以批評的。也有許多事情他們已經努力在做，或者正在開始努力做，還沒有發生期待的效果，可是，他們並沒有把需要做的事情漏過。

在邊區，生活是苦的，可是我想，那些吃膩了河鮮海鮮，各種肉類的人們，到延安來過一過這種苦生活，也是好的，好似肚脹之後，吃一服清淡的瀉藥。

在邊區，人與人間的關係是比中國任何地方好多了，這些人類醜惡的感情，嫉妬，彼此擠壓，是比較淡薄多了，這些人類接近於獸的本性也比較的泯滅了，他們能夠把一個極大的目標，也是人人所仰望着的，清楚的擺在各人的面前，使人們能明白，至少時時會反省到自己是一個什麼東西。這種工作，不但對於我們抗戰是好的，是需要的，實在對於全人類也是有益處的，人類存在一天，這種工作是有至大價值的。在這裏，女子是一個人，你行走在冷落的遠郊，不會有男人跟在背後對你說侮辱話，也不會有人跟你在背後發怪聲，當你一件怪物看待。在熱鬧的街上，從不看見有人扭住頭髮或領口相打，也沒有彼此辱罵到祖宗三代的吵架；倒是有一句話是他們的口頭語：「媽裏個……」可是並不嚴重，底下是：「我鞋子上的洞這麼大了…」等等，往往笑着，自嘲自諷的，罵他自己身上的失意事情，倒霉的小事故。人與人間的關係是改善了，但還沒有到理想的程度，中國一向人與人間敵對與懷疑的根性與習慣是沒有了，但還沒有做到像那些民主國家所有的人與人間應有的親密，關切，我想，這個，正是他們所要努力的，他們來到陝北，不過三四年，我們期待着罷。

五　幾處參觀，幾次訪問，幾個談話

那天午前，鄰近的一個機關裏差人來通知我，午後二時，可以去見毛主席。毛澤東先生——延安人人叫他毛主席——是非常的忙，聽說每夜只睡三，四小時，成年担負着重要而過度的工作。可是毛先生，什麼小事情都不忽略，誰如果有什麼要申說，可以直接寫信或請求見他，都可能的。總之，人人都可以去見他，聽說毛先生也歡喜同外來的人談話。

午後一時半——延安是沒有標準鐘的，這時已二時，也許這時還不過一時——那個機關派一個通信員，對我說可以領我去，下得山，又走了好些彎彎曲曲的路，到了毛先生的寓所。門口的衞兵和通信員說了幾句話後，就很客氣的讓我進去，通信員也就走了。

進大門，是一個很清潔的院子，院子的一邊有兩三間屋子，有一間，門開着，屋子裏有人在打乒乓，我走近門口，一個瘦個子的青年問我做什麼，我回答了他，他好像早已知道了這個訪問；「哦」！他說，「請進裏面去。」一個衞兵把我領上石階，讓我進正中的屋子，那瘦個子青年也隨我後走進屋子。我把片子拏出來交他，他拏着片子向右邊的一間進去了，不一歇他出來，示意我可以進去。我走進門，瞥見毛先生正立起來，握了一下手，他向他的寫字檯邊座位坐下，同時，伸起手來做了一個請我坐的姿勢，我在寫字檯對面賓位的椅上坐下了。

很難說，很客氣，也很溫和，文雅，而很質樸，只有闊大的額角與銳利的眼光，透露出智慧。偶然看見，覺得毛先生的個性是很沉靜寡言的，但聽人家講，毛先生歡喜說笑話，做譬如，每次對抗大或別的學校學生做報告時，總有些笑話與譬如夾在中間。恰恰與那些新聞記者所寫的相反，我覺得毛先生並不瘦，面孔胖胖的，頭髮是整飭了的，一套青布軍軍裝，上衣的鈕扣沒有扣上，很隨

便的樣子。我爲他銳利而仁慈的眼光所感動，懂得爲什麼延安的每一個角落擁擠着這麼多熱烈的青年，在我，毫無成見，也從沒有黨派觀念，只是一個中國人，簡單的一個中國人，對於毛先生，我的心不能不肅然起敬，爲了他的賢明而正確的領導，使我國得保存這一部份的實力，而在如今全面抗戰中，像祖國別的忠勇隊伍，給敵人以不斷的打擊。

屋子裏很簡潔，大約這屋子就是毛先生的辦公室，正中的牆上，掛着一張大大的蔣委員長的像，旁邊，掛着一幅全國明細地圖。窗前是一隻白木寫字檯，還算新式，大約木料不好，檯子的面已經凹了下去。檯面上舖着一張暗色花紋的漆布，已經開始破了。檯上堆着些書籍，文件與文具。靠壁有一隻行軍牀，還有幾隻有靠背沒有靠手的椅子，該是經工會的木材合作社送的罷——毛先生與我所坐的就是這樣的椅子——。這屋子，在外面看，是一座瓦屋，走進裏面，實在是一連幾個的半窰洞，非常蔭涼。

因爲幾個問題已向李富春先生用書面提出了，我就沒有預備什麼要問的，又知道毛先生時間的寶貴，更不願耽擱他，把談話拖長，那天我只是問：「如果西安一旦不幸失守，延安與西南的交通阻隔了，受到封鎖，糧食發生問題，怎麼辦呢」？

毛先生微笑着回答我：「有辦法，靠老百姓……我們還可以打游擊。」他的話聲是沉重而遲緩有力，那樣的有把握。

我問起八路軍一年來在前方作戰的成績等，毛先生說可以介紹給我去見李祕書長，那邊能設法找給我所要知道的種種，他就提起筆來寫在我的名片上，介紹我去見李亦如先生。「就是在這裏不遠有一個衛兵站着的那個屋子裏，」他補充說。

立起來告辭時，又握了一下手，毛先生拖着遲緩的脚步，送到正中一間的門外石階上。高高的

個子，與遲緩的，甯說是笨重的脚步，使我連想起當年北平的李大釗先生，有一次，在西單附近的街上偶然碰見。那些大仁大智的人，他們的外表舉動總是好像很遲笨的。

從毛先生寓所出來，在幾步路之遙，找着了李亦如先生的住處，把片子交給門口的衛兵，就讓我走進院子，也是半窰洞，剛上石階，走進正中一間，李先生已從右邊一間出來了：「呵！呵！陳學昭女士……」一邊說，一邊歡躍着，李先生年紀該有六十外了，瘦瘦的個子。那麼樣年紀，也度過千山萬水，吃盡人間的苦頭。因了他的歡躍與活潑，使怕生人的我也感覺得自然起來，於是，興奮的談着話，什麼地方人，來了多少時候……。

這位可愛的老年人，有一點歐洲老年人的風味。在延安，沒有人壓迫人，也沒有人欺侮人，所以，一個人的個性得以自由發展。有時候，在街上遇到一些剛認識的人，他們對我會快樂得跳起來，好像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也有些人，整天哭喪着臉、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憂愁的背景，不過性格如此。這些人，都使我歡喜，對於我，引用法郎士（Amatol Fra.ce）這句話是最好的：「不虛僞做作的男子，很少使我討厭的」。（Les nommes Gui Se Montrent tels guli's Sont M'ennuient Rarement'）——Lys reuge

談了些話，說到正題，李先生說他這裏沒有什麼及時的東西可給我，這間客室裏有一個白木的書櫃，我立起來看了一下，的確只有些「塞上行」，「西北散記」……等，另一端，擺着幾份報紙，大公報，新華日報，掃蕩報……。

「譚主任那裏或者會有你所要知道的東西，我來打個電話」，李先生走近窗前的電話機，打電話給譚主任，譚主任出去了。他想了一想，走進裏面去，一歇，拿了寫好的一封介紹信給我，叫了李先生，我就告辭出來。

在山上過日子，好似特別來得快。其實在清涼的夏早，通常我在五時半光景就起身了，但是總做不出什麼事情，我已經養成了一個極壞的習慣，必得把房間整理好，我才有心緒拿起書來看，或做別的事情。還記得初在巴黎學鋼琴的一年，一個朋友，一早起來，蓬頭散髮，也不洗臉，就練鋼琴，但是我，決不能，一定得把那些使我不安心的灰塵拂去，才能練琴。那時有些朋友同我開玩笑，說我該同一個不知整潔的男子結婚，可是這樣的男子，我決不會愛的。在這裏，有些行軍過來的熟人說我這種古怪的脾氣經過行軍或者就會減掉一些，或許是可能的。我承認這種人生古怪的小節目，卻也足影響到一個人的幸福，我相信有些人的獨身就爲了這些小節目難以解決。在延安，過的不是歐洲大學生生活，早起你可出去散一下步，讓侍者把你的房間收拾好，卻是北平的大學生生活，如果你自已不照管，你的房間可以弄到像一個豬窩。揩揩桌子，抹抹櫈子，而且黃沙滿天飛，桌上櫈上時時刻刻揩，也總不乾淨；洗洗衣服，手巾，甚至於被單，也得自已洗——給老百姓洗，三角錢一條，還要給肥皂，但是洗了拿回來，依然等於不洗，肥皂也根本沒有用，反而把虱也帶來了——每個人要消費一部分精神與時間在勞動工作裏，這類勞動工作是最好而最實際的運動，原是很好的；可是我相信，對於有一些人，有專門工作的，終久還是一個損失。人終究是一種不平常的動物，求生的本能是那麼的大，小時候，我沒有洗過一塊手巾，在歐洲，爲了環境的逼迫，我只好洗手巾同襯衣，在延安，我居然會洗被單，可是我的身體，比任何一年來得好！——自從我回憶得到起——腸病也還沒有發，也沒有因爲這樣不好，那樣不好而鬧肚子痛。「人是賤的」，這句通俗的鄙人話，我卻認爲有幾分眞理。

要參觀的地方是那麼的多，只恨兩條腿跑不够勁。延安沒有一輛車，大家都得安步代車，下山，上山，彎彎曲曲的山路，可是走走也好，不用另化時間來散步，雖然是不得不然的練習。

李富春先生已有信來通知我去各方談話的日期，准照李先生所寫的日期，作了幾個訪問與談話。

二十日，上午十時，去抗敵後援會訪齊華先生，談關於民衆運動。齊先生出去了，一位女同志，抱着一個幾月的小孩，很客氣的請我坐：「齊同志剛出去了，馬上就會回來的」，她說，倒了一杯開水，放在我面前，我正走得口渴，不客氣的拿起來一下喝完了。

等到十點半，十一點……外面中午的熱陽正炎炎如火燒，可是在齊先生的石窰洞裏，非常的清涼，靜靜地坐在椅子上，我竟覺得衣單了。這位女同志，可愛地同我談着話，好像爲要消磨這個厭倦的等待的時刻。我看見靠窗的一隻方桌上堆着好些報紙，向她借了一份新華日報。

「你是浙江人」，她開頭就說，我驚奇了。「我一聽你說話口氣，就知道了，」她又說。「呀，杭州，那一邊，我知道，那一邊的地方多好，那一邊的人也是頂清秀的！」

我這麼回答：「那裏？那裏？」

「同志是……？」

「我是這邊人，」她說。看我有點不大懂得，她又添上去說：「我是陝北人。」

陝北人？陝北的婦女，已經解放到這樣！人們怎樣責備陝北的婦女，文化水準低落，纏小脚，懶惰，笨拙……甚至於連一雙鞋子也不會做，可是這位女同志，我覺得她是聰明的。

十一時半，齊先生回來了，跑得滿頭是汗，他是抗敵後援會的負責人，事情是很多的。女同志把小孩放在一隻有靠的白木椅上，叮囑齊先生稍爲照顧一下，就出去了。

齊先生說着一口浙江官話，知道他是杭州方面的人　看看剛才女同志對齊先生的態度，猜想她是齊先生的夫人，我心裏暗暗佩服他對於他的夫人替浙江做了這麼好的宣傳工作，使她對於浙江與

浙江人有這般好感。

小孩哭了，齊先生用手拍他。仍無效，他或許感覺到父親的拍與母親的不同，他把他抱了起來，哭剛停，小孩又小便了，一直流到父親的褲脚管上。齊先生簡直非常爲難，輕輕的抱着小孩，不知如何才好，好像捧住一打雞蛋。怕打破似的。

我們的話，穿過小孩的哭聲，時斷時續。

「這裏做民衆運動，也不是沒有困難，第一是因爲交通不便，加之地廣人稀，往往隔多少里才有一個村，村上只有極少數的人，把他們組織起來以後，要使村與村間經常發生聯系，也是不容易的」。齊先生說着，立起來在窗口的桌子上拿了一本小册子給我，「陝甘寧邊區抗敵後援會概況，」陝甘寧邊區抗敵後援會的緣起及成立經過是這樣的：「在國民政府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並與各省市縣抗敵後援會取得一致行動……」主任是齊先生，副主任是膚施縣縣長，參加在抗敵後援會裏的民衆團體有廿多個，像邊區總工會，邊區婦女聯合會，市商會，文化界救亡協會，國防教育研究會……等。雖然地廣人稀，民衆運動的工作不易開展，但照我後來住得較久的觀察，組織民衆，動員民衆，教育民衆，是邊區做得最好的一部門工作，在邊區，我沒有看見過壯丁用繩索牽了走……。

從街上的牛糞馬糞，談到土地的肥瘦，人民的生活。與糧食，生產。

「今春我們曾動員開荒，就是春耕運動，老百姓他們是不知道糧食生產直接有關抗戰，他們只顧自己够吃，或者求稍微寬裕一些，就滿足了，不願再多耕了；至於這裏土地，其實並不瘦，」齊先生說到這裏，我打斷了他：「對了，我也覺得。」齊先生的話確實使我同意。

「你看這些白菜，長得那麼肥，上海那邊我們從沒有見過這樣肥大的白菜，是不是？」齊先生又接下說：「這裏的老百姓不知道用肥料，人口少，土地多，他們往往把這塊地種了幾年，嫌牠不

下了，就把牠荒起來，讓牲口與人自然去下肥料，另外找一塊來耕。」

我想這些肥料如果在我家鄉，種田人一定會搶得打起架來，可是在陝北，老百姓不要。

「你下去時，請你注意山底下的白菜，那塊地是老百姓不要種了的，我們去下了肥料，種了白菜，那些白菜不是長得頂大的？」

「爲了老百姓不用肥料，肥料不被重視，牛糞馬糞滿街堆，我們曾經教他們使用肥料，並且組織拾糞隊，動員小孩子去拾糞，但他們已經那樣習慣了，一個時候不容易得到效果。」

「哦！」我心裏想，可見我不能冒冒失失的批評延安的街道太髒，是有原因的。

延安也出西瓜，這是我來延安之前意想不到的，在延安有時居然吃得到與我家鄉及無錫，江西的好的西瓜，有時也很甜的。常常在進城回山的時候，帶一個上去，大一點的三角錢一個，小一點的二角。齊先生說如果老百在地裏下肥料，那麼西瓜長得一定還要好。這話很對，我也這麼相信。

是午飯的時候了，而且齊先生也需要休息，可是話談得正很好，只得告辭出來。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去訪邊區財政廳廳長曹菊如先生。曹先生他在辦公室旁邊的一个窰洞裏——該是會客室，有孫總理遺像，　蔣委員長的肖像，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標語——接見我。

曹先生一邊要我坐，一邊叫勤務倒開水。一口廣東音，說得較快時，我就有點聽不懂了。

講到邊區的財政，世界上恐怕沒有比邊區這个地方政府更窮的，這裏沒有雜捐雜稅，就連正當的稅，他們也不收，如像營業稅，延安是沒有的。去年，延安三百多家商舖，家家贏餘的，政府沒有叫他們繳一個錢的稅。他們認爲這三百多家商舖，是不够稱爲商業繁榮的。深怕一收營業稅，連這三百多家商舖也會減少下來。

「但是我們也不拒絕徵收正當的稅，如果連正當的稅也沒有，那麼政府怎樣維持呢，這一點義務，人民是不能不盡的。今年我們想開始收一點營業稅，怎樣收法，收多少，還沒有決定，可是他們商會，自動的提出了三千元，作為整頓市容，這三千元由商舖擔負，拿來修理街道。這樣，他們已負担了三千元，我們自不能再收稅了」。曹廳長又繼續說：

「現在我們唯一的收入，只有鹽上收一點，與皮毛上收一點，但都是微乎極微的（曹廳長曾將確實分比告我，可是不會處理經濟的我，當時很惧沒有記錄，現在已記不清楚」），就是鹽稅，本來也是不收的，因為這是勞苦大衆日常的必需品，我們希望越便宜越好的給大衆享用，但是，你也知道，關於這種東西，有許多事情，事實會與目的相反，我們是阻止不住的，我們沒有收鹽稅，鹽價並不見得便宜，老百姓還是吃與不產鹽地方一樣價錢的鹽……，」

「對了，一定還有私販」，我說。

「當然，那是免不了的，商人要賺錢，他們各種法子都有。後來，我們覺得收一點鹽稅，對於老百姓生活並沒有影響的，譬如一角六分錢一斤的鹽，增加二三厘稅是不生問題的」。

我接着問：

「現在邊區是不是歡迎外界來投資呢」？

「萬分歡迎！我們歡迎外界有人來投資，我們還歡迎外界有人來開設一家銀行，做些貸款與流通經濟，我們是萬分歡迎的！去年，曾經有一個華僑已決定來設一家銀行，他曾來邊區各處參觀，但到現在，不知什麼沒有消息了。如果有人來投資或開設銀行，我們歡迎到極點。對於這方面，外界的人不免尚有些懷疑，實在，我們從沒有摧殘過資本，就是在蘇維埃時代，我們對於資本，也從未加以摧殘的。在蘇維埃時代，我們沒收大地主的田地，對於商舖，對於資本，我們從未沒收，還

是事實，只要看，我們所經過的地方，商業還是特別的繁盛。我想誤會也許是這樣來的；當我們沒收一个大地主的田地，這個地主同時開設商店，他見田地被沒收，就連商店也拋下逃走了。實在，我們從未摧殘過商業」。

我問到關於農民的負担，曹廳長這樣回答我：

「邊區的農民也沒有什麼負担，土地問題，在這裏，地廣人稀，耕者都有其田。去年，二十六年，冬天，我們發動救國公粮，這是邊區農民第一次的一點負担，他們都自動的來繳，超過政府所希望的數目。原定的辦法是三百斤以上的負担百分之一，三百斤以下的百分之一也不到，可是要知道，這个三百斤是實數，是把農民家裏人口消費食糧的負担數除去之後，剩餘之中抽的，在他們是微乎其微，滿不在乎的。」

談了兩個鐘頭，這時已正午過了，我告辭出來。

曹先生給我一個好的印象：這是一位能幹的實事求是的財政專門人才，在邊區，一如在全國，需要這類的人才。他的直爽與誠懇的話也很使我感動。

走在路上，我深深感喟，在邊區，是人民吃政府，而不是政府吃人民，當然，這是原該如此的，好的政府原該給人民吃，他是爲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可是在這吃之中，人民對於政府應該有一點「義氣」——不要笑我用這個俗字，或者以爲讀「七俠五義」中了毒——延安的商人，與農民，他們衣裏的荷包是厚厚的，無論在一些買賣的事情上，或別的，顯出一些驕橫與了不得的神氣。他們的政治意識停留在半路裏，他們還沒有望到前面，也沒有看見後面。

延安有一家邊區銀行，行長是曹先生兼的，這個銀行不印發鈔票，只辦理些兌換的手續，存款也接收的，有一次，我曾看見一個第二戰區的軍官向邊區銀行作「友誼的存款」，這個軍官如此說。

走到鐘樓附近，我記起了忘問曹先生一個問題，殤片捐。二十六日我要去民政廳，那麼只好留着問民政廳長了。

二十四日，我準時去訪教育廳周廳長（周揚先生），他在窰洞裏，我們隨意談了一些話後，始歸到正題。蒙周先生送了我一些刊物，內有一份「邊區的文化教育」，一份柯柏年君著的「國防教育之基本原則」，「邊區兒童」…等，與幾本教育廳自印的小學教課書。

邊區文化，過去是非常落後的，雖然這地方，却是我國的文化發源地，我覺得十分悵恨，爲什麼現在找不到一點遺迹，戰爭的破壞性是這麼利害的。在歷史下，延安是西北的屏障，胡人亂，欲占長安，必經延安，我想，在南宋偏安之前，這個地方不但是軍事重地，而且文化也一定很發達。延安曾是「韓范舊治」——延安城裏的鐘樓上掛着有這樣四個字的一隻匾———韓琦與范仲俺都會來治過這個地方，說不定「打棍出箱」的事就出在這裏附近。

這兩年來，邊區當局，大大努力從事開展文化，以前只有一百二十個小學，現在增至七百零六個了，小學生的人數在二十六年春季只有五千六百，二十八年的春天增爲一萬四千二百零七人，在過去的一年中一定又有了增加。在小學校與小學生的數目字上固然我們可以看見牠的進步；可是在學校行政，教育方法，師資人才方法，我想有一定同樣改進的。

直屬於教育廳的，全邊區的小學校外，還有一個中學校，那是新近成立的：延安邊區中學，以舊的魯迅小學現在改爲邊中附小了，——抗大，陝公，魯藝是獨立的——。

教育廳所從事的工作，不單只是推進學校教育，在社會教育方面，如識字組，夜校，半日校，俱樂部等，都是他們工作的對象。

勤務員同志已把周先生的小米粥開來，我就告辭了。

趕回自己窰洞吃午粥，我的小勤務同志（其實不是我的，是隔壁窰洞裏一個同志的）把粥拿來放在我的桌子上，已涼下來了，在跑路之後，又渴又餓，吃着涼涼的粥，簡直成爲我從未吃過的好東西，那味道比燕窩與烘豬鮮美。

午睡，倒在舖上，翻看剛才帶回來的初級小學國語課本，第一冊至第五冊。

這些課本印得不壞，很新式的，毛邊，紙張是毛道林紙。裏面的材料像別的所有邊區的事業一樣，也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爲着抗日」，這是眞正的國防教育。但有一點可惜的地方，是自然科學材料少一點。十歲以下的小孩，如果裝進許多空洞的理論進去，是不是適合於小孩智慧的發育？這些小孩是十幾年後，建造新中國的一代，那個時候我們不再需要許多政治工作人員，我們需要的是工業工程師，農業工程師，各種科學技術專家與技術工人。

在這些課本裏，我還感到有一個小小的遺憾。

十幾年前，我國的小學教科書上，開始有起希臘神話式的故事對白來，五四運動，與大革命後的西洋文化的介紹，西洋書籍的翻譯，好似只帶來了這些給我們：

「母雞說」，「小牛說」，「火車說」……火車會對小妹妹講早安，母雞會對小弟弟發一大篇議論。

這幾年來，我極少同任何教育機關接近，更不用說起小學教科書了，只記得有一次，在朋友家裏吃夜飯，大家在飯後坐着談天，他們五歲的小孩跑進來玩，手裏拿着一本幼稚園讀本。

「唔，唔，唔，喔，喔，喔」，他走近一個客人。這麼喊起來。他的母親責備他。「這算什麼了」

「母雞同公雞說話」，小孩回答。

「母雞不會說話的！」他的母親帶一點討厭的口吻。

「書上說：「小弟弟你早，早！」母雞不說話的？」小孩又皮又呆的問。

大家笑起來。

「爲什麼現在的幼稚與小學教科書弄成這樣，簡直一點也不通，一點也不近人情！」

「我記得我小時候念的：犬守門，雞司晨，人而可無業乎？雖然是文言，可是從情理上說比那小羊說小牛說通一點。」

「對了，我也還記得小時候念的什麼：大雪紛紛下，柴米油鹽都長價。」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講。

「不是麼，商人乘下大雪抬高物價，可不是眞人情的？」

他們的話使我有同感，可是我對於教育一點也不懂，只能希望從事教育的人注意這些。我想，編教科書的人不要把編教科書像爲什麼隨感的寫下來，最好可以設一個編教科書的會，這裏面的會員要包括各種有專門學識的人才，天文學者，地質學者，……都有。不要把教科書成爲單單是一些文化人的感情的產物。

這些希臘神話式的對白，在邊區教育廳自印的小學國語課本裏，也未能免俗。

小學教育使我發生興趣，二十五日的下午我就去參觀邊中附小。這時在暑假期中，還沒有正式開學，只有那些無家可歸的東北流浪兒童，與一些父母因工作太繁重，而照顧不到他們自己的子女——有些孩子的父母在前方打日本鬼子——都留宿在校中。

學校在城裏，校舍够破敗，是瓦屋，如果同南京，上海的那些市立小學校舍比起來，那眞是無從說起了。

我很抱憾不能一一去參觀全邊區的小學，有機會時，我總想多參觀幾個，可是延安的邊中附小，我後來又去了好幾次，曾與附小主任吳燕生先生談了一次話。

邊中附小過去是延安縣府所屬的一個小學校，後來因感經費困難，官方就不能辦了，邊區政府將牠接收過來，與原來所辦的工作人員子弟學校合併，起初名魯迅小學，後來，邊區教育廳爲了人力，物力，財力的種種關係，把牠改爲邊區中學附屬小學。全校有四百多個兒童，抗日工作人員的子弟一百多，他們經常食宿在學校裏。

剛從繁華地方，繁華生活裏來的人，看到在這樣苦難情況下生長着的小孩子們，印象與刺激是非常深刻的。

每次到邊中附小去一次回來，我總要坐立不安，恨自己沒有能力，沒有辦法使這些小孩子們的生活過得好一點。這些孩子，他們吃的是小米飯，素菜，有時候一星期吃一次肉，因爲營養的不足，面孔黃瘦的也不少——陝公，抗大，每人有七分錢一天伙食——他們睡的是土坑，許多人睡在一個坑上，穿的是灰色小軍裝。實在，這些小孩子們，你給他穿的住的吃的更壞些，他們也許仍不會覺得苦的，在這個年齡，孩子們只知道一件事情：玩耍。所以就是照現在的糧食給得更壞些，他們也不會叫苦的，他們不會像成人一樣替自己說話。但是問題却存在着，他們的發育恐怕要受到妨礙。聽說伙食方面最近加到了七分。

小孩子們的生活是非常有紀律的，大早鈴聲一響，他們就集合起來了，爲了防空，吃過早飯，他們就排隊到南門外去上課，背了一個小包裹，一些書籍，飯碗箸等。在延水邊的一塊空地上面上課，吃午飯，一直到太陽快落下來的時候才回去。延安是在敵人的轟炸威脅之下，敵機不知多少次會來偵察，來投擲荒謬傳單。這些天眞爛漫的小孩子，幸而他們走得快，一個炸彈落中了他們破敗

的校舍，他們連這個破敗的校舍也沒有了！

在我窰洞口，每天早晚我都能聽到這些孩子們的歌聲，清脆地——可以想像得到合着他們的步伐：「好鐵要打釘，好男要當兵，上前線，殺敵人，發動游擊戰爭，一，二，三，四！老百姓，會打仗，才能保家鄉……」與「小米飯，黃又黃……」可是，生活是這樣的苦，他們沒有一點玩具，自然更談不到自動的小汽車，電發的小火車，就是一條延水與黃沙泥是他們玩不盡的寶貝。

抗大與陝公，有募捐委員會，學生們爲愛護母校，自動的募捐，外界響應的也不少，可是邊中附小，牠雖然那樣的需要幫助，却是一分錢的捐款也沒有，我覺得在這裏，必須照着我的良心，來作一個微弱的呼聲，希望全國熱心兒童教育，熱心保育事業的人們，賢明的父母，不論多少，捐輸給邊中附小！我相信他們一定會以民主的辦法，將一個一個的錢合理地用在小孩子們的身上。

這些抗日工作人員的孩子，衣，食，住由公家負担外，還每人發給一塊錢的津貼，做零用。在我看，這一塊錢的津貼不是頂需要的，有這筆錢來發津貼，還不如增加在小孩子們的伙食上，把伙食弄得好一點。十歲以下的小孩子，有的還不知道用錢，有的進學校之前沒有吃零食的習慣，進了這個學校，吃起零食來了，肚子瀉，腸胃病都從零食的習慣裏帶來了。吃零食延安是那樣的普遍，成人與小孩都一樣，歐洲人嘲笑中國人是一個吃零食消費時間的民族，這句話不能不引我深深思索。小學校門口的小食担上在放學的時候還是擠滿了一羣小孩。一個朋友託我照顧的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她在進邊中以後的一星期八塊錢給偷掉了，她說是一個夜裏，大約是男同學把門拏下，進她們的宿舍來偷了的。」我也不十分相信她的話，因爲她自己吃零食吃得很利害，也許就是她自己吃掉了的，造出這故事來，俾可向我拏錢！但是不論對於吃的，或用的錢，打游擊的風氣都是非常利害，看見別人有吃的他就討，別人不給他就自動去拏，沒有錢可以買吃的，就去拏錢，那怕是別人的。

小孩子們，離開了家庭，不再看到聽到父母怎樣艱難困苦找錢來養活他們，買一切日常需用的東西，現在，只看見公家的東西，一批一批的發出來——雖然沒有好的，物質條件限制住——破了的衣服，有人在負責替他們領到新的：孩子們不知道公家給他們這些必需品是經過多少的困難，尤其是在抗戰期間，必定要教育每一個小孩愛護公家的東西。

孩子們的衣服是自己洗的——他們生活上的一切都是自己照顧自己，可說有絕對的獨立性——七八歲的小孩太小了，洗一塊手巾也不會，年齡較大的同學幫他們洗，可是這些較大的同學，他們自己有功課，況且自己的衣服已够他自己洗了，他們大的也不過十一二歲。我因此想，不如把每人一塊錢的津貼取消，把這款子拿來增加幾個洗衣服的女同志，替小孩子們洗洗衣服，補補襪子。原先，聽說洗衣服是由保姆負責的，一方面是小孩子多，保姆太少——只三個——工作來不及，一方面也是做保姆的不知道工作的方法，以至有些小孩子生了虱。

他們的功課，除了增加一門政治外，其餘都同別地方的小學教程一樣，政治水準高於文化水準，這是一個長處，却也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我想一切最好能够並進，希望增加自然科學。有一次，一位有小孩放在附小念書的女同志對我說：「小學裏的教師，大都是抗大畢業生，他們把他們所學過的「中國問題」，「統一戰綫」搬給小學生，當然也是好的，可是，多講些自然的東西，對於小孩不也有興趣麼？」她的話我很以爲然。

在延安，老百姓有時候的表現是很奇怪的，像有些極少數的個別工作人員，對於權利是斤斤然計較得很利害的，對於義務，却不一定要求去盡。吳燕生先生曾對我說，他覺得苦痛的，是軍隊子弟——老百姓的子女——與工作人員的子弟，在一起這件事上常常引起許多麻煩，好比工作人員的子女每一元一月的津貼，老百姓就幾次要求也要同樣待遇。這眞是從何說起！他們開店舖賺錢，沒

有一點稅捐負担，子女不要他們化錢入學校，而工作人員，他們每月有的只拿一、二塊錢的津貼。

另一方面說，這些小孩子們，你說他們是不幸的罷，但他們却又是幸運的，正如吳先生說的：「這些喪了父母的伶仃一人的孤兒，失了家鄉的流浪兒，離鄉背井的小叛徒……他們得以生長在革命的熔爐裏，他們可以呼吸在自由的天地中，他們享受着孩子的權利，他們看見眞正「人」的生活，誰說不幸呢？」

他們所受的教育，是極嚴格的方式，他們不是玩具，也不是被大人壓迫的小東西，這是這裏小學教育的特點。這特點，除了嚴格的實行國防職務之外，就是那種在中國別的學校所沒有的自我批評的精神與彼此互助的精神。那一個同學犯了過誤，在開會的時候，大家提出善意的批評，促使他改過，在全邊區，體刑是不存在的，就是駡人的話也不作興說的。

「我們也不敢說這個教育方法已經成功了，可是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訴你：我們這裏曾有一個長征過來的小朋友，他有十歲多了，小時候是很苦很苦的，沒有見識過什麼東西，他見了錢要偷，見」東西也要偷，開了幾次會，大家批評他……他還是要偷，後來小朋友們大家決議全體不同他玩耍，不同他說話，這樣的一個時間之後，他不再偷東西了，變得很好，可是我們並沒有誰打過他一下，駡過他一句，他是這樣把惡習改掉了的。」

孩子們對於他們的吳主任是很歡喜的，當然也是吳先生對小孩子們負責與愛護的緣故，小孩子是不會裝假的。有幾個在邊區參觀的人，曾對我說過吳燕生先生給他們一個好的印象。以前在瀋陽北平先後「聾啞學校，曾發明了一種助聽音機。很艱苦的得到友人的幫助往日本去學聾啞教育，聾啞教育是他愛好的一件事業，日本鬼子把他兩次辛苦辦起的學校摧毀了。前年，他曾經從內蒙古那邊帶領了一批流浪的兒童來，經過沙漠，好不容易的達到這裏。他是陝公的畢業生，大約是最早的

一期罷，我猜想。

「現在抗戰期中，國家有多少事情被財力限制着，戰爭結束以後，炸彈砲彈的震動，聾啞一定會增加，那時候我還是希望能給我做聾啞教育方面的工作，但是現在，我負責這小學一天，我總要一天爲這些小朋友們謀幸福」。

吳先生的話使我感動了。

「小學教育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我知道」！我說。

他望着我，好似同意，而又不肯表示同意。

「唉！」他輕輕的嘆了一聲氣。

小學教育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照我的觀察，尤其是在邊區，這是一種很艱苦的沒人知道與關心的底層工作，需要一些無名英雄的精神去幹的。小學教師，他們沒有羣衆沒有幾千人聽他們說話，一天到晚，爲了小孩子們的芝蔴細碎的事情，而消費他們的精神與時間，他們沒有一刻工夫是自己的。有時候，他們還兼負母親樣的職務。

近年來，我國大都市裏的市立小學，對於小學教師的待遇比以前改善了——鄉村裏還是一樣——可是若與國立大學教授的薪水比起來，還是太遠。在歐洲小學教師與大學教授薪水相差很近，固然實際上，總還是大學教授生活富裕，因爲往往文科大學的教授同時是作者，有版稅收入，法科教授兼做律師，醫科教授同時是自由開業醫師……。

邊中附小共有教職員廿三人，大家平均都是每月津貼三圓，若說全國的小學教員苦，那麼邊區的小學教員更苦。他們只有一個通信員，一個勤務員，那一天，在街上，我遇見吳先生背了一个皮包往邊區醫院去領藥，我很驚奇，他說怕別人去耽不下。這種精神是難得的，確實把堅强的政治信

仰表現到實際上來了。

在延安，伙夫同志是很感缺乏，好一點的都已被別的機關調去，附小化了六元一个月的薪資用老百姓，伙食上面時常弄不好，這也是當然的，這些老百姓，他能燒什麼呢？

那一次，談話的末了，我問他：「什麼是你覺得最困難的」？

「我覺得」，他想了一想，「把小學教育當做畢生事業的人實在太少」。

幾次參觀與幾次同小孩子們的談話，我已經觀察出來了。附小確實缺少以小學教育為畢生事業的人。有些教員，當上面分配工作的時候，覺得這樣也不配，那樣又不會，於是送到附小當教師。在上邊分配工作的人，這方面似乎疏忽了，或者是不得已，因為前後方都需要優秀份子。如果有一个較能辦事較為適合的人派在附小，那麼這个人也不肯安心做下去，他是一定要走的。女教師與保姆，有些是大着肚子，快要生產；因為要產生了，不能做別的工作，才勉勉強強來暫時教一點書，生下孩子，就不願再留在附小了。小孩子是愛動的，可是，懷孕的女子，在那个時期需要休息，清靜，結果她們的疲勞與煩燥都發洩在無罪的孩子們身上。在我個人想，小學教育，像保育事業一樣，婦女可以盡一部分力量，但是我直爽地說，來邊區的婦女，她們竟沒有懂得婦女自身的利益，她們同別的人一樣，大家要做革命大事業，要找事業，固然很好，我希望在這次民族生死的戰爭中，我們要有不止一個的花木蘭，成千成萬的花木蘭。可是在另一方面，婦女自身如果不肯去從事與自身利害有關的事業，那麼到頭來還是自己吃苦。有一次，一個女同志，她哭着對我說：「我害了他！我害了他！我不應當把他放到保育院裏去！」可是我却想，如果有優秀份子肯去保育院工作，這種悲慘的事情可以減少一些。邊區當局已把所有好的辦法都想了出來，但是沒有人去做，缺少優秀份子去做。

我希望，對於後方的小學教育，邊區當局能比前更注意些，一方面，小孩子的父母們，也要盡可能的與學校及他們的子女接近，偉大的革命者，我想不是機械化的，多多與學校與自己的子女接近，了解這一部份的工作，鼓勵從事小學教育者，提高待遇，也是一個辦法。

我還有一點小小的建議，教育的方式是非常好了，可是在沉思之後，却有一點担心，這個担心是否是不必要的？在這個小學校裏的抗日工作人員孩子們，他們是遠離了父母的，有些實際生活的知識，與日常生活上的監督，勸導，能得之於父母的，他們得不到，十四，五歲的男女孩子，如果你不告訴他們一個人怎樣能够幸福，如果不把他們有些好奇心給以解釋，如果不武裝他們的體格，與不武裝他們的頭腦——政治教育——有差不多的危險。我們的幸福一半基於健康，我們民族的強盛也一半基於優秀的種子。這些孩子，家庭把他們的前途整個託給學校了，學校的責任更重大了。學校只得把家庭教育未能完成的工作也去做，一句話，我希望邊中附小——邊中也在內——增加一點性教育。

二十六日午前十時去民政廳，高主席正在開會——民政廳廳長是邊區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先生兼的——他說最好能够改在明天這時約談，問我有沒有收到他的信，爲的怕我白跑一次，高主席昨天已託人交信關照我了。在窰洞門口講了這幾句話，我就辭了。那天近晚，我到文協會去玩，看見高先生通知我延一日談話的信。

二十七日上午在高先生的窰洞裏，談了近兩小時的天。這是一位年紀五十外的長者，在不久以前爬山跌了一交，把嘴唇跌破了，現在留着一個新的疤。性格看去是很質樸的，說話帶着又似江西，又似福建的口音，我得很費力的才能聽懂高主席的話，有些字眼我還是沒法聽懂，可是我相信高先生也一定很困難的聽懂我的話，

一般的情形都談到了。

邊區的一切事業都在十分困難之中進行着，目前，他們盡力集中力量，以求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多多貢獻邊區的人力物力給國家。可以有些事情是有待於國家的幫助，特別是在財力與人力方面。延長一帶有煤油鑛，用的機器是破而舊的，以極老的法子，成本很大，油質不好，產量也少。許多煤鑛也因爲被財力人力所限制，不能開採，就是已開的煤鑛也只仍用老法子，人工開採。

我拉雜地問，高主席都一一回答我。原來延安城並不是邊區的，原先，那時候紅軍來到陝北，延安城包圍了一個多月——這是我聽別的長征過來的人講的——城外紅軍，城內東北軍，可是大家沒有打，有時候，城內的軍隊往城外開聯歡大會，彼此交換沒有的東西：後來和平統一，大家只求團結禦侮；有些行政上成了懸案，因爲當時大家都毛毛虎虎，既然都是自家人，但有些不知體統的漢奸，却常常想從中引起些無聊的摩擦。邊區政府如果能早日得到國家承認爲一個合法的地方政府把界線劃一下——當然不是分家——，在行政可以方便一些，漢奸也較不易活動一些。

在我，一個沒有黨派觀念，一個沒有組織頭腦的野極的野人——只不過要做一個中國人——我們冷眼看，邊區爲了團結禦侮，爲了國家統一，他們的確放棄了某些政策，不惜犧牲他們自己。我拿尊敬一個黨派的他們的信仰與理想——只要是不出賣民族利益的——，爲的我自己，我們，無黨派的人，也希望別人尊敬我們的理想，小市民的理想。

問到鴉片，高主席說這裏關於戒烟，是從教育着手，並不加以槍斃的重刑。關於有些老病的人沒有法子戒除的，也不加以強迫，私販烟土或私自吸食的，在這方面，得到婦女的幫助不少，他們常常會來報告他們的丈夫或鄰居：做這類的事，因此而得以減除。在陝北，以前是遍地鴉片，現在[illegible]不了，偶有人私種，如果還沒有長成，一經發現，就給以勸告，把烟種拔掉，下別的食糧種子；

如果烟已快收了，那麽政府出錢買牠，而勸導他下次不要再種。政府所以收買牠，也不過是顧慮到老百姓的生計。其實，照我看，現在陝北的食糧，凡是小米，豆子，及菜類，沒有一樣不是售價高昂的——小米四元三十斤，白菜五分錢一斤——，我想老百姓實在不需要種鴉片。高主席說鴉片的售價很高。這個很對，也是減少吸鴉片的一個幫助辦法。

已過正午，我告辭了。天氣很熱，太陽的光正威逼着整個山坡，爬下高山，又爬上高山，幾乎用盡我的畢生之力，爬過了許多山坡，才回到我的窰洞裏。累了，可是很快樂。

自從八月中旬到十月，天常常下一點雨，有些日子，幾乎每天午飯後——一時左右，當我正午睡的時候——先括一點風，接着下起微雨來。當我起來的時候，雨過天晴了，地土是那樣的乾燥，一下子把雨吸收了進去，變得那樣乾淨，沒有一點灰沙，好像用潔木屑掃過的廣漆地板。踏着這樣的地土，感到十分爽氣；空氣裏也一點灰塵沒有。我歡喜，在微雨後，立在窰洞門口，呼吸明潔的空氣，望着遠山若黛——那是北方美人的黛，非常粗糙而自然的——，一重山，一重山，這些山引起我許多遐想。

那幾日，天日夜下着雨，山路太泥濘了，不能下山，交通好似隔絕了，不見一個人，只在附近機關開飯的時候，那些男女小勤務，他們手裏拏了飯菜，像背傘的走上來，像滑冰的走下去，夾着一，兩聲尖銳的叫聲：「啊唷！」「媽呀……」

心境隨着沉沉的雨靜下來，唉，太寂寥了，晚上，不禁想望有一個熟識的友人——像他們慣常所做的，偶然地，來談天。

懷着這個徒然的想望——在延安，我還沒有熟識的朋友，也還沒有無話不談的朋友——來消磨這個寂寥的黃昏。朋友，朋友！我想念你們！抖動着的燭光下，想起納蘭這兩句詞來：「最憶西

奮共剪燭，却話家山夜雨。」延水鏗鏗地，若遠若近，在雨聲裏，像一個交響樂裏的高音提琴聲。烟霧罩住了所有的山，在曚矓中，幾點燈光，浮在延水上，好似西湖裏遲歸的划子。這個發現，頃刻打激我，戰爭，家鄉：：把我沉入一個忿怒而憂愁的情緒。

遠處，一點燈光，時高時低，在勔着。呀！這一點燈光，是不是那個冒雨歸來的人？也許正是對山那個窰洞裏——透出燈光的人所愛着的，爲了抗戰，爲了工作，他們經年分離。「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是的，正是這樣，我深深地想。可是，他們，那些革命者，會不會像我們這些渺小而簡單的人生，起類似的感情？

一個傍晚，張君來看我——就是在西安招待所中認識的——他最近才回延安，面孔瘦得認不出來了，說在洛川，天雨担擱了七八天，就在那個地方生起瘧疾。

我爲了不認得八路軍政治部，還沒有拏李六如先生的介紹信去見譚主任——譚政先生——。問張君有機會能不能領路，如果對於他沒有妨礙。

張君看過介紹信，他說下一天的上午九時來同我。照着約定的日子，張君同我到政治部去。託他把介紹信拏進，回出來，他說譚主任身體不好，正患肚瀉，可是能够見我，希望談話不太久。

譚先生在一隻舊籐椅上休息着，見我進去，起來招呼，握了一下手。

我在長方桌旁邊坐下，請譚主任隨便些，可是他還是坐到桌子旁來。

他說他也沒有什麼材料可以給我，一般材料，在「解放」的紀念專刊中，朱總司令「八路軍抗戰的一週年」中可以看到。別的，還是介紹我到文協會去。文協會還次從前線回來的文藝工作團曾經展覽過照片，我說想要幾張，譚主任就提筆了一封信。談到敵軍工作，譚先生帶着強硬的湖南口音——但還容易聽懂——說：「這是非常重要的，在平型關一仗，敵人給我們包圍在山谷裏，但他

們無論如何，不肯繳械；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一向在那裏荒唐宣傳我們殘暴，所以敵兵的腦子裏都以爲如其被俘，給中國人破腦子——日本帝國主義是這樣宣傳的——還不如戰死；一方面是他們的武士道精神，他們作戰是極英勇的，這是應當承認的，他們覺得被俘是一件極恥辱的事情。平型關後，我們俘到幾個傷兵，有一個，担架隊抬著，往救護所走，出其不意，這個負傷的敵兵從担架上滾到山溝裏去了。還有一次，一個放在救護所的手術床上的敵兵，醫生正要給他上藥，他怕得發抖，忽然，乘醫生不備，他拔出刺刀來刺醫生……。他們是那樣的頑強譬如已經逼到牆角落裏了，」譚主任做着手勢，指着牆角，「應當可以繳械了，可是他們不肯，這樣打仗，是很費力的。」

「爲什麼他們會這樣呢？」我驚奇地問。

「那或者，在第一次抗戰的時候，我們沒有做敵軍工作，老百姓也許有殺害被俘敵兵的事情………」

「一次抗戰？綏遠麼？」

譚主任沒有否定與肯定的回答，好像不歡喜我這個問句。

可是我，心裏忽然的想到「夏伯陽」中費多爾的一句話：「有時候，血的債還得用血來回。」

「現在這裏有多少俘虜」？我問。

「很少，只六、七個，一則是很不易俘到，二則，交通太不便，無法運到這裏來：而且游擊戰，有時爲了迅速進退，不能把他們帶了走。我們現在的辦法，在前方，對俘虜，我們俘到後，就對他們講些話，馬上放他們回去，負傷的，給他們上過藥，也馬上放他們回去：我們從敵軍文件裏知道如果三天之內不回去，回去了，他們有性命危險的。」

「可是那樣，我們不太吃虧了麼？他們回去依然拿起槍砲來打我們。」

「是的，不過至少對於我們釋放俘虜，優待俘虜的事實，給他們知道了，至少給他們的一個印象，也許在下一次作戰的時候，他會想起這個印象，並且，這個俘虜回去，別的同伴一定會問他怎樣經過，身上傷口的藥是誰給他上的…………」

「對於這方面的工作，已經有了效果沒有呢？」我問。

「還不多，可是已經有了，從前方報告中，最近居然有一個自動過來的敵兵，是這樣，在衝鋒時，這個兵沒有衝過來，他站在戰壕裏不動，等我們的隊伍過去，他過來了。」譚主任接下又說：「這是一個艱苦的工作，日本帝國主義對他的人民已經實施了多少年的侵略教育，我們只有從政治上去爭取他們。」

我說、「我想去參觀一下俘虜。」

譚主任那嚴肅的瘦方而無血色的臉孔上露出了一絲微笑，「可以的，我替你寫個介紹信」，他提筆來寫。

我想，他是不是笑我這個平庸的好奇心？外邊來的人一定有許多要參觀俘虜的，我也可算得不能免俗了。

寫好介紹信，譚先生告訴我怎樣去找負責人，送到門外，他要叫一個通信員帶我去，張君聽見了，從邊屋裏出來說他可以領我去的。

告辭出來，張君領路，就在政治部後邊，很近，在靠着一個沒有圍牆的空院子邊的一座低低的瓦屋，就是敵軍科了。公事公辦，我把介紹信託交一位正在門口的同志，他要我待一下，接着就回出來領我進去。敵軍科的科長好像是姓劉，就是張君工作地方的負責人，當我回轉頭來，張君也進

來了。

劉先生好像是非常怕羞的，低着頭，話聲很輕，我見了生人也不會說話，幸而張君，把我的意思轉達了。於是劉科長說：「好的，那麼你陪了去罷！」又對我說：「請你統統問張同志好了。」

俘虜是住在北門裏大街上的一座老百姓屋子裏。張君同我進去，他們有四個人在炕上打麻將，蹲在一隻矮小的桌子上，蟠膝坐着。麻將牌是用一塊一塊小方木頭，上面貼了紙，寫上字，畫點花。據說是他們自已做的，我可佩服他們的創造精神。邊區也有人玩麻將，幸而不是工作人員，他們是俘虜，我雖然覺得討厭，可是與我們無關。還有兩個正在燒午飯，他們吃小米。柴是公家發的——與邊區工作人員一樣——。菜是發的錢，他們自已去買。他們穿着與邊區工作人員一樣的青布軍服，只不過他們還保持他們的特別習慣，有的着木屐。

這些俘虜，他們沒有受管束，享受絕對的自由，滿街亂跑，成爲延安街上的奇貨。——我知道有些「打洋盤」的學生，特別是從上海方面來的，那樣地崇拜外來的一切，竟至找俘虜說話，以爲榮耀——。這樣地優待俘虜，眞是歷史上未有的，可是我覺得在「人」的立場，他們這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是道理，我們可以給他們做些工作，——當然不是像歐戰時給俘虜做苦工——給他們做些他們所歡喜而善長的，並且給他們報酬。我對張君說出我的意見。最近，八路軍政治部對於俘虜已在那樣地做了。

我們現在還沒見過一個高貴的日本人，從前，在北平，上海那些留日朋友的家裏，見到些專門打胎的流氓醫生，與一些狡猾虛僞的茶葉商人，書店商人，我討厭他們那種幾乎快要到地下的鞠躬，我常常十分奇怪那些朋友，他們歡喜同這類日本人來往。上海虹口一帶的日本流氓小販，也是我能見到的，他們公開做商人，秘密做間諜。

這幾個俘虜的面孔是這樣的庸俗，像我以前所見過的那些流氓面孔，特別有一個矮小極的，他那副傲慢的神氣，與那時時轉動的小圓眼珠，給我一個極不好的印象，他們這樣自由，要做間諜工作，恐怕倒很方便。

其中有一個朝鮮人，他的面孔，我直覺的覺得還老實——恐怕有人要笑我好像是相面先生，不過我覺得一個人的本質的好壞，有時也能直覺的從相貌上看出一點來——八一三前，他在青島，做一個汽車司機。他說日本人並不強迫他們去打仗，不過用種種方法使他們「自動」去投軍。他同張君說着日本話，我聽得很難受。滅亡一個民族，在軍事取得優勢後，馬上就是消滅這個民族的語言，因為人類的生活，可說一大部分寄託於語言，與語言發生聯系，我們想念家鄉，為的家鄉有我們熟悉的聲音，語言。從語言裏帶來了各種脫離不了的習慣，吃飯，睡覺：：：甚至於一把裁紙刀，吃得玩的東瓜糖，我看見幾個留日朋友都要跑到日本店舖裏去買。

我沒有同一般訪問俘虜的人一樣問他們這些問題：「你對於八路軍有什麼感想？」「你對於中日戰爭的觀察怎樣？」：：：我覺得他們的回答有時固然會極真實，但也很可能多少帶一點虛偽，我為什麼一定要聽那些虛偽的話呢？我只同那個朝鮮人談了幾句話，他說他很愛中國話，可是覺得太難了。我鼓勵他多多學我們的話。這樣就出來了，謝過張君，便回到山上。

六　繼續參觀繼續訪問

那天上午九時，拿了婦聯的介紹信，去接洽參觀抗大，往各處探聽如何辦理參觀的手續，終於找到了一點頭緒，說是須先往校部去。好不容易的尋着了校部，是在城裏，延安師範舊址。我把介紹信給門口的收發與傳達，他們拿起介紹信端詳了一歇後，把信收了起來。

「同志，我是來參觀的。請你把信給我馬上送進去！」我說。

他們抬起頭來望了我一下，把信交回我，用手一指，「往那邊去！」

「是不是把信交給門口站崗的？」

他們沒有回答我，只揮手叫我去。

我走進大門口，把信交給站崗，他叫：「送傳達！」一面攔住我。於是我把信交到原來的地方。這樣地循環了兩次，又回到傳達的窗洞口。

「這是怎麼的？」我終於有點不大高興的問。

「怎麼的？你怎麼的？」一個年輕的男子，他反問我，好似準備吵架。

有兩個衣襟上掛三角徽章的男同志來窗洞口送信，我只好讓到一邊，窗口裏面的人還是像對我一樣的態度，把信看了一下，懶洋洋地放到桌子上。

「趕快送進去！趕快！上次你把我給X隊的信送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們……」其中一個開始數處的說。

「好好！這次好好送去，」另一個男子問不對題的說。

「對不起，請問一聲，我來參觀抗大，這封介紹信應當怎麼辦？」我問他們。

「你可以叫他們送進去！」矮個子的對我說。

吱唔開始了，裏面走出了一個人來，「什麼事？」我說了原因，他把信交回我：「你進來好了！」站崗的人仍舊攔住我，可不十分固執，我於是走了進去。

走進大門，過了一關，可是總得找個人來問問，把這信交到一個負責的人。

院子裏有人走來走去，我攔住了一個問路。

「那裏！」這人回答我，我走去，到幾間屋子的面前，被人阻住了：「你做什麼？」從頭到尾又把原由說了一遍，再問路。「那裏！」叫我往原來的路走……這樣，在大門裏的院子內各個方向我都走到了，終究又回到大門的進口。「在那邊！」一個年青的男子對我說，指着對面的一個院落，他說過，吃吃地笑起來。

對面的院落？我明明知道他在開我頑笑，「他把我當什麼東西？人？畜生？匪徒？」這麼想時，我的耐心到了終點，其實，若在外邊，這種情形之下，我早已發脾氣了，可是在延安，脾氣是不好發的，雖爲悄發的，但這次，我確實忍不住了：

「同志，你這是什麼態度？若說你不願我進去，你可以乾脆打發我走，何以要把我送到這邊又送到那邊？」

越是不知道尊敬別人的感情與自尊心的人，自己的感情與自尊心也越碰不起，這也是一定的。把別人的感情放到墻下踐踏，拿在手裏揉——是有一位女同志對我說過的話——可是這些人自己，他們的感情高貴到吹一口氣都受不了的。

「什麼態度不態度？自己是什麼態度？」他對我排起馬步，兩手叉起，大聲的問。

「我有什麼態度？」我想，可惜我沒帶鏡子，但我心頭不禁懊惱的想：「天呀！我在這裏做什

麼事呢？」我的脚步已無移動往外走了，可是這個念頭「參觀抗大」又使我停住不走。

「你自已看一下，你這一副是什麼態度？」我說。

他還提起嗓子，想用大聲音來壓倒我。眞巧，下台的人每次總是有，正在這個時候走出來，是一位女同志，他把那個青年勸開，對我問：「什麼事？」「呀！對不起了！他們不知道！」但是老實說，我很不滿意她這個態度，是與否，兩者之中，總有其一，既不責備我，也不責備他——或者在她是不可能的？三家村孩子或許是這樣勸吵架，因爲她不知道什麼是眞理。

後來，照樣又有過一次，那是我去看許光達先生的夫人，許夫人鄒女士，就是與我同日由西安坐車來延安的，到延安後，在她尙未進校的時候，她與她的小姑許女士曾來我山上玩過兩次。那次是約得我去看她們，日子與時間都約定了。她住的地方，沒有地名，唯一的標記，就是在一顆大樹下，因之叮囑我往抗大校部問許教育長家就會有人指示我。那知到抗大校部，又是這麼一套，「請你把字條拿進教育長室，」——教育長室就在大門的進口——他們不肯：「教育長不在！」終究也是一個女同志來下台，問我做什麼，我把字條交給她，悵悵的回出來。我失信了，害朋友白等了，且並不是我的過誤呵！

抗大的門禁這麼森嚴，不知道是否對於每一個參觀的人都這樣？我很好笑的記起上海復旦大學的門禁來，那是聖地，每逢女子一走進門口——那怕就是他們培植出來的校友的太太們——校門口的人就要不客氣的趕：「請出去」！可是抗大是男女同學的，自然更不是聖地。有些人描寫權貴之門的可怕，但我沒有這個經驗，因爲我從來沒有想去奔走權貴之門的願望與需要。

我曾同延安的熟人談到關於抗大的門禁，那個熟人說：「爲防漢奸。」我可不相信，這只是他臨時想出來的解說，我想漢奸一定不會像我這樣呆頭呆腦拿了一封介紹信去參觀的，早已什麼都知

道得明明白白了。另一個對我說：「抗大的勤務與收發是頂討厭的，這是薄弱的一部份，」這話在我看去，比較對一點。抗大是太大了，當然免不了有薄弱的部分，或者有些個別分子，他的行動的表現，會使人驚詫的。有一天上午，有一位抗大的工作人員，他找到我窰洞裏來，他是找離我不遠的一個窰洞里的醫生看病的，我錯了。「看病」！他對我喊，一嘴吧酒氣味、往我臉上冲，該是剛剛吃飽酒飯。在門外，我看他走向那個醫生的窰洞：「看病！」他喊：「這不是姓×住的，一個醫生？」「是的，我就是姓×，」那個醫生走出門來回答他。「那你不是看病的？給我看病！」「現在不是看病的時間。我門診的時間已由醫務機關通知各機關了！」「不行，你必得現在給我看，我是抗大某某科科長」，他指着他衣襟上的三角章與榮譽奬章，「我只現在有空，我們沒有多少空時光！」「我也沒有空時光，我的看病時間是排定了的。現在要出診去。你要看病，請你往底下泥屋子裏去問醫務科長。」那個醫生說話的口吻是那麼客氣，還做着一個非常禮貌的請他下去的姿勢，使我想起在歐洲見到的，人們用絕端客氣來表示他們的不高興。

本來，那天興緻很高，想去參觀抗大，經過這樣一番波折，我覺得很疲累了，只想回到自己窰洞里，安安靜靜的睡一覺，什麽都忘記掉。

可是一位女同志，她請我在里面的小院子裏坐一下，搬了一隻小凳子給我。「這里不好，近樹可以蔭涼一點，」她說，又倒了一杯開水，送到我手里。她的一番好意，在我那時的心情上起了一種不可修理的修理（Reparation irreparable）作用，畢竟我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人們對於我的好與壞，都一樣地碰不起。於是我坐着，揩着額角的汗、開始同她笑談起來，像對一個老友似的。

「請你等一下，我們派一個女同志陪你去，領你路！」

「那不是太麻煩那位女同志？」

「不，一點也不！」她和氣地說，立刻使我想起，國外的各個國籍不同的女同學，往往我們祗第一次見面，但大家幾得已像老友。

這個女同志，她有一張拉得很大的嘴吧，可是並不討厭。

又走出了兩位女同志來，她們手里拿着兩封信，問我歡喜參觀那一隊。現在女生隊有兩個隊，三與四。我問路遠近，說三隊比較近一點，就決定去參觀三隊。但她們的意思參觀四隊好，因爲軍事與政治隊都有。

一位長個子的女同志，穿着一套已退色的藍布軍裝，衣襟上掛着一塊三角章，她的面孔長長的像驢子面孔。面色不黑也不白，不紅，略帶一點灰靑色，兩手叉在軍裝袋里，看她的步子像走一步退一步，其實却還比我走得快——因爲個子長，脚步大——陪我走往三隊去。

走在路上，爲消遣別人也消遣自己，最好是聊天，但是這個辦法祗有和氣的對手可用，爲怕討沒趣，我就不開始——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是極冷的——。

走進城門，突然，她問：

「你今年幾歲？」

「三十二，算中國歲，叫三十三了！」

「倒看不出，一向生活很好罷？」接着，停一歇：

「什麼地方人？」

「浙江」。

「呀！」她長長地喊了一聲，好似有無限的思感。

「你受過什麼敎育？」

我吃的笑了出來，「你是不是要同我做媒？」這個滑稽的念頭使我忍不住笑了出來，這太失禮了，我連忙掩飾住笑，說：「陝北的山多麼高！」

「你們那里沒有罷？」

「有也有，不是這個神氣。」於是我問：

「你是北平人罷？」

「對了！」她說。

「那個地方我頂愛」我說，「那里的人多有禮貌，就是商人，也不討厭！」

「你到過那里的？」

「是的，我住過一年。」

「你在那里做什麼？」

「教書，也唸一點書。」

「呀！在那些地方呢？」

「在黎明，適存教書，在北大聽一點點課。」

「黎明中學，我聽見過，」她說。

「是的，那兩個中學都是北大出來的學生辦的。」

「後來呢？」

「後來我就出去了。」

「出去？」她追問。

「我離開中國。」

她不再問了，我們已出了城，指着對山的一排窰洞，她說：「那個山上就是女生三隊！」我長長地嘆了口氣，好似結束了一個口試。

其實，這個並不是口試，後來，我覺得這樣直爽的問語，在延安是流行着的，有一次，我看見有一個男同志問另一個：

「你有老婆的？」

「是的，老早有的。」

「那天的是你的老婆？

另一個點了點頭。

「她識字麽？」

「識幾個」

「小學畢業？」

「不。」

「那麽是文學家？」

把自已的資格頭銜都擺出來，像舊小說裏的，「通過名來」也常有的，有一次，在大禮堂門口遇見幾個熟人，旁邊有一位女同志，他們給我介紹：

「燕京大學出來的……」出於我意料之外的，她自已接着也說了一大串頭銜。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見裴姊的老友，招呼了一下之後，她邀我去玩。

「我不知道你的住處與你的大名！」我說。

「你只要找××，×副司令」，她說，又着重的問我：「×副司令，你知道麽？」

我們走到山脚下了，山石上，泥牆上，滿是標語：「完成學校突擊任務」，「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各式各樣都有。先去找大隊長，大隊長住在山下的泥屋裏。

在山下，這些泥屋東一座，西一座的很多，不像營房，也不像宿舍，裏面一小間一小間欄起來這類泥屋子南方人是絕對想像不出的。這種房子實在我不出比擬，如果要比擬，那我覺得太不好聽了，因為我只覺得有一類的房子勉強可以比擬，那就是在北平，我所見過的。據說這類屋子並不便宜，雖然照我看去，建造的法子是極簡單的：用兩塊木板夾起來，中間疊碎泥，稍稍用木槌把泥敲緊，就成功恐牆了；屋頂架幾根木頭，木頭上舖些高粱桿子，再塗上爛泥，就成了，可是合起來，也要五，六十元一間。

我們進大隊長泥屋子裏去，他從裏面一間走出來，笑着說請坐。軍裝穿得齊齊整整，乾乾淨淨，方方的面孔，笑起來，兩個金牙齒露在外面，這樣的軍人，我好似見得很多，但是一聽他說話，却有點不同。

「她們今天大早出操去了！請坐一會罷！」他一邊說，一邊叫人拿開水，當一把缺嘴的茶壺拿上來時，他自己接來倒。

在那間泥屋子裏，我們隨便談談，天已正午，熱極了。

「你們辛苦罷？」我說。

「也不怎麼，從前過草地的時候才苦呢！」他說。這位大隊長，聽說曾是團長，是從江西出發，長征過來的。他聽我說曾住過江西，熱烈地問我江西的情形，但我說只在省城裏住過，他有點失望的樣子。

他時時派人去看學員回來沒有：「她們今天早上四點集合的……」，微笑着說，好像談着自己

的子女。

「她們已在回來了」，一位女同志來說。

「我們去罷」，於是他與那位陪我來的女同志領我上山坡去，我們在指導員——一位女同志——的窰洞裏，剛剛坐定，聽見人聲喧鬧，「你們俘到了多少敵人？」……「哈哈××當俘虜了……」我也就跟着大隊長與指導員出去，看一個一個身體健壯的女同志正從山坡上來，每人拖了一支木鎗。指導員立在山坡上快活地同她們每一個搭着話。她們有的喊：「熱死了」，「口渴死了！」我眞的自嘆不如。

忽然，她們來一個集合，說是歡迎我。糟糕！我怎配她們歡迎？她們立正，少息……之後，副隊長又來了一篇歡迎辭。怎麼辦？她們還要我說話。在無可奈何情境之下，我只好開口說了幾句，好像同一個老友談話，無頭無尾的。我說我非常羨慕她們，敬愛她們。眞的，她們的精神實在使我欣羨，就是在不去打游擊戰的早上，通常她們在五時已出操了，在我的窰洞門外，大早，我常常可以聽得許多脚步聲，不是抗大的男同學就是抗大的女同學爬山出操。她們是民族與婦女自身解放的先鋒隊。我太感動了！

在散隊之前，指導員同她們說今天吃過午粥，每個人都要好好的睡覺，不要偷看書，她們今天起得太早，如不睡覺，晚上的功課會沒有精神聽的。

我還想參觀學員所住的窰洞，指導員對大隊長說：「今天恰恰弄得不十分整齊，因爲被褥在她們出去以前已亂七八糟拿在外邊晒了，現在呢，她們肚子餓了，急等飯吃。」

我想也好，不去參觀了，不要爲難她們，就告辭，大隊長與指導員再三留我午餐，我謝了他們，下山坡來，送到半山。他們喊：「有空來玩」！

抗大自抗戰以來，栽培出了許多抗戰優秀種子，散佈到全國前後方，已經不知有多多少少，他們自然已起了極大的作用，將在那些地方出芽，開花，結果，我們期待好好的收成。抗大的精神外邊大家都已知道了的——二十七年八月十四日新華日報上杜映先生的「延安半年來的國防教育」可以看一看！——他們的校訓：忠誠，團結，緊張，活潑，確實是做到了的。

抗大的校長林彪先生——延安抗大的學員稱他做林校長，外邊來的人稱他做林彪將軍，或林師長——我在一個晚會上遇到，一個熟人對我說：「我來給你介紹抗大校長」，我說「算了」。——那一晚，我遇見西安招待所中認識的李女士，她跑來跑去已很熟識了，正拿了一本小冊子在請林彪將軍簽字。——我不歡喜在晚會上去招呼忙人，他們，可憐的忙人，好不容易在晚會上舒舒服服透一口氣，爲什麼要去麻煩他們呢？雖然在後來。幾次羣衆大會上，見到林師長，但我並不認識他。抗大的副校長羅瑞卿先生，也是在一個晚會上見到的，恰恰坐在前後排，一個熟人替我介紹，可是沒有談什麼話。

好些人曾經描寫林彪將軍是一位倭胖的年青軍人，我看去並不倭胖——有些人說以前胖，自從隰縣受傷後，瘦了——至少並不胖，在那些大會上，我從沒有見他笑過，總是一副好像有什麼不快心事的臉色。羅瑞卿先生，正如好些人寫的，瘦長得像一根鐵絲。

軍事委員會的犒賞隊×隊長，他曾對我說：「他們這種地方眞好，你看林師長受傷後，委員長送了一千元，他自己一個大子也沒用，統統捐了」。

「是的，」我說：「這固然是個人的高潔，却也是一個集團的反映」。

十一月十二日，抗大女生大隊成立的那一天，我也很榮幸的收到一張請去參觀成立大會的短柬那天我聽到邊區的許多領袖們講話，毛澤東先生，是在那個大會上我第一次聽他講話，他的聲音

不怎樣高，可是他的冷靜，好像與聽衆不發生一點關係的冷靜，把每個聽衆的注意吸住了，那天他說得不長，人們瘋狂似的拍着手。

接着說話的，有十幾位，林彪先生，賀龍先生，羅瑞卿先生，滕代遠先生，——延安人稱他做滕參謀長——徐特立老先生……。他們個個都像婦女運動專家，而且他們的口才個個都那麼流利，在延安，這是一個奇跡，好像所有全中國的演說家都集中在邊區，每次大會上，那些說話人的口才，個個都是Cicero。

中國女子太不幸，却也太幸福了，有這許多同情我們解放的男同伴，在替我們叫喊！

「今天是你們女子揚眉吐氣的日子……」羅瑞卿先生說話咬緊牙齒——聽說是受過重傷的——「我希望抗大女生大隊培植出許多婦女幹部來，那麼我願往前方去，這個副校長的位子，我可以讓位的……」，一陣哄笑，繼以掌聲。

可是我在這裏，也要說笑話，若說那天是我們女子揚眉吐氣的日子，不如說是男子替我們揚眉吐氣的日子，爲什麼那天說話的儘是些男先生，而女子只有三位呢？——一位是女生大隊長張琴秋女士，一位是女生大隊政治教育主任孟慶樹女士，一位是河南老太婆劇團團長薛士英老太太。

徐特立老先生的話引得每個人都痛痛地笑了：「小時候，我覺得女子眞偉大，她們會燒飯，會洗衣服，還會生小孩子……」平常面孔拉長得有點可怕的成仿吾先生，在台邊，也笑開了嘴吧。

「假使女子不同我們合作，那我們男子怎麼辦呢？我們還能像平常時候一樣的工作麼？我們的工作效能一定會減少，我們只能作半天工作……」人們只是笑着。徐老先生的話是對極的，眞的，如果我們女子不同男子合作，看男子能怎樣，有許多地方，因爲有女子在做石基，男子得安安心心造他們的屋子。

賀龍先生，他希望女子也能帶兵，滕代遠先生，他希望女子就她們身心所近，多多參加通訊與衞生兩部門的工作。孟慶樹女士總結說：「我們但願能努力達到各位首長的期望！」

抗大實施眞正的國防教育，在現階段，可說一切都好。但我也曾聽到好些人說抗大出來的人，有些極少數的個別份子，常常態度很驕傲，——也有些女同志，不肯上前方，也不肯往別處，只老願在延安當一個文書等等——。這是可以理解的，抗日軍政大學，這樣一個大學，什麽都全備了。可是抗大的軍政，好像是教授基本知識與基本方法，一切還須從實際中去磨鍊，應用，才得盡量發揮。裏面學員的文化水準是很不齊的，有些人能隨手紀錄，有些人還不能完全理解教授們所講的課。抗大錄取學員，及格與否，看每人的抗戰信念堅定不。在外邊，我曾看見有些青年，爲想進抗大，特地補習代數，幾何，他們是沒有明白抗大的教育。

有些外來的大學生，因爲文化水準高些，他們覺得有點苦痛，而不安於抗大；「我們聽得有興味的，有些人聽不懂」。抗大的學員實太多了，要文化水準很齊，實在也不可能。

「我有點懊悔來進抗大，那裏都是些沒有辦法的青年，人家知道我本來在Ｘ Ｘ大學念書，竟出隨的問我：你爲什麽來進抗大呢？」

延安有一種極奇怪的空氣，不止抗大如此。在外邊，我從前也這樣想，延安總是充滿了拋擊名，棄地位，純粹爲着抗戰，無條件的來到邊區學習或工作的人；那知道延安的空氣並不如此，有些人，他們對於眞正拋棄一切而來的青年或別種人，常常表示極大的驚奇，有時也會天眞地問：「那你何必到這裏來呢？」好似不好說：「你既然本來有飯吃的，何必到延安來呢？」我也推究不出爲什麽有這個空氣。我想，自從抗戰以來，爲着抗戰，拋棄一切的人一定太少，因之這些人會被看做怪物，甚至傻瓜。實在說，抗大裏雖然有許多沒有辦法的青年，但也有許多有辦法的青年，他們拁

給學校，有一人捐到一，二萬元的。

「在黑暗社會裏所用得着的吹牛拍馬，有時在抗大裏也應用得着，如果你常常去接近大隊長，指導員……吹吹牛，拍拍馬，那麼分派工作起來，你總能得着較爲適合的工作。」

「我們學員有意見，不能直接提呈校部，先須交給班長，班長解決不下，而認爲有解決的必要，再交給區隊長……這樣推上去。往往有許多問題就是這樣按下去的。這些指導員有的是抗大前幾期畢業生，我們不能解決或解決不下的問題，他們也不能爲我們解決。」

「有一次，在大會上批評區隊長。我們同隊一個女同志，她的丈夫在一個下午來看她，爲的小孩子生病，醫生說要檢驗大小便，父親從二十餘里外取了大小便來，再叫她送往醫院……在場上，兩人正要會面了，還來不及說話，區隊長趕來，把女同志的丈夫打發走：「這不是會客的時間！」這個男同志來不及把大小便交代，提起走了。許多人都同意我的提出，但是會畢後，夜晚，區隊長差人來叫我去談話，房間裏沒有別的人。

「你要對我說話，同我說好了，爲什麼在大衆之前說我的話？批評我？」

「眞要一些光棍的人，才吃得消抗大的風氣，越光越好」又有人這麼說，「好比一隻面盆罷，你有一隻面盆，大家拿着用，洗衣，燒開水，煮粥……一點也不愛惜，用完也不放在原處，這個也不要管牠，一天，這隻面盆燒破了，面盆主人有點不高興，或者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的面盆給人弄壞了。」有人報告區隊長，批評起來，說：「東西大家用用有什麼關係」。可不是，只怪這人有了一隻面盆。

有些抗大的學員同我談到抗大裏的民主，聽說抗大這次大檢查工作是用極民主的方法，一位名教授對我說：「一定有些東西的」。意思是一定有好成績。

民主集中制，這是邊區在號召的，我國現在是在戰時，不要忘記了這個戰爭，就是在平時，我們需要的也是民主集中制。

缺乏人才，就是說缺少幹部，這恐怕是一個事實。抗大栽培抗日幹部，但是怎樣選拔呢？恐怕這倒是困難的。從各方面講，好比一個抗大的大隊長或指導員，在一年或六個月中間，他能不能普遍接近幾百個人？這在時間上已經不容許他了；從大隊長與指導員本身講，他的眼光是怎樣的？他的識人的標準又是怎樣的？他既識人了，會不會用人，能不能容人？如果能夠用人容人了，但是對方受用與受容不呢？所以選拔幹部，還是決定於本來的幹部。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成爲抗大校部幹部，也不知道分派工作的標準是怎樣的，照我日常淺薄的觀察——有些外來參觀的人都有同樣的觀察——，邊區各種工作都由會說話的人去担負做。政治主任，由一個會說話的人去，指導員由一個會說話的人去，事務主任由一個會說話的人去，教書，也由一個會說話的人去……可是我覺得，在邊區，會說話的人夠多了，就是缺少去照着領導者的話不折不扣地做出來的人。分工合作，民主集中，就是要把這兩個大原則推廣到任何事情上去。

有些青年，抱了一種非常美妙的理想來到延安，但延安是不是一切都好？我們就說這些老百姓罷，老實說，他們的頑固，他們的狡猾與偏狹，那種牛皮糖的脾氣，少有使我們江浙人同情的，但是有什麼辦法？歷史，地理，特別是生產的方式這樣造成了他們。他們把適合於他們一己利益的口號與標語學了去，把不適合於他們一己利益的推了出來。教育他們，提高他們的文化，生活種種方面的要求，是的，正在這樣做，但在這個時間，你要痛快；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還有，正如有一位邊區的領導者對我說過：「無論如何，我們總得承認延安的物質條件是不好的」，我非常歡喜這句坦白的話，惟有坦白與眞誠，才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理解，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但延安的

物質條件太差，比不上巴黎，紐約，莫斯科，就是連江浙的一個小鎮，好比海甯縣屬的長安鎮之類也比不上。我也像陝北的老百姓，來說一說關係我個人利益的小感想罷。在我窰洞的隔壁，與門外，常常有人在半夜談笑，大聲的說話，大脚步的走路，我們可沒有像比京，法京，英京一樣的偕上警察，在夜晚十時以後，制止這些吵鬧而保障人們的睡眠！我也不能敲着窰洞的牆，客氣而强硬的說：「同志們，請靜一點罷，這是睡眠的時候了！」將來，當大家有了睡眠需要保障的要求時，自然會有辦法的，我也用不着頭紅面熱，忍耐着煩燥而過這些黃昏了。

星期日，渡延水，去訪看幾個朋友，青凉山下，一隻破船上，擱了幾塊跳板，——眞正的「跳板，又薄又狹——每次，許多男女青年學生，擠在這些板上，推呀，擠呀，大家要在同一個時候渡河過去，一秒鐘也差不得。你擠，我擠，你推我推，小孩子，小脚的婦人，站立不住，擠下河去了，大家哈哈地笑了。你說這些是可愛的中國青年罷，是的，我正覺得是頂可愛的，不管這個是麻子，那個是紅鼻頭，那個是大嘴吧，……我不能不愛他們，他們身上有我切愛着的祖國的泥土氣息。你說他們是受教育的罷，是的，他們個個都有堅强的抗日意志，他們受到極好的革命教育，但同時我不能不討厭他們這種帶一點原始性質的行爲，有一，二，三次，當他們擠得像瘋狂了的時候，我喊了出來：「擠什麽」？

總之，一九三八年，這一年，對於延安，以及延安所有的學校，將是永遠値得紀念的一年。這一年，延安的門開始大大地開了，吸進中國各地進來的青年，——抗大初辦時學員僅限於舊時紅軍的一些幹部——這些青年，來得很多，大都是優秀份子，可是質地的分別是否像米與穀糠的篩過了的分明？我就不敢說。從本質上去認識人，那麼我覺得不能也不會像孫行者樣的搖身一變，一到延安，就脫胎換骨的，但無疑的，他們帶來了許多好處，卻也帶來了許多壞習慣，當他們進入邊區，

開始發現許多別地方見不到的特點，優點，同時却也發現一些缺點，在裏面的人，隔絕了十年，也十分驚奇的，看見外邊來的人，他們雖然並不曾恰恰走二萬五千里，但在這十年之中，這些外邊的人，他們也在那裏走，向着一個目的地走，而且有的人還走得相當的快。於是，彼此驚奇，彼此讚嘆，經過了一個時期之後，一些摩擦，一些小事故，使大家認識得更清楚了，彼此攜着手，再走路，從前走過的路程還着實不够，彼此的優點溶成爲大家的優點，彼此的缺點，大家督促着逐漸改除。抗戰，這是一條曼長而堅苦的道路呀！攜着手走罷。

八月三十一日早上八時，我去參觀陝公（陝北公學）。往城外走，延水的聲音一下子近一下子遠的送進我的耳朵。田野裏，高高的是玉蜀黍，高粱，在離陝公不遠的地方，有一塊地上種着毛豆，已經結了豆。忽然我想起今年連毛豆也沒有吃過，「唉！這個地方是太苦了！今年會連毛豆都沒有吃過！」當我的心靜下來，好似立在山坡上，望着這一片的黃沙山與黃泥土，我不禁有點淒慘起來，「這個地方是太苦了！」而驚奇我自己到了這樣苦的地方，那樣地遠離我的家鄉！在初到法國的時候，我曾經想永遠不願回國了，大約有三年，我的確不想念家鄉，與祖國，到第四年、五年，我開始做夢了，見着老母，：：後來，不相干的人也到我夢中來了，最後的一，二年裏，就是以前我討厭的人我也想望見着他們。在延安住了幾個月，我也有了這類心情，只要能使我回家鄉，任何代價我都願出，但是，家鄉不是被日本鬼子占住着麼？那麼怎樣趕走日本鬼子呢？：我想，儘望着田野。番麥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這些小小的植物，有點像藍草，各色的花，粉紅，玫瑰色，大紅，翠綠的葉子像綠寶石一樣的綠，紅紅的根，在熱陽下，是那麼的鮮豔。幾隻肥大的黑豬，在一座小小泥屋旁懶懶地走，有一隻母豬在吃東西，胸下一隻小豬在吃奶，老鴉在母豬背上走來走去：：：這一幅米蘭的風景，使我惘悵地想起的田園風物來。唉！是這樣的遼遠了！

在一座泥屋旁，我看見有好些青年，就攔住了一位問：「陝公是在這裏麼？」「是的，正是這裏」，那青年很客氣的回答我。「你找那一個人？」「我找成校長。」「就在這個山上的窰洞裏，」他伸手指給我看。我謝過他，便上山去。把名片交給門口的站崗同志，他送進去，一歇，成仿吾先生出來了：「陳學昭女士？」他招呼而又不敢確定似的。「哼，哼，哼，」他笑着（我有點怕他這個笑聲，但後來較熟識之後，覺得這個笑聲是一點也不可怕的，完全是一個自然而質樸的笑），領我進去，「有一個客人在裏面」，走進中間的窰洞，他對我說。我遲疑住了「那麼我改一天……」，「不要緊的，來，我介紹！」他沒有讓我說完，打斷我的話，領我走進隔壁的窰洞。當我們推進小衖的門，裏面的客人也立起來了。「今天上午，朱總司令在我們這裏報告！」成先生對我說，「這是中國最老的一位女作家。」「請你不要同我開玩笑，」我說。「一點也不……」哼，哼，哼，成先生笑着。

朱總司令，我在歡迎朱總司令的大會上曾聽到說話，那天我的手掌都拍痛了。這是一位身經百戰的統將，大將風度，確實是這樣，在他不笑的時候，是很嚴厲的，但他常常是笑着的。一點也沒有年老的氣概，看去不過四十外，我笑着問：「究竟幾歲」？「我也記不清了，五十四罷！」朱總司令說，這樣接近青年，無怪許多青年戰士像瘋了樣的愛他。成校長請吃梨子，朱總司令拿着一把小刀削梨子皮「吃呀」，他指着碗裏的梨子對我說。「有什麼方法使得能這樣的健康？」「運動」，他說，又想了一想「當然有許多地方要自己留心！」完全像一個久別重見的父親，這樣對他的子女說話。忽然，他拿出了一本小冊子，「請你寫幾個字」，他對我說。成校長在旁邊笑了：「你也，學會了這一套！」我寫：「抗日民族英雄朱總司令萬歲」！輪到我請朱總司令寫幾個字。「寫什麼？」他問成校長，「堅持華北抗戰好不好？」「好」！「不用寫日子罷」，他問我，「隨便的」

，「那就不寫了」。

我說今天我的幸氣很好，可以聽到朱總司令演講——在山上，什麼消息都不靈通，許多珍貴的演講都因不知道而沒有聽到——「要四個鐘頭呢」！成先生說。

下山的時候，朱總司令問我：「德國去過麼？」「只經過」，我說，「柏林車站與那個近郊的車站逛了一下」。「是的，那個地方中國人很多」。

這天，朱總司令講的是關於華北一年來的游擊戰爭。淸楚的語句，略帶一點四川音，常常用極通俗的字母來形容日本鬼子怕我們游擊隊的窘態。屋子裏擠滿了人，連一點空隙也沒有，坐在地上，立在窗口，就是門外，也有坐的，立的，擠成幾排，聽講的人，把簿子放在膝頭，起勁地記錄。朱總司令的精神是這麽好，一直講到十二時過，其中只休息一次，十分鐘。

「講得好不好？」在休息的時間，他掉過頭來問我。

「好！」我說。

他天眞地笑了。

散出來，成校長留午餐：「午飯後我陪你參觀一下。」

他們已經上了山坡，我落在後面，朱總司令回頭來望着山下，「哈哈，還沒上來」，他說着，笑。我想總跑不過他們，在他們立定等我的時候就透了幾口氣。

在當中的窰洞裏吃飯，一隻圓桌，他們都謙座，「太太們應當上面坐」，朱總司令說，成仿吾先生也和着：「一定要上坐，你是太太們」。我想，在延安也這樣講究禮貌，可是朱總司令一定累了，而且餓了，乾脆一點罷，我就沒有再推讓，坐了下去。

那天的菜隻隻有辣子，連炒蛋裏也有青椒。同桌有陝公的教育長——忘記了大名，成校長介紹

時說剛剛從歐洲回來的——還有一位有了年紀的受過傷的先生，一隻手臂是割掉了的，眼睛也只一隻。他們像秋風捲落葉的吃着這些東西——想是行軍的關係，這樣慣了的——。一碗又一碗，朱總司令已吃到第三碗了，大家正在談飯量。

「我平常吃一碗半，有時兩碗，」朱總司令說。我忍不住笑了出來「這是第三碗！」「呀？我添過兩次了？」

吃過飯，在成先生的窰洞裏，吃着水菓，一位男同志拿了無數的小冊子來請朱總司令寫字；「要請字句寫得多些，長些！」學生們的要求。

「鋼筆寫呢，墨筆寫？」朱總司令問成校長。「鋼筆寫也好，」他自語，於是一本一本寫起來。寫完了，成先生與朱總司令間又交換寫了幾個字。

送朱總司令出去時，我立在窰洞門外，看着下山，不禁欣羨的說：「簡直健步如飛」！「是的，他頂愛爬山」，成先生說，又指着山坡下幾個小勤務：「也最歡喜同小孩子們打球，沒有一個小孩不歡喜朱總司令的」。

回進窰洞，坐着談天，「今天你不能午睡了」，我對成先生說。

「也不是天天午睡的」。他叫勤務去買葡萄。勤務一忽兒回來了：「沒有」！「怎麼沒有？昨天我看見的」。我很驚奇他這一點小事也要認眞說明，因爲在延安，我常常見到，更大的事情也就是馬虎過去，說明是從來沒有的，更不要說是帶一點責備的口吻了，那可說是絕對沒有的。

午後二時，成先生領路，走下山再上山去參觀陝公與陝公高級研究班。陝公的窰洞聽說有許多是學生自己打的，很開闊，窗子比較大，實在比老百姓打的好，旁邊還有一些像花台似的泥墩。明天，九月一日，正是陝公成立一周年紀念。走過一個窰洞，裏面擠滿了人，正在裝釘「陝北公學周

年紀念特刊」。「有裝釘好了的麼？」成先生問。「等一下就有第一本」！當我們從窰洞那端回來，第一本已經裝釘好了，成先生接過交給我；「這第一本送了你！」「謝謝！」我對成先生與窰洞裏的先生們說。接在手裏；潔白的紙張配着新鮮的油印！第一本！這樣一件珍貴的禮物，我怎有資格收受，我，一個不相干的參觀客人？

往高級研究班，時間正值午睡，靜靜的，救亡室裏有幾個人在寫標語——給明天一周年紀念的——我說想見一位學員□□□，成校長託一位學員去邀那個人來，「他睡着沒有起來，問校長有什麼事情，」去的人來回覆。「要他起來罷，他家裏託人帶口信來了」。

□□□走來了，一個清瘦的青年，簡直與他的弟妹像一個模型裏印出來的。

「你母親大人記掛得很，要你多多寫信去，囑你自己保重身體！」我把□□□女士的口信交代了。「你務必多多寫信回去」，我又叮囑他，「你爸爸聽說也要回川了」。

在回出來的路上，我們就談到這個青年，「他好罷？」我問。「好，很用功」。「但願這樣！」於是談到我怎樣認識他的家庭。「這個孩子的媽是我愛國裏一個老同學的表姊，就是□□□的夫人」。成先生有點茫然，他一點記不起這些人了，這些已經做了官的人。「就是從前創辦□□□□雜誌的一個，□□□，不是也寫過好些東西？」「唔！」他記起了，「現在做什麼？」「□□省□□廳長的親信人，□□□做着□□省□□廳長。」

「他們到處玩舞女」，我說。張大眼睛，面孔更拉長了，同外界隔絕了好多年的成先生，舞女這樣東西一定使他難以想像罷。「□□□的爸爸到處玩舞女，把妻兒都拋了！」

「呀！那更加難得了，這個孩子！現在是兒子的時代了，不是父親的時代！」成先生哼哼地笑起來，「是不是？」他問我。

談到□□□的家庭，成千萬中國這樣的家庭展到我眼前來，心裏很覺難受，也懊悔對成先生說到這些，眞的，我帶些什麽給延安，還不是這些可鄙的荒唐的煩人的故事!?

在山脚下，又走了一小節路，於是這位赤着脚，穿着草鞋，嚴肅的面孔，樸素的外表與樸素的性格，像一個老農，把事業做畢生的寄託的成先生的影子，在我眼前遠去了。「平常女子一定怕成先生」，我心裏想，然而他該不是一個叔本華，可是在結婚與離婚的潮流高到極點的延安，成校長聽說還是獨身。

延安一般人口中常常流行着這樣的話：「抗大精神比陝公好，陝公比魯藝好」，這話未免太幼稚了，好似小孩子說：「岳飛比關公好」，或「關公比岳飛好」。抗大與陝公可以稱爲兄弟或姊妹校，抗大有抗大的特點，陝公有陝公的特點，抗大是七分軍事，三分政治；陝公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正如大家所說的。至於吃苦的精神是一樣的。在我看，陝公的學員在文化水準上比抗大整齊，成分上講，也好似比較純粹一點（〃特別陝公高級研究班，有極好的聲譽。

九月一日，天不做美，下着沉沉的雨，到傍晚才止，透露出一點淡淡的落暉，路上太泥濘不能走，把陝公這天極盛大的集會——有報告，會餐，晚會——只好錯過了。

一天午後——三時過了——拏着周揚先生的介紹信，到魯藝——魯迅藝術學院——去找院長沙可夫先生。「沙可夫」這三個字的聲音，總使我意想是這樣寫的（"Sakov"）共實，沙可夫先生是一位中國人，而且還是我的眞正老鄉呢——海甯人。

「我們雖然做了同鄉，可是總沒有機會見面，」沙先生對我說，一邊請坐。一下子，談到家鄉的熟人，於是我就像到了一個老朋友家裏那樣，舒舒服服的坐起來。

我們談着海甯，我記起已過的四叔曾對我講起有這樣一位學音樂的留法同鄉。「是的，我歡喜

音樂，但沒有住上十年，在巴黎住了兩年，後來到莫斯科……」。我們談到裳——不意在兩星期的後來，裳終於脫出家庭的牢獄，由香港到延安來了——的一家，是沙先生所極熟悉的，他像一個老書生似的擡起頭來。

小勤務開上沙先生的晚飯來了，留吃晚飯，魯藝教育長徐一新先生，一位看去十分精明能幹，外貌像一個軍人，一同吃飯。吃着魯藝出名的藝術飯，小米同赤豆一起燒，很爛也很香。這類赤豆，就是南方用以煮爛做甜食餡子的。可是不知為什麼延安市面上沒有這些豆子出售的，別的機關也不見吃赤豆飯。

吃過飯，沙院長領我去參觀，這時候，學員們有的在山下一個大墳場上散步，窯洞裏很少有人，偶然間遇到那一對西安同日登車來延的夫婦，男先生有一臉鬍子，太太是個長條子，走起路來，像一個男子，他們倆現在魯藝文學系。當我參觀完了回下山來時，有些戲劇系的學員正在墳場的一角排演戲。

魯藝現有戲劇系，音樂系，文學系，繪畫系。這個學院夠得上稱為世界上最困苦的藝術學院，也可以說是最不藝術的藝術學院；生活與抗大，陝公一樣，軍事紀律化，也一樣的吃素菜，小米；可是延安有些人已覺得他們太藝術化了，太散漫不緊張或太浪漫了，這是會在道聽途說之中得到的。學員們住的也是窯洞，與陝公抗大一樣，十多個人擠在一隻土坑上。沒有戲台，沒有音樂廳，也沒有畫室，排演，演奏……都在露天做。

魯藝的戲劇——戲劇系與實驗劇團——，他們的話劇，在技巧上值得稱讚，特別是佈景方面，往往用的是極簡單的物件甚至於破東西來做成的，卻是那樣的動人。佈景的負責人聽說是從上海來的，一位嵊縣人，鍾敬之先生，我確佩服他的心細，認真，這是一位後台的不出而英雄。

技巧是較好了，好戲還是少，缺少好的話劇脚本，也缺少話劇角色。但有一個特點，是不能忽略的魯藝的戲，他們的確做到了莫利哀（Molier）所說的：「戲劇是在人們的娛樂中改正他們的缺點」，（La Comédie est de corriger les défauts des gens tout eu les Amusant）所以不是純粹的娛樂品，換句話說，是教育與宣傳的武器。有一次，在晚會上，看到演什麽寺（我眞正糊塗，已把戲名忘記了），內容是在河南的一個鄉村裏，漢奸利用人民的迷信，利用寺僧來做活動工作。在內容與結構方面都好，因爲曾有這樣的事實，所以內容是充實的，演員方面也盡了最大的努力。又有一次，我看他們演一幕短劇（獨幕還不知是二幕三幕，忘了），演一個意志薄弱的工人，被誘被逼做漢奸，放信號，在敵機轟炸中，他的好友一家被炸死了……情節是動人的，也可能有這類的事情，但工人與他的好友的對話太長了，這種字眼的玩弄（jeu de mot），好像英國的低級小說裏所常常用的——爲使讀者覺得滑稽——，在巴黎，我曾兩次在不同的戲院裏看道斯托也夫斯基(Dostoyewski）的「罪與罰」，每次都使我覺得不痛快，總是爲了那個大學生（犯罪者）與法官的捉迷藏式的對白太煩人了，那次短劇也犯了這個毛病。

中國的一般羣衆是不愛話劇的，話劇還是五四以後，最近幾年來，在上海一帶更熱鬧一點，他比較還是被知識份子愛好着。民間只會理解京戲與各種帶地方性的雜耍。但我覺得不應當遷就民間，反把戲劇的大路棄了不走。對於戲劇幫助動員民衆，那我想魯藝的劇對於老百姓一定及不上民衆劇團——文協會主辦的，由柯仲平先生帶領往各地出演——的受歡迎，民劇團演秦腔，我曾看過他們的「好男兒」，雖然粗糙一點，可是老百姓是愛好的，我想魯藝儘可以把話劇稍爲藝術化一點，不要太遷就民間。

在延安，從事學習話劇的人聽說有相當的苦悶，爲着時勢的需要，大鼓、相聲各種雜耍：：：

都變成極受人歡迎的娛樂。藝術家，在延安，就是會唱大鼓，玩雜耍的人們，他們被一般人活實似的捧着，變成 Homme du Jour 是不是有一技之長能够娛樂人們的這類人，就是藝術家？我想一定有人在思索。其實一切爭論都是徒然，話劇者們也不用苦悶，「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話劇研究者們拿出些東西來，給人們看看怎樣是理想的藝術作品，或者庶幾乎近矣。

、二十八年的新年裏，延安第一次演歌劇「軍民進行曲」。街頭貼着動人的彩色廣告，在第一次預演的那晚，蒙老鄉沙可夫先生來領我去看。

從內容講，太簡單，至於辭句，沒有印發本子———演歌劇，印發譜與辭怕是必需的———聽不清楚，音樂方面，歌曲是冼星海先生作的。那晚姑嫂的兩個女角，太沒有聲音了，曲的本身已是低音，而她們的聲音又只半音。老頭子的聲音還宏亮，欠圓潤。還有一最大的毛病，唱與動作附合不起來。演完後，他們當場請觀衆批評，先請丁玲女士，丁女士推讓了一歇後，立起來，說她喜歡過天送一個書面意見：再請她說，終於說了：「：：音樂太帶一點洋味兒：：」接着請一位會唱大鼓的呂什麼先生（不知他的大名）批評，正在那時，我就去了。

歌劇在中國是沒有的———在上海，聽交響樂也只好往工部局市政廳去———，如果勉强要說牠有，那麽算是崐曲罷？可是我不同意，崐曲，淸唱多於扮演，那些內行人都得承認的，雖然「牡丹亭」，「長生殿」：：都可以扮着唱，可是一般人要牠，還是歡喜獨個兒在眉月下，天井裏，「天淡雲閑：：：」這樣哼哼的味兒來得深長。

我覺得「軍民進行曲」的情節比土氣十足的「農民曲」還不如，固然，「農民曲」裏的歌曲是東拉西湊的，好如靑菜豆腐湯放肉片：：：。「軍民進行曲」是一氣寫成的，是一位作曲者的心血；爲了急於上演，僅僅費了四天工夫，應該珍視作曲者的努力，與迅速的創造力。看過互格業（

R·Wagner）的歌劇，或者，還是說近代的特勃西（E·Debussy）罷（一九一八年逝世的），被蘇聯的人民這樣愛好着，怎樣使西方的歌劇，有一個概念（Notion）。中國的作曲比以前是進步了，但還不能表現中國民族的偉大而莊嚴的靈魂——像這次抗戰——。在「軍民進行曲」裏，我期待一個忿怒，一個驚恐，一陣暴風雨樣的聲音，但總沒有，缺少氣魄，而覺太消沉一點。但這些，也得原諒，沒有一隻鋼琴，不要說大提琴，小提琴，與豎琴了，總共只有一隻可憐極點的小風琴，同一些中國舊音樂裏的破東西。

文學系裏有近五十個的學員，每次招生，來考的人總是很擠，聽一般青年口中的談話，延安好似流行着這麼一個風氣，不進抗大，就進陝公，不進陝公，就進魯藝；不學軍事，就學政治，不學政治，就學文學。「延安大小有二百多個詩人」，到延安的三，四天後，一個熟人對我說，我真的出驚了！魯迅先生在遺囑上勸人不要開空頭支票——學文學，我想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的同志們一定更加能珍視魯老先生的遺言。

文化水準太不齊，這是常常聽人講起的，「改卷子的工作實在太乏味了，一篇簡短的紀實文字還不很能寫，怎樣研究文學呢？」

我沒有素看魯藝的章程，可是我想，當然同抗大，陝公一樣，應抗戰的需要，實施國防的藝術教育。我曾聽一位邊區文化界負責的人說：「培植那些小說家，不是我們的職志，我們只要是他們能夠接近羣衆……」好像是這樣的意思。那麼不是把一般人對藝術的理解提高，却是把藝術本身拉下去，以求適合羣衆的胃口。我也相信，對於幫助抗戰中的動員工作，一定是很好的。實際上以學習的時間只有六個月，在這短促的時間裏，要有怎樣藝術修養也是不可能的。

胡考先生，這是一位聰明絕頂，極有天賦的中國漫畫家，去年八月中他同陳依範先生來延安，

會舉行了一個速寫展覽會，後來被魯藝留住，在魯藝的繪畫系任教。在未來延安之前，他曾有一個極大的對於向國際用繪畫宣傳的計劃，可惜因爲人事上的更動，沒有實現。他的計劃是召集全國畫家徵求抗戰畫，這樣一來，無疑的把全國畫家的心血集中了；再組織一個會，在這許多畫中選出若干幅，把這若干幅送到世界各國去展覽，展覽會的名稱，不妨用中國現代畫展覽會，——在蘇聯不妨公開用中國抗戰圖畫展覽會——同時把展覽的畫印成冊子，向觀衆募捐，這是一個極好的辦法，因爲人們捐款，往往歡喜帶一點紀念品回去，這小冊子的銷路一定很大，是一個極好的宣傳方法。可是這樣的宣傳工作，不是一，二個人能力所可負担的，必得有組織地由國家去領導辦理。他這個計劃，我十分同情，當一二八時，我在法國，實在那時是我國最好作宣傳的時候，但我國一點也沒有做，有幾位同情我國的大學教授與新聞記者，他們對我說：「我們誠懇的說，中國太不會做宣傳工作了。」我至今想起，還覺得他們的話是對的。在星期日，胡先生常到我這裏來午飯。「長久沒有吃油了，今天要到你這裏來吃油呢！」他滑稽地說。有豐富的上海生活經驗，加上天性富於幽默，他的對於各種事物的輕鬆的諷刺（Hnmoristique），使人百聽不厭。能說一口極流利的英語，一個朋友說他的英語是極漂亮的，極英國化——紳士派——的。

在整個精神上講，我覺得魯藝一點也不能說不好，有些地方要「就事論事」。我還沒有見過一個能比得上魯藝那樣謹嚴的藝術學院，藝術者的生活與習慣，因了工作關係，有些與別種職業者不同的地方，雖然，我頂討厭一些藝術者們故意誇張他們這些不同的地方，我想或許不止我一個人會起反感。一個白天有五，六小時按定工作的人，他沒有理由可以睡晏覺，到日高三丈不起來，可是，一個工作多到極點，早上二，三時才得睡覺的人，如果睡到白天七，八小時，他的睡眠還是不足的。在晚會的時候，人們被台上的戲，大大地感動了，用力的拍着手；到次日早上，人們知道或看

見魯藝裏有些人到八點鐘還沒起來：「這算什麼？在延安，他們這個樣子！」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巧，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事實上不可能的。昨夜的晚會到十二時才完，演劇的人回去已一時過了，夜夜這樣，或接連幾夜這樣，不比看戲的人難得的為消遣而遲睡了一夜。藝術者的工作是消遣別人，而在他們本身不是一個有趣的消遣，這是第一要認清楚的，看他們在台上演戲，看的人非常受感動，快樂，拍起手來，但做的人並不快樂，他們的動作在他們是極機械的，像化學公式那樣。所有的藝術都是這樣，聽琴的人被美妙的琴聲感動了，彈琴的人，他注意音調，拍子，節奏，手的姿勢。背痛，手酸的結果才是彈出一曲被人們覺得很好的音樂。

在目前情形之下，魯藝還不能負担起號召全國藝術界來建立新中國的藝術的使命——他們本來沒有這麼想——為了缺乏財力與人力，師資方面，及學員方面程度的不整齊。在我，我覺得提高是好的，固然不一定要培植那些小說家，但又何必一定拒絕培植呢？！

七　工作與技術人員

朋友們歡喜知道，在延安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着的，特別是對於工作，人們是怎樣做着的。他們對待技術人員，又是怎樣的。延安的生活，我留在以後絮絮地談罷。這裏談談工作與技術人員。可是，我得聲明，第一，我沒有在延安工作，工作深裏的優點與缺點；我是看不出來的。并且我所到的地方，現在爲止，只是延安，前方天天有許多壯烈的驚人事情，我見不到，第二，我不是技術人員，所以，這些話一點也不能算觀察，只好算是拉雜閒談罷。

到延安的第二天，住處的一個鄰近機關裏，一位八路軍的老幹部——是個技術人員——對我說：「這裏工作格式不同，生活格式也不同。」當時我嚇了一跳。工作格式不同，那對於我，可以不去管牠，生活格式不同，那可不是糟透了！在延安一天，我當然要生活一天，吃飯，睡覺，……都是事實，這個不同格式的生活，我是無可洮避的要和牠發生直接關係。實在，并不是我在這裏「正名」，從工作與生活的本身上去講，那麼工作總是工作，生活也總是生活，不過怎樣可以達到工作的目的，與怎樣取得生活的方法，是有些不同就是了。

在這裏，一個人的工作是用政治教育來代替了薪金的鞭子，每個人，無論担任那一種工作，都可以自豪是爲着工作而工作，爲着抗戰而工作。他們有組織的人，要遵守極嚴的紀律，在後方——這裏稱延安爲後方——黨員與非黨員在工作上沒有什麼區別與分歧，但在前方，聽說艱苦的事情都由有些人去担任，就是他們的「衝鋒在前，退却在後」的精神。在急難的時候這種精神顯明的表露出來，有一位曾是山西民大的教授這樣對我說。如果犯了錯誤，就把本來担任的重要工作降下，給他一個不重要的工作，一個政委降到馬夫，也是可能的。但是我想，這種責罰，只有對於有工作愛

好心的人機會發生效用，使其精神上感到苦惱，如若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有什麼關係呢？做馬夫罷，也好，反正吃飯，穿衣，住處，還是一樣的，就是他的愛人，與子女的生活一切也有人替他們安排得好好的，他是什麼也不用担心。在這裏，最大的罪是死罪，——漢奸重的是死罪——死罪以下、就沒有什麼可怕的罪罰了，大不得了時，就是請他到清涼山高等法院去住一下，但還不是像在機關裏工作一樣，吃飯，穿衣，住窰洞。往往在清涼山住了些時下來，他們的文化水準比從前高了些，因爲在山上，有人教他識字。這是人道的感化教育，我衷心深深的讚同。這種感化的教育精神，正像蘇聯作家Affigevou在他的短篇 bisa Sarokina 裏所寫的，也是那張有名的影片「生命之路」中所表現的。

這裏的高等法院，雖然離開我住處不遠，但還沒機會去參觀過，在我住的山脚下，有時看見犯人在修山路，他們個個十分強壯而毫無拘束。我有時便想，犯錯誤的人，有時可以請他上清涼山，或者降他工作，但假如有些人，他們幷不犯錯誤，可是也不起勁工作，你批評他罷，他笑笑，那不知道怎樣對付。在這裏壞人是極少，雖然不敢說沒有，外人所常常笑的「同情的懶胚」，恐怕也有的罷。如果有一些人，不在工作本身上努力，幷不替整個的團體利益着想，不從正確的路上去愛護羣衆，却只一味去亂討羣衆好，無是非的只求適合羣衆胃口，那樣的人不知用什麼法子對付？如若有一些人，他「一條褲子一根繩」，政治教育，他不理你，請他上清涼山罷，「好，你儘管再送我上清涼山去」。那又怎樣對付？當然，這類害羣之馬的人，是到處有的，在挺好的政治之下，「沒有飯吃的人給他們飯吃，沒有工作的人給他們工作」（加德林第二女皇的話）的地方，這類的人還是有的，他們是弗露特教授研究的對象。可是這類人，他們會冲淡了嚴肅的工作空氣，只在純潔而善良的人羣集團生活中起破壞作用，所以必得想法子對付的。

我不知道這裏有沒有勞動律這樣東西，平常一個工人一天做工幾小時，機關裏的公務人員一天工作幾小時，學校裏的教授與技術人員一天工作幾小時，我不知道。我看起來，在這裏，當然做老百姓是最幸福，只有他們的是，沒有他們的不是，做工人，也是最幸福的。在這裏的勞動力是這樣缺乏，他們可說是八路軍的獨養子。就木匠與打窰洞的工人來說，每天工錢四角，飯食每天三角，七角錢一天。這些工人，他們不願領三角錢飯錢，常常一定要僱主供給飯食，他們的食量那麼大，一個工人每天要吃三十兩小米（小米每三十斤四元），工人們的架子是很大的，技能呢，幷不高，可是他們的工作，却還是很好，眞應用得着這句歐洲俗語，「在盲人的國度裏，獨眼的是王帝。」「勞力神聖，普通勞力還缺少，更不用說技術勞力了！

在我住處附近的一個機關，他們雇老百姓開窰洞，我常常從那個山彎裏走過，看他們做工，同他們搭話，他們的原始的狡猾往往使我好笑，當我說他們好，稱讚他們時，他們句句不懂，當我說他們的調皮等話時，他們句句都懂，也有時，他們在我門外一帶走來走去閒蕩。早上，他們在早飯之前，是不動工的，因爲沒有吃飯，吃過早飯，又得抽幾筒煙，抽過烟，才慢慢的動手，一個人挖泥土，一個人倒泥土，二個人站在旁邊看，說是幫忙做，這時候是九時過了。到十時，休息，等吃午飯，乘着暖和的太陽，在太陽光下，脫下短襖來捉白虱，一個又一個，出神地夾在兩手指板間弄死。午飯後，又要休息，有的還要去「打個火」，到三時，吃晚飯，吃過晚飯，更沒有做工作的理由了。總算起來，他們每天工作的時間不過三小時，而這三小時的工作，又是未曾用出氣力來好好地做的。小時候，在家裏，聽老年人用這四句來笑不肯念書的人：「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夏去秋來冬又到，大家快活過新年」。陝北的工人，倒可以借這四句來送他們，「春天不是做工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大家快活過新年」。如果你催緊他們做——在這裏是沒有人催緊工

作的，大家是那樣客氣而體諒——他就會這樣回答你：「你這個事兒我們幹不了，我們要回去，」你有什麼辦法呢？只得婉和懇求他們，因爲除了他們，你有找不到別人的危險。

就是在那個機關打窰洞的時候，我曾去商量要了一個工人來給我打個小灶頭；而工頭偏偏送了兩個來，我說只要一個，他說一個要砌三四天。一個工人懶懶地做，一個工人站在旁邊看，在我的窰洞裏這樣的一個小灶頭，就在土坑口接出來，其實是很容易的。我畫了一個樣子給他們，他們不肯照我的樣子砌，鍋子與火灶砌隔離太遠，火力不能上去，「我們這樣灶頭砌過幾十個了，你懂什麼？」當然我該承認我什麼也不懂，只好聽信他們，結果不能夠燒，火力不上來，又改砌，還是不能燒，冒煙，這樣一個用泥與石片砌成的灶頭，費去四工，午飯後我等待他們來，見他們笑微微的從我們外經過，「去打個火」！我不懂，以爲去取個火來抽煙，老等不來，我就尋過去，找到山頂上，一個機關的棧庫裏，他們在那裏睡午睡！我把他們叫醒，他們不情不願的下來砌灶頭，表示十分忿恨，如果，我不催緊，不知他們睡到什麼時候才下來，更不知道他們要做幾工。這個小灶頭實在使我生氣，化了好幾個錢，并不能燒，特別是那個機關客氣，沒有讓我自己出錢，我從來沒有用過一個不勞而獲的錢，更是公家的錢，弄得我夜裏睡覺也不安！

十一月初，陝北的氣候已相當的冷了，下過一，二次小小的雪，有的人已穿上新的皮軍裝，棉軍裝，但是我把旗袍上的皮拆下後找一個店舖做一套皮的上衣，棉軍褲，却一點辦法也沒有。法蘭絨襯衣，絨襯衣絨褲衣…所有可以取暖的衣服都穿上了身，外面套一件單布軍裝。找遍了延安市，沒有一家裁縫店肯接受我的衣服。「錢是沒有多大用處的，還要同他們講人情」，我拉住一位原籍山西的女同志，看見她做成了一件皮上衣，請她領我到她熟識的裁縫店去，那家裁縫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她先爲我介紹了，接着說了一番好話。店主人老縐着眉頭，好像我們在同他商量借債，「現

在沒有空」，他回答。於是懇求他：「老鄉，你看一下，這麼冷的天氣，她還穿着單衣。」他笑笑：「這不干我事！」實在，他這話是眞實的，我冷，干他什麼呢？因之，我覺得難爲情了，要這樣求他們。末了，他說爲了看同鄉面上，要我們在三星期之後拿去給他做。「我們今天就留在這裏罷，請你千萬在五六天內抽出工夫來做一做，做得馬虎點也不要緊。「不，決對不能！」他連連地說：「決對不能！」我想只好把衣料拿起走，可是那位女同志示意我放下，她輕聲說：「放下他總會做的。」過了四天，我走過那個地方，去望一望。「你趕快拿回去！不能替你做，三星期也不成！」他太使我難堪了，因此，我忽然想，這些常常爲我討厭的海甯人，杭州人，如果在陝北有這樣地方人開的一家裁縫店，說不定他們會給我一點老鄉的情義而抽出時間來替我做一做。北方人是這樣講同鄉感情的。偶然在街上遇到一位江陰人，他是在防疫隊工作的，講到棉衣，他說：有辦法，我介紹你到縫衣合作社去。「沒有用的，縫衣合作社，我早去過，而且借了一個團體名義去的，他們太忙。」「不會，我與你不同，我們替他們打過防疫針，有時候，他們生小毛病還要來討藥：：你跟我去好了。」我似信未信，跟了他去，固然，人情到底路路通，答允在三天之內給我做好。說到工資的時候，那個江陰老鄉很精明的回價，帶着杭州口音的工人這麼說：「不管外來的，裏面的，八路軍有的也是錢！」這句話我好似覺得刺耳，雖然我不是八路軍，但八路軍的沒有錢，他們的窮，是我親眼目睹見到的，這位合作社裏的工人說出這樣的話來，太奇特了。在延安，的確如那位女同志所說，許多地方，錢是沒有用的，還得講人情，講人情並不是不好，在人類社會，當然有人情這樣東西，可是，我還有更進一步的希望，希望現在這些人情都變成辦法，不但一、二個人能享受，而且人人能享受。

工人們的嘴吧是非常利害的，有一次，在我窰洞的附近，我看見一個木料合作社的工人！！或

許是經理——與一個同志吵架，後來知道那個同志是外來不久，正在替一個機關辦什麼事，做了一個櫃子，講好是十五元，要做得道地。等櫃子做好之後，買客覺得做的不好，說工人沒有執行他們的預許，釘子的脚露在門外，人在櫃子邊走過，衣服給釘脚拉破了。只肯給拾元，除非木料合作社來把櫃子拿回去，或者，至少把釘子的脚設法不變在外面，那麼仍給十五元。合作社方面允許把櫃子拿回去換一扇門，或者把櫃子的脚弄好。可是沒有執行諾言，從他們雙方的爭執中所聽出這事的經過。

「把五塊錢拿出來！」

「現在我早已報過賬了，你們爲什麼幾次三番失信，約定的日子，不來拿櫃子，害我白白等待你們，不能做別的事。你評個理罷：最後我那天在路上關照你過了乂號不來，我要報賬了，在乂號之前，我等你們，你們又不來。」

「我們那有工大，跑去跑來走十五里路呢！」

「那我就有工夫天天等你們來拿櫃子—我只知道公事公辦。」

「不成，把五塊錢拿出來！」工人喊起來，開始罵了：「好，你這樣認眞，你不要拿出漢口的那種對待工人的脾氣來，你看罷！」最後，他威嚇這個同志：「你不拿出五塊錢來，也好！我們向邊區政府告狀去！」

我不知道這場吵架是如何結束的，如果告狀，我倒很歡喜知道這個官司的結果是如何的，我又不知道這位吃官司的同志心裏起些什麼感想，爲了省公家五塊錢，弄到吵架……或許他要消極的感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好好把五塊錢給他們，管什麼這個櫃子做得好不好，反正又不是自己的錢，落得慷他人之慨，倒也討人說句好話：「這個人的脾氣好！」可是對於這位吵架的工

友，我却有一點感想，站在旁觀者的立場，我不禁想，他們對於這裏的一切機關應該看做是自己的家庭，何以他們同愚笨固執的老百姓一樣，對於公家的一切總是取那樣對立的態度？他們是不是該這樣工作？他們的利益何在呢？

從各種人的口中，聽說延安的模範工人，要算印刷廠裏的印刷工人，這是可以理解的，在全世界，印刷工人總是站在最先鋒，他們如機械工人一樣，文化水準高，敏捷，靈活，也能澈底了解他們自身的利益。印刷廠裏的工人，他們在黑暗的排字窰洞裏，工作時間超於普通任何工人，並且有時爲趕印一本書，做加倍的工作。

延安的大司務工作，恐怕也够算得上是最苦的工作，在那些人數有幾百以上的大團體裏，像陝公，抗大……學員們六時多就吃早飯，伙夫同志在極冷的冬天，他們也須在早上三四時起來燒飯，雖然燒的沒有怎樣好的味道，但他們終究每天做着分內的工作，沒有偷懶。他們連星期日也沒有，在新年或節日，學生們爲體貼他們而代替他們燒一二天飯。

在這裏，有些工作特別能迅速地得到人們的認識，那幾種呢？會說話，會唱，會演講，末了，恐怕要算就是會寫。說這裏是文化人的天堂，一點也不算過分。若以他們所享受的榮譽來比技術人員，技術人員當然是趕不上的。

在後方，工作很忙的人，當然是那些負有重責的人，聽說他們經常做着過度的工作，也有抱着病依舊工作。「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魯迅先生這樣寫他自己，在這裏倒也應用得到，因爲他們平日所取，又是些什麼呢？所取的東西，比人們少。

這裏的工作，有他們的特色，如果用延安的新術語，就是有「特殊的作風，」工作不是命令的强迫，却是自動而活潑的。固然有些人忿慨，延安也有一些整天吊兒郎當，什麼也不做，倒也吃一

斤二兩小米，五分錢菜一天的人，自然，僅該給好好工作的人吃的，對於這樣白吃的人，誰也莫敢奈何他。這種吊來吊去的人，固然是無法對付他們，只好希望自然淘汰他們，但是我覺得可担心的，並不是在吊來吊去的人本身身上，却在乎他們的黴菌要傳佈到人羣中去，惡勞好逸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極少看見懶胚跟勤快的人學得勤快了，却只易看見本來勤快的人跟懶胚學會了偷懶。這種自動工作的方式下，雖然有些白吃小米飯的，但是如果是能幹的人，有才能，肯負責，那麼他如果埋頭工作，就使他不願被人們認識，人們却還是會認識他的眞價值，很少會被埋沒掉的。

這裏的老百姓工作，也與外邊有不同的地方，他們工作也是非常活潑的，三、四十歲的男子，一邊哼着陝北調，一邊作着工，悠哉，悠哉，我眞的羨慕他們，但有時候，我又覺得他們的活潑，好似太過分一點，太不像樣，太不眞實，好像三，四十歲的婦人，與十四，五歲的小姑娘的活潑。在我住的山脚下，附近一個機關在那裏蓋一座泥屋，當我每天在窰洞裏感到頭昏眼花時，就出窰洞來透透空氣，看造泥屋，一個月，一個半月，看這些老百姓工人們，嘻皮哈臉，老在打憚，一個人在屋頂上糊泥，另一個人拏泥給他，當屋頂上的人伸手來接時，底下的人又把泥縮回來，這樣嘻嘻哈哈嘻鬧嘻鬧，好久好久……。常常在窰洞門口，看見些抬着病人的人，把病人放在半山裏，他們打架開玩笑，彼此投泥石，眞使我看得要發神經了！事情不當事情做，我頂恨，這固然本來是中國人的特性，外國人也早看出了中國人這個特性，所以辱國的條件都是在酒宴席上簽字的居多。把工、作當玩笑，玩笑當工作，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開玩笑，什麼時候該工作，工作與玩笑不分開，陝北的老百姓更甚一些。我特別爲陝北老百姓的原始的狡滑性格，覺得難堪。有一次，我叫老百姓洗一條綢紗被面及夾裏——是一條絲棉被套子——，拏回來的時候，兩幅只剩了一幅多點，兩邊兩頭都給他們剪掉了，變成四方，小得只好做一條桌布用。又有一次，要老百姓做一個鍋蓋，交涉了幾次

，他們總不肯照他們自己所做的法子做，「我們保險」，他們說，但他們自己為什麼沒有保險呢？偏偏做得那樣講究！我有一種感覺，覺得他們並不如我所想像的愚笨，不過他們對軍隊不好，總有一點對立的觀念，為什麼他們給自己做的東西總很講究，至少是盡他們的力認眞，而對機關裏所做的東西竟好像故意開玩笑不認眞呢？因為老百姓是這樣的脾氣，恰恰與我個人的脾氣相反，一尺是一尺，一寸是一寸，差不得毫厘，可是在這裏，我的脾氣却要倒處碰壁的，隨便什麼事情，什麼計劃，實現起來，都得打個折扣，因為老百姓不肯依照你好好地作做的。陰歷的年夜，我睡得很早，大約十點左右，聽門外有好些人聲在喊：「拉到了沒有？」我想，這個時候，會有狼罷？把電筒往自己窯洞裏照了一下，就不去管了。過了幾天，才知道，我鄰進的有兩個沒有門的窰洞裏，住着七個青年，那晚他們大家出去了，回來，被都不見，只剩了空窰洞。再看看隔壁窰洞裏住着的老百姓工人，也不見了，追出去，總算幸氣好，追到了。可是對於這幾位證據確實的洞裏君子，大概沒有什麼責罰。在有些地方，從前，聽說有軍隊欺侮老百姓，但在這裏，却給人有一個相反的印象。

今日邊區在工作上所存在的最大的缺點，就是一切辦事機構太不科學化，我這句話說得太老實，太不客氣了，——但是我想說老實話的人未見得是壞人，我還是顯露我的眞面目罷——或者有人要不高興我的話，如果我說「一切辦事機構太手工業化」恐怕倒有好些人首肯的。其實，手工業化，就是不現代化，不現代化，就是不科學化。這是一。其次，有些辦事方式，還是軍隊化，有些下級幹部只認得一個頭兒，一個人的命令。好比一個與軍隊毫無關係的機關，譬如這個機關裏的通信員罷，他只認得這個機關裏的主任或什麼長的信件是要緊的，其他的人的信件都是不關緊要的。這是二。第三，機關與機關之間連接不起來，就說一件小事情罷，我想討幾張文協會的文藝工作團帶回來的照片，八路軍政治部譚政先生給了我一封介紹信，但是接洽的結果，好似沒有一個人能負責的

給我幾張照片。因之介紹信還放在我的日記冊裏，而我不知道究竟怎樣辦法可以弄得到那幾張照片。

一般人認爲行政，事務，管理這三件事情是這裏工作的薄弱部份。這裏缺乏行政人員，就是說缺少官，這怕是一個事實，這裏所需要的官當然不是像封建時代的士大夫，也不是那些貪官汚吏，說官話，擺官架的官，却是眞正能爲國家行使權令，替人民謀利益，負責，耐勞，吃苦，克己那樣的官。說到事務與管理這部分工作的缺陷實在碰到了這個基本的缺點：太不科學化。爲什麼我說這是一個基本的缺點呢？譬如一個人要領兩斤炭，照理，這個事情他可同總務科講，或同事務科講。或同管理科（可議的人太多了，反而沒有一個人負專責）講，結果他統統都講過了，兩斤炭總是不來，總沒有地方可去領，最後，他大胆的去信請求部長。這兩斤炭也要鬧到部長的辦公桌上，那麼這些總務科事務科可是做什麼的呢？事務與管理上的弱點，聽說是有原因的，因爲這些工作部門，很有些犯過錯誤，或在道德上有些變態的人，爲什麼放這些人在那種工作裏？是不是認爲事務工作是不重要的？還是缺乏人才？在我看，在今日邊區事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不說別的，還可以影響到統一戰線。我可以說，好些機關裏的收發都是不大負責的，信件的遲到與失落是常事。他們這些收發與通信員，有的從七，八歲起就跟着軍隊到處行軍，沒有家庭，沒有親戚，沒有朋友，從來不收着一封信，也從來不寄發一封信，對於書信的尊嚴與寶貴，他們是不會理解的。那麼還得原諒。

有人一定很好奇，這裏有沒有貪污？這個，我不知道，不能肯定地回答。但照人情上講，特別是愛錢如中國人，——我自己做了中國人，却不能不很悲哀的認承外人對中國人的這個意見。既然這裏也是中國人組成的一切團體，社會，那麼貪污，也許可能有的罷？貪污要在人類社會絕迹，不知還須幾世紀。中國的老話：「錢不過手」，還有一句，「紅蘿蔔上了蠟燭賬」，前者形容貪污，後者形容糊塗賬，………這些事實，在我極小極小的時候，家庭裏我也看够了。大約極小極小的時

候，這類事情我見得太多，貪污與糊塗賬特別令我起反感，到歐洲，我看見外國人的賬，父子之間連一分錢也算得非常清楚，如果做交易買賣，就說明有幾扣幾折，我認爲非常坦白，非常對，只能這樣，才能減少貪污。我沒有什麽處世的經驗，只好說說管家的一點感想，回國後，我理想中，要用一個不落錢（上海人叫不揩油）的女僕，我寧願出極大的工資，最高的女僕工資，我出過十二元一月，（那是在抗戰以前）可是她還是要揩油。許多許多的碰壁事情之後，我改變了觀念，覺得貪污，對於人類，只能容其相對的存在。在一定範圍之內，只好任其貪污，相對的算不貪污，過了一定範圍，那就是貪污了。僕人的揩油方式是很多的，男僕有男僕的揩法，女僕有女僕的揩法，普通我認爲揩十分之一的——一元裏一角，百元裏十元——還不能算是黑心，竟還可說是清高的呢。幾年的管家經驗，我曾把人們的貪污心理大大的研究了一番。我覺得中國的社會，有許多舊習，牠就是叫人貪污的。譬如一個僕人，或者一家公館裏的外賬房或內賬房，他即使不揩油，人們也强迫他要接受些非分的錢與物。誰都知道的，在江浙，江西一帶，譬如你買柴，柴主人必得送一筆錢給僕人，在你經常買東西的店舖，綢莊，肉店，水菓店，……僕人到節年可以去向他們取一筆錢的，——普通在百分之十以上，三十元柴，僕人可以拿到三元多——在江西，甚至於做一件衣服，僕人可以到你做衣服的裁縫店裏去拿錢。有些人迷信發票，其實店家寫發票就是聽買客的主意。小時候，我總要記起那個老實的老僕，當他來同我放晚學回家的時候，到南貨店裏買花生吃：「花生一角！」「包九分呢？八分？」（在以前是「二百六十呢，二百八十？」）「包十足！我們自己吃的！」

這裏的貪污事情怎樣成功的？我不知道，不過就是有，我想一定不多，數目也沒有其他地方的大罷，這個，自然也不一定的，譬如一個經手打窰洞的事務人員，他經手挖六十個窰洞，又譬如每個窰洞挖工二十元，他若吃五元一個，六十個，就是三百元。三百元，這個數目，在這裏也不能算小了。

把有些個別犯過錯誤的人放在事務與管理工作裏，這是因爲在上者表示君子不念舊惡，原是很好的，很人道的，知過能改，等於無過，但若如有些人他知過而並不怎樣能改，則如何辦呢？這些事務工作，需要負責做的，譬如一個馬夫，聽聽好像只不過是一個馬夫，但如果他做得不好，譬如不給馬吃飽，馬會生病，瘦下來，甚至於死亡，看看是一隻畜生，倒也値一百多塊錢呢！又譬如，有一隻馬已經指定給一個工作人員騎，而馬夫同志雖然不能同直屬的上面人發脾氣，可是他，常常用他犯過錯誤的人的脾氣發洩在旁人身上，高興給隻馬你騎騎，不高興駡你幾句：「吃大米飯，還要騎馬！」你怎敢奈何他！「好！你們再可請我上清涼山去的！」……事務工作做得不好，會弊病百出，人事上的摩擦，可以弄到無休止。我想有些個別的這類的份子，最好請他們做些可以不負多大責任，不用心腦的工作，如生產工作；生產工作，並不是一件苦工，最近在當局號召之下，人人都要參加生產工作。

有些人說中國人辦事只能用中國法子，難以科學化的，何況在這裏，農民成分居多。這話我不以爲然。如若這樣，那我們中國還要什麼革命的抗戰呢？我們永遠不能希望變成一個現代科學的農業與工業國家！我以爲什麼都是訓練問題，不過訓練是有一個開始的，這是一個不能避免的階段，而這個訓練的開始，比較困難一點。中國人是不是絕對無法訓練他們辦事科學化？我又不相信，我以爲是可能的，只要訓練。我常見許多替外商做事的經紀人，他們的辦事都會變得十分精明，能幹，公事公辦等等；我也常見外人家裏的中國廚子，他們會十分清潔，關於這方面，我自己也有一點小經驗。

要使工作做得好，固然是要依靠政治教育，可是另一方面，我想賞罰分明，也是一個附帶的必需條件。如果只有賞，不足以警戒壞人，如果只有罰，不足以獎勵好人，賞罰必須並施，因爲人

類就是這樣一種東西。看着陝北的老百姓，我總要想起「左傳」「子產論政寬猛」中這幾句：「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我的觀察是不對的，也可能那些有科學的革命理論的人，或許看法就會不同罷?!

我想，無論一個團體或一個機關，要本身工作做得好，第一當然要有正確的目標——政策也可說，接着自然要有賢明的領導人，負責人，第三就是羣衆，這是不用說的。在上（領導人）與下（羣衆）之間的中級幹部，却是工作的成敗主要關鍵，因爲中級幹部是執行者！中級幹部如果不能不折不扣的去執行上面所給於的使命，完成他們所負担的任務，那麼事情會弄糟，發生一種可憐的現象．或者中間人做了一堵隔牆，把上面人的耳目蒙蔽了，——關於這個，中國人民是很够有苦痛的經驗了——他只在上面人之前，把他好的一點盡量表現出來，或者好如上與下之間脫了節。一個團體有正確的目標與賢明的領導還不够，還需要團體裏的份子好。如果團體裏的份子平平的居多，那麼會發生一個可怕的現象；上面的人要跑，而中下的人却拖住不肯跑，要欲力，變得上面的人拉住了跑，這樣，領導者將是多少的費力呵！一個團體所需要的份子——牠的細胞——的條件，該是相當的複雜，可以分爲紀律與事業兩方面。忠實於團體的組織，不破壞，不出賣，臨難不苟免，勇於犧牲，這是好份子，可是單單依靠這樣的份子是不够的，團體不是簡單地需要一個乖乖地的孝順兒子就完了，固然在紀律上，這類份子盡了最大的貢獻；團體還需要一種有眼光，有遠識，有特長，能容人，能用人——我所說的用人，並不是如有些人說的：「這個人你可用他，那個人我可用他」，把人當做工具，樓梯或踏脚使用，却是以團體立場來謀整個利益的改善！——能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友好關係，使團體的事業擴大，優秀份子不斷的加進團體，總之，在團體的正確領導之下，敢於有所作爲的份子，這種事業的份子，是特別來得需要。

這裏對於政治的忍耐力可說是可驚的，但他們對於人事，有時好像比較容易煩燥一點。我不知道那些科學的革命理論對於那些人是怎樣說法的，可是我只記得些小時候聽過講過的故事，歷史小說，與「綱鑑」，及那些史書……我還記得「秦瓊賣馬」，「蕭何月下追韓信」，與太史公的掉筆頭，「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我想司馬遷不是徒然掉掉筆頭，或者也有些道理。

現在來說技術人員罷。在四川時，曾聽一位在延安學習的學生家長說，延安對於技術人員，歡迎是歡迎，但是很怕的，他們怕技術人員。爲什麼呢？說是技術人員吃不了苦，而且太難對付了。這個，使我覺得很好奇的。「大盜亦有道」，我又要這樣想，難道技術人員是這樣一種可怕的東西麼？在延安，也常常聽得到有人對於技術人員說這樣的話：「我們已經給他們吃大米飯，給津貼，盡力優待他們，這裏物質條件困難，那有洋房汽車給他們？」這樣的話聽去好像很對，但如仔細體味一下，或觀察一下事實，又覺得這類話是多餘的，不知道技術人員本身聽到會起什麼感想？就說有些技術人員，如果他們是有一點技能的，他們也不是沒有地位，可是他們放棄了原有或原可以找到的一切，不去找可能住得的洋房，而跑到陝北來，志願的跑得來，難道到延安來找洋房住？難道延安只有土窰子，他們不知道的？我想這樣的人，若不是有深深的民族意識與堅決的抗戰心，他們是不會遼遠地跑來的。人們還能責備他們什麼呢？除非責備他們太傻了麼？

有一位外邊來的愛說笑話的先生，他有一次說笑話：「當然，八路軍是要優待技術人員的。十年廿年的工夫，幾萬元的資本才學出來的一個技術人才，現在跑到八路軍裏來服務，固然是爲了國家，爲了自已不肯做亡國奴，可是八路軍從來沒有關心過他，對於他技術的造就也沒有化過一個大子……」這話是太滑稽了 可是如若這麼想時，也好，對於有些技術人員，可以不至於太苛求了。其實技術人員自已，他們並沒有要求優待，也沒有要求津貼，或多少的津貼，與吃大米飯，不過如若

和他們優待與吃大米飯，他們也會感謝而接受，的確，很可能有些技術人員他是過慣了舒服生活而吃慣了肉的，如果要他們吃苦，他們也願意，不過只能吃相當限度的苦。可是我也曾聽到過來外的一個技術人員帶着苦痛的情緒對我說：「我想吃小米飯一定比吃大米飯容易消化得多！」

十多年來，我交際的朋友，大都是技術人員，我並不是單單尊愛他們的技術而歡喜同他們交際，我特別是愛他們的簡單而質樸的靈魂我更其愛他們的私人道德方面，他們，不但是些好國民，還是好丈夫，，好爸爸，好朋友，好兒子。

技術人員來到這裏，他們要求什麼，不是洋房汽車，已經可以斷定，那麼來做什麼呢？他們該是要工作罷，他們要求工作的條件與環境，不差，這東物質困難，種種受錢的限制，但是一切只要大家開誠佈公，就使沒有錢辦不到，也一定能得技術人員的諒解。

有人說，外來的技術人員，如果他們不是加入組織的，於這裏少有用處，而對於這類技術人員本身也是沒有出路的，他一輩子像摸暗衖堂，他所做的事情也是勞而無功的，永遠不會被人認識的！

「為什麼呢？那又何必要統一戰線呢？」我不禁好奇了。

「那是因為如果沒有組織關係，就使上級幹部認出你的才能而用你，而下級幹部永遠不會知道你的」。

我不同意這種人的話，我想，這裏該是一個革命的集團，並不是原始結社，我們只能說，有些個別份子，在今日邊區，還不十分瞭然統一戰線，對我說上面的話的人也該是一個。

對於技術人員，我以為主要的問題是在乎要希望一般政治工作者了解科學，與技術人員的工作這個上面。如若這個問題解決了，那麼「優待技術人員」也不是一件什麼特別的事情，可是在這裏

，固然沒有技術人才，就是在最近的將來，也培植不出如何好的技術人才，所以「優待技術人員」還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在這裏，政治高於一切，許多男女青年，都歡喜學政治，特別是政治，有一次我同一位抗大的教授談到這個：去「爲什麽人人都要學政治？是不是政治工作者說出來的話，與開出來的條子，效用有些不同？大家要占政治地位，政治地位是這麽寶貴的？」我問。

「也許有一點，這也要歸罪於中國傳統的官僚主義呀！」他說。

官僚主義！官僚主義！若不是官僚主義，中國人也不至於吃這許多苦！可是這個官僚主義，到什麽時候才完結呢？

我眞奇怪，這個官僚主義的惡魔是這般利害的。有些青年，在理應當是頂革命的，他們從沒有見過官，聽過官話，但是他們自已却那樣會打官話，裝官架，這是怎麽的？恐怕是從電影與話劇裏看得來的罷？一個朋友好笑我的分析。「根本在中國人的皮肉裏就有官僚主義這個東西！」他說。

中國是沒有科學的，一個特殊的東方民族，在中國，有許多枝枝節節的問題　不大也不小的問題，文藝上有舊瓶新酒問題，醫學上還有什麽中醫與西醫問題……在任何別的國家，就沒有這類問題。現代的技術，本身就是科學，而中國沒有科學，要中國人了解科學的技術自然不很容易。

有些政治工作者，好似不十分看得起技術人員，再則自已以爲自已是政治工作人員，政治問題再沒有人能比得上他那樣認識淸楚的，在他看起來，科學的技術人員不過像一個木匠，或手工業者——

——木匠或手工業者是一個專家，而科學的技術人員好像不是一個專家，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

有一次，我聽一個政治工作者對一個技術人員說：「近來生活怎麽樣？應當多多參加政治生活喔！

「我連休息的時候也沒有，吃飯的時候也沒有！」技術人員說。

參加政治生活，怎樣參加呢？一天到晚，他工作着，人家到他耳朵邊來發議論，他可連聽的精神也沒有，無線電通訊，他得不到，報紙罷，也沒有，他也沒有工夫去向人要，也不知道該向何處要，在外邊，他還能過得到的起碼的政治生活，在這裏，他連一點時事的消息也得不到：「近來打得怎樣？」有一個技術人員常常問我：「真的，日本鬼子打到我眼前，我也不會知道的。」技術人員，他們比不得文化人，教授，需要知道這些，而做參考，可是他們是不是不需要知道呢？如果有晚會罷，難得送技術人員一張請帖——人們以爲這些人是不懂得什麼文藝戲劇的，——却是在最後面的一排，椅子前後沒高低，他看不見，又太擠，只好回去。不能參加政治生活，這是誰使他這樣的？怎樣使他工作有規定——不至於像一隻無可告訴的牛一樣——，有餘暇，有休息，並且幫助他不但使他本來的技術不退步，而且有進步。——每個長進的技術人員當然會時時希望自己的技術進步——使他的技術盡量在抗戰中發揮出來，先生！問題是在你，不要完全把他們拋在一旁！因着你，做政治工作者，不理會他們，遂使他們苦悶，不安！所以，問題是在你，做政治工作者，而不在他，技術人員。有什麼可怕呢？技術人員——就使是一把利刃，也要看怎樣使用。不會使用的人，會割破了自己的指頭，過於亂用把鋒口折斷；但若好好地使用，使用得當，不會割破自己指頭，也不會折斷鋒口，問題是在如何使用牠。

有的技術人員說，技術人員來到延安，還嫌太早，再遲十年，情形一定不同，這話也許對的，——不過延安的事情不需要年來做，有些事情推動得很快，幾個月也夠了——八路軍多年來老在行軍之中過日子，建設工作對於他們或者比較外行一點，不過聽說當時在江西，雖然在極不安定與極端苦痛之中，他們也做了不少建設工作，日常需用品及軍火，他們都開工廠自己製造。現在這裏急

需技術人員，這是一個事實，而他們優待技術人員也是一個事實。

在延安，一講起技術人員，人們的腦子裏馬上就想到醫生，因爲除了醫生，延安還極少有別種技術人員，本來有一個摩托學校，現在聽說已停辦了。

邊區的醫療工作，邊區政府並不像全國別的地方政府，設衛生處，管轄地方醫務與軍隊醫務，這裏就是有一個第十八集團軍軍醫處，他所領導之下有許多的前後方醫務所診療所及邊區醫院。邊區醫院要算是延安技術人員集中之所在。那天，我去參觀，正碰見西安招待所中認識的李女士也在參觀邊區醫院，她比我關心醫療工作，什麼都問到，什麼都記下來。

邊區醫院能容納一百病人，工作人員連醫生在內一百卅多人——紅十字會派來的醫療隊及救護隊在外——每月經費二千四百元，在這裏，這是一個極大的數目呢！病人的伙食，米在外，——米是發的一斤四兩一天——每一天菜一角。工作人員的米與病人一樣量，不過是小米，病人吃大米，菜是四分一天。問病人說他們並不天天吃大米，也吃小米，一角與四分的菜也沒有分別，病人也常是一星期才得吃一次肉，有時十天才得吃着一次呢！病人所住的窰洞是西向或西北向，工作人員所住的窰洞是南向，有極好的陽光。病人進院，並不是一定經醫生診治過後證明需要入院療治，每個機關的負責人都可以介紹病人入院，這是一個極特別的地方，所以說是醫院，不如說是一個調養的所在，因爲醫生並未能嚴格執行他的職務。進院的病人既然並不一定是有病的，出院也不是醫生所能決定的。院長是一位生長在八路軍裏的二十幾歲的青年，他是衛生學校畢業出來的，雖然這樣年輕，但有去好像已做過二、卅年的院長。聽說他不看病，那麼他是辦醫務行政的。他的津貼與八路軍軍醫處處長及邊院最高津貼的醫生一樣，每月十五元。衛生學校六個月畢業，畢業出來就是醫生。這樣的醫生也有十五元一月的津貼，而子女妻等的生活一切均由公家負担。在外邊，二，三年學出

來的看護，賺三、四十元一月，還得養家呢。邊院的女看護，身體都十分強壯，胖得簡直變成四方，不像女孩子，像一個裝足了書的籐箱，她們都是長征過來的。

衛生學校也是屬於八路軍軍醫處的，我還沒有機會去參觀，聽說裏面的學員最近已增至百多人，好像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在培植陣地醫生，學習為六個月。

有一次，敵機轟炸延安時，我恰在一個較幽僻的熟人的窰洞裏：有幾個剛從衛生學校畢業出來的年輕醫生與幾個正要往衛生學校去的抗大女生，進來躲飛機，大家就一同聊天。

「外面來的醫生，就是技術好也沒有用處，因為他們不認識政治，不懂得政治，要動搖……」一個年輕醫生說。聽他們說來，他們並不是一定要着重醫療的本身工作，第一還是政治工作。但是我個人，對於醫生，我却只苛求他們的技術，記得我回國後，生了一場大病，牙齒都壞了，有一晚，我痛得幾乎想從樓窗口跳出去，家人怎樣安慰我也不生效力，次日我找到一個牙醫，我什麼也不要知道，只求他快快把我的牙治好。

對於辦理醫院，我最佩服教會，特別是天主教會，他們的工作人員（醫生是他們用薪金及種種優待方法請去的），都是些姆姆（女修道士），我曾見一個天主教醫院，收容一百八十病人，廚房有兩個，（中與西，西式廚房做麵包，點心，與各種外國菜），管理這兩個廚房的是兩個中國籍姆姆，一個已六十外，走也走不動了。他們對於工作那樣忠實，勤快，是不是教會訓練她們成這樣的？還是出於她們自動的宗教信仰？

抗戰以前，這裏志願的醫生，只有一位唯一的傅連暲醫生。他是福建汀州人，聽說從前是自行開業的醫生。到延安不久，我曾見到他，長長的個子、瘦瘦的身材，在長征中，他吃盡千辛萬苦，有兩次幾乎落水而死。他很直爽，富於感情。同時，還是一個誠信的基督徒。這或者使人驚奇，其

徒，最初的基督教，爲反抗舊教的統治，原是極富於革命精神的。在一本小冊子裏（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法國救國時報登載的「一個基督教的醫生傅連暲氏在中國紅軍內十年來的經驗」），他說得很直爽也很詳細。他至今不是黨員，說因爲身體不好，吃不消紀律與小組會議等等。

我想，傅醫生是一個醫療技術人才，於其把時間精神用在會議席上，自然還是用在病人身上的好。在小冊子裏，他說：

「我們一如國內其他反日軍隊，迫切地需要近代的各種醫生，不管其爲外國人，中國人，男人或女人」，他再三聲說，希望各種醫學專家能到這裏來。

從前爲着人道，正如他所述的：「汀州是游擊戰爭的區域，曾在紅軍手中屢得屢失，我醫治雙方受傷者，無所偏袒。」十年來，他還是這樣，不但醫治了許多病人——軍隊或公民病人——而且還訓練出了好些醫生，與看護，八路軍今日所以還有這點醫療工作的根基，實在還是他創辦出來的。現在。不單爲人道，更爲了抗日，爲了求民族解放，傅醫生的工作更爲重大了！

正如這位世界聞名的法國科學家——中國人民之友——S angevin（中國的電訊及雜誌上，有時譯做「郎十遜」）教授，曾經公開宣示的：有些文化人，學者與科學家，他們無條件的同情某種主義與政策，因爲覺得這種主義的實現，是比較最接近人道的，而能使人類被自然與被其同類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傅醫生是這樣一位澈底的人道主義者與世界文明的真正擁護者，像這位 Langevin 教授所說的話。

在邊區，要辦一個模範醫院，當然不是一些軍醫所能做到的，全世界任何各國領導醫學科學與醫療工作的，不少軍醫。可惜，現在與從前不同，如果願化一點錢，動員些專科醫生進來，一些有氣魄，見過大局面，不貪錢也不要虛名的醫學者，而把他們集中起來，配合上得力的看護人員

與事務人員，辦一個像樣的醫院，現代的醫院，也不是不可能的罷。醫學專家們，來罷！——我不是學某先生的「三請醫生」，前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某報上刊有某先生的「醫生，醫生，三請醫生」，某先生的某先生在他的書房裏三請醫生，而不知已有多少醫生不用去請，已經拋掉了洋房跑來了，但因報國無門，或者有些情形太奇特，無可工作，只好回出來，有的退回昆明，有的跑到上海租界再去住洋房，中國的事情是非常複雜的，也難怪，老人們走這個圈子，是不會知道的——爲了國家民族，爲了抗戰，這是誰都知道，不用費辭。

談到這裏的工作與技術人員，我記起那次訪吳玉章先生，這位老先生的談話。吳老先生剛從國外歸來，耳目都是新鮮的。他談抗戰建國；「現在必須同時做建設工作，抗戰與建國是分不開的，不能現在抗戰，將來建國，將來又那有時間呢？」他又說：「史太林說的好，計劃只是一個計劃」！談到工作，他說：「一定要做到分工合作，如果一個人兼上三十個職務，結果一個也做不好」，這也正是我常常在想的。對於建設事業，吳老先生有極遠大的計劃，那天他與我談到黃河水利。「隋煬帝下江南，黃河裏能行五百人坐的龍船，幾百人背縴。那時黃河的沿邊各地，開了許多渠可以種稻，成爲極好的水田」……實在就不說那樣大的計劃罷，正如吳老先生的意思，陝北也可以從事些手工業，改良的手工業，這裏出羊毛，所以絨綫絨布，都是可以做的；還有，出產棉花可用以織布。我想如有農業工程師來開農場或畜牧場，養羊，養牛，養豬……也一定是很能成功的，陝北對於畜牧是極適宜的，畜牧事業弄起來，不但解決了軍糧的一部分，而大家，就有得吃便宜的豬肉，生病的人還有得吃小牛肝來補補呢！

吳老先生，他親眼看蘇聯如何使用技術人才，如何艱苦建設，他的見解，有獨到之處，他的話，也是最懇切的。

八 兩性與戀愛

「兩性與戀愛」，如果把人們關於這個問題的已有專集引錄起來，不知道要占好多頁數，在我國，抗戰的今日，來談「兩性與戀愛」，當然是非常不時髦的，但我不去管這個，我覺得無論在任何時候，只要有人類，「兩性與戀愛」這個平常的問題，總是一個永不乾涸的問題，在大宴會中或幾個朋友的面前，常常成爲人們最感興趣最歡喜說着的一個中心資料。就是在邊區，有時人們對於這個問題，也並不漠然。

十二、三年前，我在「新女性」上發表了一篇「現代中國女子的苦悶」，接着，宣昭姊來了一篇同意我所說的文字，我們受到多少男先生們的嚴厲的回答，果然也有很少的男子同情我與宣昭的。離國多年，主觀與客觀的情形都有了點改變。就說宣昭姊罷，已於美滿的結婚變成了三個孩子的母親，從一個職業的纏絲女工程師，因着兒女養育的担負，幾乎變成了一個家庭婦女；在另一方面，這十多年來，中國的社會有時進步，有時打圈子，中國婦女在這圈子裏面跟着打轉，好似有一些改進，但是微乎其微。所以在今日，我還要說「現代中國女子的苦悶」，我想宣昭姊也還仍舊同意我的話。並且還要加一句，也許在民主的邊區，有個別的女子，也還未能完全脫却苦悶。

若說中國社會損害人的東西太多，那麼中國社會損害女子的東西更多。我們這一代的女子，是無法找得澈底幸福的，或者「前人種樹，後人乘蔭」，我們的努力只能使我們目前的痛苦減輕，將來我們的女兒或孫女，她們比較我們有運氣接近澈底的幸福。

我們，中國女子的斗爭，是兩方面并進的：在民族，社會的利益方面，我們女子的利益就是勞動者的利益，要勞動者得着解放，我們女子也方能得着解放。在目前，這方面，我們所要做的，當

然是積極參加抗戰中的前後方各種工作，以求民族解放，國家獨立，民權建立，民生改善；在兩性方面，我們要同這些謀民族解放的共同友人，但却是統治慣了的，背上負着重重歷史的，封建的歧視女子的惡習慣，這樣的男子斗爭。這個雙方并進的鬥爭是同樣的堅苦。無論怎樣新的中國男子，他總脫不了舊的根性。我常常要這樣說、有些男先生們要以說笑話的口吻反對我這句話。在歐洲，我聽好幾對中國夫婦說中國社會是很不容易有幸福夫婦的。我也相信中國社會，損害幸福夫婦的東西太多了，政治與經濟，當然是最大的原因，在華洋雜處的大都市裏，特別是經濟。封建社會下所遺留的種種重男輕女的惡習，對於男女平權問題，在東方的中國、也是特殊的，譬如承繼權罷，在歐洲，遠在帝制時代，有些國家女子已有承繼權。我并不說中國社會絕對沒有幸福的夫婦，有是有的，我想總不會多。夫婦愛情的關係，在乎能够維持經常的關係，像一個人工作一樣，是要依靠經常性，才能有成績，如果三天好，兩天不好，當然不能算是幸福的。

京、滬、杭一帶的朋友常常說在這一帶的夫婦是極難以維持愛情的（這一帶是資本主義半殖民地，封建宗法社會一切罪惡集中的地方）。「爲什麼呢？」我問。「通貨膨脹，」一位朋友滑稽的說：「譬如一個賺一百元一月的男子，有配一百元一月的女子向他追求，賺二百元一月的，有配二百元一月的女子向他追求，如果賺四五百元以上的男子，那他要多少女子呢，憑他選擇。只有苦力們是找不到女子的。但是賺二，三百元一月以上的男子，在全中國的男子總數中，終究只占到極小極小部分，許多女子却都向這樣的人集中目標，多妻，開小公館，被拋棄，不斷地發生「但見新人笑，不見舊人哭」的事情。在這種情形下，每一個稍有地位的中國男子，他們還要自負地以爲他們是這樣容易獵取愛情的，却不知道那些根本不是愛情，是餓了金的，或者是一種求生本能所促成的。真實的愛情不容易存在，也會被這些情形所蹂躪。有些男先生們會對我說：「開條子叫來的並不算

稀奇，一個電話到××大學，可以請到會跳舞，英文說得頂好頂摩登的女學生」，於是他們把一個一個的學校說出來，總之以人名。「五十元一夜，」他們下結論。「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女學生，她是蘇州一個女學校裏的，星期六下半天，她到上海來，星期一上午回去，那一次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同她談起來，她是我一個朋友的女兒，我知道她父親是有錢的，而且對於子女錢也很寬的，爲什麼要這樣呢？她說上海好玩，同時弄幾個錢來做做零用……」我，既然是一個女子，無法去證實這些事實，但聽着男子們這樣談着我們女子，即使只能代表一小部分，我心頭還是很難過。

我覺得就使有少數女子這樣墮落，實在也還不是女子自身的過錯，如果有些男子不玩弄女子，這種事情是無需要存在的，正如鴉片是賣給抽鴉片的人吸的，雖然有時也相因爲果。

有些男先生們也愛笑中國女子愛金錢，崇拜權威，但我覺得就使有點這樣，也不是女子自身的罪過。在另一方面，我們日常所接觸到的女子，有幾個不爲了她丈夫欺壓她而苦痛的。就是在思想前進的男子，對於女子，也常常還是思想是思想，實際是實際，不能不說是中國的特殊情形。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她們在妻權與母權方面已獲得了一點，雖然與完滿還有距離，這種距離，是根本與爭取麵包，工作與和平有關的，無法獨立解決。可是這方面，我們中國女子，還未脫離封建地位的女子，已經可以羨慕她們了。在幸福的消極一方面講，做一個歐洲女子，男子可以使她痛苦，她也可以使男子痛苦，他在外面結識情人，開小公館，她也一樣的找情人，在外邊租房子，與情人約會。人家並不因爲她這樣，辭去她的職業，感情事件純粹是私人事件，男女雙方都是一樣，與職業及政治……無關，只要不犯法。但是在中國呢，只有男子給女子負担苦痛，而女子是不能給男子負担痛苦的，他們就是在感情方面，也是統治者。只許男子放火，不許女子點燈。男子可以開小公館，女子卻還須忠實於這樣的丈夫，爲他哭泣，爲他徒然消耗她的青春，假使有一個女子公然報

復不忠實的丈夫，那她要怎樣地受到人們的諷賤呢！

在中國做女子，是非常苦惱的，特別是有些跑出過國門的女子，更會這樣感到。我可以這樣說，在祖國，我從來沒有，的確從來沒有被看待做一個人，我總被看做次於男子，小於男子，輕於男子這樣的一種動物：我不是女子，更從來不是一個公民就不要去說那些大話，什麼經濟、政治、法律、職業上的女子平等的權利，一點也不要去夢牠，日常，我們所受的，常常是一些諷嘲與卑視。

還記得我第一次去歐的時候，起初，在巴黎，我的生活可說是不幸的，語言不通，生活不慣，而我又不交際同胞同學——只有這兩位對我像慈母一樣的女友X與X夫人，我至今還時時記得她們的友誼——有些人罵我傲慢。可是，我總不能忘記，那些和氣的外國朋友，他們無邪地給我消遣，什麼地方有一個好而便宜的飯館，什麼路上有一個私立戲院正在演國家劇院演過的什麼戲……他們告我。這些對人應有的公民間的關切，友愛，坦白，無邪，毫無目的與存心，只有在歐洲，我嘗到一點。

我至今還想到在華沙換車時，遇到的一個青年同伴。波蘭車站上的行李脚夫不很多，又是旅客擁擠，所有的脚夫，一下子均給人搶去了。行李簡便的人就自己提了換車。我帶着兩隻大皮箱塞滿了衣服與書籍，用盡我平生之力，也只能提得動一隻。一個青年來幫助我提箱子，並問我：「你換車的吧？」「是的。」「到羅馬？日內瓦？」「不，我到巴黎。」他兩手一手提一隻，跟了我走，幫助我換車，找到坐位。在柏林車站換車以後，他同我偶然碰在一個車箱裏了。他告訴我他是挪威人，去華沙看他的姑母，是在比國沙祿華（Charleroi）勞動大學學工程。他有一種北歐人的美麗，深沉的眼睛，長長的個子。他開始讚美中國的綢料與皮貨——那時我穿着一件深藍色綢面皮裏大衣——領口上翻出銀鼠——又談他學校裏有兩個中國同學，都聰明而肯用功。他不像有些外國朋友，一

些小販化了的，見了中國人只知道談中國女人的小脚，辮子，爛蛋皮（蛋）與荷花——從前我是非常歡喜荷花的，聽多了牠與小脚齊名，竟使我討厭這種花了——。我對他的話有着好感。我說我非常歡喜挪威，易卜生的故鄉。「我只想在那裏過一個冬，什麼事情也不做，整天溜冰，給我溜個爽快！」我說，「那你要多少冰呢！恐怕你要看厭。」那一年，——一九二八——歐洲奇冷，老年人說五六十年來未有過，國際列車上的自來水都凍斷了，西伯利亞是更不用說，從華沙到巴黎，我們每早洗面只能在雙層玻璃窗裏面一層所結着的熱汽成功的薄霜，拿下來，放在手心裏呵一口氣，這樣洗面洗手。「你從西伯利亞來，還沒有看厭冰麼？」他說，笑着聳了聳肩。

到沙綠華，他下去了，同我討了一個通信地址。彼此道「再見」。

他沒有寫信給我。到復活節，一天中午回寓，房東說有人來找過我，留下一張片子（他是先找到我友人那裏得知我的住處），待我打電話給他，他已走了。就是華沙換車認識的那個挪威青年，後來沒有再見，也沒有通信。

如不是一個祖國的青年，恐怕我會滿受麻煩，收到好許多信……。像這樣的事情，在歐洲旅行，可以遇到很多很多，但很少很少會引起麻煩與糾纏。

回國後，我第一次去西湖玩，是在大病剛好，恰恰是杭州燒香節快完的時候，西湖邊上比從前更討厭了，在湖濱公園坐一下，就有一些男子坐到你旁邊來開玩笑，搭話。坐了划子開出去，他們也叫了划子跟上來，儘對我們說鬼話，眞令人不勝其煩。那時我同着一個女朋友與一個男朋友。有男子陪着玩，那該算是有「保鏢」的。有三個穿着××學校制服的青年一直跟着我們，在岳墳，我們停留下來。「我們在這裏等你們！」我們的男朋友不愛訪古跡，更不愛跑路，所以就在划子上不下來，這三個青年看見只有我們兩個女子，就儘量開玩笑，說輕薄話。

霞陽，他們固然已先在那裏了，在寺門外的亭子裏，「呀！你們來了！」他們對我們喊，嘻皮哈臉的。一個很不好的念頭穿過我的腦子，於是我竟忍不住大笑起來，「怎樣的下作！」我對女伴說，我們儘量笑，不知怎麼，他們忽然溜走了，或者疑心我們有什麼鬼計。法律上並沒有禁止女子出外旅行 但這樣的麻煩，對於我，不能認爲是痛快的事情。

中國人的社會關係就是說公民與公民間的正常交際，在封建社會是沒有的，隨着幾次革命而轉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還是極冷酷的。人與人的往來，以冷爲標準，彼此對着像仇人似的，就是情人間的情書也寫得愈冷愈算好。一封普通辦公的信一定要寫得像訓辭似的，特別是一個女子對於男子，如果她像歐洲的脾氣，寫得婉轉曲折一點，用一些「感謝」，「對不起」……的字眼，就使接信的人不覺得特別，旁邊的人要奇怪起來，而追究他們間的關係。所以，特別是女子對於男子，冷酷是必要的。還記得有一次，一個夏天，從蘇州回無錫，在女友家裏吃暢了各種甜點後，她又要我帶一盒馬拉糕回無錫，說是無錫買不到這個東西。上得車去，京滬人所叫爲飛快車的車廂中，總是異常擁擠，毫無空隙。一隻手拿着皮夾，一隻手拿着這盒碰不起的馬拉糕，人們的眼睛，集中在這盒東西上，「貪嘴的女人」！好似他們在說。車子開得快，顛動得非常利害，我擠在立着的人叢中，四周沒有依靠，這盒東西與我人一樣的搖來搖去，而又不願把這盒東西拋掉，眞是很可笑而又是很狼狽的。在我旁邊坐位上的一位男先生對我說；「這盒東西放在桌子上罷」，他把他們茶桌上的茶杯放過一邊，我沒有話說，把盒子交他，他接去了。接着，他繼續與對面兩人的商議之後，又讓了我坐。他們三個人緊緊擠在一起，帶着杭嘉一帶的口音說着話。又是常常輕聲的談着別種語言，很快也似很流利，我只聽得懂 Do與Zo這兩個德語聲音。那個讓坐的人他穿着一件春季的灰黑色夾大衣，在中國是沒有這種春季大衣的。從他們的神氣看去，他們好似剛剛回祖國，在他們的行李

皮箱上，貼有Genoye——Paris——Berlin的行李票。為了怕他們和我搭話，我的頭儘朝上，眼睛望着車廂頂。到無錫了，人如潮湧一樣的擠下車去，「你先下去罷，我們把這盒東西從窗口交給你，」其中一個說。我下車，在他們的車窗口，接着馬拉糕，只說了一聲無禮貌而無理性的「謝謝你」，就掉頭走了，連一個再見也不會說。其實，這三個男子並不使我討厭，或許他們與我間也可以有一點公民友誼，如果不是在中國，我也不會怕同他們搭話我早會告訴他們我住在什麼地方，或許會對他們讚美一番太湖風景的離奇，三泉街肉骨頭的美味：「下車來玩一天太湖罷，」或許會這樣邀他們，但是在中國社會，男女間沒有公民的交際，做女子的祇能這樣冷漠，就使有些男子很懂得男女公民友誼的。在中國社會，有些女友對我說，根本不交際男朋友，她們能夠往來的，除非是年紀很大，可以做得上她們的父親，或者年紀很輕，可以做得上她們的孩子或者是一對一對的夫婦，這樣，可以免掉許多麻煩與旁人的閒話。在中國，做一個女子，必定要十分謹慎不卑不亢——卑還可以亢則絕對不能——，小心翼翼，就是這樣，也還仍舊免不了受人指隲，難做到極點。男子對於女子的要求是很複雜的，不像女子對於男子的單純。「依索寓言」裏，對於理想的女子，有這樣的話；「在街上像一個聖母，在家裏像一個母親，在某些場所又要她像一個妓女」。我想這的確可算是名言，在街上因為接觸到人羣，有社會性的，這時男子要求他所愛的女子，能為別人尊敬，在家裏，男子要求他所愛的女子，能服侍他，照顧他的飲食起居，像母親一樣，——有時我常常聽到人們說：這個男子太髒，太糟糕，需要一個女子照應他、但從來不聽到說這個女子怎樣，需要一個男子照應——可是在別的場所，男子對於他所愛的女子又她要求親密一點，熱情一點，浪漫一點；又要她能夠卑屈於家庭生活，會做蛋糕，也會補襪子，又會生孩子，但也不要生得太多，能文能武，能歌能舞，當然，還有女子的相貌，始終是現代，將來，任何地方，終究還成為男子選擇伴侶的主要

條件。「格蘭亞柏蛻（註一）的鼻子如果再短一點，會把整個世界的面目改觀了」。女子的相貌始終在人類生活中玩着極重要的地位，幫助現代科學戰爭最凶的武器，也就是利用着女人的相貌來做間諜工作。日本鬼子像德國人一樣，特別歡喜利用美麗的女子來做間諜。不過愛美是人之常情，究竟有幾個人願意免免强强去娶一個「無鹽」呢！除了這些以外，男子所要求於女子的，就是在某些場所要她像一個妓女，也是說要她浪漫一點，但是叉不能太浪漫。如果太不浪漫，她也許會遭殺身之禍，如果太浪漫了，也要遭殺身之禍，亨利八世（註2）的六位皇后夫人，有兩位是殺了頭。第一位，因爲她太莊嚴，太純潔，太嚴肅；第五位，因爲她太浪漫，結識情人。一個女子的幸福，要基於着許多條件，就是一個女子的事業，有時也往往還是基於「性」的，要看她如何應付男子而定，有時，她會被人投石頭，有時她會被人讚揚，與她有的眞正才能沒有多大關係。有什麼辦法呢？聰明的女子，她一邊沉默地承認男性的統治，一邊，在壁角裏諷笑他們，說這個恐怕還是最好的辦法。

女子是不幸的，就使在法律，經濟，教育……種種方面都平等了，在兩性方面，女子如果沒有求婚權，女子還是不幸的，很不幸的。在愛情方面，女子總是成爲被動者，她僅能接受男子的好意，她只好等待着，等待着男子先伸出手來。在維多利亞（Uietoria，英國女王，一八一九生，一九〇一死，一八三七登位）的私人日記裏，人家發現她怎樣用了眼淚，記述她逼得向她的表兄（德國貴族）求婚，爲了皇族，欸廷，與人民的意願，固然他也是她自己所愛的，但她認爲慣例不是這樣，一個賣牛奶的，也等待男子來求愛，可是她呢，向一個男子求婚，求婚本身這件事她已認爲是一個恥辱，而另一方面，她又怕這個男子拒絕了她。她這樣記着：「我對他說了各方面對我的願望後……他說他也很歡喜一生永遠陪着我在一起……我是那樣的感激，流下了眼淚。」

人們常常歡喜談論怎樣可以幸福，也有人常常談論怎樣維持愛情。在極小極小的時候，聽母親

講許多故事，張敞畫眉，舉案齊眉……特別使我那時候感動的是講一個什麼人，他「赴京入試」，在京師一住十年，待得他「衣錦榮歸」，他的夫人已雙目失明了，他待她還是非常好，像從前窮苦時候一樣，且常常總是扶着她走——當然他是有空工夫的，那樣的事，在封建社會的買賣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多妻制下的太太們會羡慕的，所以母親是這樣歡喜講這些故事——，在我聽去，却也覺得不壞，這個男子倒是重信義，而能同甘苦的。但我同時也聽她講許多男子負情的故事，唐．安什麼公主（後來我在逸史上也看到）的情人，拋棄了她，在長期的秘密約會之後，他同另外一個女子結婚了，她病得很重，只想在死前能再見他一次，一位俠士知道了這個公主的秘密，有一夜，乘這個薄情郎闌酒人散的時候，把他刼到公主跟前，她一見這個負情的男子，竟「一慟而絕」；至於這個通俗的故事．趙五娘剪髮賣髮，是誰都知道的。到年紀大起來，現實生活裏所給我見到的，似乎比那些悲劇更悲慘：丈夫對妻子怎樣不好，妻子吞生鴉片死了，丈夫對妻子不好，妻子投了河。小時候，家裏後門外河池的對面，住着一家農人夫婦，丈夫常常打罵妻子，她常常高聲呼救命．我們在院子裏可以清楚聽得到。終究，有一天，牠是上吊死了的。「幸福都是相像的，而各個不幸却有牠各個不同的面目」（Tolstoi"Anna Korenine），我的確相信這句話。

有人說，幸福是有條件的，系於社會環境的，有經濟，法律……等等，這是很對的。可是這些客觀條件具備之後，是不是就能幸福了，還不是一定的。這話或許有人要笑我太唯心，可是事實是這樣。當加德林二世女皇（Catherinell）與彼德三世結婚的時候，這個患神經病而荒淫過度的皇子，把她完全拋在一邊。她的婆，是這件婚姻的主使者，而且是一位賢明的攝政女王，深夜，當清理了國家大事之後，去看她的媳婦，她一個人坐着在哭泣。「怎麼？混蛋到現在還不回來？我去命令他到你這裏來！」「不要！不要命令他！」她哭着回答。「怎麼？你哭？你愛他？那我可沒有辦

法幫助你，你只好自己想法罷！」的確，愛情與權威金錢可以毫無關係。當我寓居在法國中央高原的一個城市裏時，幾乎每個冬夜，聽到一個酒鬼喝飽了酒，在一條街上來回的僻喊：「你不愛我，我還是愛你，諸糾！這就是愛情！」眞的，這就是愛情，愛情是常常會這樣的。

我覺得世上有些人與幸福很少有緣，這是人類悲劇。溫特莎公爵與辛泊生夫人的戀愛事件，曾占了一九三六年全世界報紙的相當篇幅。有些人很奇怪爲什麼溫特莎公爵甯願不做英王，爲了要同一個平平常常的婦人結婚，而且她曾離婚兩次，一個中年的婦人，既然有許多貴族小姐，他的表姊表妹，在等待着做王后。其實很簡單，人類的心理，永遠被暴君與奴性這兩重矛盾支配着（魯迅允生常描寫這兩重心理）。這位權貴的王子，從小起就受慣了異性的不得不然的尊敬與殷勤，這是可以想像的。在宴會的時候，只有女子給他燃烟，他從沒有機會與可能給女子燃烟，沒有一個女子以一個平常的男子樣，一個人樣對待他，可是辛泊生夫人，她，敢於把他當一個人，一個男子樣對待，而這個，正是他所需要的（當時歐州漫畫上曾有一張諷笑畫：溫特莎公爵跪着給辛泊生夫人穿鞋，其實，因爲他是溫特莎公爵（曾是英王），就不能給女子穿鞋？）。

無論男子或女子，權位與金錢，名譽，對於女子，還有相貌，都可以造成私人兩性生活的不幸，特別是權威與金錢。有了權威的人，常常會給庸庸碌碌的人看待做偶像，於是連行動也不自由了，他或她所理想的對象，會遭受到對方的不敢與不願（我曾經看到一件啞的永遠沒有說明的愛情，男女雙方實在彼此很相敬相愛，但彼此又猜測又担心出身與學問的背後會有怎樣可怖的東西，可說他們的身份與學問害了他們，他們不能忘記自已的地位，這是悲劇。而敢與願的，或者却又不是頂理想的人物，或者甚至於是很糟糕的人物。我還記得前幾年，在歐洲一個雜誌上讀到一篇紐約的一個百貨廉价公司（如一元公司，二元公司）的始創人的孫女，對一個記者的自述，她曾被多少貪她

財產的男子追求，結婚以後，錢到了手，或錢拿不到手，而拋棄了她。一個平平常常的男子或女子，穿的布衣，吃的青菜，倒有選擇與被選擇的權利。

我也常常聽人講到三角戀愛，似乎中國特別多，可是仔細聽聽，又並不是真心的像那些動人的悲劇，往往還是金錢與地位在作怪，是很庸俗的。可是我得認承中國女子有一個弱點，却是在現時代也還不能改正，那是歷史的遺蹟這樣害了我們的，我們中國女子因爲從來不容許自已選擇丈夫，而不知道怎麼選擇丈夫，她沒有單獨的判斷力，往往她們會去選擇一些已有妻子的男人，因爲只有在一個異性旁邊的男子，使她能較清楚的看得出這個男子的長處來，我們常常聽見妻的女友愛了妻的丈夫，阿姨愛了姐夫這一類事實，好像轉來轉去，只在一個圓圈子裏轉，果然中國社會不容許男女交際或男女間沒有正常交際機會，亦一原因。找尋自已的幸福，開闢自已的天地，愛沒有人愛的人，這並不是講戀愛道德，其實呢，戀愛也有道德。「愛情是不加害於人的」，愛倫凱這句話使我至今同意，更深一層說，如像愛倫凱所說愛情不當加害於對方，也不該損害第三者。可是在我們國家爲愛情而損害對方與第三者的非常多，「不出惡聲」這種偉大的精神，總很少見到。在言論上——如果會寫寫東西的——，在口頭上，儘量的毀壞對方，「惡之欲其死」，正是這樣：或者，不管「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反正「彼可取而代之」。男女雙方都如此。我有時聽一些青年說：「「某某人他們夫婦真幸福，他的夫人如果做了我的妻，我同她也一定很幸福」，我說：「這個也並不然，某某人與他的夫人恰恰因爲夫婦生活的各方面能够很和諧，所以是幸福的，如果嫁了你，可能一天吵到晚。」一個脾氣急的人與一個脾氣緩的人倒很合得來，一個極富感情的人與一個很理知的人也許很相投，但不一定是如此，有些人對於兩性生活似乎看得非常公式。

有些青年男女常常在閒談中說到他們厭惡離婚，——特別是女子——以及怎樣增進愛情，我說：

能够維持愛情，已經很好了，大家以爲這話太煞風景。其實，愛情是這樣：取得勝利是容易的，鞏固與擴大却不是容易的。在年輕的時候，會夢想一些天眞無邪，雷電火燃一樣的愛情，可是實際生活却是如此平凡，喬治桑（George Sand）的情人們責備她非常自私，並不像她自己作品裏所寫的熱情，她不能把她整個獻給她的情人，生活是這樣規律：早上起來，早點後出去散步，回來，寫作，直到午飯；午飯後，散步，回來，玩一下鋼琴，又寫作⋯⋯梅特林克（Maerctlmck）的情人，發現梅也與平常人一樣的愛玩脚踏車，⋯⋯她就覺得討厭了。愛情應該是經受得起平凡生活與平凡工作的磨折，但却又是日日新又日新的。在年輕的時候，也許爲青春，爲健康，爲男敢，爲相貌——多少怕有一點——而相愛着，到了中年，青春第一就不存在了，爲學問，爲信義，爲責任，爲他與她有這許多可取，而維持着愛情，到老年，爲事業，爲相互日常熟悉的生活，⋯⋯他們還是相愛着。如果年歲與環境的變換，使彼此的需要及贈與——偉大的愛情是贈與的，如像太戈爾所歌頌，至少「幸福是給與別人的」，這一句歐洲的通俗話是對的——能够和諧而不脫節，這樣的夫婦，該可以齊肩偕老罷。

在邊區，婦女的地位比中國任何地方提高了些，革命的理論是要使男女平等的，也正是在實際上人們所努力想做到的。在客觀方面，法律上，教育上，經濟上⋯⋯女子是受到平等待遇的。在一個朋友那裏，我曾看到一份陝甘甯邊區婚姻條例草案（在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中想已通過），一共二十二條，可說是很民主的婚姻法，對於女子，可說是够人道的。只不過對於離婚，沒有一點鼓勵的限制，——我是絕對贊成離婚的，不過從優生方面的立場，又覺得可以鼓勵離婚的減少，例如每次離婚，要隔多少時間才能結婚，不過法律是給聰明人用的——當時我曾問到朋友關於離婚的實施態度，朋友說對於離婚，法院當然先問雙方意見，然後第一調解，調解不成則准離。抗大與陝公及別的

學校的女生與男生受同等的教育，她們出來以後，在前後方與男子同樣的工作：至於經濟地位，在邊區是不成爲問題的，政府機關的男女工作人員拿的每月津貼是一樣的。邊區的政策，對於婦女解放運動，他們是維護的，栽培的，——在「紀念三八與開展婦運特輯」這一期「解放」上，可以看到他們對於婦運的決定指示。在三八婦女節的大會上，邊區好幾位負責人，曾再三致力的說：「如果這次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沒有半數的婦女來參加，我們是不易取得勝利的，」又再三引用列甯，斯大林的名言：「如果不扶植婦女運動，那是罪惡的。」那天晚會上，康生老先生，像一個爸爸似的，說了一席天眞活潑，充滿了對婦女的友誼的熱情話。事實上，邊區爲了實現他們的政策，開展婦運，扶植婦運，正在辦各種婦運工作的婦訓班，當我這則稿子已經寫好時，在四月九日，聽到了王明先生對於延安女子大學創設的一個報告，說女子大學創設的原因當然也是爲了適應抗戰需要，同時，鑒於全國原有的女子大學，如東吳女子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均因戰事而併合他校了，全國的女大學生都感到失掉了學習的機會而苦痛。王明先生又宣佈這個女大的課程，在革命理論以外，還着重於實施職業教育，培養職業人才，給女子有一個職業的可能，這是特別使我同意，讚成的。可惜這個女大，到現在才有創設的計劃（聽說五月中成立），如果在去年今日，當廣州與武漢還未失陷的時候，交通方便，那我相信，兩粵江浙的先進知識婦女一定有很多會跑到延安來。於其在上海租界裏化了很多的錢去進那些僅有的教會女子大學（爲應中國抗戰中婦女求知的需要，上海護旦男大，特地創設了一個護旦女子大學，聽說是去秋辦的）。邊區的注意培養婦女幹部，是有了行動。所以，在邊區，一切都似不成問題了，剩下的問題，就是要看婦女自己爭氣不爭氣，是不是還仍舊要把婚姻當做畢生事業的活動中心，以及附帶的小麻煩，小枝節，因爲這不是一個政策與一個命令所能完成的，在兩性與戀愛方面，需要與歷史的，封建的惡習相搏斗。譬如說，邊區的老百姓婦

女，她們已脫出了買賣婚姻的慘運——就使還有，也只能偷偷摸摸做——可是丈夫的虐待拋棄，雖然也有法律的限制，但有時一定有聲訴不出的苦痛及法律所及不到的地方。

在邊區，對於男女平等，的確是做到了，在任何方面都平等了，抗大的女生與男生一樣的能開荒，挑水，在從前，聽說紅軍中，四方面軍裏還有一個婦女獨立團，與男子一樣作戰。我們這些外來的，曾經穿過小姐，太太的「嫌疑的皮大衣」，所謂曾過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的女子，確實，直爽地說，有點不大習慣於這樣絕對的平等，特別如我個人，體力不强，而女性的自尊心倒有一點，因之有些事情自己力量做不到，需要男性的幫助，可是又深深感到「求人不如求已」，於其求男性，還不如求自己，這種心理有時也是一個精神上的壓迫。有一天，一個勤務同志趕了一隻驢子，拖着兩木桶水來，我因爲沒有力氣幫他抬下，他只得去請求旁邊窰洞前許多正在理東西搬家的男同志。「我這幾天背酸抬不起！」一位男同志有意義地笑着回答。「爲什麼不叫她抬？抗大的女生都在那裏挑水，她吃了飯做什麼的？」勤務對他們表示懇求，說「哦哦」，好似要他們不要再這樣說。他們嘻嘻笑，其中有一位唱起：「好男不當兵，好女……」大約我的面孔上表示出了一點不好意思或別的，自己見不到，所以也不知道是什麼，當我望着他們，他們就不唱了，哈哈地大笑起來及至我走進窰洞，他們又唱起來了。無論在任何場所，男子對於女子這樣的平等，表示得非常利害。就如過渡的浮船上罷，大家擠着，男先生們盡力擠女子，推女子這是因爲大概是在民主的地方，每一個人都可以盡量暴露自己的本性，那怕是極纖微的一部分，並不需要像上海大光明電影院裏的男觀客，穿着燙得挺挺的西裝，當散場的時候，在門口，站在一邊，讓太太們先走，爲了自己的面子，不好把本性表現到漂亮的衣服外面來。事實上，如果過渡的地方，男子見了女子就立讓一邊，邊區的女子也不會接受的。當敵機第二次（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轟炸延安時，一個熟人的夫人拖着幾個

月的小孩恰恰逃在城門下，城門下塞滿了人，跑不出城去，擠得好像是汙塞了的河道。小孩被擠在地下，如果不是做母親的盡力去搶，小孩是要被踐踏了，小孩哭，男先生們咒罵她。在這個時候，管什麼老頭兒，老太婆與小孩子，在逃命之前，人人都有平等的權利。所以，男子終究是值得美慕的。如果一切都平等，可是爲什麼他們不担負生育的天職，像我們女子一樣？大約是爲了要求得這樣的平等，一般的女子，大家要在軍事與政治上爭取地位，特別是政治，「開展政治地位」，這是一句女學生中的流行話。直至現在爲止，還很少見有女子願自動參加戰時救護與保育工作的。至於生育的天職，不但男子瞧不起這件事情，就是女子自己，也誰都認爲是最倒霉的，因爲理由很充足：她妨礙學習，妨礙工作。一方面，這些事實證明了現代中國女子的進步，她們並不想一定做一個女子，而想，特別想做一個人，一點也不推諉的與男子負起同樣衛國的責任，但另一方面，反而把婦女自己最有切身利益的事情——像戰時保育——拋棄了不做，男子，瞧不起這個事情，又不近情做這個事情，女子，又不願做這個事情，那麼叫誰來做這個事情呢？當然，最好是大家沒有小孩子，這樣豈不頂乾乾淨淨？可是實際呢，又不然，有些雖然也想做國家大事的女子，有些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國家大事的女子，她們一不謹慎，生下小孩，於是就多事了！外邊的情形有時恰恰相反，外邊自全面抗戰一起，比較覺悟的知識婦女都自動的希望，參加戰時救護與保育工作，我想在邊區，也一定有許多婦女，是關心救護與保育工作的，或許是這類的專門人才並不多，或許是客觀上的工作條件還不能十分合於理想，但這個正是證明需要人力去求得實現。聽說當抗大女生隊結束時，動員一部分女生去從事救護與保育工作，許多女生有的竟哭了起來，是不是認爲這類工作是非常卑賤的？沒有出路的？本來，戰爭對於我們婦女——更是中國婦女——是特別殘酷的。一方面，國家需要我們去盡女國民的責任，而我們自己也正不肯放棄的，拿起槍桿去殺敵人，或往前線做動員工作

，一方面，又需要我們照管後代，養育後代，担負繼續種族的偉大天職。男子是不應當也無權力卑視女子的生育，如果男子不重視女子的母權，僅把女子看成感情與本能的發洩對象，或附屬物，這將是十分卑劣的！結果，只不過增加男女雙方的苦痛，這種苦痛如若一定要靠流血，切己的經驗才能教訓人，那會十分不合算的！

八路軍裏的軍事老幹部，大概團長以至團長以下的，常常是轉戰經年，，依然一身。他們作戰的英勇，政治認識的清楚與堅定，對抗日戰爭必勝的堅固信仰，至於服從命令，遵守紀律，爲區區餘事，不算稀奇了。他們是中華的模範軍人，模範國民，他們的一切都爲着民族解放而拋棄了！呀！他們是何等可愛！可敬！如果不是他們在前方天天夜夜忠勇作戰，像我這樣，就不能坐在桌子邊寫這幾個字了！我們中國婦女，對於這樣的男子，當然要表示崇敬的友愛！他們有些，是八，九歲起就參加了隊伍，因爲各種方面努力，一直升到團長，有的也曾往蘇聯學過軍事。他們有的從沒有見過資本主義社會，也更沒有接觸過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女子，不用說，更沒有戀愛過，他們也不會知道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女子會玩些什麼把戲，當他們，有一天，愛了的時候，那種的方式，將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爲帶一點原始性的悲劇。這些偉大而質樸的人們的悲劇，使我聯想到都德（A-daudet）的「我磨坊裏的信」（Letresse mon moulin）的一則短篇："Arlesienne"裏這樣類似的事實。

也許，有一天，在窯洞的轉角，他認識了她，像一聲春雷把冬蟄的動物都驚覺了，像但丁（Dante）遇到比德麗淑（Beatrice）。「怎麼？在陝北，有這樣的女性！」這樣的莊嚴，這樣的美麗！一個稀有的神秘的 Goconde 的微笑，……而且，穿着一副軍裝。「同志！」繼之一個敬禮；他們認識了！多少革命的理論好似都與愛情脫離了關係，因爲這在他生平，還是極生疏而極新鮮的事情。

「我們上城頭看月亮去罷！」星期六的晚上，大家都是自由的，女的提議說，的確，延安是太單調了，沒有咖啡館，沒有公園，也沒有森林……只有一些黃沙，無盡的黃沙。「月亮有什麼好看呢？還不如在家裏吃花生！」男的回答。」我們到延水邊去走走罷，」女的說。「又來了，你們天天在延水旁跑，還看不厭麼？」除了黃沙，只有一條時漲時落的延水、有幾段清，有幾段濁，沒有水草，也沒有一條魚，延安，對於戀人們，這是一個嚴厲而單調的環境。最後，男的說：「還是去合作社喝四兩白乾。」多年來，他已經習慣了非常規律得近乎本能的生活，吃飯，睡覺，打仗……雖然在月亮夜宿營是常有的事，但是從沒有看過月亮一眼，不知道月亮與他的生命有什麼關係。

雖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應該尊敬女子，而且，中國的男子該幫助女子，求得解放，但偏偏有些時刻，一下子，他忘記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時候他在農村裏所看到男子的搶婚，養媳婦還一類事……一個女子怎麼不接受男子的愛?!沒有半首失戀的詩，沒有一頁苦痛的日記，他忽然想起他是有鎗的，一粒子彈，穿過女子的心胸，她倒下了……及至他回復到理知的人的知覺，特別是一位革命者的知覺，已經來不及了！

在一、二年的後來，有些苦痛的戀愛事情，還引起人們談着上面這一幕悲劇。「……已經離婚了，一共，她同他結婚了七個月。當初，她不愛他，他常常來看她，在晚上，他有時無賴的睡在她牀上不肯走：「今夜我睡在這裏，不回去了……」一天，一個特務員，背着舖蓋，她跟在後面走，「怎麼？你搬家了？」「不」，「那你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問她。「爲了工作的需要我搬到……」後來，才知道她是那天結婚的。昨天我見她在街上，前面一個特務員背着舖蓋，後面，她眼睛哭得紅紅的，垂頭喪氣的走着。「你搬家了？」她沒有回答……原來，她離婚了。肚子大大的，有着五個多月的小孩。他已經厭倦了她：「媽的……滾出去！看你這個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討個

比你更洋的洋包子！」他命令特務員來把她的鋪蓋捲出去，叫她快快跟了特務員滾蛋。」在没飛機的窰洞裏，敵人飛機正投過炸彈，幾位抗大的女生與男生在談論着這件使他們，特別是使她們十分激越的新近發生的戀愛事件，而討論着女子的大肚子是不是一個罪惡，怎樣可以永遠不成爲大肚子。有的拖住牛尾當牛頭，在忿然爭論：「媽的，他竟罵她『媽的』……。」一位男同志說：「誰叫你們女子崇拜權威，一定要嫁大隊長？」……他們青春無邪的談話使我發生興趣，我忍不住挿入他們的談話：「如果個個女子不肯嫁大隊長，那麼做大隊長的，只好一生永遠娶不到妻子，不是太倒霉了麼？」大家笑了起來，於是他們從頭至尾把這悲劇的始末對我敍述了一遍。「婦聯會是做什麼的？她們也不出來管管這些事情！」她們說。

上面我已經說過，有些感情事件不是一紙命令與一些法律所能阻礙的。任何事都要經過慘痛的經驗，可惜中國女子從來不會使用鎗來對付她負情的情人，如若有些爲崇拜權威而遭受苦痛，那麼是「姜太公釣魚」，不能够怪別人了，而別人也管不到她。

有些青年男女，他們急急地要解决或太關心婚姻問題，其實，邊區像中國任何地方一樣，並非特產理想的妻子與理想的丈夫的地方，——在三八婦女節大會上李富春先生說希望現代中國女子個個成爲新時代的賢母，良妻，孝女，男子個個都成爲新時代的賢父，良夫，孝子——或許在將來，邊區會成爲男女青年找尋伴侶的最理想所在，成爲青春的樂園。當有一些青年談及戀愛的苦悶時，我有時想笑，或許他們要覺得我太殘酷，可是我以爲十八、九歲的年齡，何必急急要談婚姻呢？「時間早得很，就算抗戰十年，十年以後也還只二十七，八歲，那才正是結婚的年齡。早婚的結果，常常促成不幸的離婚，多多交際朋友，建立些正當的友誼，可是不要輕於談婚姻，「等待罷，等待到明天！」別的事情不能等待，而愛情却需要耐心等待。事實上，也只有上面幾句話，是我能够贈

給邊區以及邊區以外的青年男女朋友。

一般的說，邊區的環境，對於兩性生活是比中國任何地方來得純潔些，客觀方面，沒有妓院——這句話對於先生們怕是不大恭敬的，只好請原恕——沒有賭館，沒有舞場，也沒有茶店，而夫婦，雙雙跑到延安來，希祈對於國家，能盡力於萬一。這種例子，可說很多。在一切爲着抗戰與「相敬如賓」，「情愛如蜜」的情况下，他們的愛情經受大時代的磨折與激蕩，是更會鞏固與健康的，邊區的典型的革命的夫婦，却也不少，可惜在延安，我沒有什麼交際，知道得不多，聽說鄧穎超女士與周恩來先生是一對革命的模範夫婦，他們是在北平學生時代結合的，蔡暢女士與李富春先生聽說也是一對革命的模範夫婦，他們是在法國結婚的；他們，在人生道上經過多少磨難，對於事業，對於愛情，都沒有背棄，是如何的難得。蕭勁光先生的夫人朱仲止女士，我比較熟識一點，她與蕭先生是一對很難得的夫婦。她很直爽，也很質樸，而且一點也不外觀主義，她也不像有些女子，把革命整日掛在嘴上叫得應天響；特別使我覺得可愛的，是她的簡單的性格與闊大的胸襟。能說流利的英語，金陵女大畢業後，曾去過蘇聯。當蕭主任指揮軍隊，一路長征時，朱女士還在監獄裏，她不折不扣的坐滿了三年七個月的牢，足足有七年，他們沒有通音信（事實上通信是不可能的），在從前，他們曾相約誰先背叛了革命，誰就可以被拋棄而無怨。可是多少男子，在長征期間，因了事實的需要而重新結了婚，不管從前的夫人的存亡與別的一切，所以，特別難得的是蕭主任，不單是一個忠實的革命者，而且是一個忠實的男子。統一戰線成立時，她已從牢中放出來了，前年八月到了延安，夫婦重得團聚，這在他們倆自已，我想一定是意想不到的。剛到延安，我曾在一個宴會上見到蕭主任，他有着儒將的豐度，樸實而多禮，只覺得這是一個堂堂的可愛的中國公民，在任何時光，總是站在最前最好的一邊，他的和善態度，一點也不使你感到像一個可怕的軍人——因爲在我

敵，有些軍人眞是可怕的，使誰都覺得可以與他有友誼。在一個英文雜誌上，我看見一篇對於八路軍介紹的文字，說蕭勁光將軍是最早去蘇聯學習軍事的一位軍事專家，他現在担任着我們很重要的有關西北得失的河防司令，兼八路軍後方留守部隊的主任。「延安的天塌下來，有蕭勁光同志撐」聽說毛澤東先生有一次曾這麼說。蕭夫人有着一種天生樂觀的態度，我想也只有她，能够坐上三年七個月的牢，而到現在，這種殘酷的經過，對於她，沒有留着一點痕迹，她寬恕一切——那怕是最不公正的，忍受所有的遭遇依然無條件的無怨尤的愛好這些缺點很多的人類！他們，這一對夫婦，彼此都經受過許多非常的事情，非常而不必要的苦難，讀「離騷」，纔感覺到這「湘水多情」與偉大，的確，湘南，她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牠在歷史上，與近代的中國，產生了多少不平常的事故與人物。

延安也有好些無名女英雄，她們是眞正的新時代的賢母良妻，可惜是常常被人遺忘了的，我愛這些況在浮萍底下的婦女，他們才是值得效法與稱頌的。王學文先生的夫人劉女士，年紀快五十歲了罷，她雖然名義上沒有担任什麼獨立工作，但能否說她不工作呢？絕對不能罷。而且事實上她或許比那些担任獨立工作名義的女子還工作得多些，這樣大的年紀，並且不是天足，在搬家的時候，——在延安，什麼事都得自己做，不管你的年齡和體力，而延安的搬家是一種可怕而麻煩的事情——她必得幫丈夫搬書以及別的東西。我覺得每個男子，更是我們婦女，應當懂得尊敬這樣的女子，還有一位外來的工程師×××先生的夫人××女士，我的認識她，倒也非偶然，談起來，她曾是上海大同大學的大學部學生，我的要好的女友××女士，是她的同學，在大同學生宿舍的園子裏，她曾見我與女友好幾次在園子裏散步。那是一九二四與二五年的事情了。居然她還記得起我的名字與面貌，有一天，一個朋友帶了她的一個條子給我，接着她來訪我，我也去訪她。不熟悉她生活的人，一

定以爲她是什麼事情也不做的——她當然不會去立在大街當中大聲叫喊說她做些什麼事情——，因爲丈夫是一個技術人員，照理是比較受到優待，以爲她就是依靠丈夫，受着優待，一天到晚在窰洞裏，像一個高樓上的太太。實際上，她做些什麼事情呢？恐怕誰也猜想不出。她不能離那個窰洞一、二小時，如果找不到妥當可託的人照看，在敵機每次轟炸時，她住的地方附近常有炸彈落下，她早該領了她的小孩下鄉去，但是爲了不可能，遲遲不行，放機器的零件與汽油的屋子在半山裏，那些東西在延安不但值錢而且稀有，如沒妥當的人照管，有人會——曾有人偷出去賣掉，她呢就担負着這個照管的責任。有些人是不會理解也不知道尊敬一個女子所做的這一類工作，人們的眼睛只見一個名義，實際上，如果沒有一部份人像乂夫人樣做沒人知道的撑脚工作，桌子的面就不會這樣漂亮地擺起來的。我常常想，一個女子，她就使好像不直接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果她不妨礙丈夫，也不拉住丈夫做她的工作，那她就等於幫助丈夫做了他的工作，這種功績是不能埋沒的。妻賢，妻能安貧若素，在任何環境下，妻能總是那樣，丈夫就得以安心做他的事情，而且一定能使負責的丈夫對公家事情更負責，廉潔的丈夫更爲廉潔。

我不知道邊區人們的婚姻是如何成功的，聽有一位女同志說，通常在男女雙方有意思以後，——我想中間當然有一個介紹之類的人物在裏面——那麼就像談工作一樣的解決問題。男女雙方都把自己的長處與缺點坦白的來一個自我介紹，分析與批評，然後彼此間：「你對我的印象怎樣？」如若彼此回答說：「好的」。婚姻就成功了，那位女同志又說：「她們——指革命者們，是非常理知的」。那麼，婚姻的成就，並不建築在不斷的情書，長久的年月，仔細的選擇，與經常的交際……。事實上，這裏也沒有男女交際的場所，與機會，只不過在學校裏，男女是同學，工作機關裏，男女是同事的，但這裏接觸的機會是多麼狹小！其他，也沒有私人的宴客（誰有錢請客呢？公衆娛樂

爲，那就是晚會，可是我注意到晚會並不是一個談情話的所在，一個男女交際的所在。實際上，爲了抗戰的需要，前後方工作人員是調動得非常利害的，根本沒有時間可以談戀愛。學習的期間算是最長的安定時間，但也至多不過一年或六個月，要在一年與六個月內找尋一個終身理想的伴侶，苛求一點的人是辦不到的。所以要謀解決，只有速成，但是悲劇就來了，雖然一切大前提都是相同的，但是在親密的共同生活裏，會發現許多小節目是完全合不來的，一個要吃甜的，一個要吃酸的：：諸如此類的事情，日子一久就會刺痛神經，而有些脾氣固執的人，一點也不肯讓步，結果只好分離。我想大量的離婚是這樣造成的。如果是理知的人，把婚姻看待做極物質的事件，那麼多離幾次婚也沒有關係，如果感情受不起磨拆的，那當然還是事前審愼一點。老百姓婦女對於離婚的潮流好似受到十分刺激，有一次，去城外散步，遇到幾個小脚婦女，大家在路旁坐下來歇息，她們就同我搭話，問我是什麼地方人等等之後，她們其中一個問我：「你的老漢（丈夫）呢？你同他離婚了麼？」

雖然結婚與離婚是這樣容易——邊區將來也許會成爲中國有名的結婚與離婚的城市，像美國的聞名的「結婚城」一樣，在邊區，而且結婚與居留時間沒有關係——可是在我看一個女子要解決她的不幸的婚姻，也並不是那樣容易的。就如最近，我聽到的一件令我十分同情而感動的一件不幸的婚姻事情。

又女同志與她的丈夫一同來邊區已經七個多月，起初，她進抗大，當女生八大隊結束時，她被派在□□□工作，她的丈夫在一個學校裏學習。當他們倆在外邊的時候，她依靠丈夫過活，自己的父母早已去世，家庭貧苦，弟妹幼弱，都要待人扶養，她自己是沒有職業的，只好事事仰仗她的丈夫，爲了這個，她受盡種種閑氣與壓迫。「你們這一家，把我累死了！」「都是你害了我！」……

她常常受丈夫的咒罵。他不知道扶養幼弱，不單是革命者所該做的，也是任何人所該做的，因為這根本就是人類的事情。在到邊區來的時候，照她的意思，想把弟妹帶了來，他們現在年紀已較大了，雖是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正因為這樣，可以到邊區來學習；但知道丈夫一定反對，連提議也不敢。在她學習與工作的期間裏，她站立起來了，開始獨立地做一個人；她還很年輕——廿多歲，也很聰明，同事都稱道她做事負責，有計劃，有條理。她開始發現她並不是如她丈夫一責備諷笑她的，她也有一點工作的能力。其實，丈夫也發現出這個來了，但他却不肯承認。他繼續卑視她，說許多瞧她不起的話，以期她永遠失却自信力。在一次他去訪她的時候，她不肯與他同居，但到第二夜，他是那樣的凶狠，她又只好忍氣吞聲與他同居。「以前我確實沒有愛過你，現在我才真的愛你了！」這個比加雷尼納（Karenine）更笨拙的男人，他以為這是最動人的情話。正如托爾斯泰借啓棣（Kidy）說的；「世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原恕的」，她記起他怎樣欺侮她，咒罵她，他曾有情人，也常出去嫖，把各種毛病弄得來……待他一去，她只有號淘大哭，對同伴們譬訴：「我受够了！」他呢，幾次要求，並且已經得着學校當局的許可調她回來與他在一起學習，但她却不肯接受。「你以為你怎樣的了不起，其實，你什麽也不知道，連持久戰也不知道，還談得到什麽文學，你一點長處也沒有，文化水準麼，也太低，試問你憑什麽來工作？你這樣不肯學習，工作是無法改進的」，他接着罵她：「你這樣不長進，這樣自滿自足，別人幾次三番要求學習都不答允，你是完全因為我的情面才得着許可的。」實在，她並不是不要學習，恰恰相反，非常想學習，更不是自滿自足，很簡單的，只是她不願進他正在學習的學校，與他一同學習。總之，她不願與他在一起。在他，也並不是真的那樣關心她，要她學習，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把她弄進學校，就近可以監督，從此又可以一把拿住。一個想近，一個想遠。

這一次，他的話，狠狠的中傷了她，「連持久戰也不知道！」她跑到工作地點後面的荒山裏哭了一場，同事們倒處都找遍，爲的怕她去自殺，找到荒山裏才找着了，把她拖回來。

最近，他又並不徵得她的同意，自去往分派工作的地方請求許她調動回來與他一起學習——可見一個女子還沒有自主的權力，好像還須聽命於丈夫——怕她又不受命，自己跑去做一番政治工作。結果，逼得太緊，她只好表示了——雖然她還體諒他曾經有過一個愛國的行動而身體受到一點殘廢，對他有純潔的同情心而一直不願輕於表示——：「我們兩人脾氣不相投，而且也沒有經過戀愛階段」。丈夫氣瘋了，老羞成怒，繼續有三四天，天天早上找着她的女同事們駡她（□女同志，本來是我們的一個女友，得着她直屬機關的許可，在我窰洞裏生病）：「××同志，」他對發燒到三十九度的□女士說，「她眞不知好壞，這次竟又不肯來學習，我所以同她講，你不要這樣自大，你以有什麼長處，你一點長處也沒有，□□同志，你說是不是？□校長對我說：爲你連對你自己老婆的政治工作還做不好，將來怎能對別人做政治工作呢？（但我想這位熟透人情的□校長恐怕不會說這句話，他一定會考察爲什麼這個人的老婆總是拒絕來學習，而有些人却在再三請求學習而不可得）你的老婆已兩次拒絕調來學習，還是不大好的」。接着，他說：「現在我還要看她半年，看她表現得怎樣，你想上次有一個女同學，生得比她好，才幹也比她好，件件比她好，表示愛我，爲了她，我沒有接受」，於是更加顧影自憐起來：「唉！這個女人，有什麼好！她要墮落，我也不要她」！」他忽然喊起我來：「陳學昭女士，你覺得是不是？實在我也不値得！」叫我去幫他做劊子手，可是病着的女友與我，始終不說一句話。如果我還在二十歲的時候，也許我會管閑事，乾脆的對他說：「你既然這樣看她不起，她又這樣不好，那麼放手罷，不要這個女人！」但是，我什麼也沒有說，只是笑了一笑。每天每天，他總是說着嚕嚕囌囌翻來覆去同樣的話，槪括起來，是這樣：他的老

婆是中國女人中最無聊無能的一個女人，她墮落了，他是不要她了，不過又覺得她不無可取之處，而且因爲了同志之愛，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他還想救她，如果她一定要墮落，她的政治還不開展，那他一定不要她了……。

這種戀愛心理，實在使我發生興趣，我想那些哲學家們，或者把這些非空談的眼前擺着的中國人的心理研究一番，一定是有益處的。有些本位主義的人生，要顯出自己好，並不把自己眞的做得好，卻只把別人抑下，於是就顯出自己的好了；對於一樣好的東西，自己想佔有牠，佔有不到（自已占有到時，又不知好好保存與使用），並不想法大公無私的保存一下，卻只想毀壞牠！有人說這是東方民族，特別是中國民族的卑劣性（魯迅先生常有這種心理描寫），我可不知道！

這位先生去後，病人感到頭昏，而我呢，也煩燥得好像拉緊的弓，「箭在弦頭，不得不發」，而又不能發，時刻對自已尋事似的，因爲已有四天早上一個字也不能寫，一個字也不能看，雖然他是在隔壁一個窰洞裏說話，可是他的話，我不願聽卻又十分想聽。到後來，早上，我把我的窰洞上了鎖（平常我把門開直放進陽光來，他不敲門就走進來），當他來時，我在門裏回答他：「××睡覺了，沒有事罷？」始終不開門，他只好走了。

實在，這個男子的意思，是顯而易見的，從前，他習慣於把她搖長弄扁，現在他看見她可以不再依賴他生活了，而且能很好的工作（我看到她給我女友的信，文字清楚，簡潔，明瞭，敍一件事有條有理）同事們都尊敬她，因爲她做事認眞負責，他那裏不要她，正因爲要她，發生恐慌而這樣的。從前，他擺足威風，——特別是已經習慣了的——現在，還是這樣，要她，卻又擺足威風。我想，如果這一對夫婦鬧到離婚，會不會正義與眞理不站在她一邊？離起婚來，會不會她要遭受人們說她墮落，政治不開展，文化水準太低，不適合丈夫的要圖的傳統？連女同志也在旁邊這麼附和着說？

當然，一對夫婦，爲了抗日，來到抗日動員工作最模範的，眞正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邊區，這種精神是值得敬重的，到了邊區，要鬧離婚，眞是一件悲慘的事情，我同情她，却也同情他。但這好比在浪費揮霍之後。冷靜下來，算一番淸賬，對於兩人都是有利的。

有些靑年——特別是男子，對於愛情的態度，我不能十分同意，有一次，一個靑年，他說他同一個女同學要好了，可是再三聲說是女的先表示愛他（中國男子對於這一點計較得很利害，好似一個男子先向女子求愛是一件恥辱的事情），過幾天，他說事情鬧翻了、現在他爲要責罰她，同另外一個女同學要好。眞使我又發怔又好笑：「你同另外一個女同學要好，能够責罰她」？「這樣使她難受，她會回轉來」，他說。「如果她看你同別人好，本來想回來的，現在也不回來了，怎麼辦？再則你同另一個好，是眞的，還是假的？倘使是假的、那你玩弄你的感情，倘使是眞的，如果她又回來了，那麼你怎麼辦？再把另一個女同學拋掉？」可是現代的中國靑年，他們對於任何事都有極大的自信力，這是很好的，對於愛情，也一樣，不過對於愛情，好似一點也不肯虛心，而且也不肯加一點忍耐。

有一件戀愛的悲劇，——其實這是充滿了想像的才子氣息，已經小說化了的平常的戀愛故事，並不是眞的悲劇，——男主角用了希臘神話一樣的敍述，講他的三角悲劇，當他講着的時候，黃黑色而油光的面孔上，露出一點紅潤，「他愛着」，我想，可是並沒有什麼動人的悲劇的意味，像「維持的煩惱」，「悲采阿士與梅麗藏特」——梅特林克劇：（Pelleas'esmelisande）——或者是古希臘的「十年歸」。我想也不用去敍述裏面嚕哩嚕囌的事實了，總之，他是有妻子，兒女的，現在他又愛了一個女子，那個女子也愛他，彼此相見恨晚，然亦無可奈何；後來，他終究又給她一個希望，如果這次她出去工作回來（她上前方去，可悲的是在，這個女子會愛這樣一個環境的男子），他

與妻離婚。可是不管這些，有一，二點使我不能理解不可思議；既然他給她希望，與妻離婚，爲什麽不在她出去之前與妻離婚，其次，他與她相愛時間，妻却正同時懷孕。我倆服這類男子的精明算盤，他把兩個女子操在自己掌中，一個回來，同一個離婚，一個不回來，也還有一個，不至於變成「駝子跌一交，兩頭不着實」。我不能不同情他的妻，這個明知丈夫另有所愛的婦人，却還要担負着生育，怎樣的苦痛！

戀愛不是人生最大的事業，就使不是在抗戰期間，男女應設法減少感情上的苦痛，免得精神消磨在這種事件裏，何況在這個時候，敵人對我們的殘踏已經够多够殘酷了，我們自己何忍再箕豆相煎，火上加油？我想該努力建立起男女間正常的公民的友誼，提高公民教育與公民道德，也就是更提高同志之愛，這點在邊區，男女正常的友愛已經比中國任何地方來得更接近「人」了，只要大家更加努力，既然有好的基礎，一定能够達到我們所理想的地步。

在外面（邊區也會聽到過），我常聽男先生們說：「近代偉大的中國大時代，竟還沒有一個加德林，一個克利斯丁（註3）（chrisitne），瑞典女王，一六二六生，一六八九死於羅馬。）或者，一個柴克金（Clara Hetkin）。資產階級的教育根底究竟不同，只要有一個男子在背後牽線，她就站得像樣」。這些話自然不能完全否認。中國婦女本身有許多缺點，這也是不能諱言的，愛出風頭，胸襟狹隘，容易自滿等等。比較長進的女子，只要男子一捧，就昏了，好像鄉下人看走馬燈，，或者，把丈夫的話雞毛當令箭，也有些女子歡喜學男性統治者，打官話，擺官架，那是永無出路的。從前一個朋友，歡喜談婦女問題的，他常常說：「女子是最投機的」，好像有一位歐洲近代作家，他說：「無論怎樣有學問的女子，她們的談話，總是結束在她們的衣服上」。我也承認，無論是理論的學說與實際的行動，對於一個女子，還不及衣服的時式容易來得使她感受。就如女子抽香

總能，其實，還並不是一件必要的事，像吃飯一樣，可是我回國來，特別使我驚異的，鄉下的大姑娘，與小脚老太婆，她們一樣還是求神拜佛，罵人罵「殺千刀」，可是有一樣不同，抽起香煙來了。就如人人認爲文化較爲落後的邊區，我也曾見過老百姓婦女，一隻小脚擱在另一隻膝頭上，嘴裏啣着一枝香烟。但是，我想，在這偉大的抗日戰爭的磨鍊中，中國婦女已經表現出多少英勇，忠誠與賢明，這是我們還可以引爲自慰的，有些小缺點是會被淘汰掉的。將來，我們會有不少游擊戰爭的母親，像趙老太太樣，也會有建國的女人才，特別是在這樣熱烈培植婦女幹部的邊區，十年，二十年後，我們當能有不少或者竟很多的用不到一個男子來牽線的柴克金。

註1：（Cleopatra）古埃及女王，她的美麗與知慧，在歷史上是有名的。在（Cesar）征服埃及的時候，被她幻惑了；接着，她又俘惑了（Antoine）法國哲學家（pascol）在他的名著「思想」（Pensees）裏有這樣的話：「格蘭岬柏說的鼻子如果再短一點，會把整個世界的面目改觀了」。

註2：Henri VIII 一五〇九至一五四七年英皇。曾娶六次。（Anne de Boleyn）與（Catherine Howard）兩后被判死刑。

註3：（Christine）瑞典女王，一六五四年讓位，她的戀愛事件是歷史上有名的。在她執政時，結束了西班牙與瑞典諸國的宗教戰爭（已繼續了一百年），法國哲學家Yoltaire曾說她厭惡與學者往回，於其治理她的只知玩耍武器的人民。她治政有名。

九　報告大會晚會與……小小的聚會

在延安，聽報告是一件極重大的事情，可是這樣，並不說這是官樣文章，大家必得聽一下，這種報告，共 可以比擬上課，有些文化水準較低的人，他們看不懂高深的理論的書，但却聽得懂人們講的話，一部分人的政治水準雖然不識多少字，但能够很高，或許是爲了聽報告。對於我，覺得聽報告特別有興趣，因爲那些報告不單是可以使我這樣好像與軍事及政治毫無關係的人，也可以知道一點抗戰的現勢；並且這些報告，根本就是極好而極專門的藝術作品。

可是我眞不幸，住在山上，雖說不是世外桃源，消息的不靈通，却幾乎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晋」，城裏經過了些什麼事情，這幾天前方打得怎樣，什麼也不知道。偶然有一、二個朋友上山來看我，對我說起：「這兩天賀龍將軍有報告！」「呀？…什麼時候？」「早已過去了，前天！」要探聽這些報告，必得到城裏去跑，向各方探聽，事實上，一個女子，公事公辦的老是那樣跑來跑去採聽報告消息，像一個包打聽似的，也不大好。我又沒有時間，在這時期裏，我只想多坐在桌子旁，多寫幾個字。

彭副司令的報告，因爲不知道日期及地點，沒有聽着，賀龍先生的報告也沒有聽着，一個朋友聽到賀將軍的報告的，曾對我稱道這位抗日英雄的口才，說他動人地說着許多瑣碎的事情，而歸結到一個軍事上的戰術戰略裏去，可是聽的人却往往並不覺得他是在談軍事。認識他的人常常說着他的豪爽。我最覺得悵憾的，是沒有聽到項英先生的「南方游擊戰爭」，雖說我並沒有特殊的家鄉觀念，但那些地方都是我曾經遊過，住過，那些爲我所熟識的河流，田隴，吃慣的東西，以及熟悉的面孔與聲音，自然是我所不能忘情的。那次，謝謝成仿吾先生，他差人送了一個信通知我，說當天

午後有項先生還得一個報告，信封上雖然寫了「郎送」，但我收到的時候，已快二時了，天下着雨，冒雨走到牛山，跌了一交，回上山，換了衣服，想再走。「有四、五里路呢！」旁邊窰洞裏一個熟人說。想想只好不去了。當晚，雨止時，有朋友來玩，說這個報告改了日期，次日早上有。次日大早，天晴，路也早乾了，我就跑往陜公。在城外不遠的地方，遇見成校長。「昨天下午沒有報告，今天也沒有，改期了，」他說。「在那一天呢？」「還不知道」。他騎着馬，急於到一個地方去開會。後來，我還寫了一封信給李富春先生，請求他的幫助。但是我終究沒有聽到這個報告。

一共，我只聽到了兩次報告，一次，就是去參觀陜公，偶然碰着那天朱總司令有報告，一次是周恩來先生的報告，也要謝謝成校長的通知，跑到陜公，已二時過，報告早已開始了，屋子裏擠滿了人，門口站的，坐的，無法走過，謝謝一位男同志的漂亮行爲，讓了我一隙之地，使我走了進去，在泥台的一角坐了下來。

周先生足足講了五、六小時，從開始到末了，他的話是同樣的沉重而清晰，也很莊嚴，好像是一塊一塊的石頭，那樣地沉重而有力的投到水中去所發出的聲音。那天講的是關於保衛大武漢問題，把敵我的形勢分析得無可復加的清楚，他再三致力的說武漢四周的動員工作還覺不够，保衛武漢的工作，並不在武漢本身，先得從武漢的四周做起。武漢不幸現在失陷在敵人手裏，可是周先生的話，在保衛任何一角國土上，都應用得着。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趕快利用這些寶貴的慘痛的經驗，改正自已的弱點。

這樣五、六小時的講話，只休息了一次，我驚佩周先生的精神是這麼好。在休息期間，成先生給我介紹，同周先生講了兩三句話，學生們來圍着他，提出許多問題。我曾聽人們帶着敬畏，講到周先生的驚人的記憶力，他的能幹，他的智慧，自然是非凡的。也有人講起他處理一切事情是如何

的有才能。有人說當紅軍改編爲八路軍時，當然，手續是十分麻煩的，一本厚厚的花名册交到周先生手裏，他拿起來，從頭至尾翻看了一遍，好像是很平常的，看完了，他把花名册閤了起來。「某某團從前有多少鎗支，什麽鎗多少，什麽鎗多少，現在册子上寫着多少，與數目不附，去問某人査看一下，有沒有棄下鎗支，某某連從前有多少鎗支……」周先生一一說，人們去査看一下，果然他的話是對的。聽說他處理事情，往往是這樣的。無論任何事情，他總是把原則推廣到一切上去。在我國，特別需要像周先生這樣的領導者們，中國的民族，以及歷史背景所造成的種種，對於領導者的要求是非常複雜，幾乎是要一些萬能的人。我很惆悵未能對周先生作一個較長的訪問。

那天報告完結，天已暗下來了，在我生平，可說從來沒有過，這樣沒有燈籠，也沒有同伴，獨個人在沒有一盞路燈，烏黑的荒凉的黃沙路上走，藉星光下，摸索着回到我的窰洞裏。在山脚下，當我望見了我所住的那一排窰洞裏透出燈光時，有無限的快樂。我理解那些行軍的隊伍，當走了許多許多的荒漠以後，看見了一個大城市，會如何的歡喜！那些航行在海上的船隻，在一天又一天的海上生活之後，又如何渴望停靠到一個碼頭呢！於是在那一瞬間，我自負的覺得深深地了解科侖布當時發現新大陸的快樂！

有些報告，雖然聽不到，但還能在「解放上讀到，如像洛甫先生的「論待人接物」，是在抗大的一個報告，我深深的爲他的寬大與深刻所感動。我想我不怕冒昧與淺薄；現代的大政治家，他們總是文明與人道的眞實擁護者。如果中國人，人人能做到洛甫先生這個報告中所說的，雖然日本鬼子這個侵略給我們的苦痛已够多了，我們還是不在乎的。不幸，全國多少老實，忠心，坦白的人戴着不必要的大帽子，多少的眼淚白白地流，與日本無關，多少的苦痛白白地磨難人的精神，好像放在磨子裏磨來磨去，也與打日本無關，天呀！中國人的幸福日子不知道還有多少遥遠！

延安的會是非常多，我想或許要算在我國是一個會最多的地方，可以與歐洲那些大都會相比並，羣衆大會，歡迎會……都在熱烈緊張之中開始，也在熱烈，緊張與感動之中結束。好幾年來我不愛參加那些羣衆大會。當我住在巴黎近郊Laplace的時候，附近的村子Arcueil，每星期有工人的各種聚會，有時跟了鄰居與房東去，有各黨各業工會代表的演說，常常鬧到開手槍，警察放自來水沖散羣衆……。在祖國，我沒有見過這樣嚴重活潑的公民聚會，一切會都在形式中開始，結束。延安的會，却有些不同，表面上，固然好似太整齊一點，但這個並不是缺點，因有熱烈與緊張。

九一八紀念大會，歡迎王（王明先生），周（周恩來先生）秦（秦博古先生）。徐（徐特立先生）四位的大會，歡迎荷蘭駐香港總領事與吳玉章先生大會，魯迅先生逝世紀念大會……雙十節聽說有一個極大的羣衆大會，晚上還有提燈，可惜天不做美，下了一整天的雨，大會與提燈都無法舉行，最使我感動而不忘記的，是擁護蔣委員長，歡迎朱總司令，與紀念蘇聯十月革命，這三個大會

武漢剛剛失路，人們的心頭，苦痛，憂慮……聽說抗大里的女生，會因武漢失守，哭泣終日，抗戰是到了危急的關頭了，誰都感覺到。

在擁護蔣委員長的大會上，第一次我看見毛澤東先生出現在大會上，並且第一出來說話，「我們只有一個領袖，一個政府……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原句已忘了，但總是這樣的意思），毛先生又繼續說：「我們堅決反對一切任何僞組織，堅決反對漢奸政府，堅決反對漢奸中途妥協投降的主張，忠誠擁護國民政府，與最高領袖抗戰到底，團結一致，打他十年，打他二十年，打出一個新中國來……」毛先生是那樣的莊嚴，他的話又是那樣有力，這就是我們抗戰到底的最精良的武器，使用不完的武器，日本鬼子所沒有的武器。是的，現在全邊區的人民，全中國的人民

，個個都有此心此志，這就是我們抗戰必勝的堅固保障。打他十年，打他二十年，正如毛先生所說的，只要我們耐心的打下去，全中國人民，消極方面，不參加僞組織，不做順民，積極方面，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自動的參加兵役，努力增加生產，每個人執行所該負的抗戰職責。我們不信日本鬼子打不出中國去！最後的勝利必然是我們的。繼着毛先生說話的是人們的掌聲如雷的響着。那樣的莊嚴與熱烈，我不覺打了寒戰。那天連女自衛軍也出動了，空前未有的人衆，擠在那個大會場上。蔣委員長的像高高的對着羣衆，當毛澤東先生講到領袖功績的時候，人們幾次肅然立正。有些青年，感動極了，掌聲不絕的響着，「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這就是對日怨的侵略，挑撥，離間與漢奸的分化陰謀的回答。這樣的喊聲與掌聲震動了山岳！我真的感動了！國民黨的膚施縣縣長也出來說話，大意是以國共合作起來回答敵人的進攻，掌聲自大會起直到未了，總是那樣的熱烈。我自己對自己說：「雖然祖國內戰十年，我在國外，沒有見到，也沒有嘗到內戰的苦痛，但終究內戰的禍根所成功的敵送今日的大舉進攻，我切身嘗受到了，使我也變成了一個流亡者，故鄉被踐踏着。永遠不再自已打自已！永遠！永遠不再自相殘殺！」那天當場散發致蔣委員長的通電，我拏着兩份，一份寄給一位特別關心團結禦侮的朋友，一份自己保存着。通電的末了，有這樣的話：「中共中央一本過去主張，願以至誠擁護我民族領袖，擁護三民主義，並在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的政治基礎上，責成全體共產黨員，本互助互讓，同生死，共患難之精神和互敬互商之工作辦法，親密兩黨間的關係，鞏固兩黨的長期合作，團結全民族，以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和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之實現。」

我想中國人民一定個個擁護這個通電，因爲中國人民現在最怕的是兄弟相鬥，而不能外禦其侮。那太恐怖，將永遠沉入地獄，萬世不拔了！

人們唱着義勇軍進行曲，歌聲使我的心顫抖，這支充滿正義與反抗精神的歌曲，爲全國任何一角的同胞所愛唱，忽然想起在漢口，一天大早在江邊，看見隊伍開拔，他們宏亮的聲音唱着這支歌！

舉行大會，平常我總是不知道的，——山上消息太不靈通——每次，在窰洞門外，遠望不遠的山下，漸漸地漸漸地擠起了許多人，我才猜想一定是有什麼會了，等人已擠得很多很多，我便跑下去，果然有會。

歡迎朱總司令大會，我是在那天近午的時候才知道的，「朱總司令從前方回來了」，「朱總司令從前方回來了」，……附近的一個機關裏的小勤務，這個傳那個，頃刻，傳遍了山巔，帶着瘋狂了的快樂，有些人，沒有吃午飯，就跑下山去了，有些人急急忙忙，潦潦草草吃了幾口稀飯，也就什麼都不要了，去參加歡迎隊伍。人們喊着：「歡迎魯藝唱歌」，「歡迎抗大第〇隊唱歌」，「歡迎陝公唱歌」……接着好幾個團體輪流着唱：「歡迎，歡迎，歡迎朱總司令，」起初，大家立着，後來。隊伍坐在地上，時間過去了，朱總司令還不來。到三時過，我往山下跑了一次，看看沒有動靜，再回上山來。「還在三十里外」，人家傳說。太陽已下山了，場上照不着陽光，天色晚下來，人們悄然的坐在泥地上，所有的歌也已唱遍了，人們已經開始疲倦了：「今天到不來罷！」「車子壞了罷？」彼此輕輕的說，這樣猜測。忽然間，馬達的轉動聲自遠而近，於是，捲起滿天黃沙。一下子，這一聲空谷佳音，使全場的人羣都機械地立了起來，好像受了什麼刺激似的。「來了」！「到了！」人們喊，隊伍開始唱起：「歡迎，歡迎，歡迎朱總司令！」車子還未開到主席台，已被人們包圍住了，聽說是藍球隊，第一，要求他們的老隊員——朱總司令，合攝一影，他們甚至於老實不客氣的跳上車去。朱總司令微笑着，帶着滿身黃沙，走上主席台……。

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的大會，是在下午四時以後開的，一直到夜，那晚還有提燈，在未散會之前，我先跑到半山上，遠遠地看提燈，各色的紙燈都點起了燭，反映出新鮮的顏色，沿着延水，彎彎曲曲的照耀着。一下子，使我快樂地想起許多幼時的回憶，當我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我的家鄉，還是一個極講究迎燈的地方，看了城里迎燈的人，儘可能的還要趕到硤石去看；元宵以前，燈節就開始了。在半山里站立了一歇，看提燈遠去了，深秋的夜風，涼涼的吹來，終究使我回進窰洞里去，這時候，對着一燈如豆，代替快樂幸福的兒時回憶的，是一種心頭說不出的狼狽情緒，把我們現在國家的情形比蘇聯，那眞太相形見拙了。對於抗戰必勝，我有堅強的信心，但對於建立一個未來的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並不像有許多青年有那樣玫瑰色的夢想，沒有那樣非分的妄想，只是希望在建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不再流血了，我們的血不再流在自己的槍刀上，必需大家理知而聰明的牢牢地團結，担負起抗戰後的清理與建設工作。歷史的遺產：惡習慣，非科學，非人道……還要給我們多多少少的磨難，生活將是單調，苦痛而沉重的。

除了羣衆大會之外，還有好些會議。在我到延安後不久，正逢着全國青年救國會開幕，會議日期足足有八、九天，還不知是兩星期罷——幾次搬家，把這個會議的約略記錄失落了——我曾去旁聽幾天，那會議里，有全國各地青年的代表，有浙江的代表，有華北的代表，有從敵人後方，越過幾道封鎖線而來的代表，他們大都穿着軍裝。邊區的代表中，有穿着短衣褲，農民的老百姓服裝，戴着毡帽，神氣十分質樸，但也很活潑。我看他們對於非本地的語言不十分容易了解，所以當一位說着純粹普通話的青年說話時，整整三小時，他們好像有點茫然漠然於台上的說話。這個會議是個空前的會議，那次什麼都討論到了：青年參戰問題，青年與文化教育問題……。

許多人已談到過延安的晚會。晚會，這是延安的的唯一娛樂，如果延安沒有了晚會，那將會更

加如何的單調！這是調劑緊張工作的正當娛樂。逢到晚會，除非天下大雨，或大雪與大雪之後，山路不好走，大禮堂里總是擠滿了人，從來不會有一個空座。雖然覺得生動，可是我常常是為了太擠，擠得——不如說被擠，手臂痛，腰背酸，而不十分有興緻去看晚會。有些較有空閒的人，吃過晚飯，五點鐘左右，就去坐在那里等開幕——晚會定七時開幕，但常常是延遲的——這樣老早去，可以占到好座位。但是我沒有時間去等待。在人們看出來，我既不進學校學習，也不去做工作，一個整天鬼混的客人，可是在我自已，有時連吃飯也好像是做一件事的快快了結牠。每次赴晚會，我常回想到國外的學生生活，在盛夏，天要在九點以後才暗足，音樂會與戲通常是八點開始。吃完晚飯，同着幾個朋友，公園裏延了一下，買了一份晚報，或者帶着將看到的戲劇脚本，進劇院去。外邊天色還是亮亮的，裏面已開了電燈，在等待的期間，看報，看書，或談一點天，並不覺時間是浪費了。

有幾次晚會，為了太擠，在門口擠了一下，只好退出來。在我剛到延安的時候，晚會的入場券上，編有號頭，進場有一、二個招待，請觀衆按號入座。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入場券上沒有號頭，招待也沒有了。或者是發出去的券超過座位的數目，人所以那樣的擠。「為什麼現在反而不編號頭了？」我偶然同熟人談起。「因為編了號碼，人們也不肯按號入座。」又有人說：「票子也只好亂發，你想延安有這麼多人，那裏能個個看得到呢？」我說：「要個個看得到，也不是不可能，延安的學生與工作人員，恐怕是容易統計的，統計以後，有多少人，把大禮堂的座位作個對比，一個晚會，同一節目演三天四天……人人都可以看到。」接着，我說笑話：「設一個娛樂部，由娛樂部長去管理。」

有幾次晚會，特別的擠。軍委會抗敵劇團第三隊的晚會，簡直是空前盛會。那次晚會給我的印象

也很深。開幕前，雖說唱了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我到時，第一個節目已完了，人還在源源的擠進來，我被擠在半中，進又不能，退又不得，看見旁邊坐着的一排男先生，我就說：「讓我一角，可不可以？」沒有一個人回答我。接着，他們喊起來：「立着的人坐下！」但大家還是擠着，而且也沒有坐的地方。幸而一個熟人救了我：「陳學昭同志！」他同他的朋友騰給我一點空隙，我才擠出了這個困難。那晚第三隊演的節目，在歌唱方面不十分動人——歌曲的本身欠雄壯，可是演的話劇「軍民合作進行曲」，卻不壞。可說他們是很大胆的，在這個戲裏，有一點涉及戀愛，我却覺得正是這戲的好處。在抗戰期間，人們還在談戀愛，這些現象，也是事實，誰也不能否認，怎樣從複雜矛盾的戀愛小觀念來服從抗戰救民族的大觀念，這戲很充分的表現了出來。那天的化裝朗誦，在延安人的腦子裏也留了一個深刻印象，雖然詩的本身欠雄壯一點。對於朗誦，我覺得可以配上音樂。如果單單朗誦一首詩，沒有音樂或帶戲劇性的表現來幫助，除非是極短的詩，或者是極富故事性的。不然，在觀衆之前，或者不會有好印象。延安自己所演的戲——第三隊直屬軍委會政治部，這次由山西前線回來過延安，在延安作友誼的演出——都是同樣的抗戰與動員的戲，從來不涉及戀愛的，但事實上，中國的青年現在是不是不戀愛呢？恐怕有些老年人，也還不能避免。延安的抗戰戲劇好像太直覺一點，太簡單一點。晚會的節目也嫌太單調些，特別是歌誦方面，只有合唱，獨唱，大鼓，快板，既然有很多人提倡舊形式，我想很可以增加些粵曲。粵曲，這是中國極富於地方性的音樂。有人說，延安多北方人，大鼓快板之所以受歡迎，那是羣衆的要求。可是延安也有不少廣東人，而且一定有會奏粵曲的欣賞者。在四個團體，魯藝戲劇系，實驗劇團，第三隊，抗大文藝工作團舉行聯合演出的晚會上，我的背後就坐着一位廣東女同志，等待開幕的時間裏，她老是哼着粵曲。我覺得晚會裏還可以加上一點短劇，在國外，我曾看見好幾次，有些學校的聚會利用（Sch

bert與Schumann）的短曲配上短舞，何可愛。在邊區今日，這樣一個偉大的生產運動，使所有的最進化的人用了最原始的工具去翻[illegible]工，爲什麼還沒有一支生產曲——雖說已有了，我還沒看見演奏——與生產舞呢！在跳舞這方面還沒有一個可以領導的人，這也是實在情形。

那次晚會，並不單單演得好而使我感動，特別使我感動的是會場的空氣，第三隊的代表講話，人們拍着手，台上與台下，唱遍了壯烈的抗敵歌曲，又繼之以拍手，接着，演戲，又繼之以拍手……延安的青年，全國的青年，是這樣的坦白眞誠，他們是一無成見的，他們的確富有偉大性。接着，他們唱起：「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像一首質樸，眞實，忠誠的情歌，與誓詞！

在四個團體聯合演出的晚會上，觀衆是空前的擁擠，通常，前面的四排凳是留給邊區的領袖們與特別來賓坐的，有二，三個背槍的同志立在這四排凳子的旁邊看守，那晚，人是那麽擠，這四排凳子也坐滿了普通的看客，及至邊區的領袖們到這時，一個空隙也沒有了，好幾次動員都沒有成功，結果，只退了一排凳子：中間的與後邊的人抗議：「爲什麽要退後，前面的讓出來，因爲坐在前面的都是後來的人，」往常在人多的場所，我最怕人們打架與吵嘴，因爲那才是審不清的官司，那一次空氣似乎有點嚴重了，可是一下子，一切都溶解在歌聲裏了。的確，延安的人們還是非常漂亮的。但是我想，每次晚會的入場券，最好還是編號頭，只須把好的號頭（前排）分給那些工作極忙而不能早來的邊區負責人們，而嚴格的執行按號入座，事情不是很簡單麽？

四團體聯合演出的晚會，三個話劇都很好：魯藝的「今天」，第三隊的「死路」，抗大文藝工作團的話劇，我忘了名稱。一個人的理解力總是受了自己的文化水準，教育，與生活經驗，閱歷等等的限制，在我旁邊坐着幾位女同志，她們很不歡喜魯藝的「今天」，實在住過上海的人，就使不曾與工人階級來往的，也都認爲是上海的工人階級可能的確會有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事實。內[illegible]

的人們，特別是農人，他們好似有一個成見，以爲住在上海的人都是些壞蛋，正如我國人一聽到巴黎，就象徵荒淫，其實如巴黎人常常說的：「現巴黎的人不是法國人，更不是巴黎人，都是那些美國人，英國人，……」也正如延上海四馬路的人不是上海人，上海的工人們與上海的繁華是沒有關係的。那晚，魯藝的「今天」，我以爲很值得讚美一番。

三八婦女節的晚會，男同志要有券才得入場，女同志不用券可以隨便進去，但當我去的時侯，在旁邊的窗口望一下，裏面已是黑壓壓了，門口還擠着不少的人，靠着一位魯藝裏的同志的人情，把我从後門領進，但是一點空隙也沒有，在一排凳子的邊沿，我半坐半立着。康生老先生，這一位漂亮的男先生，提議坐着的男同志都把坐位讓給女同志，今天是三八婦女節……但是只有少數漂亮的先生們立了起來，大部份都是坐得宗定的，絲也不肯鬆一鬆。「今天我們是來賓呀！環應招待我們坐」，有的男同志，在那樣頑皮的說。有些人立得太累了，只好半當中回去，我也是其中一個。

露天的電影晚會，我只參加過一次，人們都自己攜了凳子去，很有趣的，好像小時候看廟戲——我是極不愛看廟戲的，其實是跟家里人去看熱鬧大家必得帶凳子去。在露天空場上，人們有的坐在小凳上，有的坐在地上。嗚嗚呀呀的人聲好似占住了半個天空。我聯想起法國南方，這個熱鬧的城市都魯士（Toulouse），夏天，本市組織了露天晚會，在大園子公園（Guar dona）里擠着將近千的人，也是這樣嗚嗚呀呀的熱鬧。穿着絲襯衫的法國西人，一邊發出清脆的笑聲，一邊吃着用紙包着的冰淇淋。

延安有很多很多的會，羣衆大會外，還有各部份各工作團體的小會。歡迎何其芳，沙汀，卞之琳三作家與陝甘甯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成立的聚會，是在文協會舉行的，我很榮幸的收到了一張去參加的請柬。在那次會里，我認識了高士其先生。人還沒有到齊，高先生在柯仲平先生的房間里

癱瘓，他是一個半殘廢者，動作神經都壞了，不能好好說話，也不能好好的走路。怎麼會這樣呢？他說他研究微菌學的，回國後曾養過許多微菌，不愼微菌進入耳朵，病是這樣起來的。這是怎麼的？我大大的驚嚇！我想神經系專醫者，能夠研究出這是什麼病。

我們談着天，他說話很慢很慢。

他先問我來了多久，又問我什麼地方人；我一一回答了他。

「那麼與吳亮平同志是同鄉」，他說。他的思考是很正常而敏捷的。

知道他曾經由新大陸到舊大陸，我問：

「你曾參觀過巴黎巴斯德學院麼」？

「去參觀過」，他好不容易的說，好像有什麼有力的東西把他的嘴壓緊着。

「XXX先生你認識麼？」

「他是研究細菌的？」

「是的，他是微菌學專門者，還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學者」

「呵」！他好似記起似的，「他是从巴黎巴斯德學院出來的」？

「他曾進巴斯德學院兩次，前後有九，十年。」他的眼睛因頭不能自主的移動，也失却了表情，但我看出他的好奇，當他正直觀着前面。

「你是一位女作家，怎麼這樣熟悉科學界？」

「我不是女作家，我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女子！」旁邊的人都笑了，我也笑了。「我的朋友，大都是些專門的科學者，……我越接近科學者，越覺得他們的可愛與他們的偉大，我自己，現在我竟悔沒有學科學」：我直率地說，忘記了當時旁邊的人都是文學家，這些話或許是會得罪人的，但

人們似乎很原恕我的直率，大家只是笑笑。

「乂先生現在什麼地方呢？」他關心的問，「他現在做什麼呢？」

他在重慶辦微生研究所，養着許多細菌，製造血清與痘苗，抗戰以來，他捐出了不少血清與痘苗給抗戰忠勇的隊伍。」他十分關心的聽我說「然而這種事情，是一種製藥工業，他是一位學者，可惜國家未能用他，他只能辦一個私人的研究所」。

「你很熟識他？他知道你來延安參觀麼」？

「他該知道的罷，在重慶的時候，大家曾一起吃飯，看電影……。」

高先生的病，確實我使感動，尤其是以他這樣病的人也跑到延安來。我想我是了解他的。一個微菌學者，脫離了他的顯微鏡與微菌，還有什麼生命的意義呢？他是痛苦的。我聯想到那位不幸的殘廢作家潑和斯脫（MarcelProust）。

一朵又一朵，
白雲躺在天空遊，
像肥皂泡沫似的，
躺在蔚藍色的大臉盆里漂，
有多少人天天在白雲底下奔走；
我躺在土坑上望着白雲拍手。

……………

……………

哦，我是個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也來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吶喊；
趕走日本强盜！
還我中華河山！

高士其先生詩「不能走路的人的吶喊」，刊在延安出版的第二期「文藝突擊」上他的孤獨，他的無可奈何的對祖國對人類的熱情，他的疾病，誰能了解他像他自己所感受着的？正像羅相斯說一樣。

聽別人說，高先生現在想翻譯一些哲學的作品，但是找不到一個錄寫的合作者。延安有無數的青年作家，大家好似都要自開爐灶，竟沒有一位願做高先生的合作者？

開會時，柯仲平先生與林山先生扶着高先生走到開會室里坐下。歡迎者們被歡迎者都說了話（何其芳先生沒有說。）卞之琳先生簡短的說：「一個作家，就是以寫作爲職業的。……實在不配受歡迎……」大意是這樣。這幾句沒有文人口吻的質樸的話，很使我歡喜。

散會後，全體赴會者到工人飯店去會餐。我沒有終席就走了，一個友人來邀我去赴晚會。

聽說以前已經有過一個歡迎外來作家的會，在那個會上也提議過成立一個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的。那一次會不十分快樂而散了的，爲的一位受歡迎的青年作家，在歡迎會上罵政治家。

在那次聚會裏，我還遇見徐懋庸先生。起初，聽見一位個子不高，滿口紹興音的先生立起來說話，說過話，這位先生恰恰坐到我旁邊來。「這位就是陳學昭女士……」客氣的對我問。於是我問他：「尊姓」？他告了我，但我又立刻忘記了，不會於記人名的我，當友人們介紹朋友時，我總要

間幾遍」。直到魯迅先生逝世兩週年大會裏，聽着徐先生說話，才總於知道了。「我聽××紀念同志說你到了延安」，「呀」！於是隨便談了一些話。

魯迅先生逝世二週年的紀念大會裏，徐先生說了些直率而慷慨的話。在延安，我也曾聽到人說着他過去的筆墨官司，我離國八，九年，從來不關心國內的文壇，根本就不知道其間經過了些什麼。所以很平常的聽着他的話。那天，徐先生說：「一個青年，他走上革命的路，沒有人可以阻止他，說這條路誰可以走，誰不可以走。」（原句忘了，大意是這樣）。這幾句話我很同情。革命是不是一定要資格？那一種人一定革命的，那一種人一定不革命的，或者那一種人配革命，另一種人不配革命，誰能夠武斷的加以類別，如果革命或抗日一定要資格，加以挑選與類別，那不知道幹革命與抗日的只剩下多少人是有資格的，因爲旣是人類，總有缺點，不是神也不是聖。徐先生還很年輕，看去四十左右，實在說僅三十，人是極聰明的，不過有極濃郁的紹興味，好像一把快口的刃，很是鋒利；但如果沒有這點鋒芒，恐怕也就不成其爲徐懋庸先生了。

十　絮絮談延安

I　衣食住行與生活的氛圍

怎樣說說延安生活呢？我想只有幾首美麗莊嚴的詩才能形容於萬一。可是我的筆太笨拙了，只好把這個意願留給延安的詩人們來實現罷。

我不會正襟危坐地來敘述，親愛的遠方的朋友們，讓我只能亂七八糟的絮絮地談，今天談一點，明天談一點，毫無系統的，而且非常主觀，可說只不過是我一己的生活。

延安本身的生活是十分單調、十分枯燥的，衣食住行這幾項，譬如、就說穿罷，除了老百姓外，八路軍與邊區政府各機關工作人員都穿青布軍裝，這裏沒有什麼羅琪紗……一般的說來，八路軍裏的老幹部——當然不是個個如此，我也曾見過穿軍裝胸口的油迹泡出來，也許可以炒幾隻菜呢——穿的都整齊清潔，打着極「軍人的」綁腿，那些學生，他們穿着軍裝，但姿勢就及不上八路軍裏老幹部的軍人樣，綁腿也打得不頂好，往往很隨便，也很髒，有的學生自己說在外邊穿慣了西裝，穿起軍裝來再要講究也弄不好，那麼穿着軍裝也要經驗的。如果真是這樣，那就不能怪我現在穿得不成樣了。果然穿衣服好像純粹爲着禦寒蔽體，沒有什麼時裝之類的東西，但是也有些青年，特別是女孩子，在我平日的觀察，也常常爲要表現自己的特點，於帽子的頭恰恰偏向左邊或右邊，或斜下一點或聳起一點。如果偶有一天如此，那是疏忽所成功的，但若天天如此，那或者同「美」這種觀念，有了關係。有一時期有好多女孩子的頭頸裏束着一條顏色的絲圍巾。女子是特別歡喜表現自己的特殊性。那些未來派畫家以爲將來女人的面孔上都要刻字表白她的特性與別的。現在、艱苦的

抗戰期中，我們只好玩一點小把戲，將來、新中國建立起來了，當國家有餘暇來留意化裝工業，那時候香水，香粉、市面上有多多少少，儘少女們去選擇罷。

我覺得一個男子，需要有一點外相的醜陋，一個天生相貌整齊的男子，如果再加上種種修飾，那麼只能請他到蒙馬脫（Montmartre）去給女人玩，他不是一個事業的男子！天生成美的男子，必得有嚴肅的工作與嚴肅的性格才能完成他天生的美，對於女子，也正是一樣。

說到吃，一般人都吃小米，那是外邊大家都知道了。在冬天，蔬菜只有白菜、豆腐、豆芽菜、紅蘿蔔，白蘿蔔、洋芋、粉條、韮菜只有豬肉，及豬身上的一切，羊肉、與雞。牛肉呢，難得有出售，那是死了的牛的肉。雞蛋絕對沒有，因爲天太冷，雞不下蛋。現在、初春的美麗季候，只有菠菜，白菜絕對沒有了，其他菜類與冬季的一樣，不過韮菜增加了雞蛋而已。在故鄉，這個時候有多時鮮蔬菜　[illegible]不少要去說那些河鮮海鮮了。晚上　在窰洞門口「欣賞自然」（這裏的有些朋友愛這麼笑我）我就會想到這些南方的吃的東西：「春筍燒杭州的加香肉湯，該多好吃！」對一個朋友說。

「女人都是饞的」！那個朋友露出一個有意義的微笑，這樣回答。

「女人都知道辨別美味，男人却只知道吃！」我笑了說。

在延安，吃菜是無法變化的，吃來吃去只有那幾種菜而且燒法與一般的家常菜或南方館子裏的完全不同，往往放許多胡椒，茴香、葱……很辣或很酸，有的人對我說這樣的菜就是軍隊裏的特色。如果不到延安來，那我一輩子也不會知道什麼是軍隊裏菜的特色。一般的大司務都是四川人。這些長年長年吃得很酸又很辣的怪味的菜的人們，也是我覺得十分敬佩的。那些有胃腸病的人，他們有着一個嬌嫩的，可憐的與極古怪而碰不起的胃口，一定會感到說不出的單調。其實我想，對於吃這件事情，並不只是我一個人關心，因爲這是事實上的需要，直爽的人就說出來，如此而已。在延

安，每當人們初次相見時，第一句問語是：「你做什麼工作？」第二句是：「你在什麼地方？」第三句就是：「你吃什麼飯？」糧食方面，我覺得最好吃的是饅，但有附帶條件，鹼不能放得太多，能够發酵（這裏所做的饅都沒有發酵的）。如果切成片，在火上烤一下，有一點焦，那就很像麵包。有一次，一個朋友送了我一斤蜜，蜜的顏色不像南方的，也沒有南方蜜的那種香味，或許因爲北方沒有各種花，只有一些野草花，原料不好的緣故，可是我疑心那不是純粹的密，或者是商人在出售之前攙和了粉的。偶然把烤烘過的饅片放上一點蜜，很像菓子醬。邊區三邊一帶是出產牛油的，但延安市上不見有出售。其次好吃的是大米飯，南人食米，北人食麥的習慣下，饅雖是好吃，但似乎接連吃就乏味了。第三是大米與小米合燒成的飯，第四是小米與紅豆燒的稀飯，第五是小米稀飯，第六是小米飯。這是依我個人的嗜好而分的。

使我感到不慣的，只有三樣，第一就是吃裏面的，白糖與糖。別的兩樣是廁所與澡堂。

延安很少能買到白糖吃，那些飯館與合作社，他們有是有，但不肯賣，因爲他們要用以做八寶飯，米子團糕，雪花菠菜……這些甜點的。老百姓店裏的白糖很少也很髒，紅糖比較容易買一點，但真髒得太可怕了。我沒有買東西的技術，覺得我去買東西老百姓索價總是很貴，這是爲什麼呢？難道是我衣上面孔上有什麼特殊點？有一位某太太，她是在這裏做客人的，每天要上街去買東西，一天到晚「把點吃」，幾乎把延安的每條街每家店舖都認得淸淸楚楚，她曾買到一元一斤的白糖。但我却訪了兩星期，總是碰釘子：「一角大洋一兩，買給你四兩，」走到一家擺有白糖的老百姓店舖，店主這樣回答我。「半斤也不賣？」「不賣！」我脾氣來了，「這樣奇貨可居，索性不要！」我想，就掉頭走了。終究，我還是請教某太太，她告訴了我一家舖店，買到一元一斤的白糖。這是作白糖，日本貨，那家看去是小小的店舖，却有很多的洋白糖，不過有些什麼東西，店門口什麼也

小寫出，連照牌也沒有，轟炸以前家家店舖有照牌的。在延安街上的商舖攤頭，有好些日本貨，我怎麼敢說是日本貨呢？在去年十二月裏很少很少見的東西，像洋磁碗這一類，因爲漢口失陷，來源徒然斷絕了，現在忽然多起來，並且一套一套的很多。這些印着「天津，直隸省」的火柴，我想也是日本貨。據說這些東西是從太原及黃河邊岸來的，那麼是走私。這樣的抗戰，眞是艱苦，爲了需用，不得不用仇貨，但是多少錢又流給了他們。這一點也證明只是打，而不從事建設是不成的。我想延安可以用一個不用仇貨的口號，提醒一班老百姓，在目前固然有些不得不用的東西還只好用，但該儘量省却那些可以省却得下的東西。重慶去年七月間的本產白糖市價爲二角五分一斤，現在不知長了多少價，但我想無論如何總不會到一元一斤的。我們應當儘可能的改進川陝公路上的運輸，同時希望邊區也儘可能的發展一點簡便的日用工業，這正是他們近來所做的，這裏爲了號召發展手工業，曾開過一個工業展覽會。

實在，在延安住了快九個月，我已吃了近三十斤白糖。當來的時候西安一位朋友曾告我需要帶點糖來，我就帶了十斤，其後，朋友又託人帶了十斤白糖與五斤牛奶糖來送我過中秋，接着這裏又有朋友送我十斤白糖。愛吃糖，這也是一個不良嗜好，人生活上的一個弱點，但不是我自己替自己袒護，我不抽香烟，不喝茶，也不吃花生，就是吃一點糖，不是可以原恕的？一個人的願望會隨環境而變遷，現在，不要去說什麼牛奶糖，菓子糖，……只要有白糖吃，已經會歡天喜地了。

說到延安的廁所，或許有很多人會縐眉頭，其實，越往西北走，廁所就是這樣的，並不是這裏的特色。廁所是我日常生活上感到最不慣的事情。

有一次，我的住處，離紅十字會很近，他們有一個非常美好的女廁所，毛坑打得很深，有木蓋，經常維持得也還乾淨。後來，我搬了家，帶着十萬分的惆悵離開了那個廁所，就此非常糟糕。延

安的一般廁所，毛坑打得不很深，有時用泥牆圍起，那是已算好的，沒有門，男女不分開。陝北的老百姓，就無所謂廁所不廁所。他們乾脆就來個滿地黃金，到處都是天然肥料。一九三九年的新年，一個晚上，中共中央宴請延安文化界及各人們，飯後，我已經走了，熟人把我喊還來坐上一輛載重車，偶然看見毛澤東先生與王明先生，他們坐在車上，去赴晚會。在車上，毛先生與王明先生說着笑話：「延安有幾多？延安有三多：霧多，山多，」王明先生接下說：「毛廁多！」好些人忍不住發出了笑。「多麼方便，不像在外邊，有時要跑好些路才找得到毛房，在延安，只要你需要，毛房就到處都是。」

接着毛澤東先生與王明先生談着北方的好處，毛先生說：「月亮清……」。「如若在漢口，這樣月明的夜裏，日本飛機又要來了，」王明先生說，「那麼這又是延安的一個好處。」

北方的氣候乾燥，月亮非常皓潔，天空沒有片雲，特別是在積雪的夜，一點風也沒有，只不過空氣很冷，明月照着積雪所反映出的光，使人發出一種貞潔與恬靜的感覺。如果駕着一輛小派利（雪橇），在積雪的月光下飛馳，那眞有說不出的風味。

是的，延安還沒有過夜襲，就是在月明的夜裏也沒有過警報，或者天氣太冷罷？飛機上的馬達不容易生熱？還是敵人認爲不需要夜襲？還是因爲山多，夜襲對於轟炸機本身的危險太大？

延安還沒有一個女澡堂。

說到住，一般人大家知道是住土窰洞，那些泥房子潦潦草草的，爲了省錢而如此造的，我想恐怕是八路軍帶來的。那些土窰洞是一個一個獨立的，有時也可以打通。在延安，住的問題可說是最有趣味的，因爲這是一個沒有迷信與盜賊的地方，可說是一個最痛快的地方。回想我平常一到家鄉，人們是那樣整個沉在迷信裏生活着，一到家鄉，好像鬼跟到了腳跟邊。從前，在別的地方，我騙

個人從來不住旅館，爲的不知道旁邊房間裏住的人是一個什麼，殺人犯還是流氓……常常碰到人們講許多黑暗的事件，使我不能安心。好得住旅館的機會非常少，旅行到一個地方，總有親切的朋友家來招待我。我也最怕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住家，每次租房子就發生這些困難，不知道鄰居們是怎樣的。我歡喜光明而無一點黑暗的生活，可以絕對公開的生活，其實我也並不一定怕社會的黑暗面，不過見到了有些稀稀奇奇的事情，就像碰到了髒東西那樣會令人嘔吐難堪。在延安，你窰洞的附近，你的鄰居們，或者是農人出身的一個工作人員，一個革命者，他說話有時帶着「媽的，媽的，」一點土包子的神氣，但他是非常質樸，誠懇，使你感覺得他是一個人，一個堂堂中國人，沒有什麼可怕的，甚至於還覺得可愛，有時是一個什麼機關或某一部分的負責人，一天只見着忙忙碌碌的，他們的生活是如此簡單，誰對誰都可以想像得出。他們的勤苦，使你心中不由的發生感動與慚愧的感情。

說到行路，邊區地廣人稀，走一、二十里路不見一家人家，那是意料中的事情。到處都是高高低低的山，連峯不斷。我曾經想像這個地方將來變成新中國的重工業區時，交通工具的發展情形，普遍的用升降機，還是用爬山電車？在目前，大家用兩脚來走。西北地方與南邊不同，在我們那裏，走二、三里也好，五里，十里也好，就有田舍村莊或有一個涼亭，走路的人可以在涼亭裏坐坐歇息，如在夏天，涼亭裏還有茶喝，這是鄉村人一定備着的。這種涼亭該就是驛站，舊詩詞裏最多寫着這些涼亭：「水驛燈昏」，「人語驛邊橋」，水，橋，涼亭，在南人的日常生活裏確實占着極重要的地位。在西北，可就沒有這些東西，走許多路，特別是在炎炎的夏季的中午，路邊買不到一點開水，就是有店舖也不出售開水或茶的。這裏普遍的交通工具，就是騎牲口，馬，驢子，騾子，這裏的老百姓不用說是長於此道的，八路軍裏的老幹部都不論男女也都善於騎馬，這是使我最驚嘆不置

的，其中有些南遊人，他們也會騎牲口「南人乘船，北人乘馬」，這是半原始時代的交通原則，在今日的西北似乎還可以應用一部分。這裏的道路都是黃沙泥成功的，沒有一棵樹，沒有一點樹蔭，今年，生產運動大號召的結果，邊區種了十多萬株樹，去年本已種了有相等的數目，幾十年後，這些樹成爲柏油路旁有蔭背長凳的坐着乘蔭歇息的地方了。在目前，大家暫時滿足這些缺陷而爲這個地方的光明與簡單的生活氣氛而愉快着。

、延安的實際生活大致是這樣罷，可是，這個要算全中國最最貧困的地方、却是令人十分留戀的。我想、當我離開延安後，會回憶牠。我太愛延安生活的氣氛了，有些青年，他們老說：「延安生活眞痛快，在延安精神上眞痛快！」但是他們說不出爲什麽痛快，吃小米飯，當然是不十分痛快的，拿一塊錢或兩塊錢的津貼一個月，這是很好了，這還是八路軍省下來的錢呢，但是用起來恐怕並不見得痛快的。那麽痛快在什麽地方呢？我曾經思索了一下，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確的，因爲無疑的，我是沒有政治修養的，最大的原因，用我們家鄉話來說，政治清明，什麽都是淸淸楚楚的，以及領導得好。其他的原因呢，我想是因爲淸明的政治反映到了社會生活。社會生活，牠是這樣的光明，坦白與純潔！說句對步先生們不大恭敬的話，這裏沒有妓院 ，沒有茶館，也沒有酒樓。來延安參觀的人們住兩星期或一個月，他只能看到一部分的延安的面目，人們的緊張工作與學習，艱苦的飲食衣住，抗戰的熱情…… 但延安眞正的好處，使人留戀的地方要稍些久住一些的人才會深深感覺到。

在延安光明的純潔的社會生活裏，我想到莫泊桑小說中所描寫的現實的黑暗社會生活。我想莫泊桑當時一定用着失望與嘔吐的心情來描寫這些黑暗的。人們說在莫泊桑死後，發現他的枕頭底下放着一本聖經。如果是現在，不知道莫泊桑的枕頭底下放一本什麽書？

Ⅱ 日子

在我剛到延安的時候——八月初——還是盛夏，天氣早晚風涼，中午很熱。北方的夏天本來少蚊子，多蒼蠅，在陝北，特別因爲垃圾滿山堆，大頭蒼蠅非常多，恬靜的午睡常常給吵得不能安枕。最沒有比這種大頭蒼蠅的使人討厭了，牠並不來咬你一口，給你感到痛楚，不，牠却是擾得你坐立不安，在你的疲倦之中，牠得勝利。我完全不懂這種蒼蠅的心理與生理，爲什麼當牠飛進一個窰洞，牠總是飛來飛去的飛個不停，一邊嗡嗡地響，就是這樣，使你煩燥。十四、五年前，一個夏天，當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太原開第二次年會，編輯股裏的某君常常因蒼蠅吵得不能午睡，索性打蒼蠅，太原也有很多的打不完的蒼蠅。同股的一位先生時常同某君開玩笑，某君覺得非常討厭：「你是我的蒼蠅」！同伴們說他還是一句最好的情詩。

自從身體不好，我就一改過去的習慣，早起早睡，不在床上看書，也不在夜裏寫東西，在延安，我還是這樣，上午，我從不出去，除非同人有了約。近晚，有時下山去看看熟人，但我最歡喜的，是當我白天寫多了字看多了書或洗多了衣服的日子，在晚飯後，黃昏，有熟人來同我聊天，移出幾隻凳子，在窰洞門口的泥場上，三兩個人捧着半個西瓜，一邊吃一邊談。

「你在這個時候還留有西瓜！」某君說。

「西瓜要在晚上風凉的時候吃更有味！」我說。

「呀！是的，法國人是很會享樂的，恐怕你也有點那樣？」某君稍嘆着微笑說。

「那不，一點也不！」我不禁帶着決然的口吻。

「人家說巴黎是多少繁華呀」！某君說。

「但不能說這是他們的享樂。我得說法國人是很知道享受生活的，從前俄國幾位大作家，對於法國文學有修養的，像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他們常常愛稱道法國人知道享受生活。這是一個極善於把生活與工作配合起來的民族，這個民族是極富於和諧性的。如若他們一味只知享樂，當普魯士兵向巴黎走的時候，他們一向怎樣把敵人趕出去呢，就是現在……他們有愛國的熱情，而且，知道工作。」我說。

但是某君的話終究還使我思索了一下，有時候一個人的話可以變成幾個人的話，幾個人的話可以變成與論，我雖不是道學家，恰恰一點也不是，但也恰恰不是享樂者，像某君所想的。有時候，在毛房裏遇到一些不相識的女同志時，她們要這樣問我：「你來中國幾年了？到延安幾時了？」我總是想笑。「我是浙江人，一個道地的中國人！」這就使我往自己身上檢討，我穿的是軍裝同延安別的女子一樣……那麼難道我的日常生活中有什麼使人覺得特別的地方？在外邊，我是頂歡喜布置自己所住的地方，在不浪費與不奢華的原則下，反正錢是用正當的努力去換來的，不是搶來，不是騙來，也不是括來的，怎樣使用我的錢，自己有絕對的權利，但在延安，我根本沒有佈置我住的窰洞，只不過把東西理得整齊些，儘可能的使灰塵少一點，這是目前私生活上的原則。因為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離開延安，就使暫時不離開，我也不想布置一個家，在離開南昌的時候我已決定不再想一個家、將來，抗戰勝利後，回到老家，我要想像從前一樣的布置一個家。抗戰期間，就是身邊帶着的一點衣服，我也想能穿牠幾年。在我窰洞裏唯一的奢華品是一隻木椅子，化了三塊錢定做的，可是遠遠及不上在齊華先生那裏見到的，他們的木椅。可是現在我馬虎極了，從前，桌子一定要多少高，椅子多少低，配合起來才覺舒服，現在有一隻木椅坐我已覺太幸福了！我曾夢想一隻能坐能躺的木椅，以前我在一個醫生朋友的待診室裏看到的，坐着非常舒服，並不需用彈簧，馬海德先

生有這樣一隻類似的木椅，聽說曾化了九塊錢，想了幾個月還沒有決定去做。

某君，常常在黃昏時來談天，果然也明白他不是每次特地來看我的，他是來看他的女友某女士她不在，他就來看我，一邊談天，一邊藉以消磨厭煩的待人的時刻，但我每次總當他特地來看我的招呼他。

當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他給我的印象不大好，他好似羞怯，這種羞怯會給陌生人誤認爲驕傲，他是有一點脾氣的，執拗，强硬，但也還和氣，聰明而有一點眞實性，他對於女子有正確的觀念，這或者使我不討厭的原因。

他與我談法國的風俗人情，與法國的文學作品。我歡喜聽他講他的獄中生活，他曾坐過四年牢，在那裏消磨了最寶貴的青春。我從沒有聽到人像他那樣不帶一點憤激的感情，或者一點自負，他却甚至於帶着一點惆悵來敍述苦痛的獄中生活。坐過長期牢獄的人，因爲生理與心理上所受的迫害太大，神經有時會失常，往往使他們變得冷酷而古怪，但某君，他不。

「春天，從窗格裏看見許多男男女女走往孫龍公園去，那個時候的心裏，……不想着是在牢中還好，當想起了是在牢獄中……」

我從沒有嘗過那種生活，會不會在那種生活裏，我會發瘋？我想人類最大的知慾，是不是叫他忍受寃屈？

有幾次，他在我處談了一個黃昏天，回去了，好像沒有見到她，因爲次日大早，他又來了，她還沒有起來，我正在漱口。她住在二層樓，我住在三層樓——這是我用以分別山上窰洞的高低的——就是說她住在我底下的一排窰洞裏。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某君在我的窰洞裏談天等待他的女朋友回來。有兩次，兩個青年男子問到我的窰洞裏來：「某女同志住在那一個窰洞裏？」某君自己回答

他們：「在底下，第二個窰洞！」——我偷偷地端詳他的面孔，覺得他很理知，沒有表示出一點難受。當然，他是曾經受過比這種苦痛更難堪的苦痛。

一晚，某君又在我處談天，他曾上去看過兩次某女士，她總沒回來，到十一時，他無可奈何的回去了。

實在，我知道她在什麽地方，她就在她所住的窰洞底下一座泥屋裏，同着兩個女伴，招待一位賓客，她們的歌聲笑聲，在某君與我談話的時候，清楚的聽得到。某君走了，我爬到牀上，笑聲與歌聲還在靜夜的風裏一陣一陣送進我耳朵——附近機關裏的人那天大約都好像去看露天電影去了——我一時情緒有點複雜，自然更聯想着某君。

次日大早，某君來了，某女士還沒起來。我正在洗臉，被也還沒有舖，人覺得十分疲倦，昨夜睡晚了。我已有了早起的習慣，不論在夜晚十二時或大早一二時睡覺，太陽一出，天一亮我就不能睡覺，必得起來，——反正是睡也睡不着——這樣夜裏睡不好的日子，往往使我不想吃飯，也不想做事，很煩厭的。

等一歇，某女士上來了，蓬着頭髮。「昨夜回來晚了，回來後又睡在牀上看雜誌，今天起不來了。」她沒有着落的對某君說，一面望着我，我裝做沒有聽到她的話，掉過頭，遠遠注視半山裏兩個小孩子在開玩笑，打架。

「夜裏不要貪看書呵！」某君露出一个父親似的微笑。他同她下去了。

「她有什麽錯誤？」我想。我唾棄那些欺騙的友誼與欺騙的愛情。但我忽然想起在克萊蒙文大的一個女同學，她老是前門送走一個男朋友，回轉身來後門又接進一個男朋友，——前後門通兩條街——她的父母卻爲這些生氣。「或者這種行爲，對於一個正在選擇伴侶的少女，是可以容許的

？」只有這樣想，使我減輕一點對某君的難過。

某女士約有二十三，四歲，歡喜運動，籃球擲得很好，從前也會寫詩，現在，她是一個技術人員，相貌不醜陋，卻也一點不美麗，看去好似還聰明。好些人曾在我面前說過她的壞話。星期六與星期日，來山上看她的人非常之多，在許多上山的人中間十個中倒有五六個是來訪某女士的。我甚至於對她有一個不好的念頭。「那或者還不至於罷！」有時我又覺得或她還不至於如此，但我也沒有注意她。我覺得這類女子的生活，同她交際的人很不易認識她的全部。我同她維持着平泛的交際，見面打招呼，說「今天天氣好」之類的話。

幾個月後，我已搬過家，從某君口中也知道某女士已到近鄉工作去了。一天午後，我去看一個同鄉（封建的口吻！）的病，我窰洞裏有一個生病的朋友睡着，急急忙忙的偷出時間去望病，拿了一罐人家送病人的牛奶去轉送病人。剛下山，在山腳下遇到某女士，兩個人就一同走。她一路招呼三三兩兩走過的男子，該都是她的朋友。

「你到什麼地方去？」她好奇地向。

「到那邊！」

「那邊有什麼人？」

「看一個朋友！」這方面，大約我有一點所謂外國人脾氣，我從不歡喜去關心人家的私事，也不歡喜人家來問東西問關於我自己的私事，那怕是不關重要的，自然更談不到什麼秘密。

「我知道你去看什麼人！」她笑着說。

「呀！你知道，那說出來看看呢！」我說，也笑着。

「你去ㄨㄨ看ㄨㄨㄨ，」她露出有意義的微笑，「不要騙我，是不是？」

一下子，我幾乎要發脾氣了，這個討厭的如此庸俗的女孩，她這個猜測算是肉麻當有趣的開玩笑還是帶有惡意的？ㄨㄨㄨ，還是一個小孩子，雖然我還够不上做他的母親，但至少可以做一個大姊姊，有時候他來我處吃飯，怎麼?!在她看起來，他可以做我的情人，在她看起來，我是這樣容易愛一個男子的?!在她看起來，我也是到延安來找丈夫的？或者，竟還可以同她這樣二十幾歲的少女做情敵……「也算榮幸！」……總之，所有的思索都歸結到一個不快樂，甚至於覺得受了侮辱。照中國一般女子的辦法，表示不愛一個男子或與一個男子無涉，就把這個男子毀罵一頓，「瞧不起」之類的話，可是我不會也不願這樣做，我想說她幾句，但又盡力抑制，不過我的臉色一定不自覺的流露出了一點什麼，末了，我還是笑了起來：「呀！你以爲……那你還沒有認識我」。

前面走來三個男子，齊聲招呼她，她立定同他們講話，我同她就分別了。

「你不要生氣呀！」她遠遠的還向我喊。

我還沒有脫却不快樂的情緒，但已開始悔恨沒有涵養工夫了。

近過年的時候，一個淒冷的雪的黃昏，去看一位工程師夫人——她快下鄉去，——回來，路上遇見某君，他從幾百里外回延安，騎着一隻高大的馬：「昨天我差一點跌死，這頭馬真胆小，過橋的時候，牠不敢上橋，倒退下來，把我跌在河裏，幸而水淺，冰也不厚，可是我也昏過去了好幾分鐘……」。

次日正晚，他來看我，在我處吃飯。

「唉！」他忽然嘆氣，「我這次跑了一圈回來，快活多了！」他說。

「噢？」

「你大約知道我與ㄨㄨ的……」他微笑着說，望着我，找不出適當的字眼似的。

「呀？」我避掉他的眼光，担心他講出來，因爲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他，如果他硬硬對我說而問我呢？

「還次在×× 一個夜裏，很無聊，而戰爭的空氣又十分緊張，在期待戰鬥的時光中，大家圍着爐火談天，他們要我講自已的事情，我說我一生曾經愛過三個女子，但這三個女子都不愛我……他們聽了，大家捧腹大笑，其中有一位對我說：「你怎麼好意思講出來的？」我肚子裏也好笑，那晚他們個個說有多少女子愛過他們，追求他們，可是我想，不見得個個是眞的罷……」

我不禁笑了起來，他曾對我談過從前愛過兩個女子，都沒有表示就分開了。他說話非常含蓄，而我對於這類事不愛問，始終沒有道着一個頭緒。

「在我愛第二個女子時，她的女友曾勸我對她表示，我不敢，後來想想又悔沒有表示，這一次，我表示了，又碰到一個釘子……想想很不好意思的，實在我不知道對女子該怎樣，我一點也沒有經驗」。

「那是沒有什麼的，誰沒有碰過釘子？」我說。

「實在，她還個人是很吃虧的，你大約也聽到人家說過她的話…我曾勸她，理解她的人很少……對於我，也會引起誤會與不利……現在是好了，完結了！」他深深的透了一口氣。

接着，他向我討紙筆，寫了一封信給她，因爲附近的機關與那女士工作地方有聯系的可以託帶去。當我拿漿糊給他封時，他抬起頭來，對我笑了一下。

「我本來想不寫這信，但又想該告訴她一聲，不告訴她不大好？」他說。

事情是該當完結了，但是他還要寫信給她，還沒有完結！如果她是一個漂亮的女子，她該當更明白的表示態度，倘使以爲接受這樣的友誼多多益善似的，那是她的不好，因爲他一直可以夢想以

爲還有希望。

過了幾天，我又搬了家，他夠來，默默的坐着，一歇，不說一句話，特然，他說：「一個人眞矛盾，我已去看過乂乂一次了！」

「呀？」

他顯然十分苦惱，但我能說什麽話呢？這類的事，是征個人自已的事，如果這個人要愛一個不愛他的對方或者不忠實他的對方，那是他們自已的事，關旁人什麽呢？

過了二，三小時，他立起又坐下，好幾次，還是在我處吃了飯，依舊是那樣苦惱，走了。當然友誼是無法也不能安慰的。

乂君，在我看，不但在感情事作上，他將是十分不幸的，就是在事業方面，恐怕也不容易快樂的。他的相貌不很整齊，使人發生一點可憐或可怕的感覺。這類的相貌是很不容易得女子歡喜的。他的感情似乎細膩，簡直是那樣地禁不起，可說是帶一點女性的，他的性格使他憂鬱，而這種憂鬱，更流着他的性格擴大起來。其實他有一個質樸的性格，但他偏偏要學奢華。受過種種壓迫，而又想儘力猜測人的心理或想法迎合，因之，變得如此複雜。人家對我說他有時的煩惱是很簡單的，譬如對於X，這是上海人所謂「臘燭」，他並不在道義上接受X君的好意，他越是捧他，他越是擺架子，其實，這是何苦呢？不管他是一個什麽人，眞理正義總還是一樣的；何況在民主的邊區！並且X君還可以向上告狀，終究他是一個小團體的負責人，而在他之上還有別的人可以請求。我覺得這眞是一個不幸的人生！乂君一定曾受過一些不負責任的人的頌讚，因之他自已所信爲這一部分有特長的，而旁人的觀察却却不以爲然，一個人是常常會被某時期某些不負責任的人的偶然頌讚而走迷，路的，這就是認識了洋錮的正面而還不認識反面的人！乂君，他有這個自信，再加上一點憫陷，

那他能做些什麼呢？

搬家又搬家，同乂君隔得更遠了，乂女士已離開延安，不再聽人談著她，就是乂君，也不再來我處談天了。

在十一月初，陰曆只九月底的天氣，早晨，霜很濃，舖在白菜田地裏與山峯上，淡淡的一層顏色，使人起一種「已涼天氣」的感覺。沿著延水的公路上，很早，很早，就有人騎著馬在飛跑，「馬滑霜濃」，在這裏是一個現實的景象。駿馬應該贈於英雄，可是脂粉不當贈於美人，美麗的人何用脂粉呢，脂粉是用以掩飾醜陋的。有時，立在窰洞外，望著那亂草已枯了的山，與那連綿不斷的黃土，覺得異樣的淒涼。「塞外草先衰，」北方就是這樣。在故鄉，秋天的野外，有蘆花，柿子：：。說起柿子，陝北也有柿子，但遠遠沒有杭州柿子的大，我恐怕從來沒有吃上十隻柿子，根本不愛這種水菓，也就不去關心牠的價值與味道。

陝北有很大很大的霧，有時把太陽遮了起來，霧很低，整個天空與地面都變成迷迷糊糊的。怪不得從前我們的祖先軒轅皇帝因着實際環境的需要而發明了指南針。

夏，秋是陝北水菓最多的季候，是一年中可說僅有的吃的季候，有西瓜，小甜瓜，梨子，杏子，桃子（桃子與杏子很小），還有沙果，紅紅的，大得像蘋菓一樣，一角錢可以買到八隻十隻。接着，有白清棗，胡桃。有人從西安來，說在洛川一角錢可以買到一百多個胡桃。可是在延安城裏，我至多買到過一角錢三十個。當然，因爲交通不便，這些東西，從一，二百里外運到延安，馬上就增加到幾倍的價格。吃著胡桃，我想起小時候，家裏的老年人弄補品吃，把胡桃肉，桂圓肉，瓜子肉，糖，豬油：：：和在一起，蒸幾十遍，拿出來吃，這東西的味道眞好，在他們是吃補品，對於我，却從只因爲好吃，常常偷開櫥門拿來吃得玩。

非常歡喜延安的夜，月夜也好，黑夜也好。黑夜，同幾個朋友在小路上走，望着城外有一角的一帶窰洞，一層一層的透出燈光，完全像船停泊在九龍，所望見的香港，也從Hauterille瞭望Lompne的村景。這是我所最歡喜的夜景，牠使我高興，又使我很不高興。有時候，我坐在窰洞門外一隻小倭櫈上，在朦朧的夜光下，遠處的延水反映出絲絲白色的影子，像一個我見過的海港口的夜色。常常在窰洞外，覺得好似在船甲板上，我的下意識裏總要以爲底下是水而不是山溝。

延安的冬天，並不如何可怕的冷，特別是去年，聽說不算頂冷。雪在十月中就下了，前年，九一八那天就下雪了。雪花很大，眞有點像棉花似的一朵一朵。下過雪，太陽就出來，陽光照着連綿不斷的積雪的山，天空發出皓潔的反射。我想若在平時，人們一定歡喜欣賞這個雪景，但是這個時候，一般人的腦子裏自然地會這樣轉着：「天這麼好，敵人飛機怕要來罷？」天一下雪，山路很難走，特別是上山下山，兩隻脚不够勁，只好用兩隻手來幫忙。我覺得去年的延安冬天，就像天津北平一樣，遠遠及不上哈爾濱冬天的冷。夜裏很少有西北風，不過空氣是乾燥的，冷的。人家對我說離延安向西北八，九十里的地方，就比延安冷多了，有人甚至於說延安的北門外比延安南門外就要冷些，照情理講是通的，不過我個人的感覺還沒有這麼敏捷。

初冬的黃昏，常常望見隔着一條延水，那面對山的窰洞前，燒着一大堆火，火光一星一星的在暗中飛跳着，我忽然起了一陣驚悸，在電影中，我看到原始時代——就是現在有些未開化的地方還是這樣——殺人總是在晚上，當燒着一大堆火的時候，那就是殺人的標記了。晚上與火是一個可怕的信號！這些火光使我想得很遠，牠把我引到歷史裏去！殺人！這是一件痛快的事情，可是，事業並不是殺人所能完成的。如果要痛快，亂殺一陣，混殺一陣，把一個一個的人統統殺光，那不是再痛快也沒有了!!可是你的事業呢？事業是需要理知的，而不是感情的？忽然我覺得很好笑，爲什麼我的

思緒會這樣流空了實際，邊區，這是一個民主的地方，也是講人情道理的地方！牠堅決反抗日本強盜的虐殺，而在全世界愛和平，反法西斯蒂的隊伍中，他是小小的忠實的一員。

冬夜，在窰洞裏，如有一，二個朋友，圍着一盆炭火，談談天，那是彼快樂。這好像有一點詩意，有一點慵墮，但在這種半原始交通的地方，沒有現代的娛樂，那怕你是從紐約，莫斯科來的，你也沒辦法煩燥，你也只好安於這個。我非常愛冬天的小小窰洞，洞裏放着一盆炭火，會使你覺得好像住在歐洲中世紀的地窖裏。有時，我把炭火故意放在地上，那就更加像了。

大早，天剛亮，鄰近八路軍的警衛部隊，已在那裏出操了，他們在一塊出清了雪的小場上跑步，瞄準，一，二，三……他們唱起歌來了，「……東洋鬼子眞猖狂……」他們的影子，在淸晨初出的日光與積雪的反映裏顯得更生動而有勁，好像傲寒的冬梅。雖然很冷，但每天早上，我總歡喜站立在山上觀看一歇，這個景象使從暖被窩裏出來的人，一下子記起前線凶惡的戰爭。所有他們唱的歌我都聽熟了，只是聽不出辭句來。

嚴冬，延水連底凍了，人與牲口都在冰上走來走去，一片美好的冰場，可惜買不到溜冰鞋。延安的冬天生活，是乾燥而單調的，其實，也不單是冬天如此，經常是十分單調的，你只要看一看城門口站崗的武裝同志與抗大女生穿的服裝有什麼分別？有時候遠遠的連男女也分不出來，因爲這般單調，恐怕纖弱的人感到束手了。

開始解凍的時候，過河又成了一個大問題。延水上過渡的橋，只有總工會前的一條是好的，其餘的都是糟糕。有的是在水中小石塊上再放小塊石頭，有的打了木樁，上面擱幾條圓木頭，用細得像兩股綫一樣的鉛絲索住。可是人走在上面，圓木頭就動起來，老百姓的小脚婦人，走到橋邊，兩手俯下，用她的手，與膝爬過去。我希望邊區政府建設廳能够把過渡的橋建設一下。其實，並不需

變化多少錢。只須把那些圓木用大釘子釘住，圓木中間用一些乾柴乾草像紮辮子似的紮着，那麼一則不會動了，二則就不會滑了●

有一次過河，我站在河邊，那條所謂橋，是用狹而薄薄的木板擱在小塊石頭上，石頭又擱在石頭上，……這樣成功的。脚踏下去，木板一滑，脚就落在水裏了，那裏的水有一點深，我連忙伸起，已濕到了膝頭，後來，我繞了許多遠路，才再渡過河，走回家來。

陰歷年的前幾天，有幾個朋友會開玩笑說要到我處來吃夜飯。炭是五天之前就沒了，自已會出去買過二，三次，老百姓說：「留着自已用的」，唯一的棉襖與棉鞋都濕了，情緒是十分惡劣的。回到窰洞裏，有兩個朋友在那裏，他們一望見我，就出聲笑起來。「我掉在河裏了」，我對一個朋友說。「當然，這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另一位朋友說他的「呆話」。當我坐在小凳上，回過頭來，看見放炭的地方有了些炭

「我怕你今天還沒有弄到炭，所以叫人拿了點來」。那位朋友說。

很不好意思，因爲昨天我會同他開玩笑：「如果明天來吃飯，請帶點炭來！」

他沒有說什麼話，可是我覺得他做得很好的政治工作。僅僅爲了這點炭，一下子眼前都變成快樂而光明了，人就是這樣物質的，一點也沒有疑問。我自已，我也最不會用嘴吧來安慰別人的，我不會像有些人那樣說上許多一句也不着棱的勸解話，不會開這類的空頭支票。覺得如若沒有解決的辦法，說上千萬句不關痛癢的話還是徒然的。

一九三九年的第一天，早上九時左右，日本鬼子來了七隻轟炸機，投了幾十個無結果的炸彈，走了。給我們拜年。在炸彈聲中我們過了新年。陰歷年夜的上午他們又來擲了幾十個炸彈，敵人以爲最懂得中國人民的心理，他們以爲那天老百姓爲預備過年，擁擠在街上，一定是沒有什麼戒備的

，而且又新年一號來，舊歷年三十來，以爲這是最好也沒有了，誰知警報放得早，大家都跑走了，他們依然沒有達到目的。

過新年，元旦，延安不但各機關一例用國歷，就是老百姓也用國歷，在這裏，街上沒有出售日本鬼子替我們印的刊上五色旗的皇歷。在使用日歷的習慣上倒已完全統一與一致。年初一，附近的機關送了些花生與糖來，糖留了一點給自己，花生全請了客。到舊歷年元旦左右，西安的一位女友，託印度救護隊帶了一包年糕，鹹瓜子，榨菜來給我，眞是「喜從天降！」但在延安，什麼事也瞞不了人的，那到並不是有什麼包打聽傳達消息，這是因爲人與人間的關係比較密切的緣故罷，那怕是最最小的事情，特別，是關於吃方面的事，一下子就可以給許多人知道。

「你這幾天收到了好東西？」

一個朋友趕來，坐下，就問我。同時，他在窰洞裏用他銳利的兩眼觀察起來。眞的「家徒四壁」，他看不到什麼。

「怎麼？難道已經吃完了？」

我只是好笑。「你怎麼知道呢？」我說。

「明天請我吃飯，我相信沒有吃完！」他說。

「明天我要出去，」我笑着說。

「不管你出去也好，我們也要進來，把你窰洞裏的所有吃東西找來吃個光」，他滑稽地說。

年夜，幾個朋友在我處吃飯，瓜子在一小時內吃完了，年糕也吃完了，只吃剩一點榨菜。到次日早上，近午飯的時候，他們又來了，好像做了什麼惡事似的，一些形容不出所以然的面孔，「昨天的難不是還沒有吃完？」

「今天我是不想來的，又，昨晚回去的時候，在路上，他就說明天再來吃飯。今天他來約我，我說不去了，眞的，我自己鬥爭了好久才來的。」

當我來延安過西安的時候，一位熟悉延安情形的朋友，曾對我談及吃的事情，他說剛從延安出來的人，他們見了熟人就說：「你請我吃飯！」說這個的確是事實的需要。我想如果我回到成都，重慶，我是不是見了朋友也要他們請我吃飯。

陝北的春天，非常可愛，靑天無片雲，天氣暖暖的，氣候十分乾燥，爽快，在祖國，我還沒有住過像這個地方的乾燥的春天，只有國外，當我住在×國中央高原的時候可以比擬。一到春天，日子長起來了，衣服穿得少了，感到輕鬆。但是，討厭的風，那是我所最討厭的東西，括起風來，窰洞的門窗格格地響，灰沙從門窗隙裏一陣一陣飛進來，滿天灰塵黃沙，比濃霧更利害，走在路上，什麽也望不出來了，飛沙走石，那樣地呼呼作聲。

「你怕什麽呢？牠不會把窰洞吹去的」。一個朋友說。

但我恰恰不是怕窰洞給風吹了去。我只是討厭那聲音，而想能够製造出一個可以克服風比風更大的聲音。自從我憎惡賭博，對於玩麻將之類的事情不發生興趣了，但是有一種時光，我還想玩玩麻將，不賭錢，純粹玩，或者彈鋼琴，彈高音的曲調，但在延安，這兩件事情都辦不到。

在未到延安來之前，我曾在一份外國報紙上看到一位外國的朋友的文字，說陝北多斑疹傷寒，當時眞把我嚇壞了，其實，並沒有這個事，這位先生一定弄錯了，用普通常識來說，冷的地方，急性傳染病總比較少。陝北連普通傷寒也很少，像白喉等等都很少。就是流行性感冒最多，特別在春天，這個風季，大半是這個討厭的風帶來的。譬如早上很暖和，太陽也很熱，一下子括起風來，頃刻就涼了，風是那麼大，人們呼吸的空氣來不及經由鼻孔而暖和一點就吸進肺部，有些生長在南方

的人，沒有大風地方的人，一連感冒幾個月都有的。

在歐洲我過了七、八個春天，星期日的晚上，無數的人羣從近郊回來，每輛電車，每輛公共汽車，每輛地道車裏都溢出了鈴蘭花的香氣。「巴黎人眞傻！」年年春天看到這個景象，我有點煩厭。但是後來，離開了那個地方，每個春天，看着桃花，我總要想起那些情景與那鈴蘭花的芬芳。延安附近的山上有許多鈴蘭樹，我曾在一個熟人那裏看見揷着鈴蘭花，只是人們沒有去移植。春夜，那快樂而熱鬧的Vogue的音樂，與露天音樂，從溫暖的空氣裏送來，使人不想睡覺，恨不得飛了起來。聽慣了這種音樂，再來聽祖國南方春夜的池塘蛙聲，是怎樣的單調！現在、再來聽這陝北的蝲蛄！（住在延水邊的人有時可以聽到一、二聲蛙鳴，住在山窩裏的人只好聽聽蝲蛄！）雖然是單調極，但也聊勝於無，「今夜偏知春氣暖，虫聲新透綠窗沙！」牠報道春天已至。不過、窗裏的窗上一例糊的白色油光紙

延安的春天只有風聲，夜晚很少蛙聲，清早很少鳥聲，「處處聞啼鳥」在西北處處不聞啼鳥。有時候，偶然聽到一、二聲鳥聲，像白頭翁，有時一聲鵪鶉，把我的耳朵剌激得直豎起來，可是要追尋却又沒有了。麻雀與老鴉，這是延安最多的鳥，特別是老鴉，竟是那樣的多，牠們胆子很大，一羣羣的人在牠們旁邊走過，也不驚飛。倒使人想到是養家了的鴿子似的。當我無聊的站在窰洞門口透透空氣的時候，「這些烏老鴉也變成我研究與分析的對象，牠們的叫聲實在太討厭了，可是、我覺得牠們是極有知戀的，有一次、旁邊窰洞裏的鄰居，他們大約剛剛拋了一點什麼果子殼之類的東西，接着，鎖上門出去了。他們一走，一隻烏老鴉，牠飛到洞前，像一個偷兒似的、攝手攝脚的走了幾步，又斜着頭傾聽一下。在法郎士的小說裏曾寫着一隻「受過訓練的老鴉」，後來我在一個城市裏，眞的看到一隻受過訓練的老鴉，這隻老鴉，當人們走過廣場同牠玩的時候，牠好似還會罵人

」。本來是一家人家養着的，因爲牠常常把孩子的玩具啣到樓頂或別的地方，被趕走了，說是老鴉富於賊性的。西北的春天，牠是沒有一樣能使你感覺到南方的氣息，只有在雨後，一種青草的氣味，潮濕的氣味，使你嗅到一點熟悉的醉人的南方的春天，使你聯想起那些池塘，河沼，亭樹樓角，與秀麗的山峯。

近晚，延水邊浮着一層烟霧，這情景使我想起南邊河邊。一九三四年春夏的夜晚，我常常同着朋友在南邊河邊散步，有時候，就在早上，我獨個人也出來走走，有些西班牙菜菓車，他們早晨從街上推過，一邊叫喊：「鮮美的橘子，鮮美的香蕉，鮮美的青豆……」每一種菜菓上都加上「鮮美」兩個字。有時我不出去，偶而走到洋台上同他們開玩笑：「你有沒有「鮮美」的菀豆?」「鮮美」的櫻桃?」有時我就跑下樓去，同他們買點水菓。晚上，他們推着空車靜靜的回去。一晚，月亮下，我站在洋台上玩，一兩菓菜車經過。「你可還有「鮮美」的香蕉?」我俯身依欄輕輕地問。他笑了：「還有七隻。」「好，賣給我罷！」我放下一條繩子去。他把香蕉結在繩上，好像吊井水一樣的把牠們提了上來，但是給旁邊的朋友知道了，結果我自己只吃到兩隻。但願快快趕走鬼子！我還可以去過過故鄉的春蛙的夜晚，也還可以去吃吃那些鮮美的香蕉！

Ⅲ陝北的古蹟，陝北的美人，陝北的名菜，陝北的朋友

陝北該有極多極多的古蹟、古極古極的古蹟，但是現在，往什麼地方去找呢?而且恣無頭緒，手邊，一本書也沒有，想找一本「延安府誌」都找不到。

延安，看看好像遠遠及不上我家鄉的一個村鎭的大，但是、牠還是「府」呢。老百姓至今還叫「延安府」。延安又叫「膚施」，在外邊時，一個熟人曾說這是有典故的，仁慈的皇帝爲救一個人

把他自己的身上肉割下來給一隻食餓的神鷹吃，所以叫「捨施」，就是施捨的意思。小時候我曾看過一本古時傳說的書，談到這個，現在已經記不清楚，可是，就使記得清楚，也並沒實際用處。

有人說楊六郎就死在這一帶地方，他的墳墓就在附近。延安的城外有一個很大的墳墓，裏身已看不出來了，只見許多蟠龍的石柱，石碑在着，這些東西給了我很多的想像，但僅僅是想像。

在從前，因爲這裏接近京城——長安，每次統治者的變換，這裏的人民是最早會受到影響的，同時，又是軍事上極重要的地點。陝、甘、寧、青這些地方過去有多少血染成的歷史！古詩裏有許多歌誦塞外的詩，從那些詩裏我們也可以想見一點當時的一切。

離延安不遠的地方，聽說有一個「馬超祠」，不知道與馬超是不是有特殊的關係。延安附近有一個山，叫清涼山，上面有幾株樹，還有一個很大的破廟，跑到山上遠望，延水若帶，寶山像一隻一隻的盆子。

究竟從什麼時候起，我們的祖先開始絡絡續續往海邊一帶移？恐怕不易查考。現在我是浙江人，但聽從前家裏老年人說，我們原來本是河南人。許多人都要集中在海口這個情形，實在是並不好的。在抗戰以後，我希望我們國家，要有眼光的建設內地，而特別要注意建設邊疆，建設邊疆，就是保衛邊疆，同時人們也不會因貪海口都市的繁華而集中在那些地方。譬如一個人的發展，腦，心，肺，胃，腸手足……都要平衡，才能健康，邊疆，猶人的四肢，如果邊疆弱，那怕心肺……都好，這個人也是不健全的。

在歷史上，陝西是出產美人的，楊玉環就生在陝西。陝北的美人，現在如我所見的，就是這個問我小時候家裏那些「繡像繪圖」的小說上所有的簡直一式一樣，楊貴妃式的，圓圓而粗粗的身材，圓圓的鴨蛋臉，眼睛是單眼皮，厚厚的臃腫的，眉毛稍些上豎一點。有許多女孩子，她們生得健

成而美麗，可惜她們很少洗臉，面孔上總是有鼻涕乾，灰沙，同汗所積成的東西。頭髮也總是蓬蓬的，最可憐而又討厭的，很小年紀，她們大部還裹了脚。

我剛到延安，住在城裏，那家老百姓家有一個女孩，生得有我一樣高，這是一個美麗的女孩，長圓面孔，粗圓的身材，完全是典型的陝北美人。我曾同她搭話，問她識字不，她回答說不識，問她爲什麽不進識字學校，她說她年紀大了，其實也還只十五、六歲。她又說她的弟弟是進學校念書的，現正放暑假。原來，沒有幾天之後，她就出嫁了，我却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沒猜想到。一個中午，看見院子裏有許許多多的男子，鬧鬧的熱鬧得很，問了人，才知道這是房東人家做喜事。很簡單的，前面有些穿短掛的男子引濤，新娘穿着紅衣服哭哭啼啼上了綁着紅毡（陝北是出產毡毯的）的毛驢子，媒人騎在後面的毛驢子上跟着，在媒人後面，有人揹着一些圓的餅，小小大大的積疊起來，像我們那裏的塔餅，但這裏是用麥粉做成的，也沒有餡子。下一天，她回門來了，滿頭戴了紅紅綠綠的紙花，打着哈哈的笑聲，旁邊模關裏的小勤務們對她問長問短，她快樂的回答她們，但我可習她有點不好意思，竟不敢望她。

美的觀念與美的標準是隨着風俗習慣而改變的，歐洲人認爲希臘式的鼻子——額角到鼻子是平矩的——是最美的，大眼睛，雙眼皮，也算是美的。中國人愛單眼皮的眼睛，與細小的眼睛。一位南方熟人對我說，陝西人說話多鼻音，認爲多鼻音話的地方的人，是很情慾的，這是根據什麽說的？不過我不歡喜陝西北美人的單眼皮眼睛，好像永遠睡不醒似的，那倒是我的實話。

延安除了合作社外，老百姓開的館子也不少，但是如果問到陝北有什麽特別的菜 我却回答不出。

「我會做三不粘」，有一次一位朋友說。「三不粘」？我不懂。「這是陝北的名菜」！人家對我說，怎樣的好吃，而且是甜的！待我吃了一次，天知道，其實就是溜黃菜，不過是甜的，做法頂

簡單，把麥粉與豬油，蛋黃及糖和水放在一起燒，燒到一個沸的適當的程度，就成了。我呢，把它變通辦法，因爲不能多吃油，只放了一點點油，把麥粉與蛋黃及白都在內和糖與水燒起來，就像Gem一樣，有時我把牠做了冷下來吃，那就像冰淇淋。朋友們許我這一點小小的發明，「三不粘冷吃」！可惜買不到香精，如果放一點香味，那就十足像冰淇淋，在延安，也許可以賣到四、五角錢一杯呢！

我這樣嚕囌地談着吃，恐怕人們一定要以爲我是一個極貪嘴的女人，或者以爲延安也像別的地方一樣，「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大家在講究吃的，那倒不是這樣。我說，在延安，並不如人家所猜想的，連飯也吃不飽，有時候可能，還可以弄一點玩意兒。

「軍人合作社口蘑湯，抗大合作社八寶飯……」熟悉館子的人把名菜一一背出來，我很少上館子吃東西，這方面的市面一點也不靈通。

「聽說法國人非常愛熱鬧，沒有客人過不來日子，你大約也有點這樣！」一位朋友看見常有人在我處吃飯，對我說笑話。

「那裏！」我幾乎要跳起來，「我一個人可以幾天不出門，幾天不同人講話，你以爲我最愛熱鬧，最怕寂寞的？」我說。實在，我是最討厭一般人的消遣——聊天。我是並不歡迎朋友來吃飯，要熱鬧——也有些人需要熱鬧，非熱鬧不可的人，但恰恰不是我——他們並不是我去請來的，有時我甚至於很煩燥，倒並不是肉痲一點菜，因爲有人來總不好完全不理他們，浪費時間，不能做事。在他們通常是做完了事到我這裏來找點東西吃吃，在我却被他們攪掉了做事的時間，但是我總不願表示我的煩燥，把牠克制下去。平常總是這樣很巧的，當我燒了一點東西，就有朋友來，好像有人去通知他們似的。有一次，我好不容易靠了一位熟人在一家合作社讓買到一點糯米，放在一隻紙盒

裏，急到近住處，才發現已漏去三分之二。把剩下的燒紅薯糖粥吃，剛剛燒好，第一口放進口裏，兩個朋友來了：「你吃什麼東西呢？」我真的只有笑。

在外邊，我看見有些好客的人，脾氣是各人不同的，有的人歡喜把菜的價目在吃的時候講出來，表示這些菜的有價值，表示他對客人的尊敬，使人覺得厭煩，覺得雖然請，而並不如何捨得的。又有些人歡喜在吃的時候，說這些菜是經過了怎樣複雜困難的手續而做成功的，好像把請來的客人看做從來沒有吃過什麼東西而什麼也不懂得的。對於請客，我歡喜歐洲人的習慣。他們通常是不大請人吃飯的，總是要好的朋友（外交的宴會不在此例），通常他們請茶點，會客的日子，每星期也有指定的一天。——託爾斯泰小說中描寫俄的家庭是如此，但不知現在怎樣——他們並不用最多的菜請客，像我國的習慣，却是用認爲最好而知道客人歡喜的菜請客。如果客人吃得很多，主人就表示極大的快樂，認爲他的菜是成功了。我也歡喜那些溫泉療養地與鄉村裏的館子，他們的菜是很帶家常色彩的，每上一隻菜，飯館主人——通常主人自己兼做大司務——出來問你：「這隻菜好吃麼？太鹹麼？」如果你表示太鹹，他真的就拿進去給你換一隻來。

有一次，在魯藝前的墳堆裏，一位朋友給我介紹他的朋友「ㄨㄨ」，接着，他馬上開玩笑：「你要去她那裏做食客麼？」

我想，在邊區，不知有沒有食客這東西，該是沒有的罷。

在延安，像我這樣自已燒點菜吃吃是很少的，一般人因爲工作關係，有鐘都上館子吃，就是女同志，自已會燒菜的，也這樣。所以友人們到我這裏來吃東西，變成特殊情形之一了。

邊區社會，特別是，八路軍裏的老幹部，他們不像外邊社會上的人與人之間有特殊的友誼——或者這種友誼，在他們看來是不是審華的靈魂所造成的？——這裏是有一種普遍的友誼的作風，你

看他們之間彼此相見，一般都是非常親熱，他們曾一同經過多少艱難困苦的日子，大家九死一生，這種友誼是非常的，他們的工作與生活及一切彼此都太熟悉，所以當幾個老幹部聚在一起的時候，一個外邊來的人擠在裏面，頓覺要感到陌生與隔膜。但我想人總有一種偏愛，譬如說罷，某人同某人結婚而不同某人結婚，這是一種偏愛。譬如有些人歡喜同某人在一起做事，這也是偏愛。所以我想還是有友誼，特別一點的友誼。

「某某常到這裏來玩麼？某某常來看你麼？」有人會常常這樣問我，我想我不是一個機關裏的負責人，也不是延安的交際名星，那裏會有許多朋友呢。在延安，我還沒有什麼朋友，一個人到了中年，很少有機會能交際到那些所謂知己朋友，當你走入社會，你就會感到事業與學問上的朋友是那樣難得，有的人愛名，有的人愛利，有的人愛……除非你一絲一毫的事情也不做，否則總要碰到嫉妒這類感情。好勝是人類優良的感情，但如果這個感情擴大到近於嫉妒，已經有點討厭，因為嫉妒會蒙蔽真理與正義。如果由嫉妒而走到陰謀，那不但討厭而且太陰險可怕了。在延安，只有一，二個年紀輕的小朋友到我這裏吃吃飯，倒是有的。

IX 轟炸的前後

在第一次轟炸（十一月二十日）的前幾天，日本飛機來偵察過好幾天，十七號的大早晨，大約六時半，一隻銀色的敵機飛得很高，從西往東南，飛了一圈走了，有人還望見牠擲下一把傳單來。但誰要看呢，他們真是白費了紙張。那天早上在窰洞門口，我清楚的望見高空白色一點，可是附近機關裏的人，有的在喊：「蘇聯飛機」！有的拍着手：「我們自家飛機！蔣委員長送錢來！」可是，自家飛機何必飛得那麼高呢？事後，經過了一番討論，大家只得承認今天又是敵機來偵察過了。

「延安山太多，不會來轟炸的」，「延安只有上午十時到下午二時飛機能來」，還是一般人的論調。偵察在早上六時半就可以來，我想對於聰明人，這個事實是值得研究的。倒底第一次轟炸多少都有點損失，而延安第一次轟炸的情景，我不願也不敢想像。

延安的空氣裏有了緊張的氣息，但城裏依舊擁擠着人羣，倒處是人聲，笑聲，話聲。大家有時候談到轟炸：「會有」，「不會有」，總不外這兩種。

一位長征過的女友，曾再三關心的叮囑我，如果敵機來轟炸，叫我馬上跑出窯洞，到附近山溝裏去躲。「長征中，她有經驗，飛機的炸彈常常把甘肅一帶的窯洞震塌，壓死過不少人。我在住處的四周，我曾仔細研究地勢，什麼地方是有較爲好的，但我也研究不出比我窯洞更好的地方，我倒曾想一想如果窯洞塌下來，該怎樣爬出去，可是只想了一下，就沒有再想下去。

聽說在好久之前，就有疏散的號召，但是老白姓的店舖一家也沒有減少，「機關裏還在造房子我們搬什麼？」他們說，還好像以爲叫老白姓疏散掉，機關裏可以自已來做市面。老百姓是非常執拗的。

二十日，這是一個晴明的星期日，學生們照例到城裏買零食吃，看朋友，上合作社吃飯……平常，上午，我從不出去，爲想做一點事，下午三時以後，人疲倦了，需要透透空氣，需要走動一下，有時我就下山進城遶一個圈，買點水菓回來。早上，八時左右，X來了，她說X因爲胖走不動，今天不來看我了。我正急於寫，移一隻小方凳放在門口：「你請坐罷，好！在這裏，晒太陽」！把一本雜誌交給她：「讓我寫好這點，我們談天」！我背向外，太陽從門口進來，晒暖我的背。

「拍」「拍」！清脆的兩下槍聲——後來，有人說聽到三下，但我只聽到兩下——我立起來，挺了挺胸口，伏在高度與椅子不相稱的桌子上，胸口常常不舒服，站在門口，我說「那裏來的槍聲？」

「打靶子麼！」又用她們的家鄉口音回答我，放下雜誌。

轟炸機的沉重的聲音，嗡嗡嗡，像一隻了不得大的爬虫似的，已經到了頭上樣。「飛機！轟炸機！快往裏面跑！」我這麼喊：把門關上，轉身往窰洞裏面跑時，炸彈已下來了。

飛機的聲音遠去了，走出窰洞去，遠遠的望見西山一帶冲起烟與沙土，那邊大概是落了炸彈，「不知窰洞塌了沒有？」特別是一些有熟人住在那一帶的，大家心裏惶然的問着。

許多人從山下奔上來，有四位女同志，兩位男同志，跑進我的窰洞，大家敘述各人的感觸與所遇，×君的女友×女士也跑在我的窰洞裏，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她的另一方面，她在城裏，沒有聽到警報，因爲工作地點人聲很鬧，飛機已到了頭上，她抱着顯微鏡，拼命奔出來，投彈時，她剛到城外，等一陣炸彈投過，她再過河，跑上山。在山下的窰洞裏躲了一歇，一位同志把她的顯微鏡代收了起來。跑到她自己窰洞，一個人也沒有，於是她又跑到我這裏來了。在危急的時候，她並沒有拋棄那工作工具，顯微鏡，在這個時候，買起來也得幾百塊錢呢。

飛機又回來了，一個炸彈下來，把窰洞門震開了，泥土像濃煙一樣飛揚起來，撲進口裏，空氣受到了激烈的震動。「毒氣毒氣！」有一，二位女同志喊。「不是毒氣，泥呀！」有人回答。這次的炸彈好像落得離我們不遠，窰洞狠狠的抖了幾下。我一時心裏也担足。「會不會這些泥土掉落下來？怎樣掉落下來？」我想。但窰洞只是震了幾下。

飛機終於去了，一場大驚恐過去了。在任何場所我歡喜把自己提出來，在旁邊看，這個時候我少把自己提出來。有的人，裝出極大的鎮靜，心裏未始不惴惴然，有的人就一任他感情自然的流露。其實，在這種特如其來的死的威迫之前，誰都有一點驚恐，不過依照各人的性格，分量上有一點差別。前年，在南昌，有一個朋友，當每次轟炸時，他在炸彈聲裏數炸彈：「一，二，三，四，

五……」。這時在我窰洞裏有一位四川籍的女同志，面上有一點天花的疤，她驚惶得那樣，「怎麼辦？怎麼辦？」連連問，一面兩手蒙住耳朵，把頭縮碰着壁角，我忽然想起駝鳥是這樣來躲避人家去捉牠的，覺得好笑，但又不敢笑。可憐的女孩，她是從大後方來的，從沒有遇到轟炸。在這種時光，有些人歡喜擠在人多的地方，在南昌時，一位蘇州朋友，他的家眷下鄉去了，常常到我家裏來過夜。「如果我不下來。請你們喊我！」他上樓去，再三叮嚀我們。敵機來夜襲，他一邊跑下樓來，一邊喊：「這是空襲警報，還是緊急警報？」平常，我們坐在客室裏的沙發上，女僕的脚一直伸觸到地板上，也不覺得不舒服，呼呼地睡覺了。但當這位蘇州朋友在的時候，他擾亂了人們的羅夢，「怎麼辦？」女僕就連連的像小孩子似的問，一個胆怯的人是很容易把他的胆怯傳佈開來的。有時，在警報之後，我們把籐椅移到園裏乘風涼，「月亮這麼好，」大家咒詛月亮。「緊急警報來了之後，隔多少時候飛機到呢？」蘇州朋友提出這一類問題問另一位朋友。「我怎麼知道呢？」朋友回答，在暗夜裏，他拉了我的衣袖，我忍不住想笑。這位四川女同志使我想起那位蘇州朋友。

哈瞄的聲音遠去了，消逝了，每個窰洞裏出來了許多人，大家站着，互相問：「炸了什麼地方？」可是大家都答不出。有的人莫明其妙的呆立着，好像正在找尋夢境，是耶非耶的心情。在我附近的山下，落了好幾個炸彈，一，二，三，四，五，六……仔細遠看，有九個洞，沿延水邊，有一，二個人倒着，再往另一面看，倒着一個人與一隻性口……。第一個負傷者上來了，是一個住在邊區醫院的新從衛生學校出來的年輕醫生，耳朵上流着血，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好似被什麼凶惡的野獸咬了一口，惹起了忿恨，有點興奮與特別。這一下，殘酷的現象，開始擺到人們的眼前來了，希望炸彈一個也沒有爆炸的人們，心是擅抖了。

十時多一點炸完．到下午三時還不見有人出來做救護工作。「怎麼山脚下的人，還沒有去救護

？怎麼的？」有一、二個紅十字會的女看護站在山坡上說。人是走來走去很多，大家探聽轟炸的情形。好似羣龍無首。終於、謝天謝地，保安隊的担架隊出動了，邊區醫院的救護隊也出動了。在延安，什麼都是戰鬥員打頭陣，讓我讚美你們，延安的保安隊！

我燒了點飯，給躲飛機的朋友們吃，吃過，他們都走了。我想出去看一看炸過的地方，但是鄰居的朋友託了我一件事情，叫我在天暗之前不能離開窰洞。

人聲呀，哭聲呀……接連不斷，從山下一披一披的上來，輕傷的負傷者，由人們扶着走，重的，抬着，有的，到醫院，已救不活了，又抬出來……我沒有心緒做事，又不能走開，就把震破的窗紙撕下，重新糊過。我爬在窗口，望見整個對面山上所經過的一切。

好幾年來，我同醫院好似結了很大的緣，醫院不是在對面，就是在隔壁，醫院常常做我的鄰居，許多值得描寫的悽慘情景從我眼睛底下過去，可是從來沒有像這一天的轟炸受傷的情景，使我難過的。

到六時過，天快暗下來，我獨個人摸下山去——電筒給人家借去了——先到文協會，看見區平先生與一個小勤務在理最後的一點東西，所有的東西都已搬掉了，今天在轟炸時，有一位先生把門反鎖了在房間裏寫東西，鎖匙放在別人身邊，想想看！真糟糕！後來他們乘飛機打圈的空隙，跑出去了，回來門上鎖匙都已打開了，每人、偷掉了被褥與書籍，這算是小小的損失。

整個的延安城，好似穿上了喪服，是的，今天死傷了一百多人，街上沒有一盞燈，人們垂着頭，默默地迅速地走着，店舖都搬空了，再也聽不到老百姓的「偶」「偶」（陝北人說「我」字，像我們江浙人說「偶」字）的熱鬧聲音。碰見一、二個面熟而不知姓名的人，就彼此慰問：「你好麼？」感到一種同危難的親切。

一隻負傷的毛驢子，在淒涼的街上獨自跑着，牠痛楚，還是找尋牠的主人？牠該是被拋棄了的？顯然他的主人覺得他已經沒有用處了。我的心眞的凄傷了！

機關合作社，西北旅社一帶的房屋倒塌了，滿街瓦片，死的已埋了，傷的已抬走了，沒有什麼，只有荒涼。

出城門時，遇到某君，「某君，你陪我走一節路，好不好？」天已暗足了，幸虧某君是抽香烟的，身邊有火柴，我們走幾步，燃一根火柴，謝謝某君，他不但陪我過河而且直送到我山上。

城外一條路上，暗黑中，有人在裝電線，機關一面搬，電線一面裝，這種軍事化的迅速，是八路軍最强最强的地方。看見有人好好工作，那怕是極小的工作，極不被人所看重的工作，我就快樂起來，我們還有希望！中國人的命運還是樂觀。

山上機關搬到近郊去，城裏機關搬到近郊來。人聲，哭聲，馬蹄聲，人馬雜踏的聲音，一直鬧到天亮。到早上二時半，我還守着窰洞，沒有睡覺。

我的直覺，今天——二十一日——日本飛機還是要來轟炸的，什麼理由，我說不出，不過我覺得日本鬼子是這樣的，他們要擾亂我們，要炸一個「下馬威」。對於延安的轟炸，我還沒有經驗，不知道要炸成個什麼樣子，而窰洞的抵抗能力究竟怎樣的……我決定二十一日的早上到較遠的城外友人那裏去。

起來，天沒亮足，五時半，其實，根本一夜沒有睡覺。附近機關還沒有搬完，地上堆着許多白布……等等，人們正在不斷的把這些東西裝到牲口背上去。旁邊窰洞裏的一位朋友，前幾天，曾約好一個城裏朋友今早去看他，本來早就該去的，因爲前幾天下雪，積雪，溶雪，山路不好走，已改過一次期，今天是不能再改期或失信了。我很想勸他今天不要去城裏，這句話已經在口頭上了，但

是還有說出來，「就是女人妨礙男子忠於他們的職務」這個思想使我耐住了那句話。

渡河時，紅十字會的女看護隊裏的兩個女看護，正從城裏摃了一隻桌子向山上來，她們遠遠招呼我：「昨夜來不及搬完，今早再搬！」

晨是寒冷的，清寂的。

過清涼山渡河的地方，在文協會轉拐的街角擺水菓雜貨攤的老太婆，她同着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坐在岸頭，旁邊還有一隻大木箱。她不再是那樣狡滑，頑皮，平常同她買花紅，她把爛的給你，卻是抬起慈和的眼睛，望着我，她的神氣，如像一隻忽然斷下翅膀的鳥。「昨天受驚了罷？」我說。「自然哩！你想我們房子四鄰都中了彈，我……」

我望着她的木箱，「只有你同她？」

「我們等老漢，老漢回家去搬東西了。我年紀大又走不動！」

「可不是？」我望着她還一雙可憐的小脚，「快不要把你娃娃再裹出了！放了罷！」

天下着濃霧，像小雨一樣，空氣是冷的。霧在我的大衣領上結成了一片白色的薄霜，我覺得很冷。隔着延水，在霧裏遠遠望見有些人影在移動，不知是往那裏去的。

到朋友家約二十分鐘，那進城的朋友也到了：「剛有警報」！他沒有見到他的朋友，城裏是空空的。

飛機從我們窰洞上面飛過，接着，炸彈下來，一連好多彈……，終於靜寂了。

急於要回去看看，可是在離城不遠的地方，有好些人停在那裏，說還不能通過城，大家就聊天，這個地方有好幾個炸彈洞，就是今天早上的成績。

又同了她的隊伍走過，她偷出一歇來對我講了幾句話：「昨天，我同個個女同學在河北旅館洗

深，警報沒有聽到，飛機聲音沒有聽到，炸彈聲也沒有聽到，直到後面屋子燒起來了，老百姓喊叫，我們才從水裏出來……走出河北旅館，那屋子就倒下。眼前都是屍身，一塊一塊的肉飛到腳跟前來，我伏在地下，自己想，「聽天由命」！後來，飛機第一次投過彈，我們跑出城來，幸氣還好，我們還不認識延安城，居然一下就跑出了城，如果那條路是不通城外的，可不是糟了？」

經過城邊，知道了昨天防空實地演習——只有血的經驗是最寶貴而實用的——的結果，今天一共只死傷六個人。城門口站崗的兩位武裝同志，有一位是英勇地犧牲了，飛機飛到頭上，他們還不倒下，炸彈下來，一個已經倒下，一個還是直立着！現在我們經過城邊只剩了他獨個人，他的同伴已不在了，為了維持城內秩序，為了偵察漢奸，他犧牲了！呵！延安的站崗同志！他在我們民族解放的歷史上，是一首短短的史詩。

今天我到城裏打了一個大圈子，把炸過的地方都看過了，「回去還要深深地研究一番」，朋友們這樣笑我。

城裏一個人也沒有，——有是還有幾個，不過比起未轟炸之前來，好像陡然覺得一個人也沒有了的，冷寂淒涼！聽說昨天曾捉到了漢奸。漢奸，這類東西在邊區也有！天知道，真是沒有一個地方是乾淨的！日本特務機關的魔手已伸進到邊區來！當然，這是一個敵人不肯放鬆的地方！但不知道這些走狗拏多少錢一個月呢？對於這些漢奸，我主張責罰嚴厲一點，從前，我覺得人類有死刑，是人類的羞恥，可是，對於這批漢奸，我倒覺得有時用死刑也好！在南昌，每次鎗斃幾個大一點的漢奸，我們老百姓就得幾夜安眠！南昌的小漢奸，當敵機來放信號，他們拿兩角六分錢一天，他們大半可說是為了生活的逼迫，及他們的無知，但他們為什麼這般笨呢，日本鬼子就在他們放信號的點投擲炸彈，這批小漢奸自己的命不是也很糟的？在邊區，老百姓生活得好好的，我就不懂為什

麼要做漢奸！

晚上，立在窰洞前，望城裏，簡直一盞燈光也沒有，黝黑而古舊的城牆圍着一座空洞而黝黑的城市。今天鼓樓上落了一彈，把「韓范舊治」炸掉了，落下了幾塊瓦磚，別的一點也沒有動。對於我國的舊建築不禁驚奇而頌讚起來了，牠雖然比不上鋼骨水泥，但是七、八十磅的小炸彈，倒也不在乎。

二十二日，我決定不走了。七時左右，在窰洞門外看早景，老百姓一個一個的走出城來，趕着他們心愛的毛驢子，背着包裹，扶老攜幼的下鄉躲飛機。號子一響或偶有一個人跑，別的人就跟着亂跑，他們還聽不懂警報的號音，而他們是嚇壞了，一切聲音對於他們都有極可怕的意義，簡直變成草木皆兵了。

乂君的女友乂女士，這兩天在我處吃飯，她的工作機關夜裏搬家時，沒有通知她，而新搬來的機關不便承認她，不肯開飯給她吃，總之，在特然的移動裏，有些事情弄得青黃不接，幸虧我是自已燒飯吃的，還有點米，她就在我這裏吃，等待她原來工作的機關放毛驢子來接她及她所保管的東西。

八時左右，我要到六，七里外去託人帶寄稿件，——不幸，那次恰恰失落了，而我倒奔走了一點路——乂女士沒有事做，說她陪我去，這樣，雖然不是去躲飛機，而事實上却同那些躲飛機的人一道到近郊去了。

太陽已帶着一點暖意，開始照在山頭上了，路上行人已沒有大早的多，躲飛機的人早已走去了。寥落的清晨的街道，嗅着一點乾草的氣息，我回憶起魯森堡公園的Rue Vangirard 路，有一個冬季，我去補習法文，天天要經過這條路，清道夫正開過了自來水管冲洗道路，道路上一朵灰塵也沒

力，我出神地呼吸冷冷而新鮮的空氣。有一次，我曾在那路角的咖啡館前跌了一交，跌得很利害，一時爬不起，一輛公共汽車正開來，咖啡店裏的侍者跑出來拖我的脚，——「一定是怕我被汽車輾落了」——我立起來，覺得很不好意思的，頭也不回的跑過了馬路，忽然想起剛才沒有對那位侍者先生道謝，不安的心壓倒了不好意思。

X女士同我兩人靜默着走，我呢，沉在遙遠的回憶裏了。在離城不遠的地方，兩個面頰紅紅的，穿着軍裝，强壯而結實的青年，走來，見了我們，其中一個，他唱起來：「陝北土包子，住的土窰子……」另一個接下，「吃的小米子」。我忍不住笑了出來。他們走過去了，在我們背後，也發出清脆的笑聲，這是新中國的笑聲！開始的笑聲！

在幾個小墳堆旁，X女士遇到一個青年，「X X是不是X X」？她問。她是近視眼。那個青年把身子悵悵似的搖了一搖，掉轉頭，好像要哭似的。

他們倆立定了說話，我慢慢的走着，等待她來跟上我。「一定是她曾經開罪過他，拒絕他的情愛……」我想。

她來了，說她的朋友！——剛才這個青年，她的弟弟前天炸死了，今晚他邀她去幫助埋葬他的弟弟。

談過信，我們慢慢的無目的地走着，朝城的方向。想回去，又想晚一點回去，總是想不定，不是說笑話，自己諷自己，因為確實，腦子裏還在想到轟炸與飛機來不來這件事情。「現在你們回去不太早一點罷」？有的人從城方向來的，對我們喊。延安人是沉在躲飛機的高潮裏去了。

我們順路走進一個山溝，那裏面居然「別有天地」，在那一塊一塊生得很好而很巧妙的巖石下人們坐着或躺在高粱桿子堆上躲飛機，我們走到最裏面的一塊巖石下，有十幾個扣着X X徽章的學

生，在那裏，不知道他們怎麼取了單獨行動而到這個地方來的。

我們想留着，因爲這個地方很好，吹不到風，高粱桿子堆得亂高的，很乾燥，男青年們看見我們坐下，他們嘻嘻哈哈說笑話，唱歌，特別利害，顯然是因了我們的存在而興奮了。X女士對每一個男子都好似要打招呼、微笑，這就招來了他們對我們更甚的開玩笑——上海人所謂吃豆腐——我很想回給他們一下，無奈X女士太不爭氣。

結果，我們換了一個地方，在一塊最不好的巖石下。那裏有一個中年婦人，同着四個小孩，大的男孩子已經長得很高了。婦人把被褥鋪在地下，呆呆的坐着。我們把那不多的高粱桿子，鋪搠起來，做成一個狗窩似的，一邊可以擋住風，一邊靠在巖石下，可以躺，也可以坐。在小時候，我最歡喜偷進柴間裏去玩，去「搭棚棚」，整天在裏面，吃飯都可以忘記，但是現在，這個爲我童年所常常夢想而不能做到的狗窩樣的「棚棚」，却一點也不使我歡喜！

我們要那個婦人也坐到我們的窩裏來，她那裏風太大了。這是一個典型的陝北美人，胖胖的鵞蛋臉，粗粗的圓圓的身材，還同着一雙三寸金蓮。北方的女子，皮膚很粗，這是同南方女子完全不同的地方。在國外，我遇見一個波蘭畫家，他說中國女子的面部皮膚有時候細到發亮，這種亮光畫家感到束手。我想他所說的大概是中國南方的女子。

小女孩，看去五，六歲，生得很美，非常頑皮，一刻也不停，吃棗子，又吃餅，大的哥哥，擺出「長兄爲父」的神氣駡她，第三個哥哥，「苦惱三官」，像我們家鄉所說的，一般父母都不喜歡第三個兒子，他生得呆頭呆腦，十分歡喜他的妹妹，把她抱着、笑着。母親帶着溺愛的口吻勸止她的子女們的頑皮，我同X女士笑着對她說：「你不要太寵壞了她！」

她一邊梳髮髻，一邊對我們長長的敍述起來：「前天……飛機的聲音已聽到了，我同了娃娃（

娃指着小女孩）跑，旁邊的一位女同志，她拉了我的娃娃跑，跑得很快，叫我快快跑！我的大孩子挑水去了，他們（指第二個與第三個男孩）跟了我跑…：老漢在篩小米。我叫他快逃，他說：「篩完這一升小米」。我們跑到城門口，炸彈下來了，……我們在河邊石窰洞裏躲到天暗，才回家去。

走到城邊，碰到從前同老漢一起做事的男人，他看見我，說：「乂嫂，大家以爲你一家都完了！乂哥恐怕……」我回到家裏，大孩子跑在城外，剛剛到，他身上濺了一身泥，他說剛放下水，炸彈下來，他伏在地上，水與泥濺了一身。……老漢倒在磨子旁，他身上一點傷也沒有，只有嘴吧裏流出一點血……」

她哭了起來。

「我買了一口十三塊錢的棺材，做了全身衣服，一共用掉五十三塊錢，我同他夫妻一番，也算對得他起了。起初，我想我不要活了，我只是哭。老漢的同事們勸我：「乂嫂，你還有未完的責任，乂哥要你好好兒做的，就是好好的管着這些娃娃們，」我想，可不是的？娃娃們誰來管呢？」

前幾天，當敵機來偵察之後，她的丈夫，從前是一個新中華報裏的送報工友（他們住近新中華報），把新中華報裏的一個防空洞，下過雨而倒塌了的，工友們覺得不能用，索性把牠弄平了，她的丈夫又去爬開來，同她說：倘使飛機來，你同娃娃跑不動，躲在這個飛機洞裏（陝北老百姓不叫防空洞），我同大的跑出去……」

他從沒有罵過我，打過我，我歡喜他，我歡喜他！」忽然，她哭得非常利害，瘋狂了似的喊起來。

我的心激跳着，「我歡喜他！」我愛他的意思，陝北話竟同我的家鄉話完全一樣。我覺得十分難受，想嘔吐了。但是乂女士却笑着，笑得那麼利害，對於她，這種人間最悲慘的事故，好像是一

個有趣的祕密，我有點不高興她。一個未婚的女子，她不會懂得這類苦痛，但至少一個人的死亡，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她的大女兒已嫁了人，曾離婚過一次——前夫是一個江蘇人，從前在延安做電報局長——現在的女婿是在漢中做縣長的。她身上的布罩衫裏穿着綢面的皮襖，裹面還露出白色的細絨襯衫，「這是我女兒寄來的」，她指她的襯衣。「我把帽子（一頂新的絲絨帽，這些東西在外邊是太平常而且式樣也過時了，而在延安却足以代表一個人的資產呢）同衣服統統穿戴上了，我想倘使屋子炸壞了呢……」

她的大兒子十七歲，年底要結婚，她說老漢太沒有福氣了，見不着新媳婦。「我們那裏想到飛機呢，去年飛機也來偵察過不知多少次，但從來不見來轟炸，公家叫我們疏散，可是，公家機關一個不搬，老百姓生意做得好好的，那一個想搬呢？我們只想要過年了，替娃娃們做衣服，做了一件再做一件，延安這幾年的年成太好嘍！老百姓恰恰過得好好的，要來炸了！」

「前幾天，狗對着我們的門叫了五天……」可憐的婦人，她只好求援於迷信，來解慰她丈夫的慘死。

這是一個長於敍述的婦人，我恨我的筆太笨，不能照她說的寫下來，否則就是一篇完妙文字。她同她丈夫相差十五歲——她小——可是她覺得很幸福。她說：「夫妻緣分好就歡喜，夫妻沒緣分要吵架離婚。她不相信什麼愛情，第一是要緣分，像所有的陝北老百姓一樣，她用了許多新名字新術語說着她的一切。

母親儘哭着哭着，孩子們不是叫，就是鬧，或吃，總之，手脚同嘴吧是一刻也不停的。只有大的孩子，懂得一些事情了，不笑也不言，滿屋的男子們在我們窩棚前走來走去，又女士同孩子們

玩，對每一個過路的男子笑……碰到交際科裏的人陪着幾個客人也在躲飛機，X君，介紹的人對我說，是一位留法同學，現在任新聞記者。他拿出一隻照相機要替我照相，我最怕陌生人替我照相，而在X女士的不斷的笑裏，我覺得十分不自然，大約我還裝了鬼臉。

「讓我把帽子戴戴好，」以爲她也照在裏面，婦人說，已停止了笑。

「好！好！」X君回答她。

相照過了，X君回到他們的巖石下去了，X女士時常跑到那個地方去逛一下回來。

X君來約我們要不要一起去問老百姓家燒點東西吃，結果，他們去交涉，老百姓不肯，當然，看見有這許多人，如果天天來問老百姓買小米，借鍋子燒，老百姓自己的糧食怕要不够過冬了。X君說東北的老百姓頂好，當然不去說大城市，大城市裏的居民都是狡滑的，鄉村裏的老百姓人家，他們常常肯留不相識的過路人，一個月二個月都會的。的確，一般的東北同胞是很和善的，但我覺得這也與地方富裕及物產豐富有關係的。

我帶着幾張紙，就寫在高粱桿上寫幾個字，但我的思索常常給X女士的話所打斷。後來，我索性不寫了。

她變得很知已的同我說着話，她說她不料到我是這樣和氣的，她想像中的我是很嚴厲的，不易接近的……所以X君曾對她說可以多多同我往來，她都不願（當然我知道她自然瞧不起這樣一個平庸女子，還是她的眞正意思），在人家「客觀的」眼光與猜想中，我是這樣一個人，這倒也奇怪的。但現在中國的少女們她們想些什麼，怎樣的女子使她們羨慕，成爲她們所想達到的一種目標，使我有點好奇。

她對我談到她的感情，她說她已經堅決的回答了X君（還同X君對我說的相附合，她沒有脫離

），並告訴他她愛的人是X X，就是今早路上碰見的這個青年。可是從她的語氣姿，我立刻感覺到這只是她所愛的，——她把他說得像天神似的，使人感到沒有一個平衡的尊敬與愛——而今早那個青年愛不愛她是一個問題。

她說她同X X認識了已經五年，當她在西安念書的時候，就認識了的。他曾到日本留學過兩年，明治大學畢業，今年二十二歲……現代的中國青年，他們有的比起我們那一代來，眞是活躍得多，他們只要化一、二年的工夫就在國外的大學裏畢業，而年齡還是極輕極輕的。

這個青年，我有時在路上遇見，他有一個比較長的個子，圓長的面孔，大約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不算醜，因爲他那種誇大到極點的男性的尊嚴 只有那些自以爲聰明而美貌的男子才這樣的。他穿着皮鞋——在延安是很少的，穿皮靴的倒有——拿了一根手杖，和着他的脚步，有節奏地揮着，原來他是留學生。「何必呢？」我想，「天知道！留學生是這樣特別的麼？留學那一國是更加了不起的？擺什麼架子呢！眞是半殖民地的可憐意識！」X女士問我對於這個青年的意見，我正在那樣想。

「意見？你自己對他有什麼意見呢？」我笑着回答。

她對我談到一些女同志……「呵！」我心裏想，這個我以爲有一點神秘的女子，其實是一點也不神秘的，而且十分簡單，她急於找一個男子做丈夫，——是不是因此對每一個男子微笑——這個男子不管是在外邊或邊區，只要是有權力地位的，不過最好還要年輕而美貌。如此而已。

「有些男子諷笑女子：「我們男子兩手兩脚一齊爬，也爬不過女子。」

在歐洲，我看見有些女子，她們以青年與色相來嫁一個有地位財產的老年人，一方面，她結識情人，一方面她等待快快做寡婦，再可以嫁人。

像X女士那樣心理不是很矛盾的？要有權力地位，同時年輕，這可不是很困難的？一個人的學

問與事業不是一下子就成就的，就是那些相信金錢萬能的人，也會知道並不是件件東西用錢買得到的。還要自已的努力，需要精神與時間。

我們離開那個山溝還很早，中年婦人與他的娃娃們還在那裏。乂女士在半路同我分別，她去看她的朋友去了。

晚上，天已暗了，乂女士到我窰洞裏來，她剛剛回來。「我不想吃東西」，她說，眼睛是哭紅了。「××寫了一封給他弟弟的信，要我代她念，他寫得那樣痛苦，我都哭了……」今天我幫他給他的弟弟穿衣服，唉！眞可怕……」我不知道怎樣安慰她，靜默着。

她坐在一隻矮櫈上，斷然心情是為一種人間絕端的苦痛與哀傷所刺激着。

「乂乂等一下要來看我，」她靜默了一歇後說。「今天他悲傷得那樣，對我說要我與他在一起……」。

「呀？」我不十分歡喜聽着她同我談她與他的事。

「剛才我沒有同他說什麼，因為他太悲傷了，等一下他要來，你說我怎麼回答他呢？」她望着地上，對我說。

「那要看你自已怎樣想的！」我說，感到不十分自然。

「我想不大好」。

「那他這樣年輕，已經想結婚了？」我隨便說。

「不，他說同居，不結婚」。

「為什麼呢？為怕化錢舉行隆重的儀式麼？在邊區好像沒有的罷？」

她走了，怕她的朋友已在底下等她。

已經有幾夜我沒有睡好，而這一夜，我的心情更十分複雜，剛剛朦朧睡去，又給狗聲吵醒了，這些狗是撤走的那個機關的，他們沒有帶去，這幾天大概也沒有人餵牠們。一到夜晚，整個山頭好像變成了狗的世界，牠們嘷嘷然叫着，叫着。

「他身上一點傷也沒有，只有嘴吧裏流出一點血……」

「狗對着我們的門，叫了五天……」

忽然我覺得很冷，翻來翻去總睡不好：討厭的狗叫！

我身上穿着一件絨睡衣，從床上爬起來，也沒有披什麼衣服，捧了面盆裏的一盆水走出窰洞去，向着那些狗潑，剛剛把面盆舉起，大約用力過大，「拍」的跌了一交，空氣很冷，月亮非常皓潔，狗的影子在月光下，拖得長長的。

旁邊窰洞裏的朋友，聽着潑水聲與跌交聲，哈哈的笑了起來：「我勸你不要起來，明天感冒，還要找人治跌傷！」

的確，在延安是不好意思認真發脾氣的，忍耐！忍耐！這一次可說是我在延安發的最大的唯一的一次脾氣，但立刻就受到了責罰。

聽說X女士已離開延安，那個中年婦人也不再見到，躲飛機的高潮也早已過去了，我呢，整天在窰洞裏，很少出去，在我想像中，好像離她們很遠了。

V 長征的人們

剛到延安的時候，一聽着人說那個先生或女士是長征過來的，心裏立刻肅然起敬了。雖然我也跑過十幾萬里路，但那是坐着火車輪船，誰都可以辦得到的。他們，長征的人們，歷盡千辛萬苦，所有人間可以想像的苦痛，都嘗遍了，這就是現在在我面前的這些人，他們還很健康，而且活潑，快樂．可不是一個奇蹟？

延安剛剛開了門的時候，有許多男女青年跑進來，聽說有許多外來的女孩子，都以能嫁一位長征過來的八路軍老幹部爲榮耀的。如若是真的，這也可以代表一般人對於長征的人們的仰慕心理。

我還沒有得到機會聽長長地談長征，像談一個不相干的故事，把他們當時的處境，當時的心情……沒有帶感情的敍述着，許多人到前方去了，留在後方的人都是忙忙的，一般人的注意力集中於抗戰，很少聽到談長征。平常我聽得最多的，是幾位戰鬥員口中講過草地，四方面軍曾過了兩次草地，過來又過去，「一隻脚拔出來，一隻脚又陷下去」，但我所需要的却不止這個。

那些悲歡離合，出死入生，可歌可泣的事情，該比一部「元曲」還豐富，但是還沒有！我想，在長征中，有些有文藝天才的人。他們也担負着不是軍事就是政治的工作，他們沒有預備收集或紀錄一些將來可寫作文藝作品的材料；延安現在有許多外來的文藝工作者，這個偉大的工作，不是也可以由這些非長征過的人去担負着做，但是一般的外來文藝工作者沒有注意與重視這部份材料，同時，目前一般人要求於文藝工作者、似乎不是在這方面。我個人，希望他們能夠有一部長征的史料

興逸事，供給關心長征，對於長征有興味的人。

麻煩了幾位先生，跑了兩個下午，借到了那部爲外邊好些人們所期待見面的集體創作「二萬五千里長征記」。裏面有日記，有敍述，大都是過後追憶而寫的罷了。共約三十萬字。只有一點是遺憾，沒有一位女同志參加在內，聽說本來鄧穎超女士預備寫一篇的，大概是忙着忙着沒有工夫寫罷。

長征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中開始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達陝北，大概是這様罷。

董必武先生在「出發前」說到何叔衡先生的死，李富春先生在「夜行軍」裏，寫得非常美麗，可是夜行軍遇到大風大雨，却十分苦惱的。「特別是夏秋天氣，乘着有月光夜行軍，却很暢快。月朗星稀，清風徐徐，有時虫聲唧唧，有時水聲潺潺，有時犬吠數里，野花與黃菜爭香，夜行更覺幽雅。經過村落時，從疎疎的燈火中，看到一村的全部老幼，帶着詫異而又愉快的眼光，望着我們這走不盡的「鐵流」的紅軍，常常可以聽到這些話：「晚上走，涼爽呀！」「你們眞多呀！走了三日三夜了……」「你們眞文明呀，救命菩薩！」」讀者會起了有趣的想像，想如果是住在那些荒僻的高山上，茅屋中，看着這些不速之客的經過！

聽說在長征中，他們大半夜行軍，爲避飛機的轟炸。在夜里，他們自做火把夜行軍，雲、貴、川都有竹頭，四川又特產便宜的松香，這對他們做火把有了便利。

陸定一先生的「老山界」何滌宙先生的「遵義日記」，這位先生在遵義十天，吃了九個辣子雞丁。坐在土豪家的沙發裏看上海的摩登畫報，做布爾喬亞（Bourgeais）了，確實富有趣味。莫休先生與李一氓先生的「從金沙江到大渡河」……都給了我極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在一個地方吃飯，偶然遇到鄧孝平先生，這是一位八路軍裏聞名的政委，他們笑着叫他「牛皮公司」，我以爲那是鄧先生獨家經營的。讀了這部長征記，知道這是在長征期裏產生的合

股公司。在西安時，我曾聽一位八路軍的老幹部說在長征中，幾位老人，董必武先生，林伯渠先生，徐特立先生、也是這樣走着，談着，飢餓着，冷凍着，時時被炸彈鎗彈威逼着到了陝北。同着許多朋友，而且是共生死的朋友，一邊走一邊談，這一定是非常快樂的。

長征中，毛澤東先生聽說一路作詩，當渡過雪山（岷山，他們所渡雪山中最後的一個）快到西北的時候，毛先生很高興，曾有這首詩：「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似等閑，五嶺蒼茫翻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懸崖暖，大渡橋橫鐵鎖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這首詩我在外邊曾看見雜誌上刊過，聽說當時傳遍軍中。

希望這本長征記能早點與世人見面。從這部集子裏我們得以知道許多許多的事情，毛澤東先生的游擊戰術戰略是從怎樣環境下產生出來的，他們怎樣經過人煙稀少，荒漠千里，高山層層的地方的。他們所通過的地方與接觸着的人，回、夷、番幾種同胞，對於他們都有好感，這些被人們遺忘了的同胞，他們的文化，他們的生活習慣，以及他們所想的，我想都該是中國人發生興趣的。

關於敘述長征，在外邊我曾看到過一本「隨軍西征記」，這是一位被俘到紅軍裏的軍醫寫的，只寫到四川會理，後來他被川軍俘去，離開了軍隊。在邊區我又借到過一本小冊子「雪山行軍記」，是一個被紅軍俘去的無線電技術師寫的。這兩本冊子裏都曾提到長征中的女英雄，說她們都是體格強健，雄糾糾的佩着手鎗。後一本的小冊裏說得比較詳細一點，他提到鄧穎超女士，蔡暢女士，與紅軍中的歌舞名星李伯釗女士。在延安，我也曾聽到人們稱道鄧女士的能幹，蔡女士的慈愛，爲了她的慈愛，一般人叫她做「大姊」。

從江西出發，聽說一共三十個女同志，他們沒有掉隊，也沒有別的意外，都安然到達陝北，就是幾位老人，也一樣。但是一路上參加長征的婦女還很多，有的在湖北參加進的，有的在四川參加

進的，在延安，我們很少很少遇見江西出發長征的女同志，比較多能遇到的是四川與陝西的，特別是四川，婦女同志是怎樣長征過來的，她們做的什麼工作，她們的心境，都是我十分好奇的。

在延安，談到長征，或者更擴大些說談閑天，四川來的先生們叫做「擺龍門陣」，第一次，我在一個朋友那裏，聽到：「來，我們來擺個龍門陣」！我不懂，一位熟人笑着對我說：「你不知道？就是一字長蛇陣，二龍出水陣……四川的農民把土地革命叫做「擺龍門陣」」。

談着長征，就聯想到陝北流行的這個名字：「土包子」，不知道這個名字是怎樣有的。長征的隊伍中，有很多是生長在極幽僻的農村裏的，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大都市，也從來沒有見過火車，汽車，以及女子身上的五顏六色的綢料，香水，雪花膏，耳環，戒子。我看見有幾位長征過來的四川女同志，手指上戴着一個銀戒子，這些戒子使我發生一些有趣的奇妙的想頭，這些戒子戴在她手上，好像是必需的，如若在我的手指上呢……在到延安之後，永榮姊託二妹再託便人帶了一個在成都鑲的紅豆戒子來，便人囑人交到我手裏附了一張條子．「寶戒一個」。那裏是寶戒呢，幾毛錢可以賣到一升的紅豆呵！這不過是一種好玩的，友情的紀念品，並無物質價值的。我非常羨慕，歡喜延安人所叫做土包子的，他們對於人生還有這許多的慾望、期待與興趣，對於他們，人生與一切事物，還是這樣的無限與新鮮，什麼都使他們引起愛好，好奇與動人的啓發。

有些外來的人，他們能從面孔上與走路的神氣上認出這是長征過的人，「長征的面孔」，「長征的步子」，有這樣的口頭禪。

當時紅軍主力長征了，留在江西的人怎樣呢？這是一個殘酷的別離！為了工作的關係，有的丈夫隨軍長征了，妻留在江西，有的妻往別處工作，丈夫留守。聽說有一位先生，也長征過來，夫人留在江西，他帶着兩件夫人的內衣離開江西，一路沒有拋棄，在那樣長征的困苦環境之下，他都捨

不得拋棄。現在呢，他的夫人大概已犧牲了。當時留在江西的人所遭受的苦難聽說比長征還利害，其實，在外邊，那些單身匹馬做底層工作的，我想倓起來也一定比長征艱苦，一個人的雙肩負着一個集團的担子，而些卻不像長征時是有武器可以自衛的，當打一仗的時候，至少死的命運敵對的雙方各有一部分的。

在特別殘酷的東方民族國家，僅僅做一個革命者的忠實伴侶，已是偉大的，如果本身也是一個革命者！倘使一對革命的夫婦，多少年生死與共，一旦忽然其中有一個起了拋棄另一個的念頭，那是怎樣的殘酷！但是這樣的事不是不可能有的，倘使爲了性格不相投，不過革命者是不是對這類的苦痛看得很平淡而能克制牠？但是兩人之中，總有一個是比較担負着更大的苦痛，因爲他們之間，沒有理由可以互相卑視，互相仇恨！一個女子，我想一定不願被她尊敬的同志丈夫拋棄，她倒還歡喜被一個壞人，一個理想不相合的男人拋棄，對於男子，也一樣罷。

在江西，在長征中，有些男子爲了事實的需要，結了婚，雖然從前，在家裏還有着妻子兒女的。那個時候，他們不能預料什麽時候能再見他的家裏的人，而且這個再見是不是可能的？他們恐怕也沒有料到統一戰線的成功，而且如此迅速。這樣，從前隔膜的兩個不同世界裏的人，又可能找着從前原來的各種感情上的關係了。從前的妻，這個穿着跳舞襪，高跟鞋，旗袍的女子，看慣了穿軍服的女子的，看來倒也覺得新鮮，有點特別，有點洋味，怎麽說？實在，這也是很自然而平常的一種心理。

一個人在一定的地點住了較久，如若這個地方的一切比較單純，交通比較不便，沒有黑暗來給你咒咀，也沒有紅燈綠帷墮落的場所來刺激，這不是一個詩的環境，這是一個叫你『生活着』的環境，環境的應付十分簡單——，當然不是人人如此，這是很主觀的話——於是不需要多用腦子，漸

漸的變成土頭土腦的土包子式了。我在延安、現在住了快十一個月了，自從把一隻值得紀念的錶——因爲我已用了十四年——訂劃之後，每天要知道時間，只有問鄰近的朋友，但這個朋友是常常不在的，當然老去問，那個人也會覺得討厭。這樣，日子久了，我也就失掉了要知道時間的習慣，慢慢的也就無所謂準守時間了。外邊的朋友們聽着我說這個，一定要跳起來了，「這怎麽過日子？」但日子倒每天很快的過去的，不過，只是爲了不要做土包子，我該快快離開延安了，我正在漸漸地習慣於一切，而對於這個地方的一切，正在漸漸的消失敏感性。這是很不好的。

平常，對於女子，接受新的東西比男子來得迅速，但在生理上，女子總是比較保守的，男先生們有時諷笑女子：「我看每一個未結婚的女子都是有希望的，一結婚，就完結了！」其實許也有一點眞理。譬如一個工作不懈、奮鬥不息的女子，一天，她担負了生育，那麽她對於工作或學習，總得有幾個月的停止或至少減輕，這是事實，爲了這些，女子對於工作或學習總不能像男子一樣的順流，有規律，而且往往有時生育損害了健康，那就更到糟了。有時候，對於有些人，學習會有優良的條件與否，譬如一位排字工友，他走進了學校去學理論，在他一定不會像一位伙夫同志，一向與書本子無緣，進學校學理論的困苦，有些人到了某些年紀，簡直學不進什麽了，也是有的。除非有些特殊的人，文化水準本來很高，有了根底，且能自強不息，時時接受新的進步的知識。這樣，人人都有變成土包子的可能，從前的洋包子，在今天也許是土包子了，今天的洋包子，將來不還是也可以變成土包子？

往陝北來時，我曾想像在西安的旅館中可以見着我年輕時候的同學張琴秋女士，但是不，直到在延安住了兩個多月之後，一天上午，我正在窰洞門口洗白菜，聽到一聲似乎陌生而又有點熟識的喊聲，抬起頭來，是隔別了十三、四年的琴秋。昨天下了一天雨，今朝山路還是泥濘的。從前我們

是頑皮的朋友，現在，在她的老家，賓主名分之下相見了。

「你做什麼？燒白菜？現在你學會了這些事？」她有點驚奇。

「是的，我飯也會燒了，好幾年前就學會了！」

當江浙內戰的冬天，有一天，天下着雪，我從我的堂姊姊家裏搬到她的寓裏，我不能過舊家庭裏的生活，那時又還不成家。每天她出去做事了，留澤民同我在家裏，有時澤民也出去了，就留我一個人在家。那時他們兩間屋子，一間是她們夫婦的房間，一間放東西同燒飯，我住着。吃午飯時，澤民燒白菜炒牛肉絲，這是澤民愛好而善燒的菜。天暗下來，可以開電燈了，快吃夜飯了，巴巴的等待琴秋回來，有時她還帶一點好吃的東西給大家。我在他們家裏，像一個小弟妹。每次我從家裏出來，一下北站，就先到他們那裏放下東西，睡覺，然後再不得不然的跑到親戚家去做禮貌的訪問。「不，因爲張小姐要我看家」，這是我對親戚家留住的推託。琴秋是那樣地善於應付人，在上海我的親戚沒有不歡喜她的，特別是义姊，直到前年，她還問起張小姐。五卅慘案的時候，琴秋還去向她募款，她，這位愛買香賓票與香燭勝於一切社會事情的舊式婦女，但琴秋還是成功了的。夏天，晚上，澤民爬到屋頂上去乘風涼，聽隔壁人家吵架，一句兩句搬給我們聽，使人發笑，打斷我們的談天。在那時，澤民與琴秋有時是我的顧問，收到朋友們的信時，給澤民看，問他該如何回答……這些年輕時代的回憶，想起來是可以好笑的。

那天我們在快樂的情緒裏重見了，我離開祖國好幾年，其間國家經過了多少事情，但對於我好像讀歷史，中間脫落了一段，多少人死了，多少人變了，……「訪舊半爲鬼」，在這個年頭，見着一個青年時代的老朋友，眞是一件難得而快樂的事呵！可是見到琴秋就映起一個澤民的影子，因爲對於我，在琴秋旁邊沒有澤民，好似很不習慣的，於是說話也得想一想過。雖然吃過多少苦頭，她

還健康，而且比起我來，着實還健康，皮膚也還像從前一樣的白潤，可是我覺得她似乎比從前高大了，就是她從前帶圓的面孔好像變成方了。她的體格一向比我高大些，强壯些，在愛國裏，有人叫她做「小弟弟」的。從前琴秋就是很理知的，現在，覺得她更加理知了，這恐怕是從軍隊中鍛鍊出來的。

那天她在我處坐了一下就走了，隨便吃了飯，因很忙，只是約好一個星期六去她那裏聊天。

星期六那天，天色陰沉，到下午三時左右，我還是動身去了，到得快近她住處時，天下起陣雨來了，只好躲進一個山邊的石窰洞裏，是一個機關的廚房。陳昌浩先生曾拿了雨衣來接我，沒有遇到，等我到琴秋處好久，他才回來。

我們開始談起從前在學校裏的許多小事情，傻事情，與許多老同學……旁邊幾位先生笑我們「談不盡的話！」

晚上，天下着陣陣的雨，夾着一陣一陣帶寒意的風，這是延安的秋雨！她與我同睡在一隻土坑，我們不曾抵足談天，並着頭睡。雨聲，從窰洞外飄進來，時常打斷了我們的話聲。在過去好多年裏，我們兩人的生活太不相同了，我們的話、就像江水從一個方向流，但總是相差一點點，匯合接連不起來。

「澤民究竟怎樣死的？」我終於這樣問，明知道這是不大好問的，但還是問了，心頭感到了輕鬆，透了一口氣，覺得人也自然了。澤民的死，對於澤民的老朋友們，至今還是一個謎，可是，琴秋也不知道，她不在他身邊。

「如果澤民還活着，又×她會來的」，談到澤民的家族朋友們，我覺得琴秋的話是對極了。

接着，她談着她自己：「那個時候四面八方都是包圍着，前面正在接觸，有什麼辦法呢，我在

隊伍中間被抬着走，後來，抬到隊伍旁邊，塞了一點布頭，拋了。一個很胖的小孩呵！我們走了好久，還聽得見他的哭聲！」她在甘肅結婚以後，生過一個小孩，這樣拋了的。

「會不會有人拾了去？」

「那樣荒的地方！凍也馬上凍死了！」

後來，在好幾次步馬交戰之後，四方面軍吃了一些虧，她失散了（那時她是四方面軍裏的婦女獨立團團長，女子與男子一樣作戰，這是四方面軍裏的特點），在過渡的地方，幾被急流冲去，騎兵又在追擊，渡過了河，走呀，走呀，走了許多荒山，終於被俘了，邊寨的苦工，都市的牢獄之後，回到延安來。

苓秋已呼呼入睡了，時間已過了午夜罷，我想我也該睡着了，這倒並不是自已保養身體，因爲生起病來，不但自已倒霉，還要拖着旁人。這是經驗告訴我的，不可以隨便生病，要末就一病病死，倒也乾脆，可是越這麼想，越加睡不着。從前，當腸病利害的時候，枕頭邊我總放着餅乾，半夜一醒，馬上機械地拿餅乾來塞進口裏，這個腸子，是不好惹的，一餓要痛，一飽又要痛；可是這夜我並不感到肚餓——其實白天每餐飯我都不敢十分吃飽——，只覺得熱，又不能翻身。在工作與磨難的時間裏，她的體格鍛鍊成這樣的堅强，我特別覺得她的體格的强大！

爲了叫自已睡覺，我想出一些舊詩詞：「閑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與「Lerlaine的：Il pleure Dans mon Coenr Comme Il plent Sur La rille」這些爲風與雨所引起的大半忘記了的句子，結果又聯合到：「一個很胖的小孩呵！」與澤民的影子。

雨一直下到天明。起來後，我馬上想回到自已住處，爲待雨小，留到午後，雨還下着，已小了，冒小雨告辭了她。

「一個很胖的小孩呵！」在山溝裏走，這話時時還在我耳中響着。

統一戰線結束了十年苦痛的內戰，一個快樂的團圓不是值得稱頌的？像蕭勁光將軍與他的夫人朱女士，像許光達先生與他的夫人鄒女士……這好幾位的團聚。鄒女士聽說與許教育長結婚半個月就分離了，一別十多年，她覺到當他們近湖南的時候，他沒有信來了，當他們遠離湖南時，她還能收到他的一點音訊。那年彭德懷將軍攻下長沙，他們隊伍過境，但無法可以去認識。這十多年內，許先生也沒有另外去找尋伴侶。如今，他們團聚了。這些團聚來紀念長征，不是最好的？現在，為抗戰的需要，全國忠勇的戰士，前後方救亡工作的人們……不得不暫時分別開他們同她們親愛的人們，讓我們祝頌能！「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將來，以堅決抗戰，抗戰到底的最後勝利來紀念這堅苦的抗戰。

VI 青年！中國的青年！

「青年！中國的青年！」我每聽着這歌聲，心裏自然而然的起了對於青年，現代中國青年的羨慕，尊敬與愛好的情緒。

中國現代的青年是幸福的，他們能夠得到自由的革命的集團教育，過去的一代裏，為着求得一點教育，多少人曾是可憐地過着「個人主義」的奮鬥的大學生與中學生生活，中國的知識份子，學者，技術人員，很少是為一个家庭能每年匯給他幾千幾萬元給他安心地讀書而成功的。就是有這種人，他們却往往是一無成就的。這些个人主義的奮鬥大學生中學生生活，恐怕却是現代中國青年所覺得好笑的。

中國現代的青年是偉大的，國家正在進行一个兇惡的國際戰爭，這種戰爭是我們一个沒有經驗

的，我們的青年，他們担負起衞國的責任，他們迎接戰爭，像迎接他們久別的親愛的人。國家把整个希望交給了這一代青年，他們是我們民族解放的最大力量，青年啊，願你强壯，結實，而且堅定！

邊區是青年的搖籃，青年在這裏，受到革命與戰鬥的教育，與民主精神的培養，這些現在是在學校裏簡簡單單的一個學員，將來，他是一個游擊隊長，一個指揮員，……將來，他是一個參加建設新中國的人才，一個行政人才，一個技術人才，一個斯太哈諾夫……。邊區對於青年懷着極大的愛護與關心。青年在這裏是幸福的。青年不是最抗戰的麼？這裏正想培植堅定的抗戰幹部的。青年，在這裏，他們過着自由的集團的學習生活，緊張，規則，愉快，這是他們的精神。許多在家庭裏從吃也吃不胖的孩子，特別是女孩子，到這裏來都胖了。她們變得强壯，簡單，質樸可愛。大家驚奇着這個現象，有的人說女青年在邊區是太幸福了，在學校裏，在學習中，她們跟不上的有男同學幫忙，在生產運動中，她們做不了的，有男同學來代替做，在機關裏做工作，男同事對於她們也是好好的，人的，一般封建的殘餘力量不是說絕對沒有，但那是枝節的力量，人們隨時可以把牠撥向一些正確的原則上去，原則是正確的呵！在外邊，一般學校生活也還算是快樂的，但你回進家庭，走入社會，怎樣呢？

今年五月四日紀念節，由邊區青年提議，全國一致稱爲青年節。五月三日那天，洛甫先生曾有一次演講，對於青年的希望。這是一篇很透澈，深刻而感動的報告，青年們快樂而熱烈地拍着手。

五四的晚上，有一個盛大的露天火炬遊行晚會。毛澤東先生作了一個報告（已刊載在第三期「中國青年」上），青年代表向蔣委員長與毛澤東先生獻旗。接着，遊藝開始，參加幾十個人的秧歌舞，十分動人，熱鬧。五四以後，接連有運動會，各種比賽，賽球與賽馬。在五月卅日，爲紀念五

所慘案，舉行了一個選舉模範青年的大會與晚會。「我們相信青年」，這動人的標語到處貼着。

是的，我們相信青年罷，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行爲，有時容或有一點幼稚，但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他們生活着，學習着，在前後方抗戰的工作中鍛鍊着，這些幼稚就會改正的，好的發揚出來了，壞的也淘汰掉了。邊區青年，他們快樂的響應當局的號召，一批一批跑上戰場，頑固份子引起吃醋，他們是不要國家的，愛自已財產與生命勝於自由的國家，日本鬼子感到懊惱，沒辦法。邊區青年還有一種可愛的精神，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其實是所有的青年自然而然具備着的，不過延安的青年更能在這個優良的情況上把這個精神發揚。自我批評，在邊區是發揚得很普遍的，這是邊區革命領導者們的優良而偉大的作風。這種精神是人類高貴的精神，猶如敢於赤露露地看自已身上的瘡毒而克服了痛楚。聽說在邊區開會時，負責人自已也常常提出自我批評，在外邊，人們要想這樣做時，會損害自已的威信，可是不，在邊區，恰恰相反，一個人愈加發揚自我批評的精神，他的威信只愈加會增高。

在大後方，去年，我還看見有些個別青年，穿得漂漂亮亮的在電影院裏大搖大擺的進進出出，嘻嘻哈哈的。女青年也還是畫眉毛，塗胭脂。過漢口，我在一家外國朋友家裏吃飯，因爲我們很熟識了，大家就隨便談談。她們老實對我說：「有一件事情我們不懂，跳舞場與電影院門口都擁擠着你們漂亮的中國青年男女，可是你們正在戰爭呀，你們政府應該禁止他們這樣。」當時我慚愧，又煩惱，我說：「那些是壞蛋，我們好好的中國人不當他們人看的。」然而這些是事實，我的話是沒用的。在延安，沒有這類青年，固然環境也不容許有。邊區青年他們最關心的是抗戰到底的大事，剩下來的或者是他們的婚姻問題。婚姻問題每個青年都會自已解決。在我想，戰爭中何必結婚呢，但戰爭在事實上却是頂促成迅速結婚的。在邊區，婚姻是自由的。是的，婚姻當然自由，因爲別人

的規勸，是無效的。人們只能加倍的實施一點性教育，告訴青年如何避免疾病，如何避孕，增加每個人對於身體上的自衛知識，這是非常需要的罷。

同着青年，我總覺得自已是老了，他們與她們有美麗健康的青春，有無邊的前途，但有時，我還是同他們，她們在一起的，我也還有許多稚氣，還有與他們，她們相同的地方。

我不想到在延安會遇着我看他們長大起來的青年，當我搬進文協會的那天，會裏對我說一共有多少位先生時，說到有一位在前方。這位先生回來時，方知道原來是×××先生夫婦的兒子。一九二五年在上海見到時，他該是八歲罷。現在，他長得長長的高高的，立在我面前像一朵牆。「我要叫你一聲老伯母，」人們介紹時，他笑着說，眞的叫起來了：「老伯母，你什麼時候到的？」一本正經地問，我倒有點覺得窘。

長長的回憶引起來了，十三，四歲的時候，第一次離家到××去讀書，這是用了許多眼淚，懇求，好話，威嚇，換得來的，但是又捨不得家。剛到那學校裏時，常常總是眼淚鼻涕的，比起現在這些十三，四歲的女孩子，獨個人拋了家，跑上幾百幾千里到延安來，我該大大的慚愧了。家裏准許我每個星期日到××先生家裏去一次。那個時候××先生是那地方的工學校的校長。我去得很早，他們照例在吃油條，豆腐漿。「這星期過得怎麼樣？」他們問。眼淚掛下來了。××先生微笑了，××夫人笑着說：「別哭了，」又轉向××先生：「你老是這麼問！」直到好幾年後，在上海，他們見了我，還要開玩笑，「怎樣？現在還要……？」我沒等他們說完，就跑掉了。

上海的親戚熟人們中，有的歡喜看舊戲，那個時候時行毛韻珂的「諸葛亮招親，」××先生的青衣也是好些人所愛看的。那天晚上，幾個女伴把我拖到天蟾舞台去看××先生的「饅頭庵」，他那能兒。我們坐在正中第一排。這位身材不高而略胖的××先生，平時常常啣着一枝雪茄烟，這時

在台上，隔着一層薄紗，穿着女子的古裝，在空中舞着！——用鉛絲緊掛着——我忍不住的笑，笑得仰不起頭來，覺得不好意思；離開了那排橙子。那晚同去看戲的有ㄨ三公子（人家給她的綽號，因了她身材細長，走起路來脚步一搖一擺的像男子），現在她變做了漢奸的女兒，但不知道她自己怎樣呢。這個漢奸，我曾親眼看見他，當北平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時，他做着司儀。一個革命者，經過十幾年，變成了一個出賣民族國家的醜陋漢奸！他們的真面目一朝顯露出來，使我們這種從不參加政治，與政治一向無緣的老百姓感到莫明其妙與驚奇！如若說出來，人家一定覺得，我的話是不合理化的：我覺得有一類人常常有走到做漢奸的可能性，或者是必然走到做漢奸，那就是對於名與利追切的要求而急不擇路的人！眼前的事實不是很多的？我倒也有一些例子與回憶。

一個人生活着，生活着，不但會接觸到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人，也會見到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但這有什麼辦法呢？能怪誰呢？年齡大起來，知道的事情慢慢多起來，要像十一，二歲小孩那樣的純潔無知，是不可能了，但是一個人所寶貴的，恐怕並不是無知，是在乎能夠保持住一個人的、一個公民的起碼的操守，對國家，對同類，什麼？說牠是起碼的政治操守或道德罷？就是現在，在抗戰的巨流中，誰知道有些人在幾年或十幾年後會變成壞蛋？全要看一個人的操守。

面對着ㄨㄨ又ㄨ先生的愛子，引起了我一點不相干的回憶。

「爸爸呢？」我問。

「在香港」。

「媽媽呢？」

「在上海」。「呀！妹妹，她也長得很大了！」他忽然高興起來，露出了一點稚氣。

「也是長長的鬍子？」

「是的。」

「像媽媽」。

「是的，爸爸又胖了！」

「你還是那樣老實！」我說。

「是的呀，家裏說我小時候這樣，大了也還是這樣。」

「××先生他們的小孩呢？那時同你一起玩的。」

「大了，還是瘦得很！」

「小時候也瘦，大家笑他瘦得像個小猴子，老是吃零食。」

「是的呀，他們說我們兩人眞一樣，他小時候調皮、大了也還是調皮。」

我搬了幾次家，他也調過工作。一次，在路上遇到了他。

「老伯母你請我吃一毛錢花生好不好？」他同着一個朋友，對我招呼，說。

走到花生堆，他忽然改變了：「還是請一毛錢柿餅罷！」

那次託熟人從西安買了鹹魚來，吃不到鮮魚，鹹魚也是好吃的，聊勝於無就是了。還剩一條，了一個信託人帶去請他來吃。

星期六這晚，他來了，同了兩個朋友。「我來燒罷」，他說，我就乾脆把洗乾淨的魚交給他。

他會燒很多的菜，什麼回鍋肉，紅燒肉……是從家裏的那個廚司學來的。

「如果延安辦廚司訓練班，你有資格當教授，」一個朋友同他說。

「哼！我還有資格當校長！」他笑得張開了嘴吧。

他一歇來問我要酒，一歇來要糖，一歇來要鹽，「老伯母，有沒有葱？魚裏不放葱是不好吃的

。」

「反對放葱！」一個南方朋友說，「放了酒還要放葱？」

他生長在上海，說着一口道地的上海話，可是做的菜，還帶着湖南的風味，甜酸苦辣一股腦兒下去。

下一天，一個朋友說：「昨天我沒有吃到魚頭！」這位先生是愛吃魚頭的。「昨天的魚一下子就完了！」他帶着惆悵。

「，五個人吃，當然一下就完的。」我說，「可是我也沒有吃到魚尾。」

「誰知道！他們一邊燒一邊吃，也是可能的！」另一個朋友恰恰在，他的話引得我笑了。

在延安，我也還看見了另一個看他長大起來的孩子。當我第一次參觀ㄨㄨ，ㄨ先生同我談到從前的一些朋友。忽然，他說：「ㄨㄨㄨ的兩個兒子在這裏讀書。」

「呀？我在外邊也聽到過」。

「在這裏，還是在分校？」

「該在分校罷？」ㄨ先生似乎驚奇我的關心。

實在，這兩個小孩，大的從前叫我「陳先生，」小的叫我「伯伯，」如果現在見他們一面，我還是快樂的，成人間的友誼可以不影響對小孩子的感情，可是旁觀的人或者覺得不是這樣或者以為不必再與這些小孩子們有新友誼了。

該是新年間的一個晚會上，我確信見到了他，那個大孩子，叫ㄨㄨ的。他就在戲台的旁邊，同他小時候的面貌有了一點分別，現在變得完全像父親了。

下一天，我注意到，他就住在我隔壁過去的一個窰洞裏，他們一大羣，該是為考學校而暫時住

着的。他似乎在開始注意我，當我洗好了衣服掛出去的時候，他總是在窰洞面前，側着頭，偷偷地注視我，我接受了乂先生沒有明說的意見，沒有招呼這個小孩，不去開始這不必要的友誼。

在北平有半年，我同他住在同一的人家，他是他父親把他寄放在這家人家的，這對年輕的夫婦（其實也中年了）是他父親的朋友；我呢，一個同鄉介紹去借住的，我不願住到抽鴉片烟的親戚家，也不敢獨個人去住公寓，我的飯也是包在這家人家的。平常，當吃飯的時候，主婦太太把那些葷菜移了開去，對我說：「這個菜恐怕你不歡喜！」把一隻青菜或豆腐放在我與這個小孩面前。當小孩拿了一塊肉吃時，主婦太太說：「怎麼你又吃肉了，明天又要肚子瀉！當小孩添飯的時候，主婦太太喊住他：「怎麼你吃了一大碗還不够，又添第二碗！」有時候，孩子給喝住了，只好放下了碗。我在那家人家做了可說是半年養媳婦，對於這類事，從小我就沒辦法的，所有爭權利的事情我都不會，但那時我已經濟獨立，唯一對付的辦法我就買點糖果點心吃吃，塡塞這未飽的肚子，有時到朋友家裏吃點好東西，但是對於小孩不同了，他是不能像我一樣的。有時，近晚，他的父親來了，那家夫婦當然客氣的留吃飯，孩子在旁邊拖住父親的手臂要父親吃了飯去，我知道爲什麼他要這樣拖住父親吃飯。當父親在吃飯時，好菜都放在小孩與我面前，主婦太太連聲的說：「吃呀！吃呀！」父親走時，九歲的乂乂眼淚汪汪的拉住：「幾時再來？」

這些青年，他們出自各個不同的環境，但都是在這個多難的國家生長起來的，他們能够吃苦，對於抗戰建國有堅牢不拔的信心，讓我們珍愛，期望這一代青年罷！

「現在是兒子的時代了，不是父親的時代！」我想到成仿吾先生的話。

VII 刀鞘

附近的機關裏，有一個趕驢子拖水的中年男子，常常在下山上山的時候遇到他，小勤務們，行人，……在近水邊的山路上，大家同他搭話，開玩笑，他生得倭胖，胖得結結實實，皮膚黝黑。一雙嚴肅而深沉的面孔，使人不覺得可怕，却也不覺得是如何同情，兩腿粗粗的，比他的上半身短，這樣，就愈加覺得他的倭了。他常常赤着上身，上山下山來回地趕驢子拖水，在冬天，穿着一件單上衣。就是下雨天，也不停止這個工作。驢子，拖得累了罷，上山的時候，喘着氣，走兩步停一停，他帶着一種溫柔的像父母對於孩子的責備口吻：「走！走！你走不動了？你這傢伙！」從不見他鞭打牠，他對牠那麼說了後，牠還是不走，就在牠面前，拉了牠的韁繩上山。下雨天，山路非常滑，驢子下得太快時會跌交，從山上跌到山下，會跌死的，他小小心心的，在騾子旁後拖着騾子的尾巴，一邊嘰哩咕嚕說：「哼！你這傢伙，跌下去，沒命……」他這樣愛護牠，牠是他的工作工具，也是他的伴侶。

第一次，我在旁邊友人的小勤務口中，得知這位趕騾子的拖水的人叫「倭子」，一般人大家叫他倭子，當然，我想這一定不是他的名字，這是一個綽號，但是有什麼關係呢？「倭子」也好。

許多人，大人，小孩子，都把他當做一個開玩笑的對像，人們同他開玩笑，他打着哈哈。當他不趕騾子的空時候，對山紅十字會裏的人，常常要他抱病人，他力氣很大，一兩病人，他一個人用兩臂抱了就走，可是担架人員有時四個人槓、還說槓不起。

抱過一個病人，他問：「沒有了麼？」

「現在沒有，等一下還有！」

「等多少時候？」他又問。

「等半宦鐘頭」。

「我吃半筒煙興麼」？

「興！興！」紅十字會裏的一位女士回答他，一邊同他開玩笑：「一個鐘點有幾分鐘？」

「八分鐘。」

「不對，還要多一點」。

「那麼十四分鐘」！

他成天成天趕騾子，那個機關裏的水從來不斷缺，可是後來，這個機關搬走，倭子也去了，另外一個機關搬來，開水同洗臉水常常缺乏。無論是什麼重的東西，只要他不在趕騾，你去請他幫忙拿，他總是肯的。他太使我覺得可愛，可尊敬了，這個把工作當做偶像的人！對於人，我只知尊敬他們的工作與才能，而不是尊敬他們的權威。有一天，我上山去，碰到他趕騾子下山來，我問他：「你趕了幾年騾子？」

「五年！」

我這想同他講話，特別是對於他的工作，讚美一番，但是我聽不懂他的話，不知他是什麼地方人，說話非常含糊，好似舌頭短了的。他呢，也聽不懂我的話，我這笨拙的浙江話。

聽說上海有一位寫了十年鋼板的工友，得到列甯獎章，那麼這位倭子，再過幾年，我想他也是有資格得列甯獎章的。

文協會裏的最近的廚子，有些人背後叫他「怪物」。「唉！這個老漢！」說到他，有些人搖着頭，這個老漢是河南人，從前，他做過軍隊裏師長等等的私人廚子，大概他是逃難逃到了陝北，現在文協會雇用他，給他五塊半錢一個月的工資。

在延安，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清潔的廚房。一個小小的土窰洞，裏面三爬灶爐，一塊切菜用的

擱起的方板，一隻深進的小小的土坑，廚子自己睡的，爐子，爐蓋，碗，陳菜的小洋鉛盆，罐……甚至於一把破舊的掃帚，也是淸淸潔潔的。沒有油膩，沒有灰塵，每樣東西都是有條理地放着，而且，可說是一個沒有蒼蠅的灶房，只有幾個可數的三四個蒼蠅。這個土窰洞的泥地，發出平滑的亮光，大約是他每天每天那樣勤掃，掃得沒有一點泥屑與灰塵，光滑得可以跳舞。

在這個窰洞旁邊，他打了一個小窰洞，放着一點柴（柴統統放在露天，如果天一下雨，生火就很困難了）與白菜，另一邊，打了兩個小小的洞，一隻木桶與一隻缸放着，恰恰流不着雨。沿窰洞的轉角，挖切成了一隻圓轉的泥土凳子，好像巴黎有些戲院裏，博物館圍在有彫像柱的四周的圓凳子。對着窰洞的山路邊，放着一隻傾髒水的木桶——一半埋在泥裏，一大堆木柴緊緊地整齊地疊着，一根大配一根小，非常和諧，像罐頭裏的沙丁魚那樣地疊着。光亮的磨刀石，及擱着做小凳的石塊，該是從山底下搬上來的。這些，一點也無可引人的，但如果你仔細一看，就可以看出是經過一個人的力氣，心思與計劃安排過的。

他似乎爲他這個工作，與這些小土窰，爐子，碗，柴與圓泥 子……而驕傲，走到他的廚房裏，他快樂的招呼你，像對一個客人。我想起匈牙利作家Lihmora所寫的『殘廢者』中 那個女人。他的飯做得很好，菜也還有味，無論多少人吃，有時人多至二十外 總是他一個人做，沒有誰去幫他忙。

「我弄得不怎麼好，」他再三謙虛，還沒有滿足他所做的，「我來的時候，柴東一根西一根橫在路上，路上不好走人，我把牠們理齊了，疊好了。」我讚美他的圓泥凳子，他笑得落開了嘴。「冬天的時候，早上我送飯上去，有的人還沒有起來……」他的話有好些我聽不懂，大意是說有些人到上午十點鐘起來吃早粥，他決定不再上去了，挖了這樣一隻泥凳子，讓大家下來吃粥時候可以坐坐。對於開水，他也不送到每一個窰洞裏去了，燒好了，放在一隻火油箱中，這隻火油箱有嘴，用

蓋蓋着，還有用粗麻繩結成的提手，像一把極大的茶壺。一切他都在當場環境之下弄得整齊，清潔，合理化，我不禁讚賞他的組織與創造能力。

午後一，二時，廚房外的地上，鋪着一塊小小的長方形的皮，老漢捲曲着在這塊皮上午睡。廚房裏，一爐子水正在沸起來，灶肚裏一根木柴小心地，謹愼地——像他這個人一樣的作風——燃着，但是惹牠不得，惹了牠，牠有火的脾氣。

「這老漢眞是一個可愛有趣的人！」去拿開水喝，走過他旁邊，我說。從他的禿頭，身上的衣服，直至赤脚，都是乾乾淨淨的。他那長而微胖的臉上發出一種「生」與「力」的光，那些油膩像上常能蒸出來的。

「唉！這老漢眞是一個怪物！天天同人吵架！」一位熟人說。

「吵些什麽？」

「他不歡喜人去弄髒的廚房，他的碗，他的刀……不歡喜人去拿給人喝的開水洗東西……」熟人接下說：「工作倒很好，就是脾氣不好。」

「那不是頂好的？只要工作好！」我說，的確，各人主觀的見解是不同的，在我，覺得只要工作好，天大的脾氣，也是不怕的，於其那些說起話來眉飛色舞，做起事來綹起眉頭，或者好像放在磨子裏磨過，磨得只剩了一些渣沫（也有些磨成鋼鐵的），簡直什麽都沒有勁了的人，就使有脾氣，總有用得多。

熟人滑稽地笑了。重覆說：「唉！這個老漢，眞是一個怪物！」接着，他說：「你看他這個廚房同這些（他做手勢指着這些小土窰，水桶，菜，柴……），唉！他簡直把這些當做一個理想！」

我吃的笑了出來，我笑的却是熟人的話。熟人笑得更利害了：「簡直是怪物！傻頭傻腦的。」

「一個理想！可不是每個工作可以成爲自己的理想的？可不是，每個工作都可以產生英雄的？還是人人該理想做個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而放棄目前的實際工作，去那樣理想，過理想的日子？」我想。

「我歡喜這樣的人！」我直爽地說。

「呀！你歡喜？」熟人有點驚奇，笑了。

「他對於錢怎麼麼？」

「你指什麼？指他愛不愛錢？」

「他揩不揩油？」

「唉！那個，不！眞太純潔了！」熟人又笑了起來，「常常拚命要替公家省錢，買老百姓的柴都要他自己過稱，他自己的這點錢，五元半，不見他用，也不聽他談起，他就是同人吵架，不許人弄髒他的廚房……」

走出廚房時，熟人對老漢喊：「老漢！她又在讚你的廚房！」

老頭子古落的坐了起來，對我和善地笑了。

「目前他的苦痛，就是他還不滿意這個現狀，還要改善，可是被環境限制了他」。熟人帶着同情的說。

像這個傢子與老漢樣的人，是樸玉，是刀鞘。「刀鞘保護刀的鋒利，而自守於笨拙」。好像是太戈爾Tagore的一句詩。

VII 鄰居

在延安，我已大大小小搬過六次家。搬家這事情，用家鄉話來說，一向使我「頭大」，但是搬家沒有及得到生病的麻煩。在延安，生了病，那眞是有點麻煩的。疾病是一種不幸　可是倒也是一個鍛鍊，那些勇於上戰場的人，會不會不習慣於病榻？疾病，也是需要耐心的，而久病的人知道這個。生了病，不聲不響的睡着，「做狗」，在外邊，家裏的人都這樣笑我，我不是迷信吃藥的，睡着，餓幾頓，這是我生病的習慣。有些人生了病，亂找醫生，醫生一轉背，希望病馬上就好，同望過的人興奮地談話，談他的病狀，完全不知道休息了。在邊區，一切受物質的限制——生病人自的然而然會做狗」——就是感情，也好像一樣。什麼都是爲了公，沒有私的友誼。生病的人不用担心來探望的人太多，就是拿一點開水，病人自已沒法爬起來取。不過這是一個健康的青春的城市，生病的人怕並不多的。說得太遠了，回頭再說搬家罷。每一次搬家，我總覺東西太多，其實我並不曾帶什麼東西來，可是比起那些抗大的慣於行軍的學生，我的東西眞太多了，每次搬家，我總拋一點東西，離開江西，直到現在，已經拋的，送的，捐的，剩了這一點，還覺得討厭，將來，我可以變成一個痛痛快快的光蛋。

每逢搬家，照着我自已的習慣，把離開的窰洞打掃乾淨，至少，收拾一下，不至太髒，及至搬了一個新的地方，又要將那新居窰洞打掃　收拾一番。

有一次搬到一個窰洞裏，那個窰洞後面有一條小街通到隔壁一個窰洞，我進去打掃，發現在我這邊的小街盡端，有一個小便缽頭、滿滿的而整個小街裏，零零散散的堆積着許多髒紙頭。

我聽說這個窰洞本來是一個學校的圖書室，後來曾暫時住過學生，我的直覺，覺得街裏的物件大概不是這些學生留下的，多半同隔壁洞裏的人有關係，因爲那紙頭恰恰是從那窰洞的小街端開始散出的：而我的窰洞裏雖然有炭屑，灰塵，但沒有這類髒紙頭。

「旁邊住的是什麼人」？我問那個幫我搬家的一個朋友的小勤務，他似乎十分驚奇，他已經與我熟識，大約從不見我探聽鄰居及旁人的一切。

「一個ㄨㄨ的教員罷，我也不知道」。

我以爲是一個女子住的，但不，是一個男子，因爲女子有時有些奇奇怪怪的特別的習慣，或者不方便，但也不該堆着這些廢紙頭，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小街不是拉圾桶。

窰洞再過去，住着一個也是ㄨㄨ的教授，我曾在一個朋友處見過他，從前是東北軍裏的一個團長或是旅長。

「你搬到這裏來了？」在窰洞外，他望見我，招呼。這位先生是很有趣味的，直爽，多話，像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婆婆，最會談那些芝麻細碎柴米油鹽這一類東西。

看見我在生炭火，——我很不歡喜人家看見我生炭火，人家一定要說我糟糕，沒有志氣，或者說我一天就是弄東西吃，實在，這有什麼呢，可是這些念頭在人類的集團裏總是會有的，平常我總躲了起來——，我來不及走進窰洞，他說：「我來送把扇子給你，好得很，你看，只要扇幾扇就成了。」他去拿了一把破的扇子扇起來。「你留着自己用罷，我也有扇子，不過已是破得不能用了，」我說。「不、這扇子也不是我的，是人家拋了的。」

「隔壁住的是什麼人？」我向他。

「你不知道？我們學校裏的哲學教授」。

「呀！我沒有看見他」。

「你不認識他？就是那個面孔上……」

「面孔上有天花疤的？」

他笑了一下。

「唔！」

「怎麼嘍？」

「沒有什麼」。

「這個人脾氣有點古怪。」

「啊？」

「那個小街裏有許多髒紙頭還一類東西……是不是？」他走近我輕輕地說。

我笑了出來。

我把紙頭都掃了出來，堆在窰洞門外燒掉，把那鉢頭放在窰洞外與鄰居接連的泥台上，「請他自己去傾洗罷」，這個事情我是不願做了。

在窰洞外拾了些人家搬走時候拋掉的破凳子，木板，放在小街的中間，意思也不過是告訴鄰居，這是「楚河漢界」，他如要拋紙頭，請他不要拋向我這邊來。

一天、二天……鉢頭沒有出空，太陽晒着，發出極濃郁的臭味，旁邊一個朋友，他說：「怎麼？這個朝天香爐還沒有出空？」天天晒着，愈來愈淺，臭味也愈來愈濃了。

那天、X君在我窰洞裏，鄰居跑來了，他一直跑進我的窰洞，一邊喊：「X同志在這裏？」

這位XXX同志，哲學家，這位……X君介紹。

哲學家，沒有理會，我笑了一下。他起勁與X君談話，學校要搬家他該跟了走——並不是人家强迫他，情理是這樣的——，但是他不願離開延安，「我不願離開一個政治的中心，」他說，並問X君的校裏需要哲學教員不，他很歡喜到X君他們的學校裏教書，……我倒了兩杯開水，就走開

了。

却斷續的順耳聽X君對這位先生做政治工作：「學校需要你到那邊去，我想你還是去的好，那邊工作重要……」哲學教授打斷了話，好像提到什麼服從不服從，……X君說：「那倒不是這麼說」……彼此說了許多話，好像X君勸他去，而他則要留在延安，政治的中心，要X君去問他們的學校，說他歡喜到他們那裏教書。

這位哲學家，他進來的時候，如入無人之室，出去的時候，也沒有想到這個窰洞的主人是誰——窰洞不是我的，但住着的是我——毫無禮性的向X君告辭，轉身就走了。

「你對這個人的印象怎麼樣？」X君坐下問我。

「我？我對他的印象？」我笑了。

次日上午，X君又來了，那幾天X君來我處很多，幾乎每天來，後來，我才從X君的友人口中得知那幾天X君爲了感情上的什麼很痛苦着，他做不下事，常常東看看西看看朋友。我心裏開始覺得有點厭煩，但又下決心克制這個厭煩。

有些人已經開始驚奇我在延安的生活，其實在延安的客人的生活，——不過平常客人留起來至多幾星期，我却已幾個月了——誰也要感到驚奇的，也不止對於我，因爲這些人的生活多少總是缺乏紀律性的。「她躲在窰洞裏做些什麼事呢？」「怎麼？你還沒有寫完？」（其實人家背後的批評一定不止這個，不過自己是無法知道。有時成功了輿論，人自己還沒有知道所以然，除非敏感一點的人）人們以爲寫東西是非常容易的，今天參觀一個地方，明天一篇「參觀記」出來了，今天同一個人談話，明天把「談話記」寫出來了，就像一隻打字機。由於這種見解，對於拿筆頭的人的私生活感到神秘，不理解，感到這種人是無論如何不會羣衆化的。拿筆頭的人的工作方式，我想也不外

這樣：收集材料的時候，動着，要寫了，就必得靜下來，需要有一個時間，關在窰洞裏。
「你這樣一天到晚不出去，你寫、如果一個朋友不來，眞可以同外界隔絕了，」X君說，雖然從前也是搖筆頭的，似乎也有些一般人的見解。
「沒法，我急於要寫完這點東西。」這樣，我只好完全把紙筆收了起來。寫、我是一個外行人，而且我早已下決心拋掉他，現在還在寫，眞糟糕！
X君同我談着他在上海時的文壇情形，似乎他的感情受到了激動。從前、我也有過那些激動，好像總受到寃屈，但現在早沒有了，這些激動，忿慨，當對人類期待與估計得太高的時候就會有的。
當X君激動而興奮時，好像一隻刺猬，牠的刺一直是豎起的，戒備着有什麽東西要損害他，這樣做人不是很吃力的，可是X君常常這樣興奮着。我猜想有些人對於他的攻擊是一個原因，但爲什麽人家要攻擊他呢，也不是沒有原因罷。人家對他不高興，所以X君老放出他的刺，X君老不放下刺，人家老對他不高興。這樣循環着。
我常常想，爲什麽X君歡喜到我這裏來談天，而一般人一定在奇怪我同他交際，延安有多少有名望的有學問的有地位的人，可是我想我不配去交際，我是一個極平庸的缺點極多的人，交際那樣的人，好像是去沾光了，好些人在我面前說他不好，可是我還同他維持友誼。在國外，一位醫治我胃腸病的熟識的醫生，他分析我的性格，說我是一個「Grand Timide」一類裏的人，這類的人 他們常常「被」人接近，當然這是一個極大的缺點，不過在被接近的時候，有的能够不被同化與不被牽引。一個人或多或少有些缺點，——缺點叫害自己，人格不好損害別人——這些缺黏常常損害每個人自己，對於x君也沒有例外，他有好些缺點，這些缺點損害他。人與人之間往往動感情，誰能

够以人的立場，寬大而冷靜的觀察與對待他的同類，眞是不容易啊！

莫泊桑在一篇小說（忘記了名字）裏寫一個墮落而祈求自新的女子好幾次離開原住的城市，到了一個新地方，起初，人家不知道她的過去，從她對工作及生活上，大家尊敬她，對她印象很好，可是，漸漸的，從原來的那個城市有知道她過去的人來了，他們宣佈了她過去的一切，那個新地方的人對她不好起來了，她又只好離開那個城市……這樣，到後來，她自殺了。

到我這裏來X君放下了他的刺，他安靜而休息似的談些不相干的天，這就是他歡喜到我這裏來的緣故？他的針刺，他的極富於地方色彩的精明，有點近於刻薄，庸俗，他的怪僻他的貪舒服享受……我都不管牠們，我只接受了他的聰明。這是一個聰明的人，可惜他自己太明白他是聰明的。

有一次，我同X君偶然在一個地方遇到，漸漸地，在談話中間，X君又開始放出他的針刺，我坐在窰洞邊的矮凳上，笑了一陣。後來，X君同我一起下山，他所住的地方與我的是同一方向，兩個人就一同走。到城門口，遇見○君，他遠遠就喊：「今天我來看過你，你不在，我把你的書回你了，投在門裏」。走近來，○君很不自然的招呼我，他的一隻眼睛好像閉了起來，特然變小了，嘴吧遍往一邊，想笑而又笑不出。我已經觀察出當○君每次不快意的時候，就有這副神氣。這個神氣，是使我覺得可怕的，難堪的。好像英國小說裏所描寫的海盜，他們的一隻眼睛會動，能大能小，就是這個聯想使我起一種可怕的感覺。

我也曾聽到人家說X君與○君之間是有意見的，可是我從不想去知道這裏面的一切，但今天，○君看見我同X君在一起走，心裏是不高興了，引起種種猜測，特別是猜測X君一定說過他許多壞話，這些壞話我都相信，對於X君呢，爲了○君與我招呼，回書，也一樣的猜測。

進城門後，X君開始問我：「你對於剛才這個人有什麼意見？」

「沒有！」我說，一般人看起來我同這個也很好，那個也很好，可是實在說，要問我這個那個是怎樣的人，我却不知道。」

「你不要遮掩你的觀察了！你……」X君似乎覺得我在虛僞。

「你要我怎樣說說呢？我不會說與我心裏相反的話，可是有時當我覺得沒有話，或有而不高興說呢？你看我還是老實的。」

X君笑了，他開始從頭至尾述說他與〇君認識的經過。走過機關合作社，他邀我進去吃一點東西，推却在這種時光要遭受X君的不高興，懷疑，興奮，不安的，我接受了。

我們叫了一個八寶飯，一隻蝦米白菜湯，人們驚奇我們兩人的行蹤，也驚奇這兩隻菜，因爲大家都是來吃肥肉的。人們的眼睛張得那麼大，可不是，在一個黃昏，一男一女走進館子去，還該有點特別罷，就是在邊區，也還有點特別罷？「讓少見多怪的人開開眼界也好！」我想，就吃着八寶飯，X君一邊講着話一邊吃。

有幾個青年對X君招呼，並走近來同X君說一，二句可以免掉不說的話：「你來吃飯？」或「你吃什麼東西？」以便看一看清楚這個同X君一起吃東西的女人是怎樣的，而從這裏猜想出許多事情來，建造一個「西班牙的別墅」……實在，這一切，真太費心了。

別人常常要替別人費心，這是常常有的，在外邊，從前，有一次我特然理了輕裝到上海去弔喪，四周的人以爲我同家裏鬧亂子，要離婚了，因爲那次送一個敬愛的朋友喪，曾經哭了；又有一次我去望一個朋友夫人的病，車夫以爲我去赴情人的約會，回來時問我是否該不說這個訪問，向我要錢……實在可笑的，別人是用不到去費心這些事的，每個人自己的事自已知道，也知道自己管理。

延安是中國人住着的地方，十足中國的，男女間要未成爲夫婦，要未就不理睬。友誼，這是太費解

」。

從機關合作社出來，天已暗下來了，X君說他可以送我到山上，我謝受了。在路上，我們還遇到一些熟人，特別是X君的熟人。「XX在你家裏等了你半天，各處都找到，原來……」人們轉而望着我。

平常X君說話帶點半真半假——至少給我的感覺是如此，這晚，他認真的對我敍述關於○君，努力克服他的興奮，他好像很珍視我對他的友誼及印象。實在，他何必呢，對於○君，這樣庸俗而迫切於名利的人，何用伸說與忿慨呢？這或者就是他們間合不來的原因，爲的兩個人都有忿慨。

那天，X君談到文壇，由文壇而談到文化人，談到團結與領導文化人。

「做一個領導人是不容易的，這是一種技術。領導文化人更不容易。做一個領導人需要和暖得像春風一樣，使人人願意偎倚着他，親近他，然而在底裏，他又要是十分堅決的。」可是我雖這麼說，真是一篇鬼話，因爲我得承認，對於領導，對於文化人，什麼也不知道，不了解。年紀大起來，我只想簡簡單單做一個人，對於文化人，還沒有螃蟹的美味那麼使我關心了。我確是太不長進的。

近午飯時，鄰居推進我的窰洞門，一邊喊：「X同志，我請你吃午飯去」。他隨接坐下，與X君又談他也不願離延安的事。我倒了兩杯開水，走開了。

我的飯菜來了，鄰居拖着X君走。X君有點爲難。

「大家在我這裏吃罷。」我說。

鄰居拖了X君出去，進出都沒有打招呼。

有人說延安人的嘴吧多少有點饞的，但我想也不是個個如此，所以我更沒有怪鄰居連客氣話也

不說一聲，因爲我決不會一呼就去的。

X君吃過飯，又回到我窰洞裏來了。「我們吃了三不粘與紅燜雞……」。接着，他說：「這個人眞傻，在吃飯的時候，他說他不想到我還是這麼年輕，「這麼大的名望，一定至少在四十以上了，你成名這麼早……呀。」眞傻！」X君笑着。「我問他多少歲，他說二十九，但對人家說三十五。還沒有結婚，不過對人家說已結婚且有了子女。「一定要這樣，年紀說大一點，又有了妻兒，這使人們對於我的學問的威望更加可以增高」。

我怔了一下，忍不住笑出了聲。

「我對於他有三個不同的印象，第一個當他從日本回來，在上海出版他的翻譯XXX，其實翻得並不好，而他對於哲學，是並不好的，一輩盲目的青年大大地捧他，那時國內正在哲學高潮的時候，他的風頭健極了。接着就有好些人批評他的譯作，一下子被打下去了，他變得十分狼狽，這是第二個印象。去年，在XX見到他，他神氣十足，大學教授了。這是第三個印象……」

「聽說他有錢，常常請客，有什麼人常來看他？」X君特然問。

「倒沒有注意，」我說，「有人帶了錢，到這裏來請客的？」

說帶錢，也不是什麼數目，千把或幾百，在延安用以上上館子是很舒適了。他在XX住了一年多，每月百餘元薪水，他該帶了千把塊錢來。」……

他的窰洞門外堆積着館子裏的碗碟，幾乎每天有，他該吃不慣公家的小米飯，常常叫麵及菜來吃罷。

送來一陣尖銳的女人的笑聲，X君停住了話。「什麼？」

「他該有個一女友罷。」

「噢！這樣的！我去……」像旋風一樣，X君立起來走了。

「唉！你去做什麼呢？」

X君大概只聽到了一個唉字，其實就是聽全，也不會信從，結果我當然責備自己多說了這句「他該有一個女友罷」。

X君對於人事有這樣的好奇，雖然有時好像帶一點稚氣，對於男女間的交際，他這樣關心，對於這樣的男子，一個女子須保持距離，他不是那種歐洲社會上的可以在一起無邪地跳舞，溜冰找正當娛樂的男子，這還是一個中國十七，十八世紀的才子，雖然在有些部份，好像已經新到了極點。

直到吃過晚飯，X君又來了，談鄰居的事情。有的人可以覺得這位女士找着了一位名人，有的人可以覺得她嫁這人而可惜。她對人說，「過不慣集團生活」，很簡單的，她想結婚了，一個女子結了婚就完成了她的事業。一個女子總想嫁一個地位比她高的，藉此可以跨上一步，男子對於妻也總要提一把，封建社會裏的人總不免有點如此。也許她還愛他身邊幾個錢，誰知道？女子愛物質勝於名位，男先生們不是這麼笑的。特別在延安，這樣窮的地方。

X君觀察到我對這些談話沒感大興趣，特別，他一定覺得我早已不在等待他來談天了，但仍是笑微微的敘述，問我的意見。

次日，X君又來了，鄰居又來約他吃午飯。飯後，這次他們倆一同到我窰洞裏來。

「呀！你是……」！鄰居第一次招呼我。「你的名字可不像女文學家的名字」，他笑着，用了隨熱而可愛的口吻。

「何所見呢？」X君半真半假的。

「像ㄨㄨ，像ㄨㄨ，大都是有草字或玉字的。」

「要不要取個紫娟，香菱，或者乂乂，像你的女友，象徵乂香甜又純潔？」這個滑稽而帶刻薄的念頭穿過腦子，笑了出來，立刻我覺得太不好了，連忙忍住笑而責備自己。

可是這個笑已傳染給X君了，他好像還猜中了我的念頭。X君，有時使人覺得滑稽，不討厭，這或是他的中國舊學問在作怪了，非常幽默的。

我出去，就這樣把他們趕了出來，鄰居回到他自己窰洞去了，X君與我下山去。走了一些路，特然，X君對我說：「他們的事成功是成功了，但並不圓滿。」

我怔住了，「你說什麼？」

「你的鄰居哲學家！」

「呀！你又來說他們了！」

「我有證據，」他從袋裏拏出了一點破紙，拚合起來：「我做了你愛情的俘虜」。

「這正是哲學家的筆跡。」

「天知道！」我笑得彎轉了身。

「你什麼地方去弄來的？」

「你們的窰洞門外拾得的。」

「唉！」我笑着嘆了口氣。

如果在別人之前，X君恐怕不會這樣天眞坦白的，別人或者要誤會他或因此罵他。但是我原諒他的稚氣，我覺得這還是稚氣。

多髒！地上拾起這些破紙頭，還放在袋裏」。可是一下子我想起從前在國外許多同學們的古怪脾氣，乂，常常把她的情書寫了個頭堆放在桌子上：「乂，我的心」，「乂，我親愛的朋友」，一

張一張的散着，一邊看書，一邊聽無線電音樂，

「我做了你愛情的俘虜，一方面可見他不是愛情的主動者，並不圓滿，一方面，他已做了她愛情的俘虜，事情已成功了。」

我只是笑着。

愛情！愛情！「前方正酣熱於炮火，後方一切還照舊繼續着，人們戀愛，嫉妬，相摶……忽然記起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裏的話來。

下天，X君沒有來，但鄰居却來討開水：「陳同志，給我一杯開水。」

我正遲疑，開水，熱水瓶裏還有一點，但這是留以保護熱水瓶的。瓶空了，等下冲開水，須把熱的倒出一杯，涼了再可放，否則胆會破的。

「人家連招呼也不招呼你，你還要給他開水，總之，這個人一點也不使我同情，他不像是一個人。」

窰洞裏恰恰有一個朋友，他對我說：「回答他沒有！」

開水確實是沒有了，但經他這麼一說，我反回答不出來了。

「人家當你傻瓜！好！那麼以後他天天來向你討開水，你天天給他燒開水！」又恨自己做不出事。」

「你急什麼呢？做傻瓜也就是！」因爲我笑得很利害，使這個朋友發急了，其實，在平常，這人對人是和氣的。

「開水沒有！」他這樣回答了，幾乎對我有點生氣。

在春天——北方三月初，還該算冬天罷——，早上四，五點鐘是最好睡的時間，可是鄰居，在

這個時候，好像已經起來了，但又不像起來，因爲通常，在七，八時才見他的勤務打洗臉水來，他一直哼着哼着，好久好久——一，二小時，直到天亮。

「……父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我們在太行山上……」一隻很雄壯的歌曲，給他哼成像小調，在睡夢中，嗡嗡地像無錫的清早，街上收買灰的叫聲與出賣灰的喊聲，一樣的：「灰！灰！灰！」真討厭！好幾次我有點煩燥。

鄰居的勤務是一個啞吧，但他偏偏歡喜說話，歡喜探聽所有的一切，與報道所有的一切。有一天近晚，我出去了回來，上山遇見了他：「嗚嗚」！他見了我喊，攔住我，交我一張條子，我想朋友送信誤交在他手裏了。拿起一看「……客飯……」，「哦！」不及看完，就交還了他。可是他覺得我沒有看懂，對我做手勢，指指他的嘴吧，意思是說鄰居今天有客人在吃飯罷，在窰洞外，他時常對人做手勢，說他是護關鎗手。他的手代替了嘴，雖然說不出來，但都能比做似得出來。附近一個朋友的馬，騎回來，他常常爭去回給馬房，可以騎一下子。有一次，那個朋友騎出去了回來，大約等一下又要出去，就把馬拴在窰洞門外的一個木頭上，等到那個朋友出來，一看馬不見了，他有一點着急，及至到馬房裏去看時，馬在那裏，說是啞吧騎回去的。

那天早上，人聲喧鬧，照例已哼過無數次的「打東洋……」，夜間我曾鬧肚痛，到早上七時還不起來。剛剛起來半個人，穿好上衣。窰洞門外在鬧架，附近的一個朋友走在門口。我問：「什麽呀？」

「啞吧送上一隻驢子來，他叫送還去，要一隻馬，一隻白色的脚上有……的馬」。

「哦！怪道話那麽多！這樣的脾氣，做他的夫人一定難對付的」。

「那誰知道？也許昨天早已說好他騎一隻白馬，今早馬房裏送一隻驢子來，也許這隻驢子他知

道脾氣壞的，自然要換。」

鄰居與他女友走進來對我辭行，乂乂女士還走到我床前握了一下手：「陳同志，我們再見了」

「再見！祝你們兩位路上安好！」我說，眞抱歉，來不及送你們行了！」

「乂乂，（我喊附近朋友），對不起，請你代我送一下行！」我知道這是一個極不好的請託，但那個朋友並不拒絕，反對，等我起來時，他立在山坡上，還在送他們。早已走遠了，他指給我看「在抗大合作社那邊，那一羣四，五頭馬的就是。」

這位鄰居終於離開了延安，但好似聽說X君曾受到批評，人家說他拉教授，這自然是一個小小的寃屈，X君曾吃了這位教授好幾次飯那才是眞的。

在鄰君走後，起初的幾個早晨，聽不到臨臨然的歌聲，反而覺得很寂寞。

IX 幾位老革命家與幾位國際友人

好幾位老革命家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與感動。董必武先生我曾見過一面，覺得他在嚴肅中充滿了慈祥與和藹。好幾年來，我特別歡喜親近老年人，覺得年老的人，對於他們的子輩孫輩，因着他們學識的淵博，生活經驗的豐富，常常有寬大的胸懷，深刻的理解，曉通的人情。老年人，他們與我之間因了年齡的懸殊，學識的懸殊，生活經驗的懸殊，而成爲我仰慕的高山。年輕人是無法可以同他們爭勝的，也無可引起嫉妬。可是，在年輕人自己中間，常常爲了事業上的種種好勝競爭的結果，引起嫉妬。我覺得最可怕的是嫉妬這個感情，牠使人類相互間遭受無爲的損害。其實，在中國，封建殘餘的毒根種在人們的身上，這樣的社會裏，一個女子，交際異性，恐怕還只有老年人或者小孩子，這是我回國以後幾年內所感覺到的。爲了什麽事情，或者爲了偶然，你交際了一個年齡相彷彿的異性朋友，這位先生如果有太太的，那還好，但如果沒有太太，或者有太太而這位太太又並不賢明，那麽不是自己遭受到閑言，就是害人家夫婦吵嘴。人與人間的友誼我歡喜保持平衡的關係，我不能忍受上對下或下對上的關係，那種關係，我在封建家庭裏早已受够了，這自然是我性格上的缺點，但是有什麽辦法呢？老年人，他們會像一個仁慈的爸爸樣，寬恕我的缺點，而我呢，獻給他們以我的仰慕與尊敬。

去年十月初能，一天上午，去訪吳玉章老先生，老人家從重慶到陝北，車中顚了好幾天，在路上就開始病了。六十多歲的人，走這樣的路！那天恰恰有醫生來替他診病，這樣，他們都到旁邊窰洞裏去了，中間客室窰洞裏只剩了我一個人，我走到廊上（那是些石窰洞，是用石頭砌成的），朱總司令正從外面走進來。

「你看誰？呀！我知道，你望病，看吳老」。他笑着說，「他一來就病」還是帶着親切的笑，「有醫生在看病？」他用手指了一下。

回進中間的客室，吳老先生也出來了，他穿着一套米色條子西裝，脚下一雙皮拖鞋，帶着莫斯科與巴黎的新鮮氣息。勤務拿上一盆水果與一壺開水來，吳老先生倒了一杯開水給我。

「這水多髒！」他望着他自已杯裏的開水說。

「可不是？」我回答。

「吃點葡萄罷！」他說，拿起一把葡萄放在開水裏洗。因水而講到怎樣做沙濾水，在延安，環境困苦，但也還可以做的，我應着。

在這裏，我過着客人的優待生活，比起延安的八路軍老幹部與學校裏的學生來，既然說不上紀律性，更談不上吃苦耐勞了！有時，在這種比較之下，精神上受到自己極大的譴責，會感到深深的苦痛。但是說到沙濾水，却也引起想到在外邊，我們連洗碗也用燒開過的沙濾水。

朱總司令從左邊的一間走出來，坐下，吳老先生與我，結束了水的談天。

他從袋子裏摸出了一把小刀，把一隻沙果切成四塊，削起皮來。這是一把德國製的精緻而銳利的小刀。這把小刀引起了我一些奇妙的想頭，我想對他說，但又不敢說，只是呆住了望着朱總司令削沙果皮。

兩位老人似乎有點奇怪我的呆木不說話，以爲心裏生了什麼鬼。

「你答允我的照片呢？」我問，但又驚奇自已這一句簡單的問話，像對一個老同學說似的口吻，實在，我沒有思索過這句問語的格式，如果我思索，我就根本不會說出來」，好得吳老先生在旁邊，好像鼓勵了我的勇氣。第一次在陝公見到朱總司令，我曾向他索一張照片（當時成校長在旁，

我想一個女子向人要照片是不大好的，而且我還是第一次，我說明是寄給一個雜誌的），當時他答允了，並且我把我的地址抄到了他的簿子上。過後，成校長說：「朱總司令允了的事，隨便是怎樣小的，他都不失信的」。

「還沒有印出來」，朱總司令回答，他似乎驚奇我還沒忘記。

「可不要失信呢」！我想說，但這回思索了一下，就沒有說，只是笑了一笑。後來，我看見文協會裏掛着一張朱總司令送給文協全體同志的照片。

後來，吳老先生坐到一隻帆布椅上，又談了些話，談到大公報裏吳老先生的老朋友們及我所認識的。

這位完全像歐洲老年人的吳老先生，他使你感覺到這樣可敬可親，好像你不同他說什麼話，他已經完全了解你，在他之前，你可以坦白真誠，就是你的缺點，也無須遮掩。

我見着徐特立老先生是非常偶然的，那天，徐老先生來參觀附近的一個機關罷，路過我的窰洞，那幾天，我接連有四，五夜沒有睡覺，上一天近晚非常疲倦的睡下後，下一天就起不來了，發燒。為要透空氣，窰洞門是開着的，走過門口，徐老先生與幾位先生立着，望了一望窰洞，

「請進來坐一坐罷」？旁邊一位朋友見着他們說。我生怕，不會招呼陌生人，睡在牀上，窰洞裏又是堆得亂七八糟的，覺得很窘。

「請進來坐一下罷」！我終於說。

「不，我看看」，滿盈着一面孔母親樣的慈祥，徐老先生笑着回答。

在延安的街上，有時可以遇到一位個子不頂高，不胖也不瘦，頭髮花白，臉色紅潤的老者，迅速而堅決的步子走着路，那是林伯渠老先生，人家說林老先生是特別長於處理財政的。

康生老先生該也有五十多歲了罷，長長的個子，常常穿着皮靴，也完全像一位歐洲老者，但與吳老先生的作風是不大相同的。好像有一個很快樂的性格，同着他，會使你感覺到同一位歐洲那些上等社會裏的老年人交際。很健康，敏捷，一雙銳利的眼睛，好像能够把他所見的東西從正面透視到背面，我想當然是有深刻的觀察，長於心理分析與綜合。恐怕是最複雜的事情，他眼睛裏都會看出一個頭緒來罷。

他老先生與他的夫人趙女士很好客，把好的東西請待客人吃。脾氣也是頂豪爽的。在他那裏，喝到咖啡，與蘇聯出產的葡萄酒。那種葡萄酒的味眞美極了，不會而不好喝酒的我，也不能不加以讚美，那味兒是清沉而甜甜的，但一點也不澀口，或感到口喝。比香檳之一種最好的 Maucewx 還要好或者可以比擬一種希臘酒，我還是在歐洲，一個朋友——一個保王黨，拿普侖派者——家裏喝到的。康生老先生善於跑馬，我歡喜聽他談馬，識馬，與騎馬的技術。越是胆小怕跌交的人越要跌交。這是非常正確的。我見了馬，有點怕，有一次，騎上一隻馬，而前有一個朋友攙着韁繩，忽然間，正走着，那馬倒下，翻起身來，幸而那個地方是平平的草地，我看見牠坐下時馬上跳下，只壓痛了一隻脚。可是從此我更怕馬了。

幾位老革命家的精神，像殉道者一樣的堅決與犧牲的革命精神，他們的毅力，他們的吃苦與耐心，眞是超常的，或者，也只有東方民族，有這樣特出的富有毅力的老年人。

現在談到幾位國際友人，來延安的國際友人是很多的，不過大都是參觀，很少有較長時間留着的，我來的時候，史沫特萊女士已不在了，她在延安與前方都曾留較長時間，八路軍裏很多人知道她的名字。李德先生是大家知道他的名字的，外邊有幾個雜誌上有的文字曾提及到他，還有的是馬海德先生。

馬先生的個子不高，胖胖的，有着阿剌伯或別的東方民族的血統。他在延安，是無人不知其大名的，有極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眞是四面玲瓏，八方圓通，沒有一個人不歡喜他。晚會的時候，人們提議：「歡迎馬海德唱歌」，馬先生就唱起「送哥哥，打日本，啊唷啊唷……」人們是百聽不厭的。他能說順利的中國話，「一塌糊塗」，「莫明其妙」（有人教他說莫明其土地堂還要好），他不但是一個中國通，特別是一個延安通。延安人人都知道他，他也什麼都知道，那一個人住在什麼地方，最近到了什麼來參觀的客人，他一定能確切回答你。

馬先生在中國，在延安，留了這麼久，比我，一個中國人還認識中國與一切我想他一定有許多對於中國與中國人的寶貴意見，什麼時候，我能够看到聽到他這些意見，或者在將來，我有幸氣讀到？

當然，中國民族有極大的缺點，一個受着強鄰侵害的民族，自然不是無因，本身有着許多弱點。百餘年來，中國受帝國主義軍事與經濟的侵略，半殖民地意識普遍了中國人的頭腦，有時甚至在思想前進的人身上，也找到這種可憐的意識，馬海德先生住過上海，現在又走到這樣偏僻的內地，自然都看得淸淸楚楚。但是中國民族也有很大的優點，自從東北四省淪陷之後，一般外商，德法等國商人，都說不能，也不能在那邊做生意了，從前，同中國人做生意，是最容易的，中國人最守信用，不必一定要寫契約商約，平常口頭說一句，都是「一言既出」遵守着做的，可是日本鬼子不同，最沒有信用，寫定商約，還要變卦。中國人民還有極大的忍耐力，他能忍受一切的苦痛，並且常常會用寬大的胸懷，對付他們的敵人，所謂「以怨報德」。他們對於生活的需要與祈求非常簡單，世界上很少有民族能比到東方的大陸民族，中國民族這樣富有耐心與韌力的。就是用着這個了不得的武器，耐心與韌力，我們與胸量狹小，出乎反乎，殘暴不仁的日本強盜作持久戰。說說中國的

語言文字罷，雖然複雜，也是美麗，完全，純粹而且和諧。

李德先生與馬海德先生不但他們的外表是不同的，看去他們的性格也好像有極大的分別，李先生是長長的個子，他的面孔，他的神態。完全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人家對於他的傳說很多，好像是帶一點謎似的。這是一個方方正正的歐洲軍人，外貌很嚴肅，極紳士的，這樣的軍人，使我聯想起巴黎的那些陸軍軍官與陸軍大學學生。在國家有事之秋，就產生出許多衛國的大將軍，而想到他們的「限制服裝」（或譯做枯尤服裝，要一定講究的服裝）的高貴嚴肅的跳舞會。有人說李先生曾經非常闊做，為什麼呢？我想該不會罷，一個國際主義者，在他們，不是對於所有的民族都是平等看待的？我能够理解一位從歐洲初到中國的外國朋友，他們對於中國的估計，他們的心情，他們不但生活有時覺得不慣，也許會引起一點失望或卑視的情緒。這是可以原諒的。還記得我同着我的小孩回到上海再往鄉間時，在滬杭車中，小孩子會有這樣的思索：「越走越不好了！」過新加坡，小孩就有這一句話，鄉間的小木橋與廁所，小孩總表示看也不肯看一看，在生病的時候，他竟會說：「我們回到法國我的病就好了！」或者中國是有一點神祕的，他有廣大的土地與衆多的人民，生產方法與工具，生活的方式是這樣原始而落後。如果不去理解這民族的潛伏力，那一定是毫無趣味的。有些外國朋友，他們對我們的抗戰表示驚嘆，是的，我們已經支持兩年，但不止全國許多領袖們指示，就是全國人民也確信只要我們團結，打下去，堅持下去，做最後一個放下武器，我們一定勝利。聽說李德先生是一位軍事專家，我想，如果在歐洲，正規軍配合上機械化的軍器，同着熟悉的地理與人情，他能發揮他的才幹。在中國，情形恐不同。對於一個人才的使用，或者說一個軍事路線，政治路線，關係是這樣重大，關係到多少生命與多少的物力。

有一天，馬海德先生請了些朋友，到他的窰洞裏，吃晚飯。他的飯菜是勤務員做的，那晚是一

隻菜湯，西式做法，不過裏面放的羊肉，切成一小粒一小粒中國式的，其他，加上幾隻叫來的菜●兩個窰洞佈置得非常精緻，可够得上算我所見的，延安最漂亮的窰洞，一個大的，可以容納五，六十人開會。晚飯後，留聲機的音樂響起，有的人就跳舞。外邊的人聽着我說這個，恐怕要嚇壞了。這好似我供給了有些人謾駡我個人與別的資料了。抗戰前，偶然在朋友家裏跳舞，上海的某報館，當然很有錢，用了包打聽，把這些我個人的消息探得去登出來幾駡。那天，人們照常一樣的穿着軍服與草鞋，人們的脚步，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跟着留聲機的聲音轉動着。馬海德先生實在什麼都中國化了，他的跳舞的姿勢也都變成上海那些舞場裏穿袍子馬掛的老爺們的那一副樣子。眞是滑稽。我謝辭了李德先生的邀跳伐耳司。在歐洲風俗，這是太不好的，但又沒有辦法解說理由與告衷，我不會說英語，雖然歡喜跳舞，但不過是一個笨拙的欣賞者，伐耳司旋轉得太利害，要頭暈，我也不會。可是對於一位軍人，這個辭謝，他一定要以爲我太沒禮貌，或者是故意給他這個不客氣，這就使我很不安。我很想問他，似這樣的長住在中國內地，他感到苦痛不，想不想回到歐洲去看看，可是我沒有問，我想如果問，他一定這樣回答我：「集團需要我在什麼地方，我就在什麼地方，沒有什麼苦痛的。」

那晚我還聽到曾時行京，滬一帶的歌曲：「這位某先生，這位某女士……快……特別快」！「特別快車」的歌聲，使我眼前立刻映起「舅太太」與某小姐的舞影，肩頭一聳一聳，綢衣上的花綠閃鑠邊，想起舊箱子裏母親的紙衣，那時我回國不久，印象是非常新鮮而深刻。聽到這類歌聲，也想起回到上海第一次坐滬杭車歸鄉，在車中等候開車，北站的月台上無線電用蘇白廣播：「從上海到杭州，第又班車，又時又分開，又時又分到……」，接着，廣播這些「摩登」的歌曲：「特別快車」，「再會，巴黎！」「再會，巴黎，我愛你……」那時我的心境眞壞極了，我回來太遲，老母

已在一個月又十二天之前跑進了棺材。這支歌曲引起我極大的難堪，我還不慣於祖國的生活，還眷戀着遠方的友誼，與一切習慣，有些人愛巴黎的實驗室，有些人愛巴黎的圖書館，有些人愛巴黎人民的民主與革命精神，人物的國際城市的空氣，而這支歌曲裏却只歌頌巴黎的女人與醇酒。就在車廂裏，我眞的嘔吐，把早上吃的早點都吐了出來。想不到在延安，聽着前幾年的時行歌曲，還引起這些不相干的回憶。

我厭倦交際社會的生活，實在，在祖國，根本也沒有交際社會生活。中國人的交際總是很少社會性的。在那些宴會與茶舞會裏，常常看見平時熟識的人或者夫婦，在這種場所還是擠在一起，好似變成小組的娛樂團體，可是在國外，人們聚餐，偏偏把夫婦拆開來，各人配上陌生的對象，而在交際場所，一個丈夫跟着妻子，妻子跟着丈夫，好像有點不合於交際道德的。在某地，我還記得有一次，特別給我奇怪而深刻的印象，××××的夫人（我到後來才知道她是××的夫人）同××××××夫人，在舞廳，兩個人彼此拍起臀部來，發出幽默的聲音，年青的×夫人與×小姐，×先生開玩笑：「喝交杯酒」，×先生並不愛×小姐，而×小姐愉快地接受人們的開玩笑，過後，一位外賓對我說中國女子比歐洲女子着實解放，我呢，深深地體味他這句話。

從前，我歡喜的跳舞會（抗戰以後，我沒有跳過舞），是幾個要好的朋友夫婦，聚在一起，大家熱鬧一下，在家裏，穿的衣服只要自己覺得舒服，不必顧慮到別人以爲好看不好看，脚下呢，穿着平底的軟鞋也不要緊，把神經放寬了，隨隨便便的，也用不着顧到了不得的禮貌。我也歡喜那些被人們認爲黑暗的舞場裏去，有時找着家裏親近的人，同到舞場裏去，那裏，沒有一個人認識我，我們跳舞，同時看這些舞客用着貪饞的眼光注視那些流露出勉強的媚笑的舞女，她們嘵嘵不休的惡無意識的話，與疲倦的笑聲。這是一個現實世界！有些朋友笑我這古怪的脾氣，說是歡喜「稀稀奇

奇，」其實我覺得很簡單，我娛樂我歡喜親切或洒脫一點。有些人特別歡喜到那些爲我所不歡喜的場所去，打扮得講講究究，去給人家賞鑑，我不愛那樣，如果我歡喜穿那一件衣服，那也是爲了我自己高興。我最怕是被人請得去，那裏有許多陌生或半生半熟的人，這些人有的對你有好感，有的有反感，很少是漠然的，不論是好感或反感，對於你，在精神上都是一種負担。

那晚，我在十時過就告辭了，如果要說我在延安會找消遣，那麼這是僅有的一次。

X　老百姓

說到陝北的老百姓，我眞覺得是一部活的生動的廣泛而又淵博的學問，政治工作者找「一般的」去做他們工作的對象，可是，文藝工作者們却也不妨找特殊的或典型的來描寫一下。我住在延安，還沒有機會到別的鄉鎭去住過，在延安過的是都市生活——陝北的都市生活，延安的老百姓，也已經多少有點都市化了。如果想懂得他們，只有到純粹的陝北鄉村間去。

我同老百姓接近的機會很少，而接近的對象，總不過是些商人，當我同他們買東西。有一次，一個印象使我十分深刻，去年，當分剛來的時候，一天，我去找她，她住在抗大招待所，那是借一家老百姓人家用的。我找到一家人家，走進大門，是一個院子，院子中間，是一個花壇，裏面淡黃色與紫色……的蟹瓜菊正開得盛盛的，雖然說不上「六曲欄干深院宇」的那些中國舊貴族人家，但至少是一份殷實戶口，跟着我問話的聲音，走出一個老婆婆來，她上身穿着黑色的絲質夾衣，下面靑灰色也是絲一點綢質的夾褲，褲脚管用帶子束住，一雙小得無可再小的金蓮，她並不回答我的問話，只是一見我，就趕我出去。「出去！出去！」因爲身上穿着軍裝，不但關係八路軍名譽，也關係所有全國軍隊的名譽（老百姓的頭腦是簡單的），所以不會發脾氣，如果我穿的是旗袍，也是老

百姓樣子，恐怕我要問她爲什麼用這副態度趕我出去。

在冬天，老百姓，男人頭上包了一塊毛巾（我們平常用的洗臉巾），在前面紮起兩個結，（同四川同胞的用布紮頭是不同的，）不是我說笑話，眞的像生了兩隻角。他們身上穿着一件翻轉綿羊皮，也不用布縫就是乾乾脆脆的一隻皮，下身穿着棉褲，褲脚管用帶束住，腰裏面束了一根帶子。站在你面前，就像「七俠五義」中的兩手叉起的彪形大漢，可惜這裏面沒有什麼盧方，艾虎……。在你面前，他們假想你是有錢的，賣給你東西，價錢抬得高高的，反正沒有人去干涉他們。在冬天，很少見到老百姓婦女，她們該一天到晚蟄伏在熱坑上罷，躲到地下似的，好像蟄虫的生活。無論男和女，他們的兩脚，走起路來，作八字的扒開，聽說這是因爲從小騎馬與騎驢子而養成了這一個難看的姿態。他們的土坑，成年生着火，就是炎炎的盛夏，也還是生火。睡在熱熱的坑上，可不是像做烤鴨一樣？眞的，我覺得就是在陝北住上十年二十年，他們這種習慣我是無論如何沒法同化的。更說一句老實話，如果不是八路軍在這裏，我一天也住不牢，一位軍事委員會的犒賞隊長，我的老鄉，他也表示這個意見。我並不是說陝北同胞的生活習慣一定怎樣不好，不，我不是這麼說，但我同他們無法同化，這是眞的。有一次，我住的地方，邊旁幾個窰洞裏住着好幾個老百姓，他們是延長人，冬天沒有什麼耕種，到延安來做泥工。白天，他們出去了，近晚四，五點鐘，他們回來了。那幾夜，在半夜裏，睡夢中常常被一種笨重的好像打泥土的聲音吵醒，我想什麼機關這樣迫切需要窰洞，工人連夜裏都不休息。但這種聲音只響了一陣就停止了，那又不像是開窰洞，接連每夜都是這樣。好幾夜後，我的耐心與好奇已達到澎湃的地步了，那夜，早上二點多鐘，這個聲音又響起來，我起來，跑出窰洞，望了一望，發現這些聲音是從那個老百姓們住着的窰洞裏出來的，我走到他們的門口去探覘，看見他們的坑上一端燒着木柴，發出熊熊的火光，一個老百姓在坑上吸烟，一

「在地下劈木柴，這聲音就是劈柴來的。滿個窰洞都是烟，他們在烟裏面倒一點也不覺得難受，從門外望裏面，火光與烟就像火燒一樣。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劈柴，劈柴在你們白天回來的時候劈罷，夜裏是要睡覺的」。旁邊的朋友哈哈大笑，等我同他們講道理，事實上，的確，儘管我同他們講道理，他們也不懂得我的話。

我直覺奇怪，同樣一個窰洞，我不生火——而且我是極怕冷的——也睡得好好的，他們的被褥好似用得很少，他們愛火，沒有火過不來日子。

一天，我出去看朋友，走到半路，人家說有警報，而且放了緊急警報，就近，我跑進一個老百姓住的石窰洞。這個窰洞真可以叫做「宴子居」，那門倭極了，要俯下頭才得走進去。原來這本是放棺材的石墓，把死人拿出，住進了活人。坑上睡着一個長長大大的還年青的男子，胖胖的，可是面色灰精糟，好像有一種烟土氣。一個老婦人，陝北人叫「老媽媽」的，坐在坑上，玩弄一頭用細子繫住頸項的肥大的貓。她的髮髻與黑色的發亮的面孔，烏黑的牙齒，特別是那一雙手上的長指甲，使人聯想起「聊齋誌異」裏的人與歐洲神怪小說裏的木乃伊。一種比擬不出的臭味濃郁地充滿了石洞，那扇倭小的門，她用木板擱了起來，這樣，可以進來的僅有的新鮮空氣，也給她關住了，老媽媽要我坐到坑上去，實在，也沒有櫈子，我就在坑沿上坐下。旁邊還有一個是什麼機關裏的工作人罷，我們隨便談着天，無非說這個窰洞非常好之類，問到我與那個工作人員是什麼地方人，接着，她自己說，她是從米脂來的，好像幾年前，那邊年荒，沒法生活。睡在坑上的青年說她有兩個兒子，在米脂做小學教員。大家開始讚揚這位賢母的有家教，簡直恭維她高興得眉開眼笑。她不停地撫弄着那頭貓，一邊喃喃地口中發出一種特別的聲音。我担心她的長指甲如果刺痛了貓，那小畜生怕會咬她，但我的担心是多事的，她的指甲撫到貓身上，好像就變得柔軟了。她與貓的安閑慵懶

的神態，使我想起波特乃爾（Baudelaire）詩裏的安閑懶惰的非洲女人與她們的貓。這種安閑懶惰有點接近於肉慾感，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南方熟人曾說過陝北人的說話是帶肉慾感的。陝北人的舉動與話聲都非常遲緩，而他們這種安閑與懶惰，的確使人感覺到特別。但同時，我又覺得他們的可愛，他們對於抗戰的熱情，與他們的嚴密的組織。他們有的只認得幾個字，但他們的政治認識恐怕比受教育的人還高。男女自衛軍所做的鋤奸工作，如像查路條放哨等等，他們都是有着極生動的自覺性來做的。聽說曾經有三個日本俘虜想法逃跑，就是依靠了自衛軍包圍了山頭，重新捉回來的 這裏的老百姓，他們的警覺性非常之大，而且對於鋤奸工作做得非常認真。一個漢奸或壞蛋，如果一經發現，他想逃出這裏，那眞休想，除非他生起翅膀。倘使全國的各地老百姓都有這樣嚴密的組織，都能這樣做鋤奸工作！他們的愛國的熱忱，也是十分令人感動的，如像秋末冬初，小米剛剛收起，那些頭上生着兩支毛巾角的小夥子與老漢，常常背上負了一袋小米（這些袋是用本地羊毛織成的，非常結實耐用，像英國最好的毛絨料一樣，能够禦雨），他們的八字扒開的脚步，慢慢地爬上山來。「同志，你們這裏收救國公糧麼？」「不」，有人漠然回答他，用着慷慨而討厭多事的口吻。「那麼這裏近段什麼地方收呢？你知道麼？」他還是熱烈地問，一定要把這袋小米交到收救國公糧的地方。城裏十字街口連一張何處收救國公糧的佈告也沒有，結果，救國公糧收起來的數目超過預算，這是老百姓自動繳納的，這樣繳納的。

這裏的老百姓，他們非常歡喜小孩子，他們，陝北的年輕夫婦，好像不大會生小孩子，但聽說生育率並不低，死亡率很高，所以我們很少看見小孩子。像江南那樣，四川那樣，一對夫婦拖着六七個小孩子，在這裏眞不多見，許多人對我說把這裏的老百姓大量的患社會病，這眞可怕，也可担心！這種遺害子子孫孫的髒病，實在也是一個嚴重的敵人呢！多少年來這些病傳染着，散佈着 遺傳

，他們完全無知，而儘是胡鬧，變成人口這麼稀少！這裏實在可以來一個民衆衛生運動，特別是以抗社會病運動。有些八路軍工作人員，因了種種不便的關係，把小孩子送給了老百姓，他們都能很好的管養，他們特別歡喜男孩子，歡迎無條件的送給他們，如果寄養，比較少歡迎。憑着這點對小孩的熱愛，他們像自己父母一樣，但終究因爲太髒，太不衛生，太沒有育兒常識，往往容易把小孩糟塌掉。

今年新年，老百姓開的店舖及他們住居的大門上，貼着新鮮的大紅門對，沒有一副不是有抗敵意義的：「擁護蔣委員長，實行建國綱領」，「打日本爲子爲孫，除倭寇救國救民」，有的是當中一個字的橫聯：「抗戰建國」……有一次，走過一家小旅館門前，一位朋友指給我看：「這裏有一副有趣的對子。」我看，「過年敵機又來了，嚇得同志東西跑」，已撕掉了一大半。這是好像有一點開玩笑的對子，或許那個店主發現覺得不大好，已經撕去了。這付對子不知是誰做的，雖然有點滑稽，却也有一點實際的眞理。在空襲時，城裏的人只有往東西向跑，因爲出東西門是最迅速的。老百姓對於八路軍的親切與隨便，甚至於嘻皮哈臉開玩笑，這是我們常常能够見到，也一點不算稀奇的。從前，我見到別的軍隊，總有「誰敢在泰山頭上動土」的感覺，抗戰後，全國軍隊都不同了。老百姓對於八路軍這樣親密，自然因爲八路軍保護他們，而且，特別給他們種種實利。總之，在政治上，他們很快的進步了，但是在文化上，還非常落後，文化水準不比政治，這是一種公民教育，一種人情的修養，一種心理的改造與建設，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因爲文化低落，雖然政治飛躍的進步，可是在他們的性格上或者生活習慣及別的方面，還有舊時的一部份力量，非常自私偏狹排外，關門，也有一點原始性的殘忍，但是在他們，老百姓自己圈子裏，有時候他們間的親切行爲，弄到會使我感動得下淚的程度。可是在日常，在對一般人，他們很少有這種人對人間起碼有的

同情行爲。這些苦痛，讓文化水準較高的人去負担罷！因之我覺得一個民族的解放與建設是怎樣一個艱苦的事業呵！

這些老百姓，他們的經濟，好似還很寬裕，這是我的印象，因爲終究我也還沒有去調查過這些老百姓平均每家有多少財產。去年年底有一次我代一個朋友到邊區銀行去取存款，遇到幾位穿着布棉袄與翻羊皮的老百姓，他們也是取存款，有一個摺子上九千餘元，有一個一萬二千多元，又有一個，七千多元。這次有好些人上前方，大家爲了東西不好帶多，把不能帶的東西都賣掉了，買主自然都是老百姓。聽說這次買賣的數目達一，二萬元。老百姓什麼都要，小孩的斗蓬，女人的短袖旗袍，與西式的上身短衣，……她們最歡喜大紅大綠的顏色，各種綢料。她們拿起來看一看，笑迷迷的問：「這是什麼東西？」這些曲線上分清楚的衣服，她們笨都的身體實在也穿不上，但是不管五塊，八塊錢，她們也買去了。精明的人賣得較高的價錢，不精明的人——分的一件鴻章公司做的襯絨，兩塊錢賣掉了——賣得低一點，但總是賣掉的，老百姓有購買力。

無疑的，這裏的老百姓需要文化，與提高文化，這個就要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去着手了。

XI　大檢查與生產運動

去年冬天，大約十月裏龍，邊區開始工作大檢查，分做兩大部份來着手；軍與黨政學……。這個檢查是有極大的意義，眞可說是附合了將委員長的國民精神總動員——事實上在邊區是什麼都動員起來了——檢查的目的，是在把原有的優點加以發揚光大，把原有的缺點加以改正，並且建立一個更合理化的工作制度。檢查工作的進行是極其民主的，無論在學校或機關裏，任何人都可以寫出意見提到檢查委員會上去，有些機關，如像八路軍總政治部，還發出請求供獻意見書，給外來參

觀的客人與一些不參加政治生活的技術人員，請大家發表意見，特別着重於希望人家指出缺點，他們這種求進心，這種謙虛心，都值得全國倣效。

一個學校或一個機關在開檢查的時候，實行迴避，就是說該學校或機關的負責人故意走開，使得任何人不會因怕負責人的威嚴，地位而把意見忍下不表白。這個大檢查工作曾經過三，四個月之久才結束。其間有的學校或機關檢查一次不滿意，又檢查第二次的也有，非常認真。在檢查工作中，大家不但相互批評，而且也着重自我批評。這樣，在極科學而很民主的檢查方法下，一切工作的陣容又更加整齊而活潑了。

這裏最大的優點，是大家集中，與團結在一個集團的領導之下，這種優點，當然我們做客的人，並不能深切的接觸到，但我們還可以看到，感覺到一點，譬如在一個民衆大會上，儘管發言的人很多，但決不會意見粉雜，或者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使聽者莫明其妙，這種怪現象，在這裏是絕對沒有的。

在大檢查工作之後，接着來了一個生產運動，這是一個偉大的空前的運動，是的，說偉大，一點也不過分。他的意義，並不限於這裏，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重慶也立刻起了響應，而有生產會議的召集。在抗戰特別艱苦的第二階段，生產運動是有怎樣重大的意義呵！他回答日本鬼子：「不但中國有自力更生的決心，長期抗戰的決心，而且還有自力更生長期抗戰的行動」！什麼地方曾有過這樣類似的運動？幾萬人拿起鋤頭快快樂樂去開荒？自然給我的印象太深刻，可是怎樣寫述牠呢？我沒有資格，只有留給那些勞動英雄，無數的勞動英雄去寫罷。

像別的工作一樣，用着合理化的辦法來進行。機關與學校都參加了，人人熱烈地擁護毛澤東先生這一號召。他們把勞動力分幾等，勞動力弱的（身體不好的）人，做較輕的工作（病人不參加勞

動），有的用分工合作制，女同志留着做內務，幫助燒飯，燒開水，替開荒的人洗衣服，有些學校女同志也去開荒。在這裏，什麼事情都是領導人領導着做，說領導着做，這是確確實實的，離我住處不遠的山脚下一塊荒地上，在北方已經暖熱的三，四月的太陽，午後，好幾次望見陳雲先生，李富春先生，他們在那裏翻泥土，在邊區，這些是他們做領導人的快樂，而不是別的。現在那塊地上，長出了濃盛的馬鈴薯，開着淺黃色的小花。在生產突擊的時候，足足有一個多月工夫，整天開荒，耕地，打土，施肥，下種，完全同一個老農夫一樣。在拔草的時季，他們大早四點多鐘就上山去了。聽說毛澤東先生在開荒的時候，常常一邊耕，一邊說：「克服困難」。這裏的生產運動像別的任何事情一樣，領導人都起着模範作用。

我眞要替這些荒山僻地歌頌牠們的幸福，這些多少年來未得人一顧的幾十萬畝荒地，（今年開荒六十萬畝）一下子都得到了翻身的機會，而且頃刻變成了一個燦爛的世界！「四月裏來好春光，家家戶戶種田忙……（生產大合唱中的一節），人們的脚步聲，語聲同着歌聲，笑聲登上荒山去。幾朝及時雨，把那些菜蔬，瓜果，小米玉蜀黍都開展了鮮的綠葉子，含着微笑，將來，等待收成。去年，當我來的時候，我曾担心大家坐吃山空，同文協會裏的幾位熟人談着種白菜，大家以爲文人的生產該是寫稿子，賣稿子。今年，毛澤東先生的一個號召，不但所有的荒山都變了顏色，就是人也變了，許多文化人，藝術工作者都放下了筆頭，拿起鋤頭，而成爲生產英雄！到頭來還該我自已大大的聲明我的慚愧，我並沒有參加開荒，只是到附近機關的厨房裏幫助切了三次菜，好幾位女同志客氣的把我的刀搶得去，一共併起來，不到兩三小時罷。

XI 送出征

結束這幾篇拉雜的通信時，想到有一天我總要離開延安，心裏不覺茫然了。我是一個太慣於習慣的人，住久了一個地方捨不得離開，見慣了的人總是希望常常見面，忽然的一個送出征，又加毒了心頭許多惆悵。

去年冬天，我已經送過惠與瑾上前方，這兩個質樸的女孩子。她們不遠千里來到延安，放棄了家裏有得吃的安安逸逸的飯，爲什麽呢？爲打鬼子。她們在抗大學習了幾個月，決然的上前方去了。

那天大早，十二月二十八日罷，在我住的山下，延水的那邊，遠遠望見她們整隊出發，地上積着深深的白雪，天空還在不斷的飄着雪花。「別了，別了，同學們，我們再見在前線」，清脆的歌聲穿過寒冷的空氣送進耳朵，像火一樣燒燙了我的心！我的心激跳了，我還留在延安，讓我的心跟了牠們一齊去！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歸，雨雪霏霏」。我把他們顛倒過來：「昔我往矣，雨雪霏霏，……」回進窰洞裏，感到異樣的寂寞。有些朋友笑我用冷漠與靜默來掩飾自己的熱情，熱情，不，我沒有熱情。我想或者還有友愛，我該提高對於殘踏我故鄉，殺害我同胞的敵人的仇恨，減少一點友愛的感情。

現在初夏清晨的和風裏，又送走了一批朋友！立在窰洞前的坡上，望見他們走過女大面前的橋。這座延安城漂亮的橋，延安的「阿歷山大」，在夕陽裏，走在延水邊的沙灘上，一邊海景，一邊山景，遠遠望着這座木橋，「板橋流水」，又有異樣的美麗。送行的人還依依的立在橋的這一邊，出征人的雄壯的歌聲，義勇軍進行曲，漸漸的去了，旗子也漸漸消失了，走的人爲要迎接一個新的戰鬥的環境，完成他們所擔負的使命，歡喜着，留下的人呢，多少有一點寂寞與慣恐。「萬里

趕戎機，關山度若飛」，想起一些古詩，我迫切的盼望延安的詩人們寫出了一首雄壯動人的現代的送出征。

他們走了，大家偶然散過步的草地上，現在有了新來的人們的足跡與影子。呵！你們走了，當你們回來的時候，今年你們手植的樹，已經成蔭！打了多少仗？殺了多少鬼子？我們回老家去罷！故鄉的破碎的田園，向我們招手，等待我們去重新建設！我們所有的同胞，還要像現在一樣，像在戰場上一樣，手挽着手，團結成一個心去建設，啊！如果再分你呀，我呀，再來內攻，敵人是會再來的！願我們團結着去打，團結着來建設！江南的金粉是柔軟的，誘人的，要留意呢！牠們會分散我們堅苦團結的心！回到故鄉，那怕是一個破碎不堪的故鄉，我們將更加幸福，爲趕走了鬼子，爲能夠建設自由的新中國而幸福！